

1840年(道光二十年)

川督宝兴等督办马边等处防务

1840年2月(道光二十年正月),因马边、越嶲诸厅彝族人民不断爆发反抗斗争,四川总督宝兴、四川提督齐慎向清廷奏报有关加强四川马边、越嶲诸厅防务计划:每年春秋时节,彝民起事频繁,提督往驻马边、峨边、雷波三厅;建昌道总兵往驻越嶲、宁越(在今汉源县)等县。宝兴建议增拨边防经费,用库银22万两完成防务建设,包括各厅增加防兵2400多名,各厅修筑碉堡、增设炮台、大炮等项开支,并用库银37万两发盐茶各商生息,获得息银3.7万两,作为常年边防费用。清廷批准了宝兴、齐慎的计划。

宝兴,全名爱新觉罗宝兴,字献山,隶镶黄旗,嘉庆十五年进士。道光十七年由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次年实授。道光二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留四川总督任。

川东北特大饥荒

1840年(道光二十年)春,川东北14厅州县发生特大饥荒。川东北绥定(今达县市)、保宁(今阆中县)、顺庆(今南充市)、潼川(今三台县)四府所属盐亭、南部、南充、西充、蓬州、营山、

仪陇、渠县、大竹、达县、新宁县(今开县)、东乡(今宣汉县)、太平(今万源县)、城口共14厅州县,方圆一千五、六百里,自上年6月(道光十九年五月)到8月(七月)亢旱45日,各处山田、山地粒米无收,坝田有河堰灌救虽有收成,又遇秋雨连绵,半数霉烂。当年冬、腊两月,民间普遍缺粮,将所种大小麦、豌豆两豆苗株,连根食尽,以后又将草本木全部食尽。本年春,老弱辗转沟壑,丁壮流离四方,饿殍弃婴到处皆是。各县米价飞腾,每斗涨至800余文。每县濒临死亡、急待救济者二、三十万人。川省向无请赈之例,出巢仓谷救济,半为胥吏奸民中饱;民力早已十分拮据,即使斗米三钱,贫民亦无资购买。

李本忠捐资平楚蜀险滩

1840年(道光二十年),湖北汉阳大商李本忠捐银20万两,平楚蜀航道各段险滩48处,并整修纤道多处。自1805年(嘉庆十年)开工,至1840年(道光二十年)全部工程最后完成。工程历时36载,耗银20万两。

李本忠,字霄汉,湖北汉阳大商,世代从事蜀楚贸易。长江自宜昌以上,险滩密布。李本忠祖遇难于归州(今秭

归)险滩;李本忠父遇险而得救。李本忠深为痛心,先请于归州知州,愿出资削平归州(今秭归县)境内险滩,不久即告竣。又出资削平夔州(今奉节)府境(今奉节县)内险滩。前后整修长江险滩 48 处,险情大减。又因湖北商船逆水而上,每船必用挽夫数十人,负纤行走悬崖峭壁间,稍一不慎即失足坠死。李本忠再次慷慨解囊,雇石工凿崖整修纤道,以利其行。

四川派兵赴粤抗英

1840 年 6 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进犯中国的广东及东南沿海地区。

是年 12 月 26 日(道光二十年腊月初三日),清廷谕令四川省备兵 2000 名,听候调遣。

是年 12 月 30 日(腊月初七日),清廷谕令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兵丁开赴广东前线,由两广总督琦善调度。同时,谕令四川总兵张青云为赴粤川军指挥。

四川部分州县大水

1840 年(道光二十年)夏秋,四川崇庆、大邑、德阳、彭县、广汉、资阳、隆昌、江油、南部、江津等州县发生特大水灾。德阳、彭县、广汉、崇庆、大邑 8 月(七月)连天大雨,广汉水淹城腰,漂

没城内外房屋、居民无数。资阳 9 月(八月)大雨大水,江水暴涨,东南西三城门淹没,船舶往来城垛上。资中、内江、隆昌,大水入城。江油、彰明大水,中江绵雨 40 余日。南部大水,城墙倾复,田禾冲毁。合川大水,上半城及州署大堂淹没,全城街巷,所剩无几。江津各乡山水暴涨,街市尽没。

天主教四川教区重建

1840 年 8 月 28 日(道光二十年八月二日),云南脱离天主教四川主教区,自立教区。

鸦片战争前,法国天主教在四川建立主教区,统管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教务。主教有两位:冯达拉主教(1838 年亡故)和他的助理贝罗书主教。同时还有 9 位传教士、23 位本地教士和 30 位讲授助理者协助他们的工作。据 1837 年(道光十七年)统计:两个主教管辖的整个教区有教徒 50000 人。云南脱离四川主教区自立教区后,天主教重建四川主教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

全省人口数量

1840 年(道光二十年),四川全省居民总户数为 627.6437 万户,人口总数为 2666.364 万人。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川军增援广东抗英战争

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清廷得到琦善(清廷派往广州与英国侵略军议和的钦差大臣)私自割让香港的奏报后,下令将琦善革职解京,并令奕山为“靖逆将军”,驰赴广东进剿英国侵略者。

1月30日(正月初八日),清廷为加强广东兵力,谕令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各增派制营兵丁1000名,迅速开赴广东作战。次月,又谕令四川总督宝兴,再派川军1000名,火速开赴广东接应参战各部。

3月12日(二月二十日),清廷谕令四川总督宝兴,调四川前任提督张必禄赴粤作战,川军如已出境,应迅速开赴广东军营,听候奕山调遣。

3月15日(二月二十三日),清廷谕令四川提督齐慎兼任参赞大臣;酌带川军数百名,星夜驰赴广东,会同办理军务。

至此,四川奉令开赴广东前线参战的军队共4000余名。

在“三月晦日”的一次战斗中,英军炮舰沿珠江大举来犯,川军总兵张青云设伏于西宁炮台,将登岸进攻炮台的数百名英军击退。当时,四川、湖

南各军探悉英军统帅义律的所在地,相率包围馆驿。义律深夜听到喊杀声,仓惶登舟逃遁。

1841年5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增援川军到达广东时,正值英军进犯广州城。广州附近人民自动组织义勇军,到处打击英国侵略军。5月30日(四月初十日),英军在石门附近唐夏乡等处焚掠骚扰,各乡义勇军在川军将领张必禄支援下,奋起歼敌,歼敌十余名,其中包括一名英军军官。

1841年5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主持广东战事的靖逆将军奕山腐朽昏庸,战守失利。在英国侵略军攻陷广州城外炮台的形势下,向英军乞和,订立《广州和约》,允缴赎城费600万元,商馆损失费30万元,奕山须领援粤清军退驻广州城外60英里。英军退出虎门后,奕山却谎报军情,向道光帝妄称“痛剿”获胜,义律“穷蹙乞抚”,只求照前通商。并说广东大局已定,内地各省援粤军队应分批撤回原地。道光帝准其所奏,只将广西兵丁1800名留驻广东备防,四川、贵州、江西、湖南军队分批撤回各省。

川人黄开基领导台湾人民抗击英军

1841年3月(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川籍台湾知州黄开基,在鸦片战争中,领导台湾人民,抗击英军,守卫台湾。

黄开基,字自堂,四川永川县人,道光七年壬午举人,道光二十年留补彰化,升调同知、直隶州知州。当时英国侵略者企图进犯台湾,他增筑炮墩,募义勇千余人,与淡水同知曹谨形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次年二月,英舰开至大安港,他设计诱惑,使之搁浅,然后用伏兵围攻,歼敌甚多。英国侵略军在进攻沿海各省时,慑于他的威力,不敢对台湾轻举妄动。

四川派兵增援浙江、江苏前线

1841年8月初(道光二十一年六至七月),英国政府不满足于《广州和约》所得到的利益,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增派兵船66艘,英军3000余人,进犯闽浙,江浙战事纷起。

8月26日(七月初十日),英军攻陷厦门,金门镇总兵江继芸战死。10月1日(八月十七日),英军陷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守军五千血战六昼夜,全军壮烈牺牲。10月10日(八月二十六日),英军进犯镇海城,两江总督裕谦率军力战,英军凭借火力优势,攻破镇海城,裕谦投水殉国。10月13日(八月二十九日),宁波失

守。在保卫镇海的战役中,四川华阳县人、总兵谢朝恩驻守镇海金鸡山炮台。英军围攻金鸡山,谢朝恩孤军无援,与英军展开血战,最后清军官兵大部战死,余者焦头烂额,精疲力尽。谢朝恩不愿被俘,腾身入海,从者数十人。浙江人民为表彰他英勇殉国的爱国壮举,将他与当时保卫定海作战中壮烈牺牲的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并称“四镇”。

浙江战事不到三月,连失三城,清廷震怒,谕令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以文蔚、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并从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陕西、甘肃各省增调兵马约20000人,奔赴浙江前线。

10月26日(九月十二日),清廷令川督宝兴迅速在四川建昌、松潘两镇内挑选精兵,省内屯兵可以调用的兵丁也一并挑选,共2000名。委派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带队,开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11月15日(十月三日),为防守江苏海口,清廷下令将调赴浙江的河南、湖北、四川官兵沿江截留,在江苏要隘布防。

同时,清廷增调大批川军将领赴浙江参战。四川赴浙主要将领有:总兵恒裕,游击张富川、李嘉猷,都司许超、梁有才,守备伍玉林、张定川、颜朝斌,千总郑心广、王国英、李超、刘炳、熊翥飞,把总彭友泉、朱玮南、刘天培等。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川军参加浙江抗英战事

1842年1月16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川军精锐抵达浙江,与各省驰援的军队和陆续招募的本省兵勇一起被调往曹娥江前线。与此同时,清廷又将前在广东作战的四川提督齐慎调往浙江,谕令他会同文蔚充当前队,配合作战。不久,增援浙江战事的各种军队陆续到达,包括江宁八旗,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陕西、甘肃、四川各路精兵,还有山西、陕西抬炮兵丁,共计11000余名,先后投入浙江保卫战。

1842年2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主持浙江战事的扬威将军奕经驻扎绍兴,他不懂军事,迷信卜巫,盲目制定分兵三路,同时夜袭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计划,冀图侥幸取胜,收复失地。3月(正月下旬),奕经下令列阵开战,收复三城。由于英军早已探悉奕经作战时间和部署,作了充分准备,加之,清军指挥失误,军官临阵脱逃,宁波、镇海、定海反攻战事均告失败。

在这次战役中,川军几乎全部参加并担任前锋。川军将领王国英、四川藏族土司阿木穰和哈克里英勇作战,为国捐躯。

王国英,四川崇庆县人,川军守备,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派往浙江军营。在反攻宁波战役中,他自愿担任先锋,挑选勇士百人,组成敢死队,夜袭宁波,在城濠遭遇伏击,身受重伤,被英军俘虏,囚禁府衙,延医调治,并多方诱降。王国英骂不绝口,终于被英军杀害。

四川藏族土司阿木穰在反攻宁波时英勇作战,率领金川少数民族屯兵400人为前锋,冒雨攻至宁波西门。但英军早有准备,在城内设下伏兵、地雷,阿木穰率兵冲入城内,中地雷牺牲,士兵百余人当即遇难。在反攻镇海的战斗中,哈克里带领屯兵300人为前锋,攻击招宝山,自绝壁攀登而上,抢入威远城。但敌舰由金鸡山江面横渡,用大炮仰轰,哈克里中炮身亡。

川军在镇江的战斗

1842年7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英军攻陷长江要隘吴淞口,提督蒋化成战死,两江总督牛鉴放弃长江防务,英军舰得以顺利上驶,直达镇江城下,川军在四川提督、参赞大臣齐慎率领下转战江苏,参加镇江保卫战。

7月13日(六月初六日)齐慎率部500余名到达镇江,因受镇江旗兵

副都统海龄歧视,驻防城外不利地势,不久,署湖北提督刘允孝率领官兵1000名,到达镇江,海龄亦不准入城,驻扎镇江东北山梁。城外总兵力约2800人。

7月17日(六月十日),英舰大举进犯镇江,齐慎和刘允孝督率官兵于(镇江)东北山梁江岸列队以待,开始向敌舰攻击,由于当时风大潮涨,江面宽阔,炮力不能及远,护炮土墩半被英舰击毁,守台甲兵难以蔽身。

7月21日(六月十四日)凌晨,英军7000人登陆攻击,英军人多势众,川军力不能支,英军又分数股攻城,西南两门被攻火起,齐慎和刘允孝率部退至距镇江府45里的新丰镇。

驻守镇江的旗兵副都统海龄刚愎自用,歧视汉人,不愿与齐慎、刘允孝等援军协力抗敌,只依靠1500名旗兵守城。在援军被英军各个击破后,镇江城遭到英军包围。英军凭借优势火力,使用云梯攻城。旗兵奋力反抗,击毙英军100余人后全军覆没,镇江陷落。

7月26日(六月十九日),清廷令四川候补都司张必禄赴江苏,由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两江总督牛鉴差

遣委用。但他还未到达时,《南京条约》签订,战争结束。

四川等省官兵归途艰窘

1842年10月12日(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九日),鸦片战争结束,清廷下令所有各路调集招募兵勇,渐次裁撤,以节经费。命奕经将所带河南、四川、山西、陕西、甘肃等处营兵2000名,河北壮勇580余名,及齐慎所带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广西、江西官兵4100余名,一并分期裁撤。

10月17日(九月十四日),川军开始撤回。在归途中,生活十分艰难,待遇极少,口粮不济,这些士兵沿途饱受饥寒,无处投靠,有的途中冻饿死去,有的流落他乡,即使勉强回到原籍,也找不到生路,最终只好加入嘎噜队伍,走上官逼民反的道路。由于散兵游勇大量参加嘎噜,鸦片战争后,四川嘎噜势力空前强盛,成为继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之后的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武装力量。

四川提督齐慎参加抗英战争后回川,于1844年5月15日(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卒于任。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清廷谕令川督宝兴缉捕
囫

1843年1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腊月二十九日),清廷谕令川督宝兴缉拿囫。

囫是四川无业游民的秘密组织。起源于清初,主要来源是破产农民、苦力、手工业者,除本省的外,还有大量陕、甘、鄂、黔、粤等省的流徙之民。这些游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只有铤而走险,打家劫舍,与官府作对。由于囫的成员主要是游民,为了相聚成伙,他们提倡烧香结盟,互助互济,具有秘密会党的形式。

囫早期活动于川陕鄂交界的巴山老林。自乾嘉以来,囫势力发展迅速,由川陕鄂边区蔓延全川,“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①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大股囫聚集彭县白石沟等处,聚众订盟,官兵捕获90余名。同年,邛州(今邛崃县)囫大举抢劫汉州(今广汉县),震动省垣。

同年,巴县私盐贩刘真才、张大童率众200余人,在木洞沟“誓盟歃血”,

“演戏聚饮,无所不为。”这些武装走私集团常与大股囫融为一体,“私枭拥众率领囫匪,各执枪炮,数百余人,大伙兴贩,霸踞引岸,敢与弁兵迎战,全无顾忌,(盐)商何敢相较。”^②

天主教四川教区举行主教加冕礼

1843年6月12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法国天主教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所辖四川主教区贝罗书主教在重庆举行加冕礼。这次加冕礼,只有一两个本地教士的协助。

重庆府属各县兴修塘堰水利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据新修《重庆府志》记载:府属各县兴修塘堰,缓解了丘陵区农田旱情。

巴县古堰182口,新旧塘2306口。南川县龙塘在县东180里,塘方圆百亩,四壁苍崖,水呈鸭绿色,产嘉鱼,无泄处。此外,各里、甲合计有堰、塘、龙泉341处。涪州(今武隆、涪陵)内河,出龙溪河与大江合流,其间有蓄水灌田处。碧溪河,下高滩筑有大堰,引水可溉田千余亩。老龙洞,上洞水出洞

① 光绪《长寿县志》卷六,页42,韩鼎晋《奏陈四川应除积弊条疏》。

② 《巴县档案》6—3—257,藏四川省档案馆。

即入暗流,下洞水流出分引,可溉田数百亩。枇杷洞蓄水可溉田百余亩。修鳞洞引水溉田百余亩,余孔洞引水可溉田数百亩。土地坡塘,引塘水绕山数里,可溉田千余亩。壁山县,有塘堰名天池槽,位于牛心山,塘周围百余丈,久旱不涸,久雨不溢;旁有暗流十余

里,通青木关山峡,分灌巴、壁二县田数万。此外,各里有堰36口,均由山溪引水。江北厅(今重庆市江北区和江北县)有堰32口,均从溪泉引水溉田。32堰中,有的一堰分注多堰,形成连锁分注蓄水系统,增加了灌溉面积。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清廷批准川民自办银厂

1844年5月25日(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九日),清廷批准四川商民自行开办银厂,谕令说:四川等处向有银厂,每年收课税银,输运交纳从未中断,也未发生任何扰害地方、累及乡民的事。历年事实说明,与其让官府出资开办银厂,不如听任商民自行开采银矿,一来藏富于民,二来有利于国计民生。

清廷急于增产白银,乃是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鸦片涌入中国,白银滚滚外流。“盖通商五口,出入各货略相抵,独鸦片价皆以现银出洋,计每年漏银二三十万两,故银骤贵。”加之,向英国侵略者赔偿巨额白银,造成银贵钱贱的现象比战前

更加严重。清廷为弥补白银亏损,不得不听任商民自行开采银矿。

四川各地回鹘暴动

1844年9月(道光二十四年八月),金堂、中江县一带,回鹘肖帽顶、周维三、蔡璜等,各聚团伙一二百人,往来城市,置备号旗枪炮并随带铁匠,打造刀械,拒捕伤人。蔡璜等到达新店子,蓬溪县“境中一日数惊”^①。温江县令江锡麟下令追捕,蔡璜到达叙府,率党焚城未果。同年,大竹县回鹘响应蔡璜起事,时有邓恩哲作乐府四章说:“尔时贼焰渐熏天,遥与璜匪相勾连。”^②江津县亦强盗四起,痞子横行,俗称滚刀皮,首领肖毛中、恶丐郑刚。回鹘首领李三丁潜入四川省会成都活动。

^① 《蓬溪县志》卷4,页25。

^② 民国《大竹县志》卷17,页31。

鉴于四川各县咽喉会党反清活动猖獗,清廷一再命四川总督宝兴,拿办四川咽喉。

四川分担战争赔款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四川分摊鸦片战争赔款。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京条约》签定,清廷被迫承认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割让香港与英国,赔偿英国鸦片和军费白银2100万两。

这次战争赔款虽说是分四年七次由与鸦片战争有关的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省,借拨库银、关税偿付的;

但是,巨额赔款造成东南各省商力疲惫,库、关储存枯竭,直接影响了这些省区向中央政府常年上缴赋税额数。鸦片战争后,各省拖欠税银的情况日益严重,迄止1847年,各省拖欠国库税银总额已达9084900两,这个数目比当时国库每年储存银数还多^①,它使清廷陷入了不断加剧的财政危机。

为转嫁鸦片战争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开始加重内地各省,特别是四川的负担。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四川开始对田赋实行“减平”,每粮一两,按库平银扣收六分。同年,四川开征“广东烟案赔款”,随粮征收,如三台县,“道光二十四年广东烟案赔款奉文增加二千两,……摊入正粮内征收。”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川督奉命严拿四川境内青莲教教首

1845年4月17日(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清廷命川督宝兴严拿四川境内青莲教教首。5月7日(四月二日),川督宝兴向清廷奏报调查青莲教结果。青莲教在四川的蔓延,是由青莲教老教友李一原分途密遣教徒,辗转传教收徒的结果。据有关方面核实,

所有被捕教徒供称,均系李一原劝令吃斋扶乩,而后分别前往各州县传教收徒,扩大影响,形成教派。李一原实为青莲教教首,其徒众被川省当局拿获,李一原闻风潜逃。

5月25日(四月二十日),川督宝兴奏报说:四川前获青莲教一案,首要李一原未获,据在押郑子青供称,青莲教总教主名朱中立,在湖北掌教,暗号八中。并据在押吴怀琦供称,范秉书实

^① 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管理户部事务潘世恩等奏。

系江南教主。经查明,李一原逃往重庆一带。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琦善授四川总督

1846年2月4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琦善由驻藏大臣授四川总督,前任四川总督宝兴以文渊阁大学士留京,入阁办事。

御史戴刚奏请在川“急行团练”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四川咽喉势力日盛,在全省各地活动。咽喉多采取结队活动方式,数百为伍,视官兵强弱为进退策略,或潜伏山林,劫掠过往客商;或出没州县乡镇,使地方官无可奈何。成都守备杨凤庭追捕其党,被咽喉围杀于汉州(广汉)和兴场。咽喉两度抢掠合州(合川),大规模活动于璧山、岳池、乐至、铜梁及广安州乾溪一带。双流、新津、温江三县知县,以“剿办”不力获咎。御史戴刚建议清廷在四川“急行团练”。

乐山流行伤寒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1~9月,

嘉定府乐山县伤寒肆虐,流行城乡,死亡人数逾千。

天主教在四川主教区的变动

1846年3月27日(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一日),原属法国天主教四川主教区的贵州教区,正式脱离四川,建立贵州主教区。

同年,原隶属于印度亚格那主教区的西藏教区,由其主教波尔基移交给四川主教区。

由于法国迫使中国接受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法国天主教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特权:“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严惩。”^① 这些特权受到清政府和地方官府的严格保护,为天主教在四川扩大活动范围提供了优越条件。此后,天主教在四川获得迅猛发展,仅1848年受洗入教的成年人,即有880余人,病危儿童8.4万余人^②。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2页。

②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Missions in China, P293.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清廷谕令改“囫嚅”为“咽嚅”，咽嚅首领“肖帽顶”被缉获

1847年5月7日(道光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谕令改“咽嚅”为“咽嚅”，命令说：“川省无籍棍徒纠缠，本名咽嚅。嗣因具折率写‘咽匪’字样，乾隆年间奏旨改正，嗣后遇此等案件，著仍遵照改为‘咽嚅’匪犯，不得率写‘咽’字样”。^①但官方文书和民间称谓仍沿袭旧称未改。

咽嚅势力日益壮大，他们百十成群，遍及四川城乡，携带刀枪武器，到处劫掠绅商。7月6日(五月二十四日)，官兵缉获咽嚅首领“肖帽顶”等人。立功都司颜朝斌受赏蓝翎，知县程祖澜等获得升级奖励。但咽嚅势力未减。

平武等县发生反抗陕商重利盘剥风潮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陕商在

川北平武等县进行重利盘剥，引起广大城乡人民反抗风潮。

陕西、山西商人自清初开始在四川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乾嘉时期，在全省已有相当雄厚的实力。道光年间，陕商进入平武山区，从事小本放大利活动，对城乡人民盘剥折算，滚放食利，终至激犯众怒。各地群众起而反抗，或捣毁铺店，或乘势赖账，虽正经字号，也被指责为大利盘剥，受到牵连打击。县民结连团众，至于数万，凡属陕客，概行驱逐。反抗活动迅速蔓延昭化、广元、梓潼、剑州(今剑阁县)、石泉(今北川县)、绵州(今绵阳市)等处，其势汹汹，不可遏止。后经官府派兵弹压，风潮才告平息。

全省人口数量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四川全省居民总户数为650.7047万户，人口总数为2797.826万人。

^① 《东华录》道光55，页12。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川省先后搜捕“囫噜”会党 200 余人

1848年3月(道光二十八年二月),绵竹知县刘庆远报告囫噜活动情况说:囫噜首领巨三、窦五等由德阳潜入绵竹,囫噜势力深入团民之中,团民中藏匿囫噜,囫噜中又有团民,二者已互相参杂,无法明确身份。囫噜首领林蛮头“纠约各捻数千人”,与大邑县令郭志融公开对垒,用抬枪“轰碎郭令轿马”,郭志融落荒而逃,几乎丢掉性命。囫噜首领杨黑骡子、王老冬、向大耶、汪罐子炮等数十人“各挟党羽数千,横行劫杀,捉人勒赎,逼近省城。”^①

迄止7月18日(六月十八日),川省历次捕获囫噜党徒270余名。清廷下谕令四川认真办理团练,以靖地方。琦善上疏称,办团弊害甚多,请办保甲,以弭盗安民,清廷批准了琦善的办法。

锦江书院增加招生名额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成都著名学府锦江书院扩大办学规模,增加

招生名额。按原额招生数:正生50人,附课50人,外课约20人。本年度增加为:正生60人,附课60人,外课约30人,共计150人左右。

锦江书院开办于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文翁石室旧址之侧,重建讲堂斋舍,命名创设的。著名学者、通儒彭端淑、高白云、杨彦青、姜尔常、敬华南、张普生、侯度、易简、杨锡麟、李惺、顾汝修等数十人均先后执教其间。书院规制崇宏,对入学生员要求极严,必须中县学的生员(秀才)才能入学,课程设置有别于专攻时文、诵习考课的官学,坚持“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注重读书,对经史算术的教学十分认真,因此,办学成绩显著,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优秀人才,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院中诸生中乡试者十余人。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中乡试者50余人,捷南宫入词林者也有数人。时称“蜀中三才”、“锦江六杰”的杰出文士均出于锦江书院。

^① 《道咸宦海见闻录》,页94~95。

郭永泰开“尽忠山”，汉留在川传播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四川永宁(今叙永县)郭永泰开“尽忠山”汉留组织，以明末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印信号召群众结盟入会。

最初，传说郑成功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在福建省开金台山。1670年(康熙九年)他派陈近南在四川省雅州(今雅安)开精忠山，拟与吴三桂联合反清，当时入盟者4000余人。1814年(嘉庆十九年)，四川人方庆澜开蓬莱山。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四川人郭禹钦开华严山。至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四川永宁人郭永泰开尽忠山组织。

据说郑成功印信，为汉留设立组织的依据，名曰《金台山实录》。因时代变迁，语气迥异，所以郭永泰托林同阶照原本略加增改，即名之曰“海底”，又名“金不换”。以后开山立堂即以郭永泰改本为准。“汉留”名称传遍天下，均以排除异族为宗旨。

瞻对藏民起事^①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瞻对(今新龙县)连年天灾，农奴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当年秋，原中瞻对土司工布札西之后、罗布切之子工布郎结率领

200多名手持土枪、长矛、大刀、弓箭的贫苦牧民、农奴举行武装暴动，攻占大盖土司官寨，将土司的粮食、酥油等生活用品散发牧民、农奴，烧毁契约、账簿，还释放了牢笼中的奴隶、娃子，并拒绝承担乌拉差役，抗交一切贡赋和苛捐杂税，四方牧民、奴隶纷纷参加工布郎结部队，他的队伍不断扩大，先后占据了上瞻对、如龙、下瞻对土司领地，将历代皇帝赏赐给土司的印信、制诰、官服、顶戴全部抛入雅砻江，将战利品分给从军家属和广大穷苦百姓。藏汉土司、官吏受到沉重打击。工布郎结受到下层群众拥护和支持，战斗中屡胜，不久攻占了瞻对全境。

同年冬，甘孜白利、孔萨、麻书土司联合朱倭土司、德格土司图谋合歼工布郎结势力，工布郎结采取先发制人、各个击破战术，击败了各土司的攻势，声威远近震动，队伍扩充到2000余人，成为雄踞川边的地方势力。

天主教入藏受阻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罗马天主教会以中英《南京条约》为依据，委派法籍神甫杜某为西藏拉萨教区主教，该主教取道四川入藏，行至昌都被阻，不久退回四川清溪(今汉源)化林坪，建立教会主教区据点。

^① 瞻对：民国改瞻化县，今新龙县。

1849 年(道光二十九年)

徐泽醇升任四川总督

1849 年 10 月 30 日(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山东巡抚徐泽醇升任四川总督。前任总督琦善(上年,清廷授协办大学士)调署陕甘总督。

清军镇压瞻对藏民的反抗活动

1849 年(道光二十九年)初,工布郎结威震川边。清廷批准德尔格等十五路土司对工布郎结提出的诉状和川督琦善关于镇压瞻对(今新龙县)工布军的奏折,2 月 20 日(正月二十八日),由川督琦善抽调松潘、懋功(今小金县)、建昌(今西昌)等地屯兵 4306 名,与土司十五路土兵共 6000 余人前往对工布军实行血腥镇压。工布军利用地理优势、采取避实就虚、以守为攻、以少胜多等策略,变劣势为优势,

经过两月鏖战,清军精疲力竭、伤亡甚重,推进困难,只好不了了之。

次年初,瞻对工布军势力进一步壮大,工布郎结在占领区重新分配土地、迁徙居民、废除门当户对婚姻习俗,巩固了工布军在瞻对地区取得的辉煌战果。当年春工布军攻占了炉霍,消灭了炉霍土司家族;又快速袭击了甘孜土司,工布军总部设置甘孜孔萨土司衙门。其后十余年,工布郎结攻占德格土司、理塘土司,挥兵巴塘,东占打箭炉(今康定)境内的明正土司,形成号称八万之众的庞大武装势力。工布军控制地区,东至明正土司境,西至昌都,北至青海玉树,南至理塘,纵横千里,威震康巴全境。清廷因穷于应付太平天国和李蓝起义军的强大攻势,无暇顾及瞻对事态,只好听其自然。

1850 年(道光三十年)

建昌大地震

1850 年 9 月 12 日(道光三十年八月七日),建昌(今西昌、普格间)发生 7.5 级地震,震中烈度十度。建昌遍

城屋宇倒塌,木石填塞,不辨街巷。城垣倒塌 200 余丈;西、南、北门城楼及文武衙署、仓廩、库局、庙宇、监狱概行倒塌。白塔寺、青龙千佛寺、东岳庙前殿山门等扫地无存;龙神祠、禹帝宫、

文华寺、关帝庙、药师寺、字库等概行倾颓；静宁寺、西盛寺、永盛寺、清真西寺、川主庙、四百户清真寺、泸山祖师殿、娘娘庙前后殿等倒塌；灵鹰寺垣墉尽覆，发文寺栋折榱崩，青龙寺大半摧颓。城内外及各乡场受灾户 27880 余家，灾民 135382 口。倒塌房屋 26106 间，压毙 20652 人。会理州永定营（宁南县）震倒民房 1838 户，压毙 2878 人。普格耿底武圣宫倒塌倾颓。盐源卫城倒房数十间，压毙数十人。云南巧家倾圮民房数百间，压毙数百人。

建昌城及东海镇一带大地突然迸

裂，喷沙冒水，须臾地合如故。邛海水溢，山陵崩溃，海河壅塞，湮没沿岸农田、寺宇。建昌——普格——会理州一带出现山崩、滑坡和地裂；大箐梁子南的五道箐、普子里底至扯扯街沿线有 30 多公里长的地裂缝带。普格有山崩地裂，拖木沟马厂坪滑坡将干海子填塞，沙坝滑坡阻塞河道。宁南 14 处山崩地裂，城南东白水沟附近滑坡、地裂并冒出清泉。喜德西河乡阿支等地滑坡，埋压山寨人畜。越西、冕宁、米易、会理、仁寿、德阳、庆符、乐山、南溪、南充及云南宣威、永胜、普洱等地亦震。

1851 年（咸丰元年）

清政府定四川为“协济省”

1851 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从各省调兵防堵，先后筹拨广西、湖南、广东三省军需，以及湖北、江西、贵州三省办理防务，共计耗银 1800 余万两。这使清廷本来就陷入危机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它不得不加深向战火尚未波及的四川等省摊派军需钱粮，把四川定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协济省”，加紧搜刮四川的人力、财力和粮食。自 1852 年（咸丰二年）起，四川要向战区

各省接济银粮与各种军用物资和人力，每年要摊派协济银 180 余万两。迄止 1854 年，四川向各省调拨的饷银达 330 余万两。以后，调拨数量仍在增加。从 1851 年起，清廷多次令四川地方官将川省沿长江各州县所存仓谷拨运广西、湖北、安徽、江西诸省，直到 1863 年，因拨运军粮，“沿江而下，蜀米入楚者甚多”，竟至四川“米价陡涨”。^①

清廷谕令捉拿綦江、峨眉等地会党

^① 《黄彭年家书》，《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 227 页。

1851年3月30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清廷令川督徐泽醇严拿四川綦江自称“赤地大王”的马成武。谕令说:“邪教流行,蔓延数省,河南祥符县有吴光汉伪称‘赤天大王’,四川綦江有马成武伪称‘赤地大王’,广东英德县有李三文伪称‘赤人大王’。均为各省邪教总目之首。”^①

8月(七月),清廷又令徐泽醇捉拿峨眉山会党说:“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徒皆用度牒,盖以图记,声气联络,往来各处,皆供给银钱饭食,每月按三、六、九定期赶会。现已谕令徐泽醇访拿四川峨眉山会首。”^②

全省人口总数

1851年(咸丰元年),四川全省居民总户数为664.261万户,人口总数为2875.837万户。

川军奉调参加“围剿”太平军的战争

1851年(咸丰元年)4月,清政府从四川调兵4000名,赴广西、湖南防堵太平天国起义军。当时与太平军作战的广西提督向荣,籍隶四川大宁(今巫溪),川军四千余名由向荣指挥作战。

1852年(咸丰二年),又调川军二千名,赴广西“围剿”太平军。以后各年,不断抽调川军出省驰援作战清军,迄至1860年为止,总共抽调川军万余名。

1852年(咸丰二年)

川省开征捐输

1852年5月2日(咸丰二年三月十四日),清廷为摆脱鸦片战争以后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以筹措军费和河工用款名义,谕令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等省督抚向官绅、商民开征捐输。

1853年7月(咸丰三年六月),清廷下达捐输奖叙办法规定,凡各省绅士商民捐银至10万两,准许扩大该省文武乡试中额(文武举人)各一名;每州、厅、县捐银至二千两,准许扩大该州、厅、县文武试学额(文武生员)各一名。如应扩大的名额大于最高限额,则依

^① 《东华录》咸丰七年,页38。

^② 《清实录》文宗卷38,页13。

次推展。如果捐数甚多,推展数次还有盈余,准许奏请分别酌加,永远定额。

迄止 1855 年(咸丰五年),四川捐输白银已逾 50 万两,清廷批准“永广四川乡试中额五名”。

捐输是清政府补助财政收入的一种搜刮方式。捐输名义上由绅商富庶者捐银,政府给予官爵虚衔、增加中、定额等奖叙;但实际上则是对广大人民的普遍勒索。1862 年以后,捐输成为全省范围按正粮多寡摊派的田赋附征,全川常年征派捐输总额为银 180 万余两,而清代田赋正额即地丁税每年仅 66 万余两。

“麻乡约”大帮信轿行成立

1852 年(咸丰二年),四川綦江县人陈洪义(轿夫)在昆明创办“麻乡约”大帮信轿行。麻乡约轿行主要业务是客运、货运和递送信件。其营运范围从云、贵、川三省穷乡僻壤到京、津、沪、汉各省通都大邑。

陈洪义最初在云南昆明设轿行,专门承接长途客运。1858~1860 年(咸丰八~十年),在四川成都、重庆、叙府等主要城市增设轿行,并在各主要干线沿途城镇设立分行、分铺,扩大长途客运,称长路轿子。同时,适应顾客需要,开办短途客运,在各城市城区和城郊运行,俗称过街轿子或“溜溜

轿”。

“麻乡约”轿行成立后,兼营信件递送,主动为地方官递送快信,并为川、滇、黔各岸盐商和银钱帮提供信函、打听行情、递送账单和汇兑银钱等多种服务。

“麻乡约”经营汇兑银钱业务,其方式有二:一种是相互兑用,两地交兑,并不将原银送往目的地,而采用转结办法,甲乙两地互相支用,这种方式多用于商业范围。另一种直接运送,将汇兑的银钱押送目的地,这种方式多用于官方汇款,如盐款、协饷、京饷、解银等。1874 年—1876 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年)麻乡约民信局为票号、盐号、商号所寄递的汇票和现金数目,高达 300 万两白银,对川、滇、黔、康等省区的商业、金融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麻乡约”还先后建立了以重庆为中心,沟通贵阳、昆明、打箭炉(今康定)的货运网络,使西南各省土货输往重庆,苏广洋货经重庆运销云南、贵州和康藏高原,实为近代早期西南交通运输巨擘。

奉节县流行伤寒

1852 年(咸丰二年),川东奉节县流行伤寒,染疫者万余人,死亡 2000 余人。

1853年(咸丰三年)

慧成调署四川总督

1853年1月14日(咸丰二年十二月六日),东河河道总督慧成调署四川总督,前任总督徐泽醇于1852年9月7日(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奉召入京。慧成未任,由成都将军裕瑞署理四川总督。

川省办理“借征”田赋

1853年(咸丰三年),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需高达4000余万两,财政出现巨额亏空,清廷谕令山西、陕西、四川借征一年田赋,以济军需。宣布山西、陕西、四川三省咸丰四年钱粮,于咸丰三年冬季开征,次年春季全数征完;咸丰五年钱粮,提前到咸丰四年秋季接征,以后按年催索。并申明:一旦军务告竣,财政状况好转,即将三省应征额赋停征一年,以舒民力。

川盐济楚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长江下游水运中断,淮盐无法上运,例食淮盐的湖北九府一州(武

昌、汉阳、黄州、德安、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府、荆门州等)有“淡食之苦”。清廷批准由川、粤等省盐商组织食盐入楚接济。入楚盐斤,一例实行商运商销,“无论商民,均准自行贩运,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堵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关抽税。……均十取一、二,以为定制。一税之后,给照放行。”^①

在济楚盐中,由于四川地接湖北,又有长江水路作为运输干线,因此,“实以川盐为大宗”。

从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开始,到1864年(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南京,长江下游水路通航为止,十一年间,是川盐济楚的黄金时期。仅以官方统计折算,湖北月销川盐约为720万斤,年销额约为8640万斤。这一数字尚不包括难以估量的四川私盐在内。

川盐销楚的极大成功,强有力地刺激了四川井盐生产。“川盐行楚已阅十有余年,近来广开井灶,添集丁夫,产盐之所,较之向年增产数倍。”^②仅富荣盐场在短期内就增开新井100余

① 《四川盐法志》卷十一“转运六·济楚上”。

② 《四川省盐法志》卷十一“转运六·济楚上”。

眼。

1864年(同治三年)以后,淮盐运道恢复,为夺回楚岸,与川盐展开激烈的争岸斗争。由于淮盐市场关系东南地区岁入,各省督府采取扶淮抑川的态度和办法,使川盐逐渐失去了大部分湖北市场的优势地位。

成都改建芙蓉书院

1853年(咸丰三年),芙蓉书院改建于成都青龙街墨池书院隔壁,原拐枣树街书院旧舍改作帘官公所。

芙蓉书院创建于1801年(嘉庆六年),由成都知县张人龙主持开办。张人龙重视教育,他发起捐资办学,自捐俸银200两,集绅商募银7000两,与县儒学教谕王子诏悉心筹划,在成都拐枣树购得民房一所,建立了芙蓉书院,书院特聘著名学者衷以薰(乾隆丁丑进士)为山长,课程为经史制艺,与锦江书院、潜溪书院、墨池书院同为当时四川的著名书院。

乾嘉时期,四川各府、厅、县即广建书院,咸同年间,四川书院的学生达三万余人。然而,这些书院均以研习制

艺八股为主课,进取举业为目标,鸦片战争的外国大炮对四川的知识界没有产生大的震动,他们还处在极端闭塞和落后的状态。

设四川官钱局,发行官票、宝钞

1853年(咸丰三年),为弥补战争赔款后巨大的财政亏空,除借征田赋外,清廷开始发行“户部官票”、“大清宝钞”。七月初三日,户部饬令各省设立官银钱局,推行钱法、钞法,指名四川、广东、福建等省立即执行。四川遂即在成都设立四川官钱局,发行“宝钞”,兑付“官票”。卫聚贤、丁福宝《古钱》集中有咸丰三年八月廿日四川所发“宝钞”印片。同治二年初(1863年),奉户部咨文,停发“官票”、“宝钞”,四川官钱局亦宣告结束。

裕瑞授四川总督

1853年9月9日(咸丰三年八月七日),裕瑞由成都将军授四川总督,前任总督慧成于3月27日(二月十八日)奉差江南办理防务,9月9日(八月七日)调闽督。

1854年(咸丰四年)

停止借征,转办津贴

1854年2月15日(咸丰四年正

月十八日),清政府采纳了四川总督裕瑞提出的“劝谕绅民按粮津贴,请免借

征”的建议,^① 决定停止执行咸丰三年实施的在四川筹措军饷,借征咸丰四年钱粮的谕令,严饬地方官选派绅士,设立公局,照章征收津贴,并增加学额、举额,以示优奖。所征津贴银数,派员解京,充作军需,不准地方扣留。因此,从 1854 年开始,川省规定按照正额钱粮一两,随粮带征津贴粮一两,民间赋额从此加倍交纳(田赋正额约为银 60 余万两)。当时,除个别边瘠州县免征津贴外,“所有腹地州县”几乎“无县无之”^②。津贴是四川特有的田赋附征,各省均无,“特为四川州县所独耳”^③。

川省开征盐厘

1854 年(咸丰四年),湖北方面开始征收川盐盐厘。清代厘金之征始于清咸丰初年,当时太平天国雄踞长江流域,清政府为筹措军费,开始抽收厘金。咸丰四年(1854 年)8 月,湖北对入楚川盐抽收“楚厘”,于宜昌府设局抽收厘金,每斤抽银一厘五毫,行之年余,仅抽银二十余万两,嗣于荆州之沙市设立分局,凡入楚川盐先在宜昌局

抽厘二文五毫,其运至荆州、沙市发卖,由行店于买户名下抽厘钱四文五毫,一卖一买之中,共抽钱七文,合钱三厘五毫,每月约收七、八万串不等。”^④

1855 年(咸丰五年)开征川盐夔厘,于夔关设卡抽收,“凡无引余盐,每百斤抽银一钱三分,大宁一厂在夔关以下,其余盐入楚,在巫山之空望沱设卡,一律抽厘,每年约收银十二万余两。”^⑤

1856 年 1 月(咸丰五年十二月),由川督黄宗汉倡议在富荣、犍为等厂就地设局,抽收厂厘,引盐每斤抽一厘,计水引一张共计抽银七两五钱,由商、灶、号三股摊派,余盐则每斤抽厘四文。^⑥

1860 年(咸丰十年),由川督曾望颜提出,在盐船过往要津重庆设局抽厘,大河运楚引盐,每斤抽钱四文,小河余盐每斤抽钱五文。自是年正月十日试办,截止五月底,共收白银 100610 两有奇。著为定制。^⑦

盐厘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源,每年约增银 120 万两,加上其他名目的

① 《文宗显皇帝圣训》卷 107,“筹饷”,页 2。

② 《王文勤公奏稿》卷七《四川存稿》页 1。

③ 民国《南川县志》卷四,食货。

④ 王守基《盐法议略》。

⑤ 王守基《盐法议略》。

⑥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第 11 章,页 415~419。

⑦ 《清盐法志》卷 261,四川 18,渝厘,页 12~14 页。

盐税,每年总征银 350 余万两有奇。^①

宝川局开铸大钱

1854 年(咸丰四年)8 月,清廷除发行“官票”、“宝钞”外,并颁令各省改铸大钱、铁钱。四川宝川局于咸丰四年(1854)改铸当十大钱两卯,后又添铸两卯^②。大钱由官钱局发放制钱时搭发三成,强迫民间使用。由于货币流通量猛增,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19 世纪 60 年代,四川当十大钱不过值制钱三文。

杨隆喜起事

1854 年 9 月(咸丰四年八月),贵州桐梓人杨隆喜起事,起事者号曰“黄兵”,在川黔边境各地活动,黄军波及川边十余州县,数次威逼川东南綦江、合江、江津、秀山等县,川督裕瑞派出官兵进“剿”,又令川东团练总局出动数千练丁围堵,义军在官兵和团练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这次起义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地方

官征敛无度,黔民无法忍受,被迫起义反抗的。据文献记载:“贵州州县征收钱粮,每于正项外加增平数,名曰跽戥费,民甚苦之。前桐梓县革役杨隆喜等倡乱,皆借口除跽戥之害,纠众滋事。铜仁府知府葛景莱亦以循田加征,致匪党复行滋事。”^③

黄宗汉授四川总督

1854 年 11 月 11 日(咸丰四年九月二十一日),黄宗汉由浙江巡抚授四川总督。由成都将军乐斌兼署四川总督,前任总督裕瑞解任,旋革。

南川地震

1854 年 12 月 24 日(咸丰四年十一月五日),南川陈家场 5.5 级地震,震中强度七度。是日未时,南川天鸣地动,陈家场尤甚,毁寺庙、民房、坟墓,压毙人畜无算。波及重庆、綦江、涪陵、忠县。自是或日一震,或日数震,或数日一震。震时如有物由地中行,至次冬始息。

① 《盐法通志》卷八二,征榷十四,款目六。

② “卯”,清代铸钱单位,每卯铸铜 5 万斤。

③ 《清实录·文宗实录》卷 207。

1855 年(咸丰五年)

张老八起事

1855 年初(咸丰四年底),四川白莲教首领张老八在蒲江县起义。张老八原名张万青,大邑县人,与蒲江县人廖怀银同在川西平原传教授徒多年,教徒遍布双流、新津、崇庆、大邑、邛崃、蒲江、彭山各县。他们纠集徒众三百余人,在彭山与新津间抢劫犍为县申解藩库的盐课银数千两,随即转移到蒲江县寿安镇八角庙,聚众起事。教军转战蒲江、邛崃、大邑县,托名太平天国部众,剪去发辫,印制文书,声称是广西太平天国大本营派遣来的人,打出太平军旗号,广为宣传。张老八与

廖怀银、杨辉堂自称统领大元帅,侯老八称为先行官。邀约附近群众入伙,鼓动穷民壮大声势。要求陆续参加起义的群众都剪去发辫,作为起事记号。又仿效太平军装束,均用红帕缠头,教军共有千余人之多。^① 清廷谕令川督黄宗汉严厉“剿办”,黄宗汉调集八旗,绿营各军将教军包围于双流县中和场,经几天血战,教军全军复没,张老八等先后被害。

全省人口总数

1855 年(咸丰五年),四川全省居民总户数为 678.0997 万户,总人口为 2956.024 万人。

1856 年(咸丰六年)

四川百货厘金之征

1856 年(咸丰六年),四川开始征收百货厘金,川督黄宗汉以地方筹办防务为由,征收厘金。初议由士绅就地抽厘,以充经费,货厘税率,平均为值

百抽二。因货物一种,计行厘一道,落地厘一道,一般实为值百抽四。1860 年才确定通省厘金办法,在省会设总局,在各州县设分局委员征解,专支军饷。重庆货厘则责成川东道就近督征。

^① 《黄宗汉奏稿》,藏中国第一档案馆,光绪《崇庆州志》卷 5。

川省组织地主武装团练

1856年(咸丰六年),继1853年2月(咸丰三年正月)清廷谕令各省实行坚壁清野、办理团练以对付太平天国起义军之后,清廷再次谕令四川开办团练。根据《团练章程》规定:团练由当地在籍绅士承首办理,受当地政府指挥约束,各道府设团练总局,省城设团练督办大臣衙署,专司统率全省团练事宜。团丁由民户摊派,大户派出壮丁三、四名,中户二、三名,小户两户一名。乡绅子弟捐钱三千文,雇人充数,可免派丁。团练的主要职责,平时“缉盗防奸”、“查禁邪教”;战时担任防卫,坚壁清野或配合清军作战,镇压农民起义。

四川于咸丰三年开始办理团练。地方繁富之区,团练成立最快,力量也最强。

富顺县自流井盐商李振亨首倡办团练,与盐商颜昌英、王克家等合伙,共集白银十万两,修筑“三多寨”,1853年11月(咸丰三年十月)落成。1860年初(咸丰十年正月)李永和、蓝朝鼎攻占自流井时,有产之家先后避居“三多寨”者千余家,共20余万人。义军多次进攻“三多寨”,均未破寨。同年,在籍侍郎、盐商王余照,举人陈南、同知黄怀猷等选择险要山岭筹建新寨“大安寨”。草创未就,蓝朝鼎率义军攻寨,寨中居民二千余户,井厂雇工不下数万,均被驱使参加团练,固守四十余

日,义军未能破寨。

金堂县杨渭练乡团,售己业80余亩,制备戈矛枪炮,结寨于县南之云顶山,率乡民3000余人驻寨坚守。

温江县黄凤山办武卫团练,团丁500名,与官兵配合作战,使李蓝义军蒙受重大损失。同县彭元章首倡捐资练团,被推为团首,率领团练截俘蓝军数十人。

天主教四川主教区分解

1856年4月2日(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经罗马教皇批准,天主教四川本部被划为两大教区:川西北教区和川东南教区。两教区主教分驻成都和重庆,贝罗书为首任川西北教区主教;不久,由德弗来什和德斯马先后接任主教。范若瑟为首任川东南教区主教。

经罗马教廷1857年2月17日(咸丰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正式批准,由罗马教皇颁发的特别敕书规定:由四川教区主教全权任命西藏教区(拉萨)主教。

黔江地震

1856年6月10日(咸丰六年五月八日),四川黔江、湖北咸丰间发生 $6\frac{1}{4}$ 级地震,震中烈度八度。

是日晨,黔江南海、咸丰大路坝一带地震。黔江后坝乡轿顶山崩10余

里,石花乱飞,洪水喷出,压毁上、中、下田 12 顷 56 亩,压没居民 300 余家,毙人数百计。原有小河被山石壅塞,河水逆行,由梅家湾、板桥溪抵蛇盘溪 30 余里潴为大泽,宽 6、7 里,深不可测,田土、庐舍尽被淹没,当地人称“小南海”。黔江等地,屋宇摇晃,势欲倾倒,屋瓦皆飞,池波涌立,民惊号走出,仆地者不能起立。奉节、巫山、垫江、彭水、南川、重庆和湖北恩施、咸丰、来凤及湖南花垣、保靖、吉首、龙山等地均有震感。

清廷加紧镇压四川秘密会党

1856 年(咸丰六年),四川秘密会党多在成都、华阳、内江、邛州、新津、绵竹、彭县、仁寿等地活动,清政府谕令严厉镇压,将李麻子、陶三婆子、白

帽顶、高山帽顶、王二矮人、蔡汗淋等 41 人逮捕杀害。继而又捕获会党首领陶尖脑壳等十三名以及张缺窝等十七名一并杀害。会党成员魏大刀在汉州署前开设茶馆,也被查获。^①

但会党之势并未扑灭,到了骆秉章督川期间,“四川盐厂票局所在,兵役诈索,穷贩积愤,纠约咽喉,千百成群,谓之开帮”,自省城外苏码头迄于巫山,沿江有数十万之众。骆秉章“调兵剿捕,不能禁,势转张”。^②

吴振械授四川总督

1856 年 9 月 2 日(咸丰六年八月四日),四川总督黄宗汉奉诏入京,成都将军乐斌兼署四川总督,陕西巡抚吴振械实授四川总督。

1857 年(咸丰七年)

涪州刘义顺起事

1857 年 3 月(咸丰七年二月),刘义顺在涪州(今涪陵市)策划白莲教徒反清事宜,准备在端午节发动起义,与鄂西川东一带徒众同时并举。当时在湖北荆襄、四川涪州鹤游坪、石柱厅、

长寿等地,均有其教徒活动。刘义顺自称依元祖师,以白莲教总首领的身份统一指挥。

后因教徒中有人被捕,秘密泄露,刘义顺只好暂时隐蔽,各地的联络也随之中断。石柱厅教首马四联络鹤游坪教徒首领刘文礼,提前举义。起事

^① 《王文勤公年谱》,页 50~51。

^② 《成山庐稿》卷 12;《丁文诚公年谱》,页 21。

后,因清军封锁长江,他们被分隔于江南江北两地。马四、刘文礼率二千余人据守鹤游坪。重庆知府李庄率清军与涪州、石柱、丰都、长寿各县团练向鹤游坪进攻。义军在激战中虽杀伤不少清军,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到一个月,起义就被清军镇压下去,刘文礼、马四均被捕。

刘义顺在四川不能立足,只好逃往贵州,1858年初(咸丰七年底),刘义顺在贵州思南树旗起义,参加了当地的号军(包头为号)。1864年(同治三年),贵州遵义人张保山建立反清复明政权,刘义顺被推为大丞相。1868年(同治七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湘军将领席宝田、李元度等人到贵州进攻号军,刘义顺于撤退途中被俘,在成都就义,终年90岁。

川省奉旨巢卖仓谷

1857年4月(咸丰七年三至四月),清廷批准陕甘总督乐斌奏议,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将四川各厅州县常平仓谷120余万石(约6480万公斤)变卖,共可得银60余万两(按每石巢银5.5钱计)。所卖价银,解部设局收买米粮。

同年6月(五至闰五月),四川总督吴振械奏报清廷,遵议请动巢全省常平仓6/10,其变卖谷价,6成上交户

部,4成留省使用。边瘠地区及边防处所免于变卖。清廷批准,照所拟办理。

乐斌曾于1854年(咸丰四年)、1856年(咸丰6年)两度署理四川总督,知四川藏谷情况,故有此议。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四川即先后两次奉命动用仓谷,协济军需:

1851年4月(咸丰元年三月),清廷为剿办广西太平天国起义,即定四川为“协济省”,令川省从沿江州县迅速调运5000石(37.5万公斤)大米到湖南,再转运广西,一切费用,准作正式开销。

1856年9月(咸丰六年八月),户部奏请碾运四川米石,以充实京仓。办法是:先将米石聚集重庆,由嘉陵江运至陕西凤县之南登陆,再由渭水运载到潼关厅入黄河,沿河东下,到河南孟县东北入溴河,又北入济河、丹河,即由豫鲁运道以达通州,补充京师仓储。清廷批示:川陕运米至京,事属首创,令乐斌等详奏。次年,乐斌复奏,建议巢仓谷得银解部设局收局收买米石,充实京仓。

王庆云授四川总督

1857年8月15日(咸丰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前任总督吴振械调任云贵总督。成都将军有凤兼署四川总督,山西巡抚王庆云调任四川总督。

1858年(咸丰八年)

四川续办津贴

1858年1月(咸丰七年十二月),清政府批准四川总督王庆云奏议,拟于咸丰八年“再行劝谕绅董续办津贴”,并确定,待此项津贴银收解完竣,即由川督核计多寡,奏请增加学额、中额。此项津贴,授照成案,按粮加征,每粮一两,加征津贴银一两;又每津贴一两,加增平余、火耗五分;又每户外征票钱八文,除边瘠地区31州厅县免征外,概莫能外。全省每年共征津贴银610000余两(此总数是每年津贴的大约数,并不代表各年度的具体收数,具体收数随年成丰歉有一定波动)。此项津贴,本为临时加派,但随着晚清财政状况的恶化,逐步演变为常赋,直至清末,有增无减。

罗马教廷将四川、西藏划为三大教区

1858年1月7日(咸丰七年冬月二十三日),罗马教廷正式批准天主教四川三大教区有关划分教区范围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四川三大教区具体范围是:

1、川西北教区:包括四川省整个西北部,外加上川南的两部分地区,一

部分是邛州、大邑县、木坪和天全州的东部地区;一部分是资州、内江、资阳地区。

2、川东南教区:包括四川省整个东部及属于下川南的一半地区。但川南地区的资州、内江、资阳隶属于川西北教区,仁寿、井研隶属于西藏教区。打箭炉以西川边地区先属西藏教区,1861年以后,逐步划归川东南教区。

3、西藏教区:除西藏地区外,还包括上川南南部地区的一半和下川南的仁寿、井研地区。

根据教区史册统计:三大教区各拥有教徒数额为:川西北教区约有29000人;川东南教区约有21000人;西藏教区约有19000人(另据教会备忘录说,西藏教区只有8000~9000人)。

1858年(咸丰八年)法国天主教在重庆长安寺街修建教堂,范若瑟为天主教主教。范若瑟系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838年来华传教,1840年进入四川,1856年为罗马教皇任命的第一任川东南教区主教。

理番杂谷脑河下游、巫溪猫儿滩山崩

1858年(咸丰八年)夏,理番厅杂

谷脑河(今理县境)下庄、铁邑间山洪暴发,冲塌山田河岸,大江堵塞曲流,对岸山崖也崩陷,江流由此至灌县,浑浊数年。

同年,巫溪猫儿滩久雨山崩,压死山民千余人。猫儿滩在今巫溪县城北大宁河左岸双河乡谭家墩。

1859年(咸丰九年)

黄宗汉授四川总督

1859年5月4日(咸丰九年四月二日),前任总督王庆云调两广总督。成都将军有凤兼署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黄宗汉授四川总督。黄未到任,奉诏入京。

松潘藏、羌群众起事

1859年秋(咸丰九年),松潘藏羌群众因无法忍受官府的压迫和剥削,在首领额能作(小姓沟大尔边寨藏族妇女)、折乃他(南坪塔藏盘信寨寨长)、欧利瓦(南坪羊峒五十八寨头人)等统率下举行反清起事。

藏羌军主力是当地七十二姓土司所辖各寨藏羌人民。因藏民信佛教,额能作乃声言活佛黑伦来(额能作之子)降世,以鼓舞士气,扩大队伍。1860年5月16日(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清廷以镇压不力为由,撤去原松潘镇总兵文升,任命联昌为总兵,举兵“围剿”。藏羌军奋力迎战,联昌大败,同年10月31日(九月十八日),藏羌军攻

下安顺堡,杀死乔农官全家,击毙清军和团练100余名,不久,又攻下镇江关,毙敌数十人,松潘失去与成都的联系,孤城告急。四川总督崇实派兵救援,亦为藏羌军包围。1861年1月24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藏羌军猛攻敌营,毙敌200余人。松潘城长期被围,兵丁、团练饿死大半。

藏羌军于1861年8月1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七日)破城,击毙同知张中寅等文武官员和清军、团练400余人,占领松潘县城达数年之久。直至1865年,松潘藏羌民族起事才被川督骆秉章镇压下去。

川省开收洋药税厘

1859年(咸丰九年),四川奉文抽收洋药(鸦片)税厘,按每百斤水路抽银30两,陆路抽银20两。经分饬各关并委员前往重庆、广元、泸州、万县、雅安、绥定(今达县)、叙永、嘉定(乐山)等处,设局抽收。但由于川省僻处西陲,不通海口,向无商贾运洋烟入境,川省吸烟之人,惯用云贵及本地所产

土烟,因而抽收洋药税厘,寥寥无几。为了增加税收,克服财政困难,遂于1860年(咸丰十年)冬更章改办,除夔关药税仍责夔州府征解外,余局概行停撤,通飭各厅州县体察情形,酌定数目,责令收解,收数仍属寥寥。于是征解厘数由各州县“捐赔”或“按粮摊解”^①,洋药税厘遂成为向四川农民强行勒索的苛捐。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1859年10月3日(咸丰九年九月八日),云南下关人李永和、蓝朝鼎率领贫苦的农民和脚夫聚集在与四川接壤的云南昭通府大关厅牛皮寨,宣布起义抗清。他们以“推满复汉”、“打富济贫”为口号,举起“顺天”的旗帜,自称“顺天军”,共推李永和为“顺天王”。起义后在六天之内,迅速攻下四川的筠连、高县、庆符三个县城。10月15日起义军北上入川直逼叙州(今宜宾)府城,占领城外的真武山与翠屏山。起义人数由七百余人猛增到万余人。切断了犍为、嘉定及隆昌、富顺入叙道路,击退了明耀光援军千余人。

清成都将军兼四川总督有凤急忙调兵遣将,驰援叙府。四川提督万福、按察使蒋征蒲奉命带兵剿办。由于义军攻城勇猛,声势浩大,援军不敢接近。有凤以贻误军机罪,奏请清廷将万

福革职,升皂升为提督,会同重庆镇总兵马天贵援救叙府。

义军围攻叙府,久攻不克,由于叛徒唐友耕投敌,泄露了攻城计划,使义军受到挫折。为了争取主动,义军决定从叙府撤军,北上进取犍乐盐场和富荣盐场。唐友耕,字泽波,别号唐帽顶,云南大关厅(今改县)人,因杀人潜逃,投入李蓝军,作战骁勇,充义军前部先锋。投降官兵后,成为义军死敌。

12月7日(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义军于叙府之西击败清军援兵,打死重庆镇总兵马天贵。提督皂升、按察使蒋征蒲率领残兵逃进嘉定府城(今乐山)。李蓝义军乘胜进入犍为境内。

1859年12月18日(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廷严辞追究官兵将领余振海、把总安定国临阵脱逃罪责,认为余安二人是叙府之战失败的罪魁祸首,命曾望颜查明两人罪行,将他们处以死刑,又命四川提督皂升同各镇清军总兵,整屯溃军,以扭转败局。

同日,清廷令乐斌速调陕西制营清军1000名,由提督郭相忠率领经阶州等地入川,协助川军进攻李蓝义军。同时调甘肃制营兵1000名,随同入川。为加强攻势,旋令曾国藩部将萧启江率湘军4000人自常德入川助剿。

同年12月20日(十一月二十九

^① 《丁文诚公奏稿》卷二一。

日),川督曾望颜布告全川军民,要求各地对义军实行“坚壁清野,实力守御”战略,控制粮食、货物,使义军无从得到给养;修筑寨堡,长期坚守,与官军配合攻击义军。同时,又发出劝降布告,对义军实行分化瓦解策略。

曾望颜署四川总督

1859年10月29日(咸丰九年十月四日),清政府谕令四川省城由有凤、祥奎二人驻守,有凤不再兼四川总督事务,仍专任成都将军。命陕西巡抚曾望颜速往四川署理四川总督事务,前任总督黄宗汉于同年9月9日(八月十三日)奉诏入京。

1860年(咸丰十年)

李、蓝起义军夺取盐场

1860年初(咸丰九年腊月),李蓝义军占领犍乐盐场,在五通桥开仓放粮,毁典当铺,向穷人发放钱物。盐工蜂拥参军,全军人数增至两万余人。

1月26日义军占领自贡盐场。当地盐工、煤工、船工和贫苦农民纷纷投奔,不到一个月,义军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在自贡盐场天池寺的义军总部,气氛热烈、兴旺,大门前,绣着“顺天军”大字的红旗迎风招展,崭新的对联写着:“恨尔贪官污吏,败坏二百余年基业;凭我雄兵猛将,扫清一十七省河山。”

起义军占领犍乐、自贡两盐场,断绝了清廷在盐税方面的财源,并威胁到省城成都,清廷大为震惊,立即撤换四川提督皂升,另派川北镇总兵占泰继任,统率各路兵马对起义军作战,保

护成都。

1月28日(正月六日),因清军作战不力,清政府令川督曾望颜整顿川省军务。“务使兵无悬额,饷不虚靡”。同时,对在四川铁蛇渡进攻李蓝义军有功的唐友耕,赏五品顶戴,任命为清军千总军职。

蓝朝鼎攻占川西各州县

1860年3月(咸丰十年二月),蓝朝鼎率领义军主力北上,接连攻下荣县、威远,在富顺绣裁坡歼击尾追不舍的清军副将张万禄部,随即攻下青神、眉州、蒲江,进入邛州(今邛崃县),于4月10日攻占名山。义军陈兵百丈场、夹门关、乎落坝、大塘铺一带,切断了成都与雅州(今雅安市)的道路,智取雅州要隘金鸡关。义军分兵五路向雅州推进,势如潮涌,骑兵数以千计,步兵数以万计,杀得清军人仰马翻,

“精锐一时俱尽”^①。25日围攻雅州,昼夜攻城,使用地雷,挖掘地道,架设云梯,“无法不备”。因城池坚固,守城官兵顽固抵抗,围攻20余天,义军主动撤围,进军洪雅、峨眉,转而向西,连下荥经、天全。再折锋东向,于7、8月挺进川西平原,先后攻入邛州、大邑、崇宁、灌县、新都、郫县、双流县境。蓝朝鼎屯兵距成都仅70里的崇庆州元通场,威逼省城,警报频传。曾望颜急调占泰带兵御敌,又令各县断路设堑,阻止蓝军入省。

1860年秋,蓝军由川江向东南转移,10月进至眉州。11月,在富顺县北牛佛渡与李永和部胜利会师。

四川政局混乱,骆秉章受命入川

1860年4~10月(咸丰十年三至九月),由于四川吏治腐败,文恬武嬉,绿营官兵纪律松弛,营风腐朽。军官贪饷肥私,兵则聚赌酗酒,与李蓝义军交战,或畏缩不前,或望风溃逃,使义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迅速挺进川西地区,对省会构成严重威胁。成都士民以写实手法,写下了讥讽川督曾望颜、提督占泰腐败无能的对联:

“曾制军不敢出征,连失四五城。任民逃,听民哭,随民从逆;甚至使民毙于水,毙于绳,毙于枪炮戈矛,置若

罔闻。伤哉亿数生灵,尽丧在曾不征之手。

占提督弗能敌战,相持六七月。跟贼行,受贼贿,与贼通风;并且教贼攻某州、攻某县、攻某乡村市镇,肆行无忌。惜乎百万国帑,半上了占不战之腰。”^②

四川局势糜烂,使清廷惊慌失措,接连不断地撤换办理四川军务的大吏,并谕令湘军肖启江部由湖南常德入川增援。当起义军攻占彭山时,清廷即命令驻藏大臣崇实前来成都,查办四川总督曾望颜和四川提督占泰。4月,四川提督万福又因迁延不前,贻误军机罪革职。6月,清廷将四川总督曾望颜革职,交部议罪,并令东纯署理四川总督兼辖四川军务,而东纯从湖北来川途中病死。8月,清廷又令驻藏大臣崇实署理四川总督。但转瞬之间,清廷又觉得崇实没有对付起义军的能力,于是决定调长期对付太平军的老奸巨滑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到四川办理军务。10月31日谕旨下,骆秉章不久带领湘军万余人入川。

1860年9月1日(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清廷根据川督崇实奏请,将已革职的贵州提督蒋玉龙调赴四川作战。崇实奏折中说,李蓝军已距成都多远,情况十分紧急,当此用人之际,应

① ②何鼎勋:《雅安围城记》,载《近代史资料》总第50号。

② 清无名氏手稿:《名雅遭贼记》,载《近代史资料》总第50号。

准其戴罪立功。

骆秉章(1793~1867年),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壬辰)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湖南巡抚等职。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军北上湖南,攻长沙80日不克。骆秉章“嬰城固守”有功,为清廷倚重。在湘抚期间,协助曾国藩办团练、建湘军、筹饷械、抽厘金,功绩卓著。1859年,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江西入湖南,攻宝庆,骆秉章多方救援,使石达开围城二月不克。

因李蓝义军横扫四川40余州县,川督有凤、曾望颜一筹莫展,清廷震惊之余,才命骆秉章入川督办军务。

金沙江、川江大水

1860年(咸丰十年)夏,金沙江、川江因连旬大雨而暴涨,沿江州县多遭水灾。其中,屏山、达县、丰都、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受灾严重。7月15日(五月二十七日),大水涌入屏山县城,达县县署头门石梯及文庙宫墙基被淹,禹庙亭楼头檐没水,7月16、17日水更猛涨丈余,全城房屋尽没水中。洪水暴涨入丰都县城,冲塌城墙200余丈,会川门摇摇欲坠。8月下旬(六月下旬)洪水涌入万县县城,滨江街道,唯见屋瓦,钟鼓楼冲垮。江水冲塌云阳城垣数十丈,猛浪直扑奉节县城正街。洪峰入巫山县城,顺城街市房屋多被冲毁,城墙没水、断裂。

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历史洪水

调查,本年7月18日(六月初一日),宜昌水位57.96米,洪峰流量92500m³/秒,三日洪量2330亿m³大水。

法国教会新辟教区

1860年(咸丰十年),在英法《天津条约》的鼓动下,以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代表的各国教会势力加紧入川设堂传教。法国天主教在四川新辟川南教区,由皮松神甫任主教。次年,法国政府与罗马教廷议妥,派遣主教1名,率领一批法籍教士,从四川、云南入康区,准备前往拉萨建立西藏教区。由于英、美基督教会相继入川,新教与旧教之间争夺势力范围,法国天主教于1865年(同治四年)被迫放弃了建立西藏教区的计划。

牛佛渡会师,建立铁山根据地

1860年11月(咸丰十年九月下旬),以蓝朝鼎、李永和为首的各路义军首领在富顺县北沱江左岸牛佛渡大会师,商量建立根据地的大计,决定把根据地建立在青神以南,犍为以北,岷江以东,威远以西纵横一百余里的铁山地区。当时起义军入川已有一年,全军人数扩大到30余万,活动地区达四十余州县。几十万大军的补给常常发生困难,义军东奔西跑,十分被动。

这次会师还决定了分兵三路的作战计划。由蓝朝鼎、蓝朝柱、瞿洪发、谢

大德、谢华瑶等将领率领的主力军向川北发展,目标是夺取绵州(今绵阳市)。张弟才、周绍勇、曹灿章等将领分兵向川东发展,攻城略地,牵制敌人。李永和、卯德兴则率部固守铁山地区,建立政权,建设根据地,并相机北上,与夺取绵州的主力军配合,夹攻成都。

1860年12月2日,向东发展的张弟才、周绍勇等将领率军进入大足,攻克荣昌。12月23日一举攻克永川县城,兵锋直指重庆。

12月底,蓝朝鼎、蓝朝柱等将领率军北上,通过安岳、遂宁,向绵州进军。

随后李永和、卯德兴率领的队伍离开牛佛渡,进入犍为铁山地区活动,开始建立政权。据史料记载:义军驻铁山后,“命人上粮,给予门牌,他的队伍即不到你家骚扰,人有腰牌即不拉去当兵。初时人犹疑惧;后见不欺,去者渐多。人亦各归家耕种,逢场期照常赶场营业。”^①“交纳的粮食,不论多少,三升五升均可,并且还要办席款待交粮者。”^②

李永和、卯德兴营建铁山基地时,在大营中贴的对联,上书:“旧主本慈仁,可恨污吏贪官,残害二百余年基业;新君多智勇,带来雄兵猛将,扫平

一十七省山河”,^③新君即指李永和,称“顺天王”。李永和在铁山曾提出“不交租,不纳粮,不出苛捐杂税”的口号,深得劳动群众的拥护,因而在群众中流行着一句民谣:“穿得好,吃得好,跟着李短辫子跑。”^④

四川赋税负担沉重

1860年(咸丰十年),四川全省津贴、捐输、厘金等项杂派超过正额两倍以上,人民负担空前沉重。清代前期,四川田赋总额66.8万两,除边瘠33厅州县卫免征4万两,以及兵田、公田、零星小户概不配额外,实际岁入50余万两,加一五火耗11万余两,共计60余万两。此外,关税、杂税10余万两,契税7万两,盐税80余万两。全川税入不过180余万两。由于丰歉无常,偶有不敷,还须湖南等省接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和李蓝起义相继发生,清廷为筹措军费,在赋税正额的基础上,大肆加派津贴、捐输、厘金等项新税,津贴约等于田赋正额,捐输则超过田赋正额二倍以上,仅捐输一项每年解数即达180余万两。每年厘金收数,从70万到100万两不等。税入总额高达300~400万两之多。岁入中,除支付本省官俸、军饷外,每年要向南

清人张务西:《罗城场乡土历史》。

② 四川省志调查小组:《犍为——李永和义军反清斗争史迹调查记》。

③ 四川省志调查小组:《犍为——李永和义军反清斗争史迹调查记》。

④ 四川省志调查小组:《犍为——李永和义军反清斗争史迹调查记》。

北各省输送协饷180余万两。到1854年为止,四川向各省调拨的饷银已达300余万两,库藏为之一空。1857年

(咸丰七年),一次协济广西经费10万两。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近年川省筹解各省军饷,为数已多。”^①

1861年(咸丰十一年)

蓝军围攻绵州

1861年初(咸丰十年冬),蓝朝鼎率10万大军迂回川东北地区,经隆昌、永川、荣昌、璧山、巴县、大竹、梁山、渠县、垫江、广安、南充等州县,再溯涪江而上,进攻遂宁,占据太和镇。4月下旬,围困潼川府,距绵州百余里。新任绵州知州唐炯前曾任南溪知县,与李蓝义军作战顽固凶悍,被义军称为“唐拼命”。3月下旬(二月下旬),唐炯已派绵州州判颜佐才率军驻扎绵州南30里丰谷井,又派绵州南乡团练驻扎城南要塞南山寺,作为第二道防线。唐炯亲率贵州播勇千余及之乡团练驻扎潼绵交界的福源寺,摆出迎战架势,等候西进的义军。

4月29日(三月二十日),蓝军直取福源寺。清军团勇对峙不久,即被蓝军击败。唐炯下令将各据点清军拔营回城,坚壁清野,加固城防,将城外房屋尽数烧毁,闭塞城门三道,只留二门出入。城内居民按户出人,编队守卫城

垛。并在城上增设炮台,加强防卫能力。

5月4日(三月二十五日),义军兵临绵州城下,沿城外涪江和安昌江扎营,“弥山遍野”。蓝军围城后,又分遣部队攻占绵州附近的安县、魏城、中坝、彰明、江油,获得大批粮米、枪炮和银钱,支援围城部队。5月11日(四月二日),汇集绵州城外的蓝军已达四、五十万人。5月24日(四月十五日),蓝军暗渡涪江,偷袭清军水师,控制了两江水域。6月25日(五月十八日),蓝军趁江水汛期将至,在南岸围筑长堤,遏水淹城。又赶造云梯、吕公车准备攻城。7月初,涪江水涨,绵州城外波涛汹涌,但城垣并未倒塌,倒是蓝军新筑长堤被洪水冲毁数段。淹城计划失败后,蓝军改铸千斤大炮轰城,城内人心动摇。唐炯命在城垣垛口安置“兀”字挡牌,城楼用棉絮浸水,悬挂檐端,以减火弹威势。

7月中旬(六月上旬),四川提督占泰奉命由德阳、绵竹、罗江救援绵

^① 《清实录、文宗实录》卷304。

州。由于他观望畏缩,所部驻扎绵竹、罗江期间肆意抢掠商民,勒索地方官,形同土匪。7月27日(六月二十日),占泰被迫率军向绵州移动,蓝军与占泰军接战于东岳庙,蓝军以诱敌深入战术,使占泰军陷入重围,遭到歼灭,占泰被杀。

骆秉章授四川总督

1861年8月25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湖南巡抚、督办四川军务大臣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仍督办四川军务。署四川总督崇实改任成都将军。

绵州会战

1861年8月底(咸丰十一年七月下旬),骆秉章实授四川总督后,开始认真策划四川剿防事宜。他向清廷奏称:“李党为最多,蓝党为最悍”,应集中优势兵力围剿蓝军,“惟尽捣绵州为事”^①。于是,他命四川提督蒋玉龙牵制眉州李永和军,阻其北援。他亲率湘军坐镇潼川府(今三台县),指挥绵州之战。他根据蓝军特点和唐炯送出的蜡丸情报,制定了“合围会剿”计划。他命湘军精锐胡中和、何必胜、肖庆高各部6000人分三路攻东岳庙蓝军主力,副将唐友耕率部由石桥铺攻蓝军左翼,副将彭太和部由桑林坝攻蓝军右

翼;湘军曾传理、刘德谦两军由绵州南丰谷井推进,分别攻打榜山十贤堂和塔子山蓝军;绵州州判颜佐才率贵州播勇由新店子攻蓝军东路;道员张由庚、傅鸿勋扼守砣楼场,阻止蓝军退往保宁(今阆中县);卢又熊扼守魏城,阻止蓝军北去梓潼、剑州。此外,又命都司姚怀玉、知府宣维礼等率团练分守中坝、安县、略坪等处。

9月5日(八月一日),清军各营五更出战。刘德谦、曾传理各率部进抵塔子山、榜山下。刘德谦猛攻塔子山蓝军,分路夹击,以火箭火炮焚烧蓝军营垒9座。曾传理攻榜山下十贤堂,蓝军营垒也被焚烧,蓝军沿江东去,遇刘德谦部攻塔子山后沿江而上,蓝军腹背受敌,溃败投江死亡者甚多。

胡中和、何必胜、肖庆高等军分路攻东岳庙,清军以火力优势焚毁东岳庙蓝军左营,但蓝军坚守不出;中、右两路获胜。由于塔子山、榜山清军乘胜增援清军中路,蓝军不支大败,30余座营垒被焚,战死万余人,烧毙、投江者不下数万人。

9月10日(八月六日),蓝朝鼎军被迫自焚东岳庙残营,将主力移往西山观一带。15日,蓝朝柱纵火焚毁龟山和桑林坝各营,渡涪江,扎营青衣坝一带,与西山观蓝朝鼎部襟带相连,两处连营20余里,列营70余座,各有

^① 《骆文忠公奏稿》卷二。

八、九万人。骆秉章见合围时机成熟，下令清军在东岳庙上下造浮桥5座，命胡中和、何必胜、肖庆高、彭太和各部由扁堆山分三路趋西山观蓝朝鼎军后路，命刘德谦、颜佐才循涪江而上，阻击青衣坝蓝朝柱军，命曾传理部驰赴沈家嘴攻其前锋。

9月18日(八月十四日)黎明，清军总攻开始，蓝军受到围攻，首尾不能相顾，纷纷败退。清军仍使用火炮、火箭猛攻，西山观一带火顺风势，将蓝军70余座营垒全部焚毁，战死4万余人。蓝军拼命突围，蓝朝鼎向绵竹、什邡、彭县方向溃退，集结于丹棱。蓝朝柱向德阳方向退却，在孝泉场受到胡中和、刘德谦部围歼，仅余数百人，向江油、平武接界的太华山遁去。

太平军石达开部前锋入川

1861年8月(咸丰十一年七月)，按照翼王石达开西图四川的战略决策，由广西进入贵州的太平天国远征军一部接受宰制曾广依的命令，由傅承相、李检点率领，从贵州攻入四川綦江县境，进围南川县城，攻克彭水县重镇郁山镇，再克黔江县城。10月撤出黔江县城，移师两湖边境，迎接石达开大军入川。太平军所到之处，打富济贫，深得群众欢迎，队伍由数千人扩充至三万余人。

眉州、丹棱会战

1861年(咸丰十一年)秋，骆秉章抵成都接四川总督印(10月16日)，并立即部署围剿眉州李永和军和丹棱蓝朝鼎余部。

李永和为配合蓝朝鼎围攻绵州的战役，5月(四月)率义军数万人围攻眉州，连营30里，横列数十垒，精锐扎松江口、铁门坝。李永和中军驻双桥刘家祠，环立80营。并分兵进袭崇庆，攻克名山。因受四川提督蒋玉龙部牵制，未能实现与蓝军会合的计划。

骆秉章解绵州围后，火速派湘果营胡中和由崇庆州取道将军庙，进驻顺河场；果毅营曾传理、护军营刘德谦等由彭山进至金鱼山、悦兴场；唐友耕、黎德盛部由太和场进攻王家场。合围各军到位后，11月3日(十月初一日)，唐友耕破快活山李军营垒，李永和见清军来势凶猛，主动收缩阵地，率义军退守黄中坝一带。11月13日(十月十一日)，清军各路同时发动攻势，李军集中优势兵力，踞险顽抗，并设伏歼敌有生力量。李永和为避免围歼，转移东瓜场，与胡中和部遭遇。李军浴血奋战，击毙湘军将领肖仁达，胡中和负伤而逃。随即，湘军全线出动，猛攻李军，枪炮、火箭齐发，焚毁李军营垒百余座，李军战死3万余人，被夺去船只190余艘。李永和连夜撤出眉州，退往青神县。

眉州一战，李军主力被歼。李永和败走青神后，骆秉章除分兵追击外，又

将围剿重点转向丹棱蓝朝鼎余部。

蓝朝鼎绵州突围后,经绵竹、什邡、彭县、崇庆退往丹棱,与李部何从政、李长毛援军万余人会合,共有兵力四、五万人。10月20日(九月十七日),蓝军攻占丹棱,凭借险要的地势,依山扎营40余座,拱卫全城。骆秉章命唐友耕部驻眉州南部洪化堰,截断李军东退之路。命湘军三营开赴丹棱,会同蒋玉龙部,约期会剿。

12月3日(十一月二日)凌晨,清军发动总攻,蓝军列阵对抗,湘军猛攻数十次,均被蓝军击溃。蓝朝鼎吸取了绵州失败的教训,将营帐易燃物扯下,火箭火炮亦不能为力。湘军只好使用收缩包抄,长围久困,断其粮道的办法,对付蓝军。

12月10日(十一月九日)左右,清军步步为营,距蓝军营垒仅四、五里;蓝军连日攻战,精疲力尽,加之粮道断绝,无法久守,于是决定突围。11日(十日)深夜,蓝朝鼎率精锐出丹棱西门,突破蒋玉龙营地。清军各营急追至麻柳湾,包围了蓝军,蓝朝鼎战死,蓝军死者万余人。蓝军瞿洪发、李长毛

部被湘军曾传理部围歼于彭县濛阳场,李长毛仅剩200余人,退入沙窝子万山积雪中;瞿洪发率残部千余人,退往犍为铁山。蓝朝柱部被湘军胡中和、刘德谦部追击到德阳孝泉场,遭到歼击,蓝朝柱率残部数百人退往平武、江油交界的太升山中。

眉州、丹棱会战,李蓝义军主力损失殆尽,开始走向败亡。

定通省捐厘章程,增收厘金

1861年(咸丰十一年),为镇压李蓝义军筹饷,川督骆秉章与藩司及盐茶道等,厘定通省捐厘章程,在省城设立捐输厘金总局(后改为厘金总局),于大江要隘之夔、渝、叙、泸等处,设卡抽收货厘,诸事皆循湘省官绅合办成法,按值百抽二到值百抽五税率征收货厘。

同治初,厘税收入猛增,仅云夔州一局,岁收六、七十万两。1863年(同治二年),川省为筹措冕宁防务经费,决定抽收蜡虫厘,于泸沽、越嶲设局稽征。所有两局货厘,均移作宁属营兵伙食、饷需之用。

1862年(同治元年)

川督骆秉章筹办四川团练

1862年1月18日(咸丰十一年

十二月十九日)川督骆秉章重申入川时向各州县下达的认真筹办四川团练的命令,并正式通告说:“统领楚军人

蜀,曾经札飭该州县认真办团,以辅兵力之不足。”又说:“零匪溃逃之处,无人堵截,以致东剿西窜,余焰复张”。^①要求各地团练,即应担负剿灭义军余部的任务。平时“缉盗防奸”,“查禁邪教”,战时分途巡缉,坚壁清野,断绝义军给养,或守城戍碉以防堵义军攻势。省城设立帮办团练大臣衙门,道府设立团防总局,州县分设团练局,甚至场镇也成立了团练组织。士绅成为团练骨干,如温江县“城内外民团部署略定,城中曰‘万春团’,推校官左廷为管带,邑绅胡渊、彭信古为左右翼长。东城外曰‘太平团’,邑绅郭安邦为管带。西城外曰‘五福团’,黄建钟为管带。”^②又如大邑县监生汤万成,充和安团总保,咸丰十年(1861年),李、蓝军到县西清源市,他纠集团众堵御,次日团败,被义军俘获,杀于悦来场之河干^③。

地方开办团练经费,按《团练章程》规定,全部由地方筹措,绅董乘机向广大群众敲诈勒索,使贫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一条枷锁。

石达开各部会师湖北来凤,进军川东

1862年1月31日(同治元年正月初二日),由傅承相、李检点率领先

期进入四川的太平军前锋部队,与翼王石达开亲自率领由广西、湖南迂回西进的远征军主力六、七万人会师于湖北来凤县城。两支大军在来凤度过天历新年,休整一月余,重新混合编组,每营均有熟悉四川情况的兄弟作向导,全军兵力超过十万。石达开制定了分兵三路进军四川的作战计划,由人台左宰辅李福猷领前军经蚕溪、大中坝等地进攻石砭厅。石达开自领中军随进。由天台左宰辅赖裕新领后军经悦来场、鱼池坝等地直抵长江南岸,查明渡口情况,相机渡江。如不能顺利渡江,就集中兵力攻占涪州。

2月19日(正月二十一日),前军李福猷在大中坝歼灭地主团练300余人,次日乘胜攻克石砭厅城,驻扎数日,城乡贫民数千人参军。24日(二十六日),李福猷放弃石砭,由长江南岸洋渡溪,沿江上行,向涪州进兵。后军赖裕新击溃地方团练,经石砭悦来场、鱼池坝,占据丰都县高家场、王家渡一带,准备抢渡长江。由于骆秉章早已下令将全部渡船集中北岸封锁渡口,无法渡江,只好率军由长江南岸上行往涪州东岸会合。石达开自领中军,自石梁河经磨刀洞,取道羊角碛向涪州前进。3月初(二月上旬),太平军在丰都王家渡连营百余里,抢渡长江未

四川省志整理《巴县档案》第五册,页181。

② 民国《温江县志》卷六,页四。

③ 民国《大邑县志》卷十一,“死难”。

果,于是沿长江南岸西进。

3月下旬(二月下旬),太平军三路会合于涪州境内,沿涪陵江(今乌江)东岸连营200余里,石达开发表《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申明反清大义,号召军民归降。4月1日(三月三日),太平军先锋部队抢渡乌江,搭设浮桥,主力部队迅速过江,清军闻风丧胆,在太平军凌厉攻势下,乌江西岸200里防线顷刻土崩瓦解。太平军占领涪州城外高山,随即发动猛烈的攻城战斗。

4月10日(三月十二日),由唐友耕、唐炯率领的清军援军到达涪州。12日(十四日),清军分三路进攻石达开围城部队,双方大战,互有伤亡。石达开担心久战不利,下令撤围西行,进入巴县境,与重庆隔江相望。因重庆为湘军刘岳昭部布防,长江船只均被集中北岸,石达开放弃了进攻重庆的打算,决定沿江西上,伺机渡江北进。

蓝朝柱、周绍勇鹤游坪会师

1862年3月(同治元年一月),蓝朝柱等率领的起义军与周绍勇等率领的起义军在川东涪州对岸的鹤游坪(今属垫江)会师。鹤游坪根据地乃是周绍勇、曹灿章、蔡昌龄等率领的义军于1860年12月离开牛佛渡后,转战于川东各县之后建立起来的,蓝朝鼎在丹棱突围牺牲后,队伍由蓝朝柱、谢华瑶率领向北撤退,经过德阳、江油,

进入平武,到了川甘边境。因兵力单薄,未敢孤军深入,乃转回到川东鹤游坪与周绍勇部会合。

当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太平军正从湖北进入川东,向涪州前进。涪州与鹤游坪相隔一条长江,起义军多次派人去和石达开联系。由于石达开围攻涪州不下,又见江防严密,遂挥戈西上,失去了这个难得的会师机会。

周绍勇在鹤游坪曾发布一篇申讨清王朝的檄文,对清王朝的暴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檄文称:“伪清垂涎得志,即以夷乱华,二百年之天日莫睹”,“而封豕其心,豺狼成性,卖官鬻爵,待士何恩?残民以惨,苛派繁征。大兴土木,频开劳费之河,人民受害者非浅。兵用满汉,何得粮饷各别?士卒含愤者久深。下民久罹其殃,上天早厌其德。隘口关津,无处非纳贿之地;纳妹杀兄,有损国家之誉;州城府县,胥尽属贪酷之徒”。檄文严正宣告:“我帅主悯斯民之憔悴,奉上帝之名威,义兴南滇,旋征西蜀”,“扫此胡腥,挽回二百年之社稷;剪兹丑类,整顿一十八省之山河”。

太平军迂回川南

1862年4月(同治元年三月),石达开在围攻涪州、进取綦江两战不利后,决定转向尚有李永和余部和南溪义军张四皇帝活动的川南,在叙府打

开局面,伺机渡江北图。5月(四月),挥军南下,经贵州仁怀厅,进入四川叙永厅。5月24日(四月二十六日),攻克叙永城。5月26日(四月二十八日),张四皇帝得知太平军向兴文移动,便迅速攻克兴文县城。5月28日(四月三十日),赖裕新部进抵兴文,两军胜利会师。6月1日(五月三日),合兵打长宁县城。6月12日(五月十四日),攻占长宁县城。长宁地处长江南岸,石达开决定将这里作为以后渡江北进的根据地。为了保全这块基地,他分兵四出略地,势力扩大到兴文、古蔺、古宋、叙永、庆符、高县、珙县一带。

四川总督骆秉章为了摧毁太平军以长宁为中心的根据地,迅速调集湘军、川军各营围攻长宁,双方鏖战激烈,伤亡甚重。石达开鉴于清军云集,长江遭到封锁,渡江无望,难以持久,于7月12日(六月十六日)撤离长宁,退回叙永、兴文、古宋。8月20日(七月二十五日)太平军由川南进入贵州,再由贵州回师川东江津,与地方团练发生激烈战斗。9月9日(八月十三日),太平军大部聚集綦江赶水,准备造木筏过江,在清白滩被团练击败,损失木筏150架。9月27日(闰八月四日),太平军主力集中于江津南部及綦江青羊市、扶欢坝、两河口、东溪、甑子场,不时与团练激战。

10月1日(闰八月八日),石达开率领全军由川东进入贵州,分兵攻桐

梓、仁怀、绥阳、遵义各地。全军在大定府(今大方)与两年前离开广西的曾广依部太平军会合,商定了分兵两路进军川西南的具体办法。一路为石达开本部,由大定西趋毕节、镇雄,重入叙府;另一路为赖裕新、李福猷部,由曾广依作向导,南走水城、郎岱,伺机抢渡金沙江,而后前往叙府以西的木川司,两军会合。

石达开本部离开大定,经过毕节于10月27日(九月初五日)进入云南镇雄县。镇雄地处川黔滇交界山区,没有清军驻防,太平军得以从容休整,补充新兵。赖裕新、李福猷部围攻郎岱不克,分兵西进。李福猷进军宣威,赖裕新进军东川。李福猷经过宣威、昭通,到达金沙江边的副官村,后被石达开招回横江镇,归入本军。赖裕新经过东川,由米粮坝(今巧家)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府(今西昌),从此,与石达开本军失去联系。

11月15日(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石达开率领本军由镇雄大举入川,迅速攻入筠连,前锋直指叙府横江镇。不久,石达开主力占领横江镇、双龙场、玉皇楼等江岸市、镇,连营横江西岸,纵横数十里,由于冬季水枯行船困难,准备等待春水旺盛时抢渡金沙江。

川督骆秉章得知石达开誓渡金沙江的计划,立即调遣川军唐友耕部、熊焕章部、滇军杨发贵部扼守金沙江北

岸,将湘军刘岳昭部、胡中和部、萧庆高、何胜必部集中横江附近,围攻太平军大营。

12月上旬(十月中旬),各路清军部署完毕,决战即将开始。石达开下令将高县、筠连县各营撤回大营,又招回云南副官村的李福猷部,作好了决战准备。

李永和部败亡

1862年4月(同治元年三月),李永和、卯德兴率领起义军两万余人离开铁山,5月,转移到叙府所属的八角寨。由于绵州会战失利,蓝朝鼎牺牲,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使骆秉章得以集中兵力,围攻八角寨。起义军在八角寨坚守三个月后,粮食缺乏,只好再次突围到犍为县龙孔场。骆秉章调集四川省内所有精兵包围龙孔场,并筑坝拦水,然后决堤水淹龙孔场。1862年10月18日夜,李永和、卯德兴被迫率领五千余人突围。义军在深水中行动,清军在旱地阻击,义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突围战斗从深夜到天明,义军战死过半,受伤被俘不少。最后李永和、卯德兴重伤被俘,不久英勇就义于成都。

李蓝起义军余部转战川陕鄂边境

1862年6月(同治元年五月),聚集于鹤游坪(今属垫江)的起义军开展分兵活动。蓝朝柱、郭富贵率领一部分

起义军东走丰都、忠县、万县,进入云阳云安盐场。从这里又再次分兵,蓝朝柱率部向陕西南部前进,于1862年6月3日越过川陕边境。郭富贵则率军进入川东奉节、巫溪,12月转战川北巴州、仪陇,遭周达武部清军歼击,大败,死3000余人,郭富贵被俘,不久在成都遇害。

当李永和、卯德兴被围于犍为龙孔场时,据守鹤游坪的曹灿章、蔡昌龄率军往救,途中被清军拦截,无法西进,迫不得已北走太平固军坝。1862年10月28日,这支部队从太平入陕南,后与蓝朝柱会合。

1862年10月,李永和、卯德兴被俘牺牲,川西战事基本结束,骆秉章得以集中兵力对付鹤游坪的义军。据守鹤游坪的周绍勇被迫放弃鹤游坪,退出四川,向陕南转移,途中遭到清军处处阻拦,前后夹击,以致义军一再受挫。1862年11月17日,周绍勇被俘,不久被害于成都。

至此,在四川血战三年的李蓝起义军,基本上被骆秉章镇压下去。李蓝义军余部先后离开四川,转入陕南活动。

蓝朝柱攻占洋县

1862年7月5日(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蓝朝柱率领起义军攻占陕南洋县。三个多月后,进入陕南的曹灿章、蔡昌龄部义军来到洋县,与蓝朝柱

部会师。这次会师决定在洋县建立根据地,重建政权,以便统一指挥,公推蓝朝柱为“大汉显王”。蓝朝柱是蓝朝鼎之兄,又名蓝大顺,是李永和、蓝朝鼎牺牲后义军的后期领袖。

这时,太平天国西北远征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枯王蓝成春、启王梁成富等率领大军由河南入陕,清廷大为震动,连忙命令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合兵阻击,唯恐太平军与蓝朝柱义军连成一气。但当太平军军锋指向汉中府时,两军终于联合起来,协同作战。1863年10月,两军攻克陕南重镇汉中府,旋又攻克成固县。11月,蓝朝柱率兵北上,翻越秦岭,出其不意的破克渭水平原上的周至县城,威胁西安。1864年初,太平天国天京被围,形势危迫,陕南太平军回援天京,蓝军势单力弱,被新任陕西巡抚刘蓉率湘军、川军攻陷汉中府,3月,蓝朝柱再败于周至县,4月蓝朝柱牺牲于兴安县叶家坪,其队部遂告星散。

法国天主教堂在打箭炉等地设立

1862年(同治元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打箭炉、巴塘、道孚、炉霍等地设立天主教堂。这些地区从1861~1868年中的几个时期,属于川南教区。1864年吴依容神父驻打箭炉教堂,巴布埃神父驻巴塘教堂,1865年被任命为西藏主教的苏罗,由于受到西藏僧俗的反对,只好在川藏边境的

打箭炉滞留下来,等待进入西藏的机会。

骆秉章奏办捐输

1862年12月31日(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为筹措各项赔款和镇压太平军石达开部军饷,四川总督骆秉章奏准开办捐输。规定按粮多寡摊派,责成有司,督绅征收。先由全省预算捐输总额,分配于各地区,区别等级,定期纳付。全省除峨边、松潘、马边等23个边远贫瘠厅、州、县不摊认捐输外,其余各地均视捐额之多寡,定税率之轻重,多的每粮一两收捐二三两,少的每粮一两收捐八、九钱,民户一般载粮八分以上起捐。四川全省一年的捐输总额,大约170~180万两,相当于清代田赋正额地丁税669131两的两倍以上。捐输银主要供甘饷、俄法英德借款、克萨息款、步兵统领衙门经费、云南铜本、防剿经费、八旗绿营军饷等。

清朝定制,不得加赋,故采取议叙方法认捐,定名为捐输。为鼓励士民认捐,仍按捐输数额,增拨全省文武乡试中额、学额。按1853年(咸丰三年)规定:每省捐银10万两,加乡试中额一名。1868年(同治七年)又改为:每省捐银至30万两,加文武乡试中额一名。每捐只加一次,不得永远保留。

由于晚清财政困难,从1862年(同治元年)起,每年造报捐输议叙,援案展办,捐输遂成固定的常年征收的

附加税,每年征派总额大约 180 万两。

全省人口总数

1862 年(同治元年),四川全省居民总户数为 703.0146 万户,人口总数为 3101.768 万人。

1863 年(同治二年)

横江大战

1863 年 1 月 8 日(同治元年冬月十九日),驻扎叙府横江镇的石达开部太平军与奉命前来围剿太平军的清军各营间展开了激烈的攻守大战。石达开亲自指挥驻守双龙场的太平军猛扑湘军胡中和部的营垒,其它各军亦主动出击,清军反攻为守。横江镇、双龙场太平军营垒林立,险路布防,清军仰攻困难,伤亡惨重。鏖战十余天,双方不分胜负。

1 月 31 日(同治元年腊月十二日),湘军将领胡中和、刘岳昭在探听到通往太平军大营的山间小道和暗中收买太平军内部叛将后,当即倾巢出动,一军猛攻横江镇大营,一军抄山路偷袭横江镇后营,两面夹击,投掷火弹焚烧营垒,使太平军处于被动地位。加教案发生后,范若瑟通过法国驻京公使向总署大臣提出严重交涉,索赔损失。清廷令成都将军崇实火速办理。崇实迫于内外压力,与重庆知府再三调

之叛徒郭集益、冯百年在双龙场太平军总营纵火作为内应,引起军心动摇,湘军乘机猛攻,太平军失利,死伤 3 万余人,被迫撤出横江,全军退入云南境内。

第一次重庆教案

1863 年 3 月(同治二年正月)第一次重庆教案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教士依仗《天津条约》获得的自由传教特权以弛禁、“还堂”为理由,要求退还被地方官没收的川东四所教堂,并要求拨给长安寺地基,改修重庆教堂。^①重庆府遵照清廷指示,被迫承认了教会的特权。教士范若瑟在官方庇护下,企图强行拆除长安寺,强占民房民产,修建并扩建真原堂和教会房舍。重庆士民激于义愤,一举捣毁真原堂及教士住宅。

停议妥:由八省会馆赔款二十余万两,允许法国教士“另外卜地建修教堂”,“各属境内教民如有典买田宅修理经堂、医馆等项,该处士民均宜玉成其

^① 民国《巴县志》卷 16,“交涉”。

事”；长安寺“转给八省永作办公之所”^①。偏右地段永远驻扎军营，以担负全城防卫任务。

川藏官兵平息瞻对工部郎结地方势力

1863年（同治二年）春，清廷谕令四川总督骆秉章、驻藏大臣景满庄，会剿中瞻对工部郎结地方势力。

瞻对土司工部郎结自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秋起兵反清以来，先后攻占上瞻对、如龙、下瞻对、白利、孔萨、炉霍、甘孜、德格、理塘、明正土司土地，在东起打箭炉（今康定）、西至昌都、北到青海玉树、南达理塘方圆千里的土地上，建立了地方政权，使川藏政治、经济联系严重中断。

1865年（同治四年），各路藏兵齐集金沙江畔，川省官兵也如期会合瞻对东南，对瞻对工部郎结形成包围之势。经数月激战，工部郎结无法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加之清军对工部郎结实行分化瓦解，战场节节失利，官兵俘获工部郎结长子东登工布父子、次子僧人四郎生格等20余人。清军利用东登工布对工部郎结进行劝降，迫使他带领族眷部众投降，并要他先将萨伽喇嘛、德尔格特土妇母子等放回。工部郎结得信后，只将德尔格特长子长女等放回，坚持把萨伽喇嘛、德尔格特土妇等扣留本寨，拒绝率众投降。

川藏官兵联合各土司军队将瞻对、新旧两寨先后攻破，工部郎结率众登楼抵抗，藏土各兵纵火烧楼，将工部郎结父子三人烧死，于是瞻对工部郎结势力全部平息。工部郎结自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至1865年（同治四年）占据中瞻对前后18年之久，给这一地区造成巨大深远的影响。

最后，骆秉章建议清廷重新考虑瞻对的归属问题，他说：瞻对地系川藏，工部郎结聚众反抗时，川藏会剿，藏兵先克并垫兵费30万两，现在款项无从筹还，请将其地赏赐达赖喇嘛。清廷依议将瞻对划归藏区。

石达开大渡河败亡

1863年4月15日（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石达开率领本军四万余人从云南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沿四川会理侧趋德昌。5月1日（三月十四日），攻占宁远府（今西昌）重镇河西镇，驻军樟木箐。5月3日（三月十六日），大败来犯清军数千人。随即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山间小道，于5月14日（三月二十七日），抵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附近）。由于当地彝族土司王应元已被清军收买，撤去索桥、渡船，据险对抗，加上大渡河水猛涨，抢渡失败，太平军被困于无粮绝境。

5月17日（三月三十日）下午，石

^① 《清档·教案档》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范若瑟致总署函》。

达开派出精锐千人,分驾船筏,沿河抢渡,重庆镇总兵唐友耕部刚刚到达对岸,拼命施放枪炮,阻击船筏靠岸。由于河宽流急,船筏无法前进,抢渡不成。后石达开数次组织壮士抢渡,均未成功。

太平军渡河失利,滞留紫打地,给老谋深算的川督骆秉章、布政使刘容布置大渡河“围剿”太平军的计划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他们派遣唐友耕、雅州知府蔡步钟率兵8000,布防大渡河北岸,阻止太平军渡河北进。同时,命土司王应元带彝、汉兵勇扼守松林小河,阻断太平军西走泸定通道。又派南字营都司王松林率兵把守箐箕湾、擦罗一线,截断太平军南撤宁远之路。并派越西厅同知周岐源、参将杨应刚、都司庆吉与土司岭承恩率彝汉兵勇自竹马岗北上,堵住太平军东进道路。至此,石达开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5月21日(四月初四日),太平军全军出动,齐集南岸,石达开精选四、五千壮士,陆续登上几十只木船和几十只竹筏,向北岸前进。由于洪峰急流的巨大冲击,船筏全部被打翻冲散,四五千壮士全部遇难。

5月22日(四月初五日),石达开改变计划,决定抢渡松林小河,南进泸定。松林小河滩浅礁多,不能行船,索桥又被王应元破坏,石达开下令全军分段抢渡,涉水过河。由于深沟乱石难以行走,又受王应元兵勇阻击,渡河失败。

5月23日(四月初六日),石达开移兵至河口以上十里的磨房沟,挑选数百善于泅水的将士强行泅渡,由于急流猛浪的冲击,抢渡又告失败。

5月29日(四月十二日),彝族土司岭承恩带领彝兵偷袭马鞍山太平军大营,四处纵火,趁火打劫,抢走大批军粮辎重,无法带走的将其焚烧,大营粮草全部丧失。太平军从此又因缺粮而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6月3日(四月十七日),石达开大会将士,引咎自责。决定背水一战,死里求生。当日夜间,全军兵分三路,两路抢渡大渡河,一路抢渡松林小河。但是,由于水势汹涌,船筏难以靠岸,加以清军沿岸顽抗,太平军抢渡大渡河和松林小河终于大败。石达开又先后写信给王应元和岭承恩,要求让路或买粮,许以重金,均被拒绝。

6月9日(四月二十三日),面对抢渡无望,弹尽粮绝的险恶处境,石达开遣散了新兄弟和老弱病残数千人,率领6000余人弃营东走,向小水方向突围。10日(二十四日),石达开到达利济堡时,发现横梗他们前面的老鸦漩河也在涨水,一片汪洋,无法逾越。

6月11日(二十五日),石达开与部下计议,决定采用诈降的办法,南投洗马姑守将越西同知周岐源部,取得粮草后东山再起。同日,清军正好派遣杨应刚、王松林前来劝降。石达开率军与他们前往洗马姑场商定了舍主帅保将士的协议。12日(二十六日),按协

议,石达开将 6000 将士精减为 2000 人重新编队,次日集结大树堡待命。石达开与长子石定忠、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在前往大树堡途中被唐友耕拦路劫获,与部下 2000 人隔绝,诈降计划全部落空。

6 月 18 日(五月初三日),石达开等被唐友耕亲率清军数百人解往成都。6 月 25 日到成都。不久,就义于成都。时年 33 岁。

6 月 19 日(五月初四日),按照唐友耕临行前的毒计,雅州知府蔡步钟对大树堡 2000 太平军将士实行大屠杀。除极少人脱险外,全部被害。

骆秉章镇压松潘藏羌军

1863 年 7 月 17 日(同治二年六月二日),四川总督骆秉章集中兵力,攻陷藏羌义军占据的松潘城。

松潘县城自 1861 年 8 月(咸丰十一年七月)为藏羌义军攻占后,清廷十分震怒,屡次诏令川督骆秉章剋日“进剿”。李蓝义军和太平军石达开部相继被消灭后,骆秉章调集精锐兵力,对松潘义军进行血腥镇压。骆秉章调集大军,“进剿”松潘的同时,收买并分化瓦

解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林坡寺喇嘛等作为内应,夹击义军,义军被迫转移,清军不战而入松潘县城。义军首领额能作、折乃尔退守小姓沟后,截断清军后路,猛攻茂州,使清军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林坡寺喇嘛告密,清军突然袭击,义军首领被俘遇害。额能作、折乃尔牺牲后,南坪羊峒五十八寨头人欧利哇继续顽强反清,直至 1865 年,骆秉章才再次集中兵力,攻陷南坪,将川西北藏羌人民武装反抗活动镇压下去。

川东私盐贩暴动

1863 年(同治二年),刘四十(受之)、张二童等私盐贩首领率众数千,占据重庆嘉陵江小三峡,武装反抗江津、巴县注册盐商,捣毁盐店,抢劫货款,杀人越货。1865 年(同治四年),重庆镇派遣重兵围剿,武装盐枭暂时星散。这类私枭捣毁盐店的事件,自乾嘉以来,不断发生,其原因在专商运销制度的弊端。由于专商垄断川盐运销,肆行偷、漏盐税,抬价销售,引起食户不满,私贩蜂起,导致专商与私贩的尖锐冲突。

1864年(同治三年)

全川大旱,崇庆、万源大水

1864年(同治三年)春夏,全川大旱,尤以绵竹、广汉、新都、温江、江油、中江、蓬溪、射洪、潼南、仪陇、巴中、涪陵、南川、雅安、名山、峨眉、仁寿、南溪、富顺、泸州、筠连、叙永、古蔺等府州县灾情严重。雅安、名山夏大旱不雨,持续时间从清明到大暑;江油、中江、射洪等县春夏无雨,禾苗枯槁,潼南春夏大旱,7月(六月)大水,旱涝交集。南溪、富顺、泸州秋不雨,至次年6月(五月)。各府州县米价陡涨,岁大饥。蓬溪、潼南秋大饥,斗米钱2400文。南溪、富顺、泸州斗米钱2000文。崇庆县6月(五月)大雨雹,平地水深数尺,禾菽无收。万源7月(六月)大雨溃堤,城内水深数尺。

川省续办津贴

1864年(同治三年),清廷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和李蓝起义军的军费,决定“再行劝办按粮津贴,每条粮一两,仍征津贴库平折色银一两,于开征时随粮缴纳;无论畸零小户,一体交收。”^①规定,所有征收事宜,均由地方官选派公正绅耆,设立公局,妥善经

理,不得假手书役,制造弊端。收数达到一定金额,即交地方官倾销足色,随同地丁批解。

厘金仍由官绅合办

1864年(同治三年),清廷令各省督抚将厘捐委员概行裁撤,统由地方官办理。川督骆秉章复奏清廷,川省厘金已著成效,改由地方官办理,诸多窒碍,奏请清廷仍照旧章办理。清廷批准了骆秉章的奏折。

厘金一项,同治初年收入颇丰,仅夔州一局,每年可达六、七十万两。全省在1856—1873年间,共收盐厘、货厘银2100多万两,平均每年收数约在117万余两。

四川大旱

1864年(同治三年),四川大部地区遭受大旱。绵竹、新都、广汉、雅安、名山、江油、中江、射洪、蓬溪、潼南、南溪、富顺、筠连、泸州、叙永、古蔺、巴中、南川受灾严重。春夏无雨、少雨,禾苗枯槁,米价暴涨五、六倍。潼南斗米2400文,泸州斗米2000文。饿殍遍野,饥馑全川。

崇庆、万源遭受雨雹大灾。崇庆6

月(五月)大雨雹,平地水深数尺,禾苗坏死。万源7月7日(六月初四日)大雨溃堤,城内水深数尺,秋收无望,饥谨相继。

时人描述全川旱情情况诗云:“火云如山日如血,江流无声厚土裂。……纵横村舍缠荒烟,浩荡清溪填白骨。

斗米万钱不易余,四境三年那曾堡;小户假息弄潢池,大家忍饥咽糠粃。亟须父母向疮痍,何乃豺狼横剥割。”^①大旱以后,全川特大饥荒,斗米万钱,人民饥毙,而凶狠的地方官吏还在肆意剥削搜刮,竭泽而渔。

1865年(同治四年)

第一次酉阳教案

1865年2月2日(同治四年正月初七日),平民刘胜超邀约宋文选、张玉、刘慎法、张添源、杨胜约等人,将法国天主教堂及不法教民张添兴等房屋打毁,并搜寻邓司铎未获。这次教案发生的原因,是不法教民张添兴等人,仗势欺人,积怨甚深并秉承邓司铎的意志,强迫大教堂附近的士民信奉天主教所致。

事件发生后,邓司铎逃往重庆。在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挟下,清政府不得不将酉阳州知州董貽清撤职,派邓清涛接任并严办此案。法国也同时派法教士玛弼乐赴酉阳,煽动教民寻衅报复。使民教之间矛盾更加尖锐。8月28日(七月七日),酉阳群众到处张贴告示“诛灭洋教,斩草除根。”8月29日(七月九日),已经退教的冉老五(冉

从之)等人到城隍庙与玛弼乐论理,而玛弼乐态度横蛮,动手逞凶,在一场互殴中,玛弼乐被击毙于城隍庙中。川东主教范若瑟得讯后急向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禀报,罗淑亚照会清政府,以此等事端可能引起法国向中国出兵相威胁。清政府受此恫吓,不得不将所谓“缉捕不力”的酉阳州知州邓清涛等,一并摘去顶戴,调胡圻接任知州,委锡佩接任川东道尹“严办此案”。锡、胡二人到任后,将刘胜超、冉老五等人逮捕归案。1867年结案,冉老五被杀,刘胜超等人充军,赔偿教会白银八万两。

四川持续干旱

1865年(同治四年)春夏,四川持续大旱,无雨少雨,米价腾贵。成都至夔(今奉节县)、巫(今巫山县),上下数千里,斗米市价五六千至一二千(文)不等。清廷命四川总督骆秉章“察看情

^① 唐炯《成山庐稿》卷4,诗,页4。

形,酌发仓谷”,并严禁所属州县囤积居奇。已发仓谷,秋后采买补足。

阶州失陷,蔡昌龄、梁成富牺牲

1865年6月6日(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在川陕甘各省清军合力围攻下,李蓝义军余部和太平军余部所据守的甘肃阶州(今武都)陷落,李蓝义军余部首领蔡昌龄奋战牺牲,太平天国启王梁成富被俘殉国。蔡昌龄和梁成富乃是李、蓝义军和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两支孤军,他们在陕西境内会合后组成一支联军,继续坚持战斗,并于1864年9月18日(同治三年八月十八日)攻克阶州。阶州的陷落,蔡昌龄的牺牲,标志着李、蓝义军的最后失败。

岷江洪水

1865年9月(同治四年八月),岷江上游暴发洪水,都江堰堤决口,淹没沿江各县农田数以万计。

张大童起事

1865年(同治四年),著名盐枭首领张大童召集川江沿岸场镇会众数百人,准备大批军火武器,约期起事。川督骆秉章飞飭川东道会同重庆镇督率江(北)、巴(县)等八县兵勇县役团练数千人围剿,张大童等人被俘,余部星散。

张大童,巴县北碚人,1802年生。

咸丰初年为巴县著名盐枭首领,与其弟二童、三童、四童聚集了数百名盐枭在小三峡私设炮船关卡,霸抽盐厘,上水每包取钱100文,下水每包取钱40文。稍不如意,结伙拦劫,对抗官府。清政府多次调兵围捕,均未将他拿获。

法国探测队入川考察

1865年(同治四年),法国在越南的总督组织一个矿业考察队,由云南进入四川叙州府(今宜宾市)、重庆,再顺长江而下,经上海回到西贡。这个考察队在四川探测了矿产资源,并写成了几份报告,如《帅冈(西贡)至叙州一带搜矿纪要》、《中国矿说》、《四川矿说》等^①。

清廷令四川采办锦缎

1865年(同治四年),自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江南织造久虚,十余年中无绸缎供应。自本年(同治四年)起,开始在四川采办。从本年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先后采办6次。以后,采办次数、数额、品种也不断增加。如1875年初(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清廷谕令四川添制大缎800匹,其中大红二则龙200匹,宝兰二则龙200匹,明黄二则龙100匹,深灰色五湖50匹,深灰色福寿50匹,大红福寿200匹,耗银89461两。

^① 见于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96~297页。

川省各地会党起事

1865年(同治四年),川省各地会党不断起事,武装反抗官府。郫县一带发生咽噜党徒王大老么起事,德阳县有教首黄神仙倡导起事,入其党者4000余人。富顺县一带,私盐贩黄金三等率同伙,抗不纳厘,由自流井运盐到牛佛渡。以后势力日益强大,劫掠富户,官兵不敢过问。^①川东一带地区,著名私盐贩首领,重庆以下为江大烟杆、罗贵兴、谭登心、杨海亭;泸州以

下,为谭二疯王、任韦驮、任长蛮。而谭二疯王、江大烟杆又系著名咽噜会党首领。这些私盐贩与会党等武装集团走私已十余年,他们动辄号召数百甚至一二千人,其船队均置枪、炮、器械,武装对抗官兵。^②

这些武装咽噜会党集团,其成份相当复杂,但从他们劫富,抗厘和贩私盐的活动看,亦具有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性质。

1866年(同治五年)

甘孜发生强烈地震

1866年4月(同治五年三月),甘孜县发生强烈地震,寺庙、民房遭受严重破坏,压死喇嘛2000余名。格通、绒坝岔、叶早、庄果、仁果、仲柯、甘孜旧城及大金寺、白根寺等房屋均遭破坏,人畜大量伤亡。

据现代科学推测:这次地震震中位置在北纬 $31^{\circ}7'$,东经 $99^{\circ}8'$,烈度为7~7.5级。

德人李希霍芬入川探险

1866年(同治五年),德国派遣李希霍芬经陕入川,先后至成都、雅安、

宜宾等地探险,窥查资源,后循三峡水路离川。在他所著《李希霍芬男爵书简,1870~1872年》(1873年上海出版)中,对他在四川的游历活动作了详尽记述。

崇实兼署四川总督

1866年2月20日(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成都将军崇实兼署四川总督,骆秉章因病给假四月。

宋仕杰反清起义

1866年10月11日(同治五年九月初三日),马边、屏山、洪雅地区红灯

① 《富顺县乡土志·兵事》。

② 《四川盐法志》卷34,“缉私了”。

教首领宋仕杰联合红灯教其他一些首领刘棒凯、何玉贤、周桂顺、朱芬、熊文才、贺代宾等高举义旗，设立官职，制备旗帜，“连营结寨，众至一万”，攻占屏山县境杉树岗、玛璃沟等地，掀起了四川红灯教反对清王朝的武装斗争。

宋仕杰起义后，为扩大战果，派熊文才通过屏山彝族地区，在洪雅县境发动起义，同时，宋仕杰率主力攻打马边厅城，屏山义军首领宋二光、熊有仁等率众攻打清军马边右营，各地红灯教起义军同时并举，使清军应接不暇。

川督骆秉章惟恐义军占领犍乐盐场，蔓延川南地区，急调提督胡中和、总兵周达武等率湘军、黔军十余营，兵

分三路向洪雅、马边、屏山集结，邻近府州厅县官又亲督练勇团丁参加“会剿”。清军八营直抵马边城下。围城义军退归谷垒，受到清军围攻。11月20日，义军木城卡寨被攻，起义首领和战士牺牲1400余人。

宋仕杰幸免于难，率众退守白石埡，整顿军队，布置作战计划，准备固守。由于清军武器精良，又有团练配合，人多势众，义军节节失利，所有堡寨在12月上旬均被攻破，全部义军非战死即被俘，宋仕杰突围出去，在潜往云南途中在麻柳塘被俘，12月23日与其他义军首领一同在成都遇害。

1867年(同治六年)

骆秉章授协办大学士，留川督任

1867年6月10日(同治六年五月九日)骆秉章授协办大学士，留四川总督任。

富荣盐场深井黑卤和天然气的大规模开采

1867年(同治六年)，由于钻井、打捞(落物)、治井工艺的不断改进和“川盐济楚”后食盐市场需求的急剧增长，富荣盐场(今自贡)深井黑卤和天然气得到大规模开采，富荣盐业进入

鼎盛时期。

富荣盐场深井在这一时期已突破一千米，达到三叠系石灰岩的黑卤和天然气储藏层位。目睹深井黑卤和天然气开采盛况的李榕描述说：“火之极旺者曰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水、火、油三者并出曰磨子井，水、油二种经二、三年而涸，可烧锅四百余口，经二十余年犹旺也；德成井火卤气熏人至死，可烧锅五百余口，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经年不喷，牛车推之，尚可百余担；如海

井卤气亦熏人至死。”^①

自“川盐济楚”以来的十余年中，富荣盐场新凿深井100余眼，全场盐、气井总数大约3000~5000眼，煎锅20000余口，年产井盐20~30万吨，产额占全川各场总产量一半以上。富荣盐场井盐除销售本省40余个州厅县卫外，还畅销边岸（贵州、云南）和楚岸（湖北、湘南）的100余个州厅县卫。富荣盐场因此一跃而为四川盐业生产中心，荣获“盐都”的美称。

黑石河洪灾，钱璋筑堤

1867年（同治六年）夏秋，霖雨十余日，都江堰淹没水尺，百川横决，黑石河淹没粮田20000余亩，灾情严重。

当年冬，灌县知县钱璋亲勘水道，夜宿江干，约集士民商讨筑堤办法。他又亲自督工，向施工人员讲明“深淘滩，低作堰”的道理。这次施工有三项主要工程：一是自索桥西起，沿河筑堤140余丈（约460余米），堤高9尺（约3米），宽1.2丈（约4米）。二是从河南方决口处开始，到下游苏家桥为止，共淘滩20400余方，用竹笼1500余条，添筑护筑数百丈，堤外植柳树数百株，以巩固堤防。三是劝导崇庆州（今崇庆县）民在灌境分受江水的汤家湾筑堤100余丈，淘河2000余方，以畅其流。

工程从1867年（同治六年）冬开始，1868年（同治七年）仲春完成，费银2000余两。

1868年（同治七年）

骆秉章死于任，吴棠继任川督

1868年1月12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骆秉章死于四川总督任，赠太子太傅。成都将军崇实兼署四川总督。闽浙总督吴棠调任四川总督，1871年3月13日兼署成都将军。

德阳等县霍乱流行

1868年7月（同治七年六月），德阳县霍乱病流行，全县死亡2000~

3000人。此病俗称“麻脚瘟”，始自成都，后向邻近州县传播。最早见于《中江县志》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民病麻脚瘟，须臾气绝。”

第二次酉阳教案的发生

1868年11月（同治七年十月），酉阳发生第二次教案。当年初，酉阳民教矛盾更加尖锐。法国天主教司铎李国奉示，在州城组织了教会武装，名为保护教堂，实为报复的手段。教民也在

^① 李榕：《自流井记》、《十三峰书屋文稿》卷一。

教士的唆使下,淫掳烧杀,无恶不作,民教之间口角、扭打之事时有发生,四川官吏则袒教抑民。

5日(四日),不法教民张添兴等到乡绅张佩超家,借索欠款为名,强奸妇女,抢去银2万余两并衣服多件,杀害雇工吴昌林等3人,又将其子张玉珙扭送狱中含冤毙命。另一子张玉镁向民团首领何彩求救,何彩与各处百姓自卫团体联络,决定攻打教堂。11月21日(十月十五日),何彩等人率民团进州城攻打教堂,响应者近万人,包围了天主堂,并将教堂焚烧,将司铎李国处死。

酉阳人民的反教斗争,得到州属各乡人民的支持,“纷纷打教”。知州胡圻等派出清军,逮捕打教百姓,并下令“解散团众”,收缴武器。酉阳纸房溪教堂华籍司铎覃辅臣乘机率教堂武装杀死民众145人,伤700余人,焚毁民房100余户。与此同时,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借口李国被杀,教堂被毁,提出四条无理要求:罢免地方官;严禁酉阳人民反对天主教;派钦差大臣赴川办案;按范若瑟的指控抓人赔款,否则将诉诸武力。清政府先后派成都将军崇实、湖广总督李鸿章等专办此案;川东道锡珮、查办大员曾传道等也亲到酉阳镇压。李鸿章等赶赴重庆,曲意奉行护教抑民政策,派出大批清军练勇,逮捕了打教首领何彩等人,并处以极刑。而率领武装教民残杀平民的华籍传教士覃辅臣却在教会的庇护下,逍遥法外。

其他恶棍也一律不加追究。

1869年(同治八年)酉阳教案结案,何彩、刘福等人被处死,其他参与者,一部分流放充军,一部分受笞刑,并由清政府向教会赔款18000两。

清廷命川军镇压云贵川各族人民起义

1868年(同治七年),清政府派兵镇压贵州龙井苗民起义和川滇边境彝民起义,贵州龙井苗民和川滇边境彝民因不堪忍受官府和土司的残酷迫害,在首领张王和勒乌立兹领导下起而反清。

清政府谕令四川总督吴棠派川军往贵州、云南、四川边境剿办。当年初,吴棠分遣知府唐炯、道员蹇闾、总兵刘鹤龄诸军,由唐炯统率出征。川军镇压苗民义军于水源沟,杀害义军首领张王。5至6月(闰四月),川军攻克偏刀水苗民义军大营。在川滇边境,越西厅彝民起义军在勒乌立兹率领下占领普雄山,筑城与清军抗衡。川军提督周达武“进剿”彝军,攻陷普雄石城,屠杀大量义军;又乘胜南进,摧毁彝民寨堡,俘虏勒乌立兹,对彝民实行剿抚兼用策略,平息了川滇彝民起义。不久,吴棠又命唐炯继续进剿贵州安城。同年9月(八月),川军攻占大坪,俘其首领刘仪顺、秦崽崽,屠杀大批义军。同年12月(十一月),又遣唐炯部“进剿”贵州麻哈苗军,攻占麻哈城。1869年1月(同治七年十二月),攻陷黄平县城。

同时,周达武部攻占平竹、黑大、大杆彝民寨堡。5月(同治八年四月),攻克贵州清平县城。7月(六月)攻克云南寻甸,镇压了回民起义,招抚回民首领

马天顺。1870年9月(同治九年八月),派道员邓琦等率部“进剿”苗彝各族起义军碉寨,10月(九月),会同滇军攻克永北厅城。

1869年(同治八年)

成都大旱

1869年(同治八年)夏,成都及郊区各县,久晴无雨,各州县旱地禾苗枯死,稻田缺水,大春无望。城乡贫民断炊,市上无米,人心惶惶,省城重地,屡出抢案。川督派遣官兵,到各地严查囤积情况,并调用仓储平抑米价。

洋商总会派商董入川考察

1869年(同治八年),上海洋商总会派商董2人入川考察商务,调查有关开设商埠的动议,并将调查结果,公诸于世。洋商乘坐两艘英国军舰从汉口出发,向西航行两个多月,这年底,

他们给英国外交部写了四川商贸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详列川省工商业繁盛情况,引起中外人士关注和向往。同年底,上海英商商会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强调:“除非汉口以上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对华贸易就不能扩张。”^①

川东兵备道推广蚕桑

1869年(同治八年),川东兵备道姚观之在重庆提倡发展蚕桑业,招请浙江养蚕技工,引进湖桑,购买蚕种,择浮图关隙地植桑养蚕,示范推广。这是晚清四川提倡蚕桑实业的先导。

1870年(同治九年)

巴塘地震

1870年4月11日(同治九年三月十一日),巴塘发生7.5级地震,震

中在巴塘,烈度十度。是日上午9~11时,巴塘一带地震,粮务、都司衙署、土司官寨、喇嘛寺庙、粮仓、库房、碉寨、堡垒和民居尽行倒塌,关帝庙、城隍

^① 英国哈德兹裴德市商会建议书。

庙、法国教堂倒塌毁坏。人民沦亡 2298 人,伤者甚多。巴塘以西乡下房屋大部分毁坏,竹巴笼讯一带碉房倒塌无存,中巴村房屋大部分倒塌成废墟。巴底塘、大寨崩、竹巴笼、空子卡压毙人畜。东面震及 40 余里,南、西、北皆震一二百里,甚至二三百里不等。

巴塘大道崩塌 400 余里,文报阻塞。地面龟裂,喷出黑色臭水,陡峻的山成为深的裂罅,丘陵成为险峻的悬崖。巴塘上下大山崩坠,巴塘底谷北面其各地区河道堵塞,河水暴竭。东至江巴顶,下起至西藏交界,沿线山崩地裂一二里、二三里不等,或成深潭,或成峭壁。西藏芒康县境有破坏,昌都亦有震感。

震后,上村、下村等有 4 处火光倏起,风助火势,烟焰飞腾,融融大火,遍烧全城,巴塘通判筹画救火之策,因连日地震不但人难驻足,兼之河水干涸,直至 4 月 17 日始将大火扑灭。

4 月 11 日后地震连日不断,及至 13 日巨大石块仍被震动滚落,地声隆隆,隐约如雷,迄止 5 月 9 日尚有震感。

四川大水

1870 年(同治九年)夏秋,四川发生大水灾,特别是川东地区灾情严重,江津、合川大水入城,江津城内民房倒塌数百家,合川城内水深数尺,铜梁先后旱水,河水陡涨五六尺,田禾冲荡无收。洪水侵入涪州城,丰都全城被淹

没,奉节、巫山城垣及民舍淹没大半。人民奔逃溃乱,生计荡然。云阳、忠县大水犯城,沿江数十里农田无收,灾后各地缺粮,仓廩被水淹没,谷米霉烂,人民无处觅食,地方官不得不禀报实情,请求赈济。遂宁 6 月、7 月相继遭受洪灾,大河王爷庙淹过月台三尺,城内部分街道被水淹没,并研县初秋大水,漂没民房数十家。

涪州兴修水利

1870 年(同治九年),涪州(今涪陵市)东北长江北岸有新修水利工程七处:

1. 云里金钗堰:溪流居中,乡人左右分筑堤堰,分接溪流,各倚山麓迂回曲达,入田处建闸,控制水流。因地势高低建闸,闸门鳞次,不减西川陆海,岁灌田可熟稻麦数千石。

2. 云里马滩河:水面宽阔处可行舟,但因水位过低,两岸土地虽然肥沃,农民常为旱灾所苦。从道光初年开始,乡民兴筑堤堰数百丈,接引溪流,灌田数十、百家。

3. 碧溪河:位于城东,上游在垫江县,经丰都县至云里高滩,南流入境。乡民分水为渠,溉田千亩。

4. 散水坝:平畴数百顷土田,苦于无田。道光初截溪流,筑长堤 10 余里,引水灌溉,旱涝保收,弥望芃芃。

5. 小马武垭山坳一涔,有泉趵突而出,汇水为渠,灌田百余顷。

6. 彭家岩,山石嶙峋,有古井一

方,广可丈余,泉涌溢,清冽沁脾,盛暑居人竞取,溢流溉田数百亩。

7. 罗云坝,有柞马、枇杷、游兰三

堰,三溪同源,异派同流,二防分泄,盛旱不能为灾,坝中腴田数千亩。

1871 年(同治十年)

四川大旱

1871 年(同治十年),四川夏旱秋潦,收成歉薄,粮价骤昂,饥民塞道;尤以德阳、遂宁、彭县、大足、潼南、荣昌、铜梁、富顺、合川、江津、武胜、乐至、安岳、眉州、南溪、犍为、叙永等 18 州县旱情严重,遂宁、潼南、铜梁连旱 300 天,米价腾贵,民相食,贫民四处逃荒。川督吴棠奏准于厘金捐输项下,拨银 20 万两,以资赈济。

川丝首次出口

1871 年(同治十年),四川首次向国际市场出口生丝 6000 包。这些生丝先从四川运到上海,再经上海运销海外。

四川向国际市场出口生丝,标志着 19 世纪晚期四川蚕丝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四川兴起了植桑养蚕热潮,连蚕桑生产素不发达的川东地区,也开始推广江浙桑苗蚕种,普遍投产。据史料记载:当时四川缫丝作坊和手工工场已达 2000 余家,年产生丝 6000 余担,居当时全国产丝省区厂家第三位和产量第五位。

1872 年(同治十一年)

英、法、俄等国派人赴川考察开埠通商事宜

1872 年(同治十一年),英国商会联合会发布建议书,要求扬子江上游对外国轮船开放,使“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几乎可以直接与欧洲

交通”。^①

同年,法国派遣教士恩伯格赴川至自流井考察盐业。恩伯格在报告中对该地盐卤、天然气资源作了专门介绍,同期法国探险家诸布盖率领一个考察组由越南赴四川、云南考察。

同年,俄国派遣贝夫特可夫和科

^①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页 133,《商会联合会第十二年度年报》,1872 年 1 月 22 日。

佐洛夫经青海至昌都、巴塘等地窥察 资源。

1873 年(同治十二年)

四川大水

1873 年(同治十二年)秋,岷江洪水冲决都江堰,内江水滚归外江至新渡口,冲决新河。洪水在深溪坎、张家碾等处笼堤西面决口成河,口宽 20 余丈(60 米~70 余米),下冲布袋口;南面新开一河,口宽 200 余丈(600 米~700 余米),洪水下逼黑石河,冲毁农田 3000 余亩。岷江西南新决一河,口宽 20 余丈(60 米~70 余米),滚归黑石河,冲毁农田 800 余亩。

岷江洪水后,灌县知县黄毓奎募捐兴工,在县西南修筑岷江堤坝。经一冬施工,筑成长 1000 余丈(3000 米~4000 余米)的大堤。

同年秋,川省其它沿江州县也发生洪灾,其中双流、彭县、蓬溪、德阳、中江、射洪、遂宁、铜梁、大足、资州(今资中)、内江、眉州(今眉山县)、富顺、雅安、汉源等 15 州县灾情严重,城镇被淹,人畜漂没,农田冲毁,灾民流离失所。灾后秋收无着,饥谨继之。

黔江教案

1873 年 8 月(同治十二年七月),法国驻重庆主教派华籍传教士张紫澜到黔江买房建堂,数日后,法国司铎余克林、传教士戴明卿也接踵而至,着手筹建教堂。黔江士民深知酉阳、彭水因设教堂,民间受害无穷,都不愿则奉教。9 月 3 日,绅士李渊树起草一篇反洋教檄文,四处张贴,号召“黔邑绅粮”起而打教。次日,余司铎、戴明卿于赴县署途中,被李渊树所率陈棕发、谢家俸等打教群众当场打死。

教案发生后,法公使和主教均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飭令川督速结此案,但法国侵略者又有意拖延,并找借口要挟勒索。延至 1875 年 6 月 3 日(光绪元年四月三十日),清政府派员与法国公使代表使馆参赞洛克特议定结案办法四条:一、将黔江县令桂衢亭罢官。二、局绅李渊树、杨万象充军。三、陈棕发、谢家俸处死。四、赔偿丧葬费白银 1500 两,原县令桂衢亭交赎罪费银 38500 两给教会。

1874年(同治十三年)

四川夔关查获英法走私船

1874年5~12月(同治十三年四月至十一月),英、法、美驻华公使先后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声称英商信和、法商泰昌、美商公泰洋行货船(雇用的木船)69只,携带大批洋货入川贸易,在川省夔关被扣,船货均有损失,要求中国政府赔偿。

后经川督吴棠调查,所谓美国公泰洋行乃渝商魁盛隆各字号“假冒”,另案处理。而英商信和,法商泰昌货船,……货物全无损坏,索赔实属无理。美国公使冒诈理亏,不再寻衅。而英国公使“据约索赔”不肯罢休。总理衙门迫于英法两国压力,饬令川省当局就地妥为解决,“如该国有籍端诈索之处,必须据理按约、持平与辩,勿堕

其术中,致貽后患。”^①此案最后结果如何,尚无史料确证。

灌县等地发生地震、洪水

1874年7月14日(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一日),灌县发生地震,有声如雷。8月2日(六月二十日),漩口场山洪突然涌溢,洪水陡至,冲没民房数十家,淹毙300余人。

同年6月(五月),汉源银厂沟遭受洪灾,冲毁民房20余家,淹毙40余人。

同年7月28日(六月十五日),叙永墩子场遭大水冲荡,全场房屋淹没殆尽,淹毙200余人。

同年6月18日(五月初五日),万源城突遭洪水袭击,水从东门入,深数尺,淹死人畜甚众,冲毁房舍无数。

1875年(光绪元年)

李瀚章授川督

1875年1月15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四川总督吴棠因病开

缺,湖广总督李瀚章调任四川总督,未履任,由四川布政使文格代理川督职务。吴棠因病于1874年12月(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奏请开缺,未获清廷批

^① 引文均见《总署奏英、法、美三国迭次照会夔关扣留货船索取赔偿谨陈大概折》,《清季外交史料》第1卷,页5~8。

准,准赏假两月调理。这次因病不能支,得清廷批准开缺。光绪二年春病故。

尊经书院在成都开办

1875年春(光绪元年春),在四川学政张之洞的主持下,经洋务派官僚薛焕等人的筹划兴建,尊经书院在成都文庙西侧石犀寺旧址正式开办。书院规模宏大,堂宇古雅。中厅有扁额曰“石室重开”,大门对联为“考四海而为雋,纬群龙之所经”。后院建有尊经阁,收藏图书典籍,以后还收藏中西时务报刊、挂图、仪器、标本等。

书院设山长1人,总理全院行政讲学及一切院务,设襄理2人以助教,设监院2人、斋长4人管理学生和教学事务。第一任山长为薛焕,以后历任山长、主讲都是博学之士,其中以王闿运和宋育仁的影响最大,王闿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家,宋育仁是四川维新运动的领导人。

书院首批学生100名是从全省3万余名生员中按学问人品择优选拔的。以后,每逢科岁两考,在各府县名列前茅的秀才、贡生中调取入院学习。学生都在书院内住宿,学习、起居都受到院方的严格管理。每个学生必备日记本一册,记录每人每日看书起止,及所得所疑。书院每月进行堂课和官课两次考试。堂课由书院主考,第一名可得奖金银3两,官课由总督、藩司及成都府轮流主考,第一名可得奖金银10

两。

关于尊经书院的办学宗旨,张之洞在其所作《尊经书院记》中曾指出:一为“成人才”,二为“起蜀学”。为此,尊经书院严禁学习时文贴括、研习八股文,学生以学习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主,凡“经史小学,輿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使四川士林风气为之一变,过去,“蜀士除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业不知《史》、《汉》。”自尊经书院创办后,才开始扭转这种不正学风,培养一批“通博之士,致用之材”。其中有不少全国知名人物,如杨锐、宋育仁、廖平、吴之英、骆成驥、蒲殿俊、罗纶、张澜、彭家珍、吴玉章、吴虞、谢无量等,皆曾受业于尊经书院。

川省拨解协饷银

1875年4月(光绪元年三月),贵州提督周达武向清廷奏报滞留重庆和贵州一带湘军的撤遣情况。这些湘军过去奉命入川“剿办”李蓝义军,后来又同石达开太平军作战。战事结束后,因欠饷过多,无法撤遣。湘军驻川部队所需饷银,历年均由川省筹付。由于川省库款空虚,历年欠饷共达944000两,其中除川省拨付580000两和借用黔省库银119000两,清廷准由黔省自行弥补外,川省尚欠协济饷银245000两。此外,尚需维持湘军驻渝每月伙食银10000两。为减轻川省财政负担,贵州提督周达武提出一面补发欠饷,一

面遣散驻川湘军,使其回乡务农。

袁廷蛟领导东乡县人民抗粮斗争

1875年6月22日(光绪元年五月十九日),东乡县(今宣汉县)监生袁廷蛟率乡民七八百人,高举“粮清民安”标牌,前往县城请愿,强烈要求知县削减粮税,清算中饱墨吏。全县乡民纷纷响应,聚众至二三千人以上。

此前,东乡县贪官污吏勾结当地局绅,任意加派浮收钱粮,自1867年(同治六年)以来,每正粮一两加征制钱五千五百文;每津贴一两,加收制钱二千二百文;捐输一两,派钱五千二百五十文;茶课一两派银八十八文,四项共派收十三串三十文,使土瘠民贫的东乡人民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不仅如此,各乡局绅又预为垫银缴官,而后又大利滚算乡民,至斗厘、猪厘尚不在内,民不堪命,怨声沸腾。

1872年9月(同治十一年八月),监生袁廷蛟上京告发该县局绅吞没捐款事,遭到清廷无理杖责。1873年(同治十二年),袁廷蛟再次具状,向府、省、京呈控东乡县滥收浮派、贪污中饱罪行,均不得申理。袁廷蛟投诉无门,遂致激众请愿,掀起抗粮风潮。斗争持续到第二年,发生官方屠杀乡民的“东乡大惨案”。

南充、营山教案

1875年6月(光绪元年五月),南充县守备高武三与文生萧用谦倡议驱逐洋教,要求全城每户居民自备木棒一根,同仇敌忾。县民早已痛恨教士和教民,群起响应,数千群众在萧用谦领导下,手持木棒砸毁教堂,并将无赖教民杨文礼殴毙。

同年秋,营山县试岁考,应试童生前往教堂参观。教堂执事出面阻拦,激发众怒,800名童生集堂外,要求与教士理论,教士匿闭不出,童生们围攻并捣毁了教堂。

两教案发生后,法国天主教会等要求抓人赔款。1877年(光绪三年),经川督丁宝桢派员与教会议定:南充教案并无证据证实何人所为,“不能断令赔偿”,酌议南充县赔银400两^①。营山教堂打毁之时,教会执事人员“避祸远匿”,又不能指出“首祸之人”,当时人多目杂,“今又事隔两年,更属无从追问”,议由营山县赔银2800两^②。

内江教案

1875年(光绪元年)夏,内江县教民彭志顺等诬告平民杨正焕毁教,将杨私押,勒罚钱文,激起众怒,团民蜂起,将教民彭志顺、邹贵贤杀死,又乘势将城内教堂拆毁。经官查明,系梅喜老么为首,与受害人杨正焕酿成人命案,二犯早已逃亡,无从究办。议由内

^① 《丁文诚公奏稿》卷14。

^② 《丁文诚公奏稿》卷14。

江县向教会赔偿白银 4000 两,以作修复教堂之用。

会党、国噜空前活跃

1875 年(光绪元年),四川会党、国噜势力活跃于四川全省城乡。官方报告说:“近日国匪勾结成群,扰乱城市”,虽经官府多次打击,“气焰仍未少衰”。“会匪、国匪充斥于四郊,帽顶、盐泉横行于各镇。……抢劫殴伤案不下数百起,而成都所属尤多。……距省二十里内外,肆行劫杀,官吏几不能过问。”^①

同年,四川私盐贩会党首领任韦驮、谭二疯王、江大烟杆,联络各路盐泉、会党“千百成群”,毁巡卡、杀役卒、

焚(官)盐店,纵横于泸县、永川、巴县、江津、合川、万县等地,其势力“自省城外苏码头迄于巫山,沿江无虑数十万。”^② 动辄号召一二千人,均置枪炮、器械、炮船,官府屡剿不衰。

四川进口洋货概况

1875 年(光绪元年),经由宜昌运销四川重庆的洋货总值为白银 15.6 万海关两。这是近代洋货输入四川的最早统计。

全省人口总数

1875 年(光绪元年),四川全省居民总户数为 751.7393 万户,人口总数为 3391.766 万人。

1876 年(光绪二年)

清廷令四川添办锦缎

1876 年 1 月(光绪元年十二月),清廷谕令四川添制大缎 1000 匹,限于次年秋间解交。1877 年 9 月(光绪三年八月),又令采办四川锦 10 匹,大卷花缎 500 匹,大卷云缎 100 匹,大卷素缎 100 匹,大卷江绸 100 匹,江绸 100 件,线绉 100 件,平绉 100 件,湖绉 400 匹,川绸 500 匹,川绢 400 匹,色

绉 100 匹,纺丝 400 匹。

两年中,四川采办锦缎绸绉达到 3710 匹,耗用白银 85716 两。

邻水、江北教案

1876 年(光绪二年)春,邻水、江北相继发生重大教案。

邻水县天主教传入较早,地方流氓痞棍求得教会庇护,利用教民身份为非作歹,杀人越货,危害乡民。

^① 《丁文诚公奏稿》卷 13,页 4、7、8。

^② 唐炯《成山庐稿》卷 12,页 21。

1876年初,教民王同兴纠合多人,于深夜闯入乡民冯大洋家中抢劫。邻近乡民闻讯赶来制止,受到教民殴打,冯贤贵、赖洪顺、张塙3人被打死,多人受伤。教民暴行激起全县士民的愤怒,一些士绅力倡驱逐洋教,响应者如潮,参加者以下层劳苦群众居多。不久,全县城乡5处天主教堂均被拆毁,平素作恶多端的教民亦被驱赶出境。

邻水县的反洋教斗争迅速扩大到江北厅。

江北厅位于重庆市区之北,与重庆隔江相望,人口繁多。天主教于乾隆年间传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盛。教民依仗教会庇护,无恶不作。在教案发生前数年,教民恶迹已多达110条:敲诈勒索、强砍古柏、欺行霸市、逼人妻女改嫁、强占民女、谋财害命等等,罄竹难书。

1876年春,当邻水县士民打教风潮传到江北厅后,士民群情激愤,士绅陈子春、聂钦斋、聂竹村、聂彦林、李明斋、李大茂、黄义成、朱兴荣、萧晓衡等集合江北厅48场镇乡民数千人,各持戈矛刀枪,明张旗帜,拥至厅署前,要求官府查禁洋教。地方官虽早已对教士、教民劣行不满,但又不愿公开支持民众打教,于是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对士民仇教行为不加制止。打教群众见官府默许其行动,于是情绪高涨,分为数路,旗戈蔽日,枪炮震天,江北厅全境10余座教堂、医馆和教民住宅300余所全部被焚毁。随后,陈子春等

又组织民团踞守城垣,设卡稽查行人,四处捉拿罪恶昭彰的教民。天主教在江北厅的势力遭到沉重打击。

教案发生后,川东教区主教范若瑟通过法国驻华公使胁迫清廷接受其勒索性解决办法,以获取更多的侵略特权。清廷迫于士民压力,不敢接受范若瑟的条件,于是采取拖延回避态度,使此案迁延年余,民教结怨,枝节丛生。

1877年(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敦促范若瑟了结江北教案。范若瑟态度强硬,不肯让步。1878年(光绪四年)初,清廷照会法国公使,要求法国将范若瑟撤换回国,由新任主教解决这一旧案。不久,新任主教白德理与四川总督代表达成结案办法:由江北厅赔偿教会白银29000两。

东乡惨案

1876年4月27日(光绪二年三月初四日),由于东乡县(今宣汉县)贪官污吏与地方绅董滥收浮派民户钱粮,又从中贪污中饱,民怨沸腾,展开抗粮请愿活动。护督文格根据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诬陷东乡县乡民叛乱,围攻县城的告急文禀,派遣四川提督李有恒,率清军到东乡各地“速行剿捕,以靖地方”。李有恒到东乡县后,以搜拿为名,举兵破寨破峒,扫境锄根,滥杀无辜,死者枕籍。“须臾尽扫众蜂出,杀人如草不闻声;父兄子弟变为鬼,肝

脑涂地万家毁。”^①李有恒纵部屠杀东乡人民,仅据官方统计即达数千人之多,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东乡惨案”。

案发后,领导东乡人民抗粮斗争的袁廷蛟冒死赴京鸣冤控诉,得到御史吴镇等在京川籍官员的支持,并联名参奏孙定扬、李有恒等人。由于事态严重,朝议纷纷,清廷不得不调查此案。起初令川督丁宝桢调查,因丁初到四川任职,不了解事实真象,从维护地方秩序出发,替李有恒等人开脱,并拟将袁廷蛟斩首。1878年3月,翰林院侍讲张佩伦上书弹劾丁宝桢,清廷另派回籍养病的两江总督李宗羲奉命复政,了解事情的真相,奏折有理有据,多从维护清廷的根本利益出发,因而促使清廷下令斩孙、李二人于成都。但为民请命的袁廷蛟,却被丁宝桢派人鸩杀于监狱。

涪州教案

1876年(光绪二年)6、7月,涪州(今涪陵市)士民“效江北打教之风”,奋起打击教会势力,连续拆毁了清溪、羊角碛、包家庙、子耳坝、武隆场等地教堂。12月初,民团数千人头裹红巾,扬旗鸣炮,拥至州城,劫毁教堂,焚烧教民住宅,又将州属小官山、老关坝、

查东乡冤案,李宗羲调查后奏报清廷:东乡冤案起于袁廷蛟聚众算粮,算粮原因是官绅通同“浮收”,造成“民不堪命,怨声沸腾”^②而后发生东乡知县孙定扬冒昧请兵和提督李有恒滥杀平民百姓的特大惨案。李宗羲的奏报虽然引起清廷的重视,但此案仍拖延未结。1879年3月,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张之洞上疏为东乡平民辩冤说:此案形成于滥杀,滥杀由于误判清剿,误判清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他认为冤案罪魁祸首是东乡知县孙定扬和四川提督李有恒。^③由于东乡惨案发生那年,张之洞正任四川学

大柏树、鹤游坪、兴场、黄草山、檀棕、汪家山等场的教堂捣毁,并将一批作恶多端的教民逐出州境。

1878年(光绪四年)4月,四川总督丁宝桢派员与新任川东教区主教白德理磋商结案,赔偿涪州教案中教会损失白银10000两。

在邻水、江北、涪州反洋教斗争的影响下,川东地区民教矛盾白热化。巴县、丰都、彭水、长寿、云阳、南川、秀山、荣昌、垫江等县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反洋教斗争,沉重打击了外国教会的侵略势力。

① 民国《达县志》卷末,诗存、东乡哀,页13~14。

② 李宗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8,页1~8。

③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57,刑政类、律例,页10—11;民国《宣汉县志》卷10,历代兵事,袁案,页3—13。

四川摊派西征协饷银 138 万两

1876 年 8 月 5 日(光绪二年六月十六日),陕甘总督、钦差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左宗棠,在进军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中,连获胜仗,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规复北疆。因军需短缺,经清廷筹议,由各省、各海关分摊协饷银,四川负责筹措协饷银 138 万两(系历年欠部解银数额)。

重庆开埠之始议

1876 年 9 月 13 日(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烟台条约》签订。

早在 1874 年,英国组织了一只武装探路队专门探测滇缅陆路交通。1875 年初,这支探路队在云南腾冲地区遭到当地群众武装阻击。随行的英国使馆翻译官马加里在云南境内被打死,英国以此作为借口对中国实行勒索与讹诈。1876 年 6 月 2 日(光绪二年五月十一日),英国公使威妥玛将英国的侵略要求列为八条,正式向清廷政府提出,其中第五条要求“英国派员在云南大理府或他处驻居,四川重庆府亦然”;同时还要求中国在沿海、沿江、沿湖地区开放若干通商口岸。清政府同意滇案各条,但在通商要求上,只同意开宜昌一口;对于英国派员驻守大理、重庆一节,“言明非通商地方,不

能驻领事”,^①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

9 月 5 日(七月十八日),威妥玛在烟台谈判时向李鸿章提出三大端解决办法,其中“请开口岸分作三项,以重庆、宜昌、温州、芜湖、北海五处为各领事馆驻扎”。首次要求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广运川滇之货”,因李鸿章一再坚持“总理衙门已于八条内议准,未便即作通商口岸”,“川江峡滩险阻,轮船万不能行”。威妥玛只好以“重庆一口本可派领事驻扎,惟轮船未抵重庆之先,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开行居住”作罢。

9 月 13 日(七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和威妥玛签署了《烟台条约》,在第三部分“通商事务”的增开口岸一节中明文规定: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馆驻扎处所。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此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②但宜昌开埠和英国派领事驻重庆,实际上是打开了四川乃至西南的大门。因此,侵略者称《烟台条约》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第三阶段,重要程度仅次于 1842 年和 1858

① ②③④《清季外交史料》卷 6,页 8~9,11,17,20~21,卷 7,页 5,6,17。

② 《中外条约汇编》页 15;《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页 349;

年的条约”^①。

四川大旱

1876年(光绪二年),丹棱、乐山、犍为、简阳、南充、广元、垫江等数十州县炎夏大旱,禾苗枯焦,秋收大歉,米价升腾,饥荒严重。

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

1876年10月27日(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丁宝桢由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同时,四川布政使文格升任山东巡抚;未到任四川总督李瀚章仍调任湖广总督。

1877年(光绪三年)

英国探险家吉尔到川滇一带考察

1877年2月(光绪三年正月),英国人吉尔(WJ·Gill)等由上海乘船经汉口抵重庆,由重庆出发先至自流井考察,再至成都,然后北去松潘,经平武返成都,再由成都出发,于7月10日(五月三十日)抵打箭炉,逗留两周,西行经里塘、巴塘,准备进入西藏,然后南下印度。江卡藏民闻讯阻挡,吉尔不敢入藏,改道赴滇,由巴塘委员赵光燮调集马队、兵丁,护送过邦木塘。11月1日(九月廿六)抵缅甸八莫。旅程多为荒无人烟的原始林区。吉尔此行探明了由川入滇的路径。为了表彰他的献身精神,英国皇家学会和巴黎地理学会于1877年和1878年先后授予他金质奖章。

川督丁宝桢奏请大修都江堰

1877年(光绪三年)春,川督丁宝桢向清廷奏请大修都江堰。大修工程从本年12月开始,到1878年3月(光绪四年四月)竣工。其主要工程有:

1. 易笼为石。将原来的由石竹笼构成的堰堤改为条石修砌,以桐油石灰塞缝,再用铁链加固。

2. 疏淤除塞。将堰区河道一律疏淘,河道普遍加深一丈多,洪水时节,不再浸溢。

在施工期间,丁宝桢除派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灌县知县陆葆德等督工办理外,还经常“轻骑减从,躬冒霜雪,沿江督率”^②。整个外江、中江、内江施工里程,长达70余里,挖土方40余万方,砌堰堤12000余丈,用3丈余长的

^①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333

^② 《灌县乡土志》卷一。

竹笼2万余条,修复人字堤130余丈,修理分水鱼嘴3个。此外,还修了白马槽、平水槽等导水工程。工程花费银12万余两。

次年夏,都江堰工程竣工不久,即遇特大洪水,新建各鱼嘴完好,但人字堤之金刚墙及各段堤身被冲垮37丈有零。^①

四川机器局在成都开办

1877年(光绪三年),四川机器局开办于成都。四川机器局的创办人是四川总督丁宝桢,丁是洋务派,在山东任巡抚时,即设立山东机器局,其目的是自造洋枪洋炮,用以镇压人民。他擢升四川总督后,于1876年12月(光绪二年十月)即上奏朝廷,要求设立四川机器局,奏称:川省各勇营习用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价值既贵,道路转运困难,并难免不受洋行欺骗。加之所用洋枪,均不知修理之法,但使稍有损坏,则一枪所值十余金,顿成弃物,又须另为远购,糜费尤不可计。因此,他提出选派精通机械制造的候选通判曾昭吉赴川,查看情形,自办机器制造。曾昭吉于1877年至川后,立即赴上海“拣择紧要机器购办数十件,由长江驶运来川”,其余机器,“均由川省自造”。^②次年即开始生产枪支弹药。

机器局厂址设在成都东南郊下莲池街,丁宝桢委派候补道夏时、劳文翔总理局务,成绵道丁士彬会同办理,曾昭吉总理工务(负责工程技术)。机器局职工除由曾昭吉带来的湖南、山东、江苏籍技术人员十人外,还在四川招募工匠数百名。四川机器局的经费来源提自“成绵道收存土货厘金”。

四川机器局从创办到1879年(光绪五年)间,共制造水轮机及各种机器25部、机器部件及工具等12000余件,造成前膛、后膛等枪共148杆,未合成洋枪161杆。两年间共耗去经费银77300余两。

四川裁撤通省夫马局

1877年7月10日(光绪三年五月三十日),四川总督丁宝桢奏准裁撤通省夫马局。

清代地方遇有差使过境,例有支給夫马钱粮陋规。夫马供应自咸同以来,扰民最甚。“一过境之差事,动费数千金,一宴会之酒食,辄用数十金,彼此效尤,夸多斗靡”,此项苛派,取之于民,“见有每粮一两,派收银六七两,制钱八九千不等者,较之公派津贴,捐输多数倍。”夫马之征,“名为办差,实充私囊。民心积忿,实由于此”^③。丁宝桢认为,夫马不除,不能安定民心,巩固

《灌县志》卷二《水利》。

② 《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7,页35。

③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1,治法类,通论,页37~39。

地方政权的统治。

撤消四川各州县夫马局的同时,也考虑到雅州至广元一路,为西藏喇嘛、藏差驿道,决定酌为保留夫马供应,以资接济。但规定:必须将应收钱文核减十分之八,由督署查明道里远近,确定派收实数,不得私加浮派,违者严惩。

英国驻渝官员贝德禄游历川滇地区

1877年7月26日(六月十六日),英国驻重庆代理领事贝德禄由成都起程赴越嶲、嘉定、峨边、雅州、宁远、会理州、打箭炉等处至滇省一带游历。他出省后,不顾四川地方官阻拦,执意要去凉山、普雄等地方会晤彝族上层人物,经地方官设计恐骇,终于放弃去凉山等地计划。他经泸沽、宁远至云南巧家,旋又于10月22日(九月十六日)与随员麦良臣由云南入川至泸州,而后经合江前往重庆。他沿途绘制地图,收集各地重要政治、经济、文化情报。

贝德禄将他在川滇地区的调查结果写成《华西旅行考察记》,于1882年发表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期刊上。

内务府令四川采办锦缎

1877年11月(光绪三年十月),

内务府奏准清廷,令四川采办锦缎绉绸2900匹。由于御用丝织品需求猛增,工艺要求甚高,对蜀锦生产起了促进作用。成都织造的著名锦缎织物有明机蜀锦、天心锦、倭锦、闪缎、龟兹栏杆、宫绸、宁绸等,还有线绉、湖绉、薄艳平纱、浣花绢等,种类繁多。蜀锦图案、制造工艺均有很大提高。

丁宝桢创办川盐官运

1877年(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为了保证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改革川盐运销制度。经清政府批准,开始在边岸(滇黔市场)、近边计岸(川省邻近云南、贵州的销区)、楚岸(两湖销区)和计楚岸(湖北例食川盐的州县)废除商运商销制度,实行官运商销制度。其办法是:“于泸州居中置官运总局,于井灶所分置厂局,于各岸分置岸局。厂局就井灶食盐,授之岸局,岸局受之商人。凡黔边额引,皆令盐道移交总局。并清查以前各年积引,以次带销,配运出纳,皆管其权于总局。又于总局置裕济仓以平价;置火盈仓,以受各局之转输。于厂局外设押运委员以转运,于岸局外设分卡以查验,其引课、税厘皆销纳于成本中”。^①

又从藩库、盐库、川东道、州府各关厘税,借银五十万两,作为官运局的运本。

^① 《四川盐法志》卷13,《转运八,官运上》。

官运制度实行后,不少朝野人士蜂起反对,认为“官运盐务利少弊多”,并指责丁宝桢“盐务出纳不实”。经有关部门查核,官运办理一年,成效显著,“核计边计各额引张全数销清,复带销积引至1万余张,所收税羨截厘及各杂款至100万余两”。^①然而,清王朝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官运制度很快又成为四川盐法上的一大赘疣。“办运者扣费以入私囊,批销者卖私以取盈余,开支挪垫,虚抵搪塞,上下分肥,弊端百出,所领成本,逐渐消磨”,^②因此,丁宝桢改革川盐运销制度终于失败。

四川大旱

1877年(光绪三年),继去年全川数十州县大旱之后,彭县、绵竹、犍为、乐山、安岳、绵阳、中江、三台、射洪、潼南、南充、苍溪、阆中、营山、仪陇、蓬安、通江、渠县、大竹、达县、南江、巴中、万源等州县持续大旱。禾苗枯槁,田土龟裂,斗米千钱,哀鸿遍野。

南充自春至夏,半年无雨,秋收全无,死者塞途。苍溪、阆中、营山、仪陇、蓬安,夏旱秋饥,道殣相望,死者无数。大竹、达县夏秋无雨,草根树皮食尽,饿殍载道。巴中、南江、万源、通江各州县初夏无雨,直至盛夏仍无雨,赤

地千里,颗粒无收。贫民之家无储粮,糠菜食尽,继食草木,再食白土(俗称神仙面、观音土)。城乡居民家家萧条,炊烟断绝,鸡犬息声,到处呈现饥荒凶景。求生者成群结队,离乡背井,求死者服毒吊颈、坠岩自杀。当年冬至次年春,有的举家悄毙,有的人相残食,死者数以万计,葬具不继,只好挖掘深坑窖埋,名曰“万人坑”。

丁宝桢整顿厘税

1877年(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整顿厘税。因同治十一年以后,榷务中落,岁入大减。丁宝桢着手重订上、下各局互检厘票章程,通飭各局按照造报收支实数清册,并督同司道逐目比较近三年月收实数,以收数之多寡定委员功过。自此,盐货厘金,皆有增加。数年之间增收100余万两。

四川省设置三费局

1877年(光绪三年),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后,设三费局筹集公用款项。三费包括本地命案、缉捕、招解相验所费开支。此项开支由三费局抽收肉厘,每宰猪一只,取钱100文,专供三费之需。此外夫马局裁撤后,凡委员过境夫马和当地官吏帮费,也由三费局供给。三费局局务由地方官委派当地绅粮经

① 《丁文诚公奏稿》卷16。

② 《中国盐政史》第3章《盐官》页13。

管,每年收支、集绅结算,报地方官查核,转报主管道、府、厅、州复核无误,始作销案。

但在实际上,各地三费局并不完全按章行事,地方官吏与绅粮往往互相勾结,征敛无度,或仍按夫马成例,将三费摊入粮银,加倍抽取;或实行量力捐办、按户收钱,重累贫民。各地三费收支混乱,官绅串通分赃情况时有发生。

川商改进缫丝机车

1877年(光绪三年),四川缫丝业为在沿海省区和外国市场与江浙生丝竞争,开始吸取沿海地区先进的缫丝技艺,迅速地改变缫车。缫车革新的推动者为三台县秀才陈宛溪,他“倡办小车缫细丝,初为脚踏,继为扬返,仿而行之者,相继不绝。……然所用之缫丝工具,仍限于木机。”^①

19世纪中叶,四川蚕丝生产已相

当普遍,缫丝作坊和手工工场已超过2000家,成都、嘉定、顺庆、重庆缫丝工艺水平较高,已能生产各具特色的生丝。川丝以它的数量和价格优势,于19世纪70年代初进入国际市场,1871年(同治十年)四川出口生丝已达6000包,经上海运销国外。但是,由于川丝生产技艺落后,无法与江浙丝竞争,在出口中大部分作废丝成交,使川商蒙受巨大损失。

因此,川丝为适应市场需要,开始改革生产技艺,抛弃了陈旧的大车,改制了相对进步的脚踏、扬返小车,不久就生产出品质优良的细丝,在竞争中赢得了新生。

由宜昌转口重庆的洋货

1877年(光绪三年),据宜昌海关统计:经宜昌关转口重庆的洋货总值为115.7万海关两。

1878年(光绪四年)

四川连续大旱

1878年(光绪四年)春夏,荣经、雅安、洪雅、夹江、井研、绵阳、中江、盐亭、射洪、万源等州县连续大旱,荣经、

雅安70余日无雨,洪雅春旱,夹江、井研大旱不雨。绵阳、中江、盐亭、射洪再旱,灾情严重。各地野有遗骨,途有弃子,饥民成群结队四方求食。

^① 钟崇敏等《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页171~172。

印度人辛克兴到川藏考察

1878年(光绪四年)印度人辛克兴由大吉岭出发,至拉萨穿过西藏高原,越阿尔金山抵敦煌。归途则向东南行,经青海、川西北而至打箭炉,由此折向西经巴塘至康印边境察隅,因当地土人拒绝让他过境,又转向北,绕雅鲁藏布江大河而至泽当,循大道返印度。辛克兴“不但所经行程多为人未悉,且报告之详尽亦使人叹服,举凡气温风向,人口数字,商业统计均搜罗无遗。”^①

岷江洪灾,都江堰遭受严重损失

1878年6月(光绪四年五月),连日大雨,岷江洪水暴发,都江堰渠首各

工程遭到冲击破坏,金刚堤多处决口,人字堤、飞沙堰长130丈(400余米)的堤埂被冲毁殆尽,县城外护城底石也大半被毁。由于内江决口,洪水直注外江,内江灌区下游缺水灌溉,农户求水无门。

由于上年堰工银12.9万两,未及一年即被冲毁,一时舆论大哗。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恩承、童华赴川调查,最后以“堰功败于垂成,复蹈明之覆辙”罪名,将四川总督丁宝桢降三级,革职留用,其它负责官吏,各有处分。

1879年(光绪五年)冬,丁宝桢等自备堰工经费,将所砌石堤全部拆去,照旧法笼石作堤。

1879年(光绪五年)

川省地震频仍

1879年(光绪五年)6月末7月初,全川各地相继发生地震。

6月29日,巫溪、绵阳、中江、通江发生地震,时止时作,有连续达五日以上者;大震之际,城廓动摇,屋宇倒塌,木拔禾伤。6月30日起,蓬安、遂宁发生地震。7月1日起,成都、华阳、

崇庆、江油、彰明、荣县、兴文、江安、峨眉、广元、酉阳、梓潼、梁山、阆中、富顺、隆昌、资中、西昌、绵竹、苍溪、乐山、剑阁、雅安、昭化、罗江、万源、巫山、奉节、简阳、广安、泸县、合川、永川、蓬溪、潼南、荣昌、三台、平武、彭县续发地震^②。7月9日,渠县、巴中亦震。巴县于10月地震。

此年地震,区域甚广,但多数地方

^① 徐尔灏《清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丛刊第8号。

^②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秘书处、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文史研究馆合编的《四川近百年自然灾害年表(草稿)》。

尚无灾情。惟南坪灾情严重,南路土崩压塞道路,从连山塘 15 里至汤祖河以下之柴门关,塌毁民房 2699 间,计 855 户,死居民 280 人,伤重 33 人,压坏土地籽种 94 石;营城震裂 110 丈,城厢附近及东北二路黑河一带,毁房屋 1354 间,计 601 户,死居民 30 人,重伤 16 人;汤祖河及柴门关一带道路桥梁多坍塌,南坪城垣裂百余丈^①。

四川机器局的停办和复开

1879 年(光绪五年),清廷部分官僚对洋务派活动心存疑忌,京官吴镇参揭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情事”,由政府当局派遣御史恩承、童华“查办”,调查结果“原参各款,或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惟所设机器局费用较巨,制造未能精良,著该督即将此局停止,以节糜费”。四川机器局当即遵旨停办,所有承办官员均被撤去差使,技术人员和工匠均被遣散。

1879 年 7 月 23 日(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四川机器局停办后,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说:“四川督臣丁宝桢在省设局,用意深远,今以虚糜钜款而无成效,奏请停止。夫用款六万金,仅造枪炮数十杆,盖初创之时,开拓地

基修造房屋及搬运器械,制造器母,种种费用,具在此六万金之内,非全以六万金造枪炮也,……若遽行停止,则前功尽弃,而机器各件以数万金制备者亦废毁无用,甚属可惜,况以后需用军械又须购自外洋,其用费虽足相抵,其得失则甚悬殊,而中国之人复不能探讨西学神明变化,而思所以胜西人之法。”^② 由于洋务派人士的强烈要求,清政府只好以“四川机器局应否兴办,著丁宝桢酌度办理等因”一语,准许继续办理。

1880 年初(光绪五年底),丁宝桢派人“携扎前赴湖南饬调曾昭吉,并全将熟悉机器制造各工匠随带前来”。3 月(光绪六年二月),曾昭吉等始行到川,4 月 18 日(三月初十日),四川机器局恢复生产。以成绵道崇纲总理局务,丁士彬、黄锡寿等为委员,曾昭吉总理工务^③。四川机器局遵旨复开后,仍仿照西法,督工造办枪炮。从 1880—1882 年共耗去经费银 164500 两^④。

奥匈帝国伯爵由川赴藏

1879 年 10 月 8 日(光绪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川督丁宝桢上奏,奥匈

① 四川省气象局资料室 1978 年出版的《四川省近五百年旱涝史料》。

② 《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附片》,《洋务运动》第四册,页 340。

③ 《遵旨复开机器局折》,《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 20,页 4。

④ 《复开机器局报销用款折》,《丁文诚公奏稿》卷 23,页 22。

帝国伯爵奥斯图凯、来赖等,先拟由青海赴西藏游历,因道路难行,改道赴川,9月25日(八月初十日)抵达成都,要求经巴塘进藏。虽川省再三劝阻,“其意甚坚”、“万难转移”^①。于是由特派委员护送,至巴塘改道去云南。

王闿运入川主讲尊经书院

1879年12月27日(光绪五年十月初十日),经四川总督丁宝桢五次函邀,著名经学家王闿运(湖南湘潭人)来川主讲尊经书院。王抵成都后,受到四川官方隆重欢迎,自督部、将军至合城生员均执弟子礼。

王闿运集成语为尊经书院书联

云:“尊德乐义见于世”。“经天纬地之谓文”,额云:“洙泗岷峨”。实比蜀学于齐鲁。王闿运于1880年初至尊经书院,前后讲学九年,振衰起废,影响一代学者。他学主公羊,综观群经,博古通今,启发思想。四川近代杰出人才,不少出自他的门下。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79年(光绪五年),据宜昌海关统计:经由重庆出口的四川土货,本年度首次以子口方式(一次纳税,不再重征,税率为货值2.5%)对宜昌出口,总货值为24万海关两。本年度洋货由宜昌关进口总值为265.9万海关两。

1880年(光绪六年)

英驻渝领事考察川江行轮事宜

1880年(光绪六年)开始,英国驻重庆领事史盘斯(Spence)分别于春、夏、秋、冬四季亲自乘坐民船考察宜昌到重庆间川江水位变化情况,并对轮船航行的可能性进行分析研究。他在考察报告中表示:可以肯定,这段水道每年至少有九个月时间可以畅行小轮船,其余时间可以借助传统办法(纤夫协助)帮助轮船过滩。

继任英驻重庆领事谢立三(Hoise)亲自考察了由川入黔、入滇的货运道路。1882年,他发表的考察报告说:只要宜昌重庆间通行轮船,汉口运川的洋货可改由重庆转运。即使从宜昌算起,也只需十天就能运抵贵阳,若再将轮船上溯至叙府,则广州入滇货物,极可能大部份改道长江。至于运川货物,采用浅水轮船可直达泸州、叙府、嘉定和合州。他认为,川江航道“唯一称得上真正意义的险滩者”,只有

^① 《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7。

“新滩”一处，而此滩又被他 1881 年 12 月乘坐吃水三四英尺的木船通过了。因此，他认为川江完全可以通行轮船。

第一次巴塘教案

1880 年 5 月（光绪六年四月）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加紧对我国西南各省，特别是对西藏的侵略活动中，西藏僧俗得知奥匈帝国伯爵等洋人由四川入藏，群情哗然，“联名具禀”，并在巴塘一带“聚兵拦阻”，情势汹汹。西藏噶厦又派出颇璋香噶及三大寺替身等政教官员驰赴巴塘。他们分调昌都、乍丫、叠盖、江卡四路藏兵，直奔巴塘，要求“巴塘文武土司将各处洋人逐去，勒令土司出具永无洋人进藏甘结，方可罢兵。”藏兵经过莽里时，还将该处教堂拆毁。

驻藏大臣松淮“恐其别酿事端”，特派夷情部主事升泰带领西藏官员赴巴塘，“妥为开导”，奥匈帝国伯爵虽已放弃进藏计划，“藏番仍嚣然不靖”。^①

次年初，此案以修复教堂，赔偿损失了结。

1881 年 9 月 18 日（闰七月十五日），法国天主教巴塘教堂司铎梅玉林押送自欧洲运来的教堂应用物资 13 驮，前往盐井等处分发各教堂，同行护

送者有乍丫藏商人伏马匹，途中被三岩藏民和喇嘛抢劫杀戮^②。

事件发生后，川督丁宝桢下令缉捕凶手，1882 年，捕获四人，判处两人死刑，另外再赔偿巴塘教堂银 1935.71 两。

清军进剿峨边彝民

1880 年 5 月 29 日（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马边乌抛彝族流民百余人进入峨边厅鹿子沟、杉林岗，四出烧毁房屋，掳掠汉民男女和牲畜衣物等，杀伤多人。又于 6 月 6 日（四月二十九日）潜往大香炉、麻池冈一带，掳掠男女数十人，杀伤三人，烧毁民房数十间。峨边厅通判派兵堵剿，未能奏效。

1880 年 7 月（光绪六年六月），川督丁宝桢派遣镇远营哨官吴国升、外委戴占彪、赵得胜各带兵勇，分路“进剿”。又派管带泰安、右营副将林丛文、代理武字营兵勇唐珊峰各带所部驰赴峨边。迄止 10 月（九月），清军屠杀彝民 1000 余人。

四川查办瞻对事件

1880 年（光绪六年），西藏驻瞻对地区的官员与查录部落相约发动武装暴动，试图称霸川藏边区，给清朝统治造成威胁。四川派员查办。

^① 丁宝桢：《藏番驱逐洋人派民弹压保护片》，《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 19。

^② 《岩番劫杀洋人查拿办理片》，《丁文诚公奏稿》卷 21。

里塘与下瞻对交界地区,有查录藏民部落一支,部众 1700 余户。瞻对地区于 1865 年即被清廷赏赐给西藏达赖喇嘛委派藏官管理。1880 年,驻瞻对藏官若康撒对查录部落出境抢劫和扩张势力,采取纵容态度,致使里塘的人民深受其害,当地土司亦受威胁。

1880 年 7 月(六月),里塘土司、喇嘛无法忍受查录部落抢劫骚扰,调集兵马与查录部落决战。四川当局闻讯,火速派遣打箭炉同知李忠清带领官兵 100 名前往瞻对查办,于 8 月 4 日(六月二十九日),抵达里塘。李忠清当即选派藏民敬信之呼图克图,分别对里塘土司、喇嘛和查录首领进行切实开导,下令双方立即罢兵,听候查办。同时飞咨驻藏大臣色楞额与西藏官方联系,请他们饬令戍守瞻对藏官若康撒,认真约束查录部落,不得妄滋事端。但西藏驻瞻官员若康撒、索康色

等却与查录部落相勾结,妄图分裂割据,抗拒官兵调解、查办,聚集瞻对藏民三、四千人,占领里塘东路大竹卡、西路曲奎桑营官坝等处,声势浩大。川省驻里塘委员知府杨福萃与阜和营副将况文榜、打箭炉同知李忠清带领官兵 500 名,自打箭炉星夜启程,前往里塘弹压。

11 月 8 日(十月初六日),瞻对地方势力突袭官兵,都司张洪得等率官兵前后截剿,击毙多名,查录首领工卻得且被斩首,达马贡大等率众溃散,连夜逃回三寨。11 月 18 日(十月十四日),杨福萃调兵一千余名,由都司杨福恒、张洪得分攻上、下寨,杨福萃自攻中寨。达马贡大等率众抵抗,被杨福恒击毙。张洪得等擒获索朗江策等十余首领,清军将三寨平定。杨福萃于 12 月 9 日(十一月八日)回兵里塘,办理善后。

1881 年(光绪七年)

加抽土药厘金

1881 年 8 月 5 日(光绪七年七月十一日)四川总督丁宝桢遵旨加抽土药(鸦片)厘金。

同年 6 月 17 日(五月二十一日),清廷批准陕甘总督左宗棠关于增抽洋药(烟)、土药(烟)税捐,以收禁烟实效

的建议,要求各省制订具体加厘办法,丁宝桢认为:川省地处西陲,不通海口,向无巨商大贾贩运洋药入境。川省吸烟者惯用云贵及本地所产土药。1871 年(同治十年)曾将各局烟厘一概停免。1877 年(光绪三年)重征烟厘。现在根据左宗棠对洋药值十抽三的章程,对川省土药每百斤应抽银 48

两;洋药入川,每百斤仍照章抽银 150 两。为确保税厘不致偷漏绕越,还制订了相应的示惩条例和稽查措施。

清政府的这种“寓禁于征”的办法,不但未收禁烟之实效,反而使四川境内鸦片种植面积愈来愈广。如广安州,“咸丰末始种植”,光绪时“遍乡皆是,遂为州出产大宗”。^① 鸦片在四川泛滥成灾,到了清末,四川每年出产的鸦片烟总值已达 3500 万海关两,其中三分之二供本省瘾民吸食。

丁宝桢劝办积谷

1881 年 10 月(光绪七年八九月),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劝办积谷》奏折中说,咸同以来,川省仓谷调运殆尽。充实常平仓是安定民生的要务,全省 110 余处官仓已收仓谷 55 万石(约 2970 万公斤)。12 月 25 日(冬月初五日),丁宝桢又奏报清廷,已饬各盐厘局拨银 28950 两,在绵州(今绵阳市)、三台、中江、射洪、阆中、南部、西充、蓬溪、乐至、盐亭、遂宁等 11 州县购储稻谷备荒。

1883 年 7 月 2 日(光绪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丁宝桢在《办理积谷上仓数目折》中称:据各厅、州、县陆续禀报,两次共收仓斗谷 291771.7 石零(约 1576 万公斤);三次共收仓斗谷

166436.9 石零(约 899 万公斤)。原仓斗、市斗不一,现在一律折合仓斗。

川康藏民起事

1881 年(光绪七年),藏民首领德呻木强绒率领丹巴巴底乡邛正村 32 名藏人起事,反抗毛丫土司白利娜姆的压迫剥削,杀死土司之兄也布,捉获白利娜姆,领导沈洛等 14 村寨 1000 多藏族人民,烧毁土司派粮、派款、派差帐簿以及高利贷文契,打开土司粮仓、箱柜,将财物、粮食分散给贫苦藏族人民。清政府支持土司,镇压杀害了德呻木强绒等,用武力恢复了土司统治。

英国领事谢立三抵渝

1881 年(光绪七年)底,英国驻重庆领事谢立三到达重庆。到任后谢立三多次调查四川、贵州、云南风土民情、经济文化状况,于次年写成《重庆洋货贸易报告书》,提出了重庆通航,扩大对川、黔、滇三省商品输出的计划。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81 年(光绪七年),由宜昌海关转口四川重庆的洋货总值为 405.9 万两,土货出口情况缺略。

^① 光绪《广安州新志》卷一三,货殖志。

1882年(光绪八年)

叙永、涪州、资州等地受灾

1882年7~8月(光绪八年六至七月),叙永、涪州、彭水、奉节、巫山、綦江等处大雨、冰雹,河水陡涨,冲没田庐,淹毙人口;资州所属地方发生火灾,延烧民房二百余户。清廷谕令丁宝桢查勘受灾轻重情形,分别筹款赈济。

川省广积仓谷

1882年(光绪八年),川督丁宝桢在川推行积谷备荒,图匮于丰,已见成效。

自清初开始,四川奉谕令开办常平监仓、社仓、义济仓各项仓谷,常年储谷综计不下数百万石。湖南等省清军大批入川围剿李蓝义军,仓谷大量消耗,储量锐减。丁宝桢督把积谷作为安定川民的要务,拟定积谷章程,规定粮户亩收谷百石,必须积谷一石,以次递推百分捐一,不许颗粒苛派抑勒,官吏只司稽查,不得挪用分毫。

1881年(光绪七年)调查,全省各州县积谷大显成效,多者捐至一万数千石,及数万石,少者亦达数百石。已经办理积谷的州县共计110余处,共收仓计谷553200余石。

1882年(光绪八年)调查,已办积

谷州县110处,共积谷1730000石。又因川北产米少,拨盐厘采买谷27600余石,分储各县,以备凶年赈济之用。

四川提督唐友耕病歿,莫祖绅继任

1882年7月19日(光绪八年六月五日),镇压李蓝义军和石达开太平军的刽子手,四川提督唐友耕病歿,清廷“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从优议恤,并附祀前四川提督占泰专祠。”

唐友耕,字泽坡,云南大关厅(今改县)人。1859年10月(咸丰九年九月)参加云南大关李永和、蓝朝鼎起义,随李蓝军入川。在攻打叙州府(今宜宾市)时,投降清军,充当镇压李蓝军的先锋,在川南、川西各地数十次会剿中,累立战功,升至重庆镇总兵。1862年2月(同治元年一月),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湖北入川,唐友耕奉命于长江沿岸设防,数度阻挡石部渡江,石部西走宁远(西昌),骆秉章饬令唐友耕沿途堵击,唐友耕收买土司岭承恩,设防大渡河,使石部陷于绝境。石达开为保全部众,携幼子向唐友耕请降,唐友耕自食其言,将太平军2000将士全部屠戮,将石达开押解成都处决。唐友耕以大功擢升云南提督。1880年(光

绪六年)调任四川提督。

唐友耕病歿后,清廷命莫祖绅署四川提督。

省城考生哄闹乡试

1882年11月3日(光绪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川乡试期间,贡生周冕蒙混入场,经丁宝桢查询属实,交成

都知县看管。该县应试士子数十人为首,伙同数百人破坏号棚,捣毁公堂,烧毁试卷。清廷谕令丁宝桢拿获为首份子,革去功名,严行审讯。

四川科场作弊,甲于各省。张之洞称:“考试作弊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甚者”。“川省积弊录遗,一场大率代替,十无一真。”^①

1883年(光绪九年)

英国探险家立德窥测川江

1883年2月(光绪九年正月),英国探险家立德以游历内地为名,由上海搭乘轮船到汉口后,改乘木船,溯江而上,侦察川江航道,经四十天到达重庆。立德根据探险日记写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一书,书中写道:“我们能够督促而且应当迫使中国官吏忠实履行中英各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以发展中英贸易。同时,对中国中央政府反抗我们的欧州竞争者要求优先权利时,我们应当使他们信赖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所给予的支持。要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以坚强的压力,来对付中国人长期拖延的泄气影响;他们是运用拖延艺术的老手,我们对他们施加压力既要有耐心,又要不停歇。”由

于立德的冒险经历和对四川的侵略活动,被外国侵略者们誉为“西部中国的英国开路先锋。”

立德(Little)(1838~1908年),英国人,探险家。1859年来华经商,1887年组成川江轮船公司,试图开辟川江航道。1890年,在重庆设立立德洋行。1896年,在重庆设立猪鬃加工厂,垄断了重庆猪鬃业。1897年,立德自任船长,驾驶7吨小轮船,由宜昌试航长江,到达重庆。1899年,立德特制的“先行号”(载重310吨)轮,由宜昌驶抵重庆。1898年,夺得江北煤矿开采权。1904年,成立江北矿务公司。

由重庆出口的生丝和丝织品

1883年(光绪九年)统计,每年由重庆向东部口岸输出的生丝(包括黄

^① 《张之洞奏议初编》,卷一。

丝和白丝)约达 17500 担,如按最高交易价(每盎司价为白银一钱)折算,则每担值银 160 两,全部丝货总值为 280 万两。

同年统计,四川成都、嘉定和重庆通过重庆向东部口岸输出的丝织品折银 109 万两、29 万两、8.5 万两,总值为 146.5 万两。

1884 年(光绪十年)

川南一带旱灾

1884 至 1885 年(光绪十年至十一年)川南宜宾、富顺、资州、内江、井研等州县连续十月无雨,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各属人民饥寒交迫,流散四方。官府和各处普济院设法救济,仅宜宾粥厂日领粥者多达 5000 余人。

清廷谕令丁宝桢调拨清军驰援抗法战事

1884 年 6 月 29 日(光绪十年五月初七日),法国为吞并越南和进占中国广西、云南两省,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法国侵略军在越南谅山一带寻衅开战,云南边防吃紧,清廷谕令丁宝桢调拨川军 20 余营,交鲍超(四川奉节人,湖南提督,后因病解职)统带,开赴谅山前线。这支抗法川军是以四川机器局所造的 1 万余支枪械装备起来的。1885 年春,鲍超率部驻云南马白关(今马关)外,4 月,中法战争结束,

鲍超撤防回籍。

同年,清廷以中法两国开战,令川省筹办协饷银二十二万余两。

同年,法国侵略者进攻台湾,丁宝桢奏请再拨川军五营,前往福建沿海作战。

重庆商帮从事进出口贸易

1884 年(光绪十年),重庆汉阳帮振记字号,经营猪鬃,销售日、美等国。四川地区出产的大宗土货,如生丝、绸缎、苧麻、白蜡、漆器、草蓆、蜜饯、酒类、动物皮、羊毛以及 250 余种中药材,都由重庆商帮运销外洋,仅生丝一项,川西地区通过重庆出口的产值就达到白银 1090000 两。重庆丝商、匹头商、土货庄号、银钱商均在对外贸易中居重要地位,不少商号在上海口岸建立了商号,专门经营进出口贸易。

同年,川商于重庆开办川江运输公司“福号”,承运由水路出入川省的洋货和土货。

1885 年(光绪十一年)

尊经书院刊行著作

1885 年(光绪十一年),王闿运主持编刻的《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相继问世,书首有四川总督丁宝桢序文。该书搜萃了尊经书院师生悉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精辟成果,对发扬光大蜀学传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名作有戴光《庸蜀羌髻微彭濮会孟津道里考》、《蜀本中国考》,吴福

连《拟四川艺文志》,岳森《汉唐成都故城考》,杨锐《听秋雨赋》、《萤火赋》,崔映棠《巴蜀乐品赞》等。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85 年(光绪十一年),经宜昌海关输入四川重庆的洋货总值为 361.2718 万海关两,输出土货总值为 105.679 万海关两。

1886(光绪十二年)

廖平作《今古学考》、《续今古学考》

1886 年(光绪十二年),四川著名学者、井研县人廖平完成《今古学考》二卷。1887 年(光绪十三年)他又撰写了《续今古学考》修正旧说。二书详尽论证统治中国学术思想 2000 余年的古文经学为伪学。康有为得到《今古学考》后,十分赞赏,引为知己。1889 年(光绪十五年),廖平在广东谒张之洞后,以《知圣篇》、《辟刘篇》示康有为。康以“好名骛外,轻变前说”加以否定。后廖平访康于安徽会馆,全面阐述了

自己对古文经学的见解。康有为“顿释前疑”。不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初稿草成,其观点即引申于廖平著作。梁启超亦谓其师见廖氏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丁宝桢病故,刘秉璋继任川督

1886 年 6 月 6 日(光绪十二年五月五日),丁宝桢病歿于四川总督任,由四川按察使游开智代理四川总督职务,浙江巡抚刘秉璋升任四川总督。

第二次重庆教案

1886 年 7 月 1 日(光绪十二年五

月三十日),重庆发生第二次大规模反洋教斗争。教案的起因是由于美、英及基督教的教士们私自在重庆城郊鹅项颈、亮风垭和丛树碑占地修建洋房,占据扼守重庆之险要,人们认为洋人“阴肆狼贪,隐怀蚕食,得步进尺,据要地以瞰全渝”。7月1日(五月三十日),数百武童和数千群众奋起打教,将城内英美教堂、法国教堂以及传教士的住宅、医馆等全部打毁。7月2日(六月一日),教民罗元义,雇人逞凶,杀伤打教群众多人(死11人,伤22人),引起群众更大愤怒。7月25日,重庆附近的民团约3000人,在团首石开阳、石汇父子率领下开赴白果树教堂,赶走保护教堂的清军,将教堂烧毁。此后数日内,群众继续打教,附近州县南川、綦江、大足、铜梁等,闻风响应,“将尽火教堂以甘心焉”^①。

第二次重庆教案由新任四川总督刘秉璋督促川东道、重庆府、巴县知县等与法国天主教川东教区主教等协商解决,结果是,赔偿英、美、法等国教会损失银261570两,团首石汇父子被判斩刑,巴县知县国璋因保护教士不力,被撤职查办,教民罗元义因雇凶手杀死11人,亦被判斩刑。刘秉璋声称“所以示持平也。既足以戢教民之势,亦足以慑平民之心。”^②

第一次大足教案

1886年7月20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大足县发生第一次教案。

在第一次重庆教案议结后,允许教士到川东所属传教建堂。1882年(光绪八年)法国传教士范若瑟在大足龙水镇等场相继建教堂多座,购买龙西二村的田产1200亩,并招收教徒,教徒借教会势力,无恶不作,放高利贷,包揽词讼,压迫人民。民教相仇是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1886年夏,第二次重庆教案发生,大足等县闻风响应。7月20日(六月十九日)大足四乡百姓往龙水镇参加灵官会,一些群众前去观看教堂,见门外私设官署行杖公案,以资弹压。群众忿忿不平,言语触怒教堂,堂内放出洋枪。参加迎神赛会的群众闻讯赶来,冲进教堂,捣毁室内陈设和房屋建筑,又将距龙水镇不远的三驱场教堂、万古场教堂、医馆和98家教民住宅相继捣毁。

教案发生后,清政府迅即派兵弹压,但无从寻找主使之人,只得以赔偿教士、教民银15000两结案。

四川第一条电报线路竣工

1886年(光绪十二年),根据湖广

^① 《巴县志》卷十六,页5。

^② 《刘文庄公奏议》卷四,第四十一页,“奏教民罗元义、匪徒石汇各拟斩梟片”。

总督李鸿章的提议,由上海官督商办电报总局自汉口开工架线,经沙市、荆门、宜昌、夔州、万县、重庆、泸州架抵成都,于当年底全线竣工。从10月(九月)开始先后沿线设立夔州、万县、重庆、泸州、资州、成都等电报局,沟通了四川与国内重要都市间的电讯联系。

成都电报局成立后,特派报务员二名在督署内设置报房,专发军政紧

要文电,这是四川官电局的前身。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86年(光绪十二年),经宜昌海关向四川重庆输入的洋货总值286.7115万海关两,输出的土货155.1060万海关两,全年外贸总值441.8184万海关两。

1887年(光绪十三年)

巴塘教案再次发生

1887年5、6月(光绪十三年闰四、五月),反洋教风潮在巴塘再次兴起,一些藏族群众攻打巴塘等处教堂,被清军镇压。7月20日(五月三十日),巴塘藏民再次突袭教堂,将教堂及附近之山庄、房屋付之一炬,将该处所有奉教之人驱除出境。

事件发生后,法国教会借此讹诈,提出修复教堂、赔偿银3万两、护送教民回巴塘原地居住等要求。清政府屡与法国传教士商议,但无结果。7年后,即1894年(光绪二十年),总理衙门同意让传教士回巴塘收回教产,并赔偿银2万两,此案方才了结。

四川机器局停铸枪炮

1887年11月(光绪十三年十月),川督刘秉璋命四川机器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认为局中“铸造各项,究未得其真诀”,“所铸之枪其大小厚薄,不能无毫厘之差”,“铸枪工料,其用费已昂于外洋买价”,“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因此,“裁减局中司事工匠,计自本年十一月起,每年约可节省局费银二万余两之谱”。这样,“以所省局费,购备外洋枪弹”,^①并请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火企业代造。机器局经整顿后,专门造后门枪子弹,铜火帽及开花炮弹拉火,洋火药等。由于刘秉璋压缩机器局生产,停铸枪炮,机器局实际上已成为以修理枪械和兼制弹药为主要业务的机构。

^① 刘秉璋:《川省机器局暂行停铸疏》,《刘文庄公奏议》卷5。

四川机器局从1880~1886年(光绪六年至十二年)的七年间,共支用经费469019两,造成机器1115件,各种洋枪15310杆,药弹685570颗,铅弹600050颗,铜火帽1375万颗,洋火药28万余斤,洋炮四尊。这些洋炮主要拨给四川绿营各军装备,用于镇压四川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如1880年(光绪六年)发生的峨边、雷波彝族人民反清斗争,丁宝桢调兵剿办,就使用了四川机器局生产的新式枪炮,击毙彝民1000余人。丁宝桢同其他洋务派一样,开办军火工业,主要是为了“安内”,但也有“攘外”的一面。如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中,鲍超率领20余营川军赴前线抗敌,就是由四川机器局生产的洋枪装备起来的。

第二次大足教案

1887年8月8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九日),大足县龙水镇群众再次发动反洋教斗争。上年教案,传教士和教民获得巨额赔款后,气焰嚣张,横行乡里,民教冲突不断发生。本年8月8日,又是灵官会期,传教士彭若瑟惧怕群众再次围攻教堂,事先请求知县派兵保护。县府于会期前夕派发大队兵丁,荷枪实弹,守护教堂。这一挑衅性行动引起广大乡民、士绅不满,以煤窑、纸厂工人和挑炭苦力为主力的大足群众,在哥老会首领余栋臣率领下,一鼓作气,将教堂捣毁。

教案发生后,传教士和川东教区主教均向官府提出抗议并提出赔偿条件。经协商解决,由大足县筹款修复龙水镇教堂。

余栋臣,又名腾良,别名端方,大足县龙水镇余家坝人。少时家贫,以挑炭为生。年长后加入哥老会,有胆识,好打抱不平,深受群众拥护。因教民侵占龙水镇炭市,影响了他的生计,因此痛恨教会、传教士和教民。1886年灵官会围攻教堂,他和兄弟余翠坪已崭露头角。此后,他通过哥老会策划了第二次捣毁教堂的行动。

下瞻对藏民起事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下瞻对藏族农奴布鲁曼举行武装暴动,10000余名农奴和牧民参加他的队伍。起事者打开土司仓库、衣橱、银柜,将金银、衣物和粮食分给拥护他们的群众。布鲁曼下令烧毁帐簿、文契,宣布废除乌拉差役。布鲁曼又挥军进攻甘孜,杀死土司,扩大起义队伍,进而再攻德格,占领全境,在川藏地区苦战支撑3年之久。最后,由于布军内部分化,被清军和土司势力击败。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87年(光绪十三年),经宜昌海关向四川重庆进口的洋货总值为288.088万海关两,出口土货总值186.9434万海关两,外贸总值

475.0314 万海关两。

1888 年(光绪十四年)

夔州府开修三峡纤道,刘秉璋具奏请奖

1888 年 10 月(光绪十四年九月),夔州府知府汪鉴“立志捐廉,禀请开修”三峡纤道。经四川总督刘秉璋批准,先从夔峡开工,自白帝城起,下至大溪对面状元堆止,迂回约 15 公里。使千刃峭壁山腰,嵌成五六尺宽平坦路,纤轿可以并行,其中分造沟涧平桥 19 道,自状元堆至巫山县城 45 公里,中造平桥 2 道,拱桥 4 道并开创土石山麓,修成宽平坦路。巫峡于 1888 年 11 月(光绪十四年十月)开工,自巫山对岸起,下至川楚交界的偏鱼溪、青莲溪止,共长 38 公里,地段较长,经费较巨,计造大拱桥 4 道,变险峻为康庄大

道,不久全部告成。三峡纤道开修经费,由夔州府知府汪鉴捐银 10000 两;刘秉璋筹拨捐款银二万八千余两,渝夔两府属官商捐银 22000 余两又钱 20000 余串。除支用工程经费及设石椿铁链等用外,存银 60000 两,发商生息,用于两峡纤路、桥道岁修资金,刘秉璋以汪鉴有志竟成,竭一己之诚,胜五丁之力,奏请清政府予以表彰。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88 年(光绪十四年),经由宜昌海关输入四川重庆的洋货总值 319.1875 万海关两,输出土货总值 216.4751 万海关两,全年外贸总值为 535.6626 万海关两。

1889 年(光绪十五年)

涪江、岷江大水

1889 年(光绪十五年)夏秋,涪江、岷江大水,两江沿岸受灾。

7 月 15 日(六月十八日),涪江第一次洪峰,绵阳、三台、遂宁、蓬溪、潼

南等州县遭洪灾,洪水淹没沿江田庐。7 月 29 日(七月初二日)、7 月 30 日(七月初三日),连降大雨,涪江洪水再次泛滥,大水入绵阳城,西北街巷行船;遂宁洪峰较前次高 6 米(二丈),南北二坝都成泽国,人畜、田庐损失无

算。下游潼南平地被水,秋禾无收。

同年夏秋,青衣江、岷江大水。名山、夹江、井研、禾山受灾。7月(六月),洪水冲毁名山县云桥,县城东垣崩塌数丈。井研县漂没民房370余家,大水漫出乐山五通桥四望溪。9月(九月),夹江大水,良田庐舍多遭淹没。

外国人到川藏活动

1889年(光绪十五年),俄人蓬凡乐脱由伊犁出发,越天山至罗布泊,拟由此去拉萨,再至巴塘。到拉萨北方腾格里海时,为藏方发觉,被阻前进,乃改道向东抵打箭炉(今康定)。自罗布

泊至腾格里海间一段旅程多为前人所未到,所获材料颇多价值。

1889年(光绪十五年),外国人洛克黑尔伪装成进香者,图谋由青海南入拉萨,旅程已完成大半,后被藏方发觉,被迫离境。以后得到允许改向东南行至打箭炉(今康定)。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89年(光绪十五年),经由宜昌海关输入四川重庆的货值为1695.9902万海关两,输出的土货总值88.3277万海关两,全年外贸总值2579.2677万海关两。

1890年(光绪十六年)

川督刘秉璋派兵弹压瞻对骚乱

1890年3月6日(光绪十六年二月六日),四川总督刘秉璋向清廷奏报:1889年(光绪十五年)瞻对吴鲁玛地方藏民,因藏官苛敛,伙同“野番”,谋叛乱,并焚掠官寨,杀害藏官。经升泰致书第穆呼图克图,派员招抚,并将办理不善的官员戴琿革职查办无效。瞻对反对藏官,纠众围寨,扼守隘口。川督刘秉璋派遣里塘官兵前往弹压,又派署阜和协副将徐联魁、知县张炳华、都司李登山带领弁兵出打箭炉,会同炉城委员王延龄等前往瞻境麻惹

查办。

徐联魁带兵到瞻,捉拿瞻对藏民首领萨拉雍珠。萨拉雍珠闻讯于3月15日(二月二十五日)出寨逃走,途中被其甥萨拉阿噶放枪击毙。同伙巴宗喇嘛闻风紧闭官寨。官兵于3月25日(闰二月初五日)夜分三路围攻,藏民等见势难支,开门突围,被官兵全部俘获,其中有巴宗喇嘛、仁青、阿苏等三首领,乌金洛布、群丕二人战死,逃亡的工布确邛亦被追回,官兵死伤十余人;瞻对藏民的反藏官活动遂被镇压下去。

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字，英国取得“重庆开埠”特权

1890年3月31日（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一日），中英两国“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在北京订立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主要内容如次：

（一）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

（二）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

（三）此等船只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装载运货，与轮船至上海赴宜昌往来所载之货无异，即照条约税则及长江统共章程一律办理。除此以外的有关规定，由宜昌关监督、川东道、重庆宜昌税务司及英国领事“会商妥定”。

英国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正式取得了在长江上游自由通商的特权，并通过重庆开埠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中国西部地区。

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四川开始迅速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余栋臣起义

1890年8月4日（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大足县发生的打教事件，发展为余栋臣领导的武装起义。

该县龙水镇教堂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第二次打教中被群众捣毁后，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鸠工重建，

1890年（光绪十六年）教堂修成之时，旧历六月十九日庙会期又将至，教士彭若瑟通知大足县令钱葆堂，要求出令禁止庙会，钱知县遵照办理。但到了会期，镇上仍旧拥挤异常。教士彭若瑟召集了以王槐之为首的教民百余人，配备刀枪，藏于教堂内。当日中午，有几个小孩在教堂外掷石块打教堂玻璃。教堂内的教民以为是群众来打教堂，遂用石灰包掷出，然后执刀冲出，杀伤围观群众10余人，又借势烧毁教堂附近的民房。余栋臣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教堂，与教民械斗。其时，群情激愤，再次将教堂捣毁。

当时，有白鹤村农民蒋道甲等担锣鼓回家，被教民夺去大锣，因锣后有墨书“蒋赞臣”三字，把总刘连升诬称是“乱民之催兵锣”，彭若瑟又逼县令交主犯，钱葆堂只好诬“蒋赞臣是主谋”，并派兵赴白鹤林捉拿，蒋闻讯携子逃赴西山表兄余栋臣家中暂避。余栋臣愤怒之极，当即邀约西山上的工人及苦力挑贩李尚儒、李玉屏、唐翠屏及其弟等12人，在余家院子歃血订盟，誓同生死。众人推余栋臣为首领，准备起义。

1890年8月8日（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余栋臣等率领300名左右的煤窑、纸厂工人、挑炭苦力，攻入龙水镇，杀死教民12人，打毁200余家教民的房屋，没收教民财产，强迫他们退教。同时散发檄文，历数教士教民

“骇天八大罪状”并招收队伍,不数日,发展到2000人左右。距龙水镇数十里的马跑场、强家坝的百姓,也焚毁当地天主教堂来响应他们,形成了“数百里汹汹骚动之势”。清政府在法国驻华公使压力下,将大足县令钱葆堂革职,急命重庆知府王遵文到大足查办。是年冬,清政府派重庆镇督标副将吴奇忠、候补知县桂天培率绥靖营到大足县,在部分团练配合下,对龙水镇进行围剿。因清军团练内外夹击,余栋臣被迫撤离龙水镇,退匿西山。

1892年1月7日(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清政府与法国公使进行交涉,议结此案。除赔银50000两外,将余栋臣等六人“檄属通辑”。

1892年9月(光绪十八年七、八月),当清军的围剿稍弛后,余栋臣率数百人下山攻打教民,在十万场与清军发生遭遇战,起义军战死37人,精锐尽失,余栋臣被迫“敛迹潜伏”,将队伍解散。

英国在重庆开设领事馆

1890年(光绪十六年),英国领事馆在重庆领事巷设立。次年4月1日,领事馆迁建于方家十字的麦家院,管辖范围起初只有四川省,以后扩大到贵阳以北。它是外国在四川的第一个兼办商务和侨务的机构,它通过英国在重庆的公司、商行、教会、学校、医院调查四川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情

况,以便决定对四川的殖民主义政策。英领事馆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以前,一直独霸重庆,扩大英国在扬子江流域的势力范围。曾任过驻重庆领事的有贺西、谢立三、禄福礼、列顿、傅磊斯、密尔德等。

重庆开设外国洋行

1890年(光绪十六年),重庆开埠,四川大门洞开。外国资本主义的洋行、公司,便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据不完全统计,1890~1911年(光绪十六年—宣统三年),各国先后在四川设立的这种机构达51家。

1890年(光绪十六年),英商立德在重庆下陕西街设立立德洋行,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航运、煤矿、垄断重庆猪鬃收购、加工业务。起初,雇佣中国人陈绵颜、卢序东、阎春荪、周云浦为买办,为扩大经营,用卢序东的名义,将重庆南岸龙门浩“九湾十八保”连亘数里的地皮用永租方式占为己有,修建厂房、仓库和码头。1891年(光绪十七年),他从天津招募一批技术工人到四川试作猪鬃的加工,以后又“在上海延熟手工人十余名”,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开始生产。其产品很快驰名于国际市场,成为畅销货,立德从中获得大量利润,工厂规模逐渐扩大,工人由初期的十多人增加到后来100多人,熟猪鬃产量由开初的每月20~30斤增加到后来的10000余

斤,垄断了重庆的猪鬃业。立德还拥有轮船,在重庆、宜昌等地建有仓库、码头和厂房,1904年(光绪三十年)结束。

1891年(光绪十七年),英国太古洋行成立,经营航运、保险、进出口业务。同年,英国怡和洋行成立,经营航业、进出口业务。

1892年(光绪十八年),重庆有限转运公司成立,由英商立德筹办,次年,立德又开设利川保险公司,“专保旗船货物”。

1894年(光绪二十年),法国导新洋行成立。同年,美国大美药房成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以前,美国利泰洋行、永丰洋行成立。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义昌洋行设立。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美国美孚油(洋)行设立,在重庆建造堆栈,并拟于上海装配商轮行驶川江。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美孚油行复在重庆设行,进口洋油猛涨至1213920加仑。其中挂旗船载入313920加仑,厘金船载入900000加仑。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英国隆茂洋行设立。立德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离开中国时,将其洋行转让给隆茂洋行,因而,继立德之后,隆茂洋行继续垄断重庆猪鬃经营。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德国亚诺洋行设立。

1901年以前,英国重庆贸易公司、法国柯芬立洋行、德国瑞记洋行相继设立。

1901年~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德国美最时洋行、日本大阪轮船公司设立。

1902年,日本清汽船会社、大阪洋行、太和洋行、友邻火柴公司、大利洋行以及德国礼和洋行设立。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保家水险公司以及日本新利洋行、东华公司设立。日本新利洋行是日商宫坂和买办,陈瑶章共同创办的,主要经营山货,洗制猪鬃,与隆茂洋行竞争相当激烈。

1904年(光绪三十年),法国利源洋行、德国元亨洋行、美、英纸烟公司成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德国谦信洋行、瑞记洋行设立。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英京火险公司设立,由英商隆茂洋行经理。同年成立的还有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英国永明人寿保险公司、英京伦敦李白洋行、日本的福记洋行等。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英国庆源洋行、兵轮酒店设立,日本若林洋行、聚福洋行也相继设立。聚福洋行,名为洋行,其全部股东均为本地商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重庆商人彭彬臣、汤子敬合伙组织了长记堆店,经营羊皮,这一时期,重庆山货业为帝国

主义所垄断。彭、汤2人为求发展,于1909年(宣统元年)经董植安介绍,勾结日本人真庚于,改组长记堆店为聚福,向日本政府注册为洋行,冒充日商,专门经营羊皮运销。聚福每年给真庚于挂旗费1200两。聚福拥有资金12000两,所出之“HB聚”唛头羊皮畅销国内外市场,垄断了全川羊皮经营,业务盛极一时。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以前,德国丰茂洋行设立。

1909年(宣统元年),德宝丰洋行、爱礼洋行设立,法商吉利洋行、美国胜家缝纫公司以及英商韦廉士药房相继成立。

1911年(宣统三年),日商瑞华洋行成立。英商白耳理申通重庆买办古学渊设立白理洋行,经营山货出口业务。

川东开征货厘

1890年(光绪十六年),清廷决定加抽川东货厘,由川东道兼征。咸丰初,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仿扬州抽办百货厘金办法,由当地绅商设局抽厘,凡市场交易货品,按质每两抽收六厘,由牙行代收,汇总后交厘金局,再汇总后,统一解送川东道库,是为老厘。1861年1~2月(咸丰十年十二月),重庆地方当局决定,于老厘附

加二厘外,再抽九厘作为本城团练城防费用。对当时重庆大宗贸易商品棉花,每包加征银一钱,由买卖双方分纳。厘金局于下游唐家沱投卡抽出口货厘兼收船厘百分之二,是为新厘。老厘于货物进关报数销售后认纳,新厘则专征于过道,于唐家沱、回龙石、香国寺三处,分设厘卡征收。川东加抽货厘,即是由厘金局在此基础上加收厘金二成。

清廷处理瞻对善后事宜

1890年11月22日(光绪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清政府驻藏大臣长庚奏报瞻对事件善后处理情形说:瞻对为四川与西藏接壤之地,1865年(同治四年),清廷将上中下瞻对地方赏给达赖喇嘛,委派堪布(僧官)管理,当时未能明确如何管理,瞻民应纳多少赋徭,也未将瞻地与邻近土司接壤界地分划清楚。各土司自工布郎结平定之后,均趋附藏官,藏官为巩固其在瞻对的统治,也主动与邻近土司和好,但又乘机夺取土司土地,土司不敢与较。加以瞻对自归藏区后,筑立新寨,派兵防守,每岁所费不资,由各土司按年缴纳协守之费,又以曾经参加叛乱为借口,胁迫土司每年输纳惩罚金,土司不堪其扰,赴汉官处控告藏官勒派,求为蠲除。藏官党同伐异,残民以逞,其苛派

陋规,“几于正赋三倍”^①,这是历来瞻藏多事的根源。1880年(光绪六年),藏官汪青洛布支使查录围攻里塘,最近德尔格特援助藏民欺凌玉树,均为明证。

清驻藏大臣长庚提出处理瞻对问题的办法如下:

一、官占土地立即禁止自由耕种。

二、不准包揽商货,发放高利贷。

三、惩罚罪犯应按旧例。

四、严禁危害瞻对人民正常生产活动。

五、需用乌拉,宜遵旧章。

六、苛政陋规,严予禁革。

七、斗秤应当划一。

八、刑罚应当禁止专断独行。^②

森昌正、聚昌火柴厂的创立

1890年(光绪十六年),森昌正、聚昌火柴厂在重庆开办。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川商卢干臣等在日本创办森昌泰火柴厂,资本五万两,专制硫磺火柴,年产六万三千箱。开办不久,“嗣因日本专利,不容华人贸易,经该商案准于重庆开设”,并

由清政府批准给予“厂专利二十五年”^③。

森昌泰从日本迁川后,建新厂于重庆,即森昌正、聚昌两厂,时间是1890年(光绪十六年),两厂由川商卢干臣、建商黄龙章、邓徽绩合资兴办,两厂资本前后达到八万两,最盛时年产火柴十二万六千箱。两厂雇佣正式工人数百名。火柴生产全部制造工序都是手工操作,生产效益不高,后经厂商改进火柴生产,使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火柴日见畅销,入股者分息颇厚”^④,“每年销售总值在关平银二十五万两以上”^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森昌泰、聚昌两厂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在滇黔交界处,重庆、泸州、嘉定等地建立分厂,“每厂日出火柴二百余箱,销路极畅”^⑥。

“四川官报书局”开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四川地方当局开办“官报书局”,局址在成都东玉龙街。书局成立之初,由上海购得印刷设备,并聘用日籍技师数人来川负责印刷工艺。最盛时,用工300余名。除印刷《四川官报外》,还印制各种政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83,页23—28;又以上条件清官方已刊碑勒示,全文载于《边政》第七期。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83,页23—28;又以上条件清官方已刊碑勒示,全文载于《边政》第七期。

③ 《渝报》光绪二十三年第三册,页17;

④ 《渝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册,页20;

⑤ Decennial Repoyts, 1892~1901, Vol. I, pp. 135~136

⑥ 《四川官报》丙午(1906年)六月上旬,第17册。

府文件、表册、契税单据。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90年(光绪十六年),经由宜昌

海关输入四川重庆的洋货总值为481.5932万海关两,输出土货总值为203.6911万海关两,全年外贸总值为685.2843万海关两。

1891年(光绪十七年)

重庆开办招商局

1891年2月(光绪十七年正月),四川总督刘秉璋奏准设立重庆招商局(招商局重庆分局)。其主要业务是管理四川进出口贸易。

在重庆开埠之初,英商太古、怡和等洋行纷纷在重庆设行,扩大洋货对四川的输入和四川土货对外的输出。重庆商帮的下水客货成为外商争夺的对象,外商采取许多优惠措施,如“先出货后付水脚”,在无保险的情况下,失落货物,“亦愿分年扣还”,水脚实行折扣等。因此“各帮乐为招徕,商货趋之若鹜”。而招商局经营方式腐败、落后,“必先收水脚,货乃得出,如失落货物,又不认赔”,商帮不愿托他们运货。加之,怡和、太古、公泰、立德四家洋行大做挂旗买卖(向川江民船出租外国旗),每只船挂洋旗每年付给外国洋行、公司银五两,即可享受洋船待遇,免受厘金。太古洋行甚至贱价出租洋旗,每船仅付挂旗费二两五钱。凡此种,使中国“关捐零落,商务利权悉入

西人掌握”。

重庆海关开办

1891年3月1日(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重庆海关建立,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英人霍伯森任重庆关税务司。

开关前,霍伯森与川东道兼重庆关监督张华奎勘选关址,定南岸王家沱为关地。制订《重庆新关试办章程(十条)》和《重庆新关船只来往宜昌重庆通商试办章程(二十条)》。章程对进出口的船只、货物、征税等事项作出了具体规定。

重庆关设外关与内关,外关在城外设卡子房,南岸狮子山设囤船验关,唐家沱设分卡。

海关监督由川东道兼任,首任为张华奎,其后由黎庶昌、赖鹤年、任锡汾、宝棻、贺元彬、冯金鉴、贺纶夔、张铎、鄂芳、吴佐、陈遒声、方旭、朱有基充任此职。税务司一职,向由总税务司派定,首任霍伯森,继任者有华特森、施特劳奇、克鲁宾、麦凯隆。

重庆海关税务司长期为英人把持,而税务司架空海关监督,独霸了行政管理权。海关洋员与重庆政府相勾结,直接侵夺中国主权,并挪用关税赔偿款、付洋债。如1896年(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为偿还英德、俄法两项借款,即指定重庆关摊派12万两。

重庆海关的外籍职员还担任搜集情报的工作。除按月、季、年向总税务司报告贸易情况外,还每隔十年向总务司作一次综合报告,其内容有鸦片贸易、人口、科举及教育、地势出产、民船、银号钱庄、大帮信局、教会、会馆、贸易及航业、税收、金融和财政、河道港口及灯塔、邮局和电报、行政、谕议局、司法及警察监狱、农业、矿山与矿产、制造业、市政及卫生改进、医院、物价、工资、灾荒、陆军和海军改革、铁路等。

外国挂旗商船开始出入川江

1891年5月12日(光绪十七年四月二日),英商太古洋行租用民船装载黄丝、白蜡出口,是为出口的第一号挂旗船。同月26日(四月十九日),英商立德洋行也以民船装载火油、海带进口,是为进口的第一号挂旗船。

英商立德为垄断川江航运,于同

年9月在重庆成立重庆有限转运公司,并率先举办长江水运保险业务。

外国势力深入四川

1891年(光绪十七年),法国教士寇德瑞到自流井调查石油矿藏资源。

同年,日本驻汉口机关乐善堂在重庆设四川支部,并派高桥谦等人入川搜集情报。

同年,英国人鲍厄尔由列城出发,横穿西藏高原,直抵中国腹地,全程约3000里,收集了许多西藏北部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资料,其中800里地区为从前探险家所未到。后经川西北到达昌都、打箭炉等地考察。

同年,外国人洛克黑尔开始其第二次到川藏的考察。洛克黑尔从张家口出发,到柴达木,由此向西南疾行,至腾格里海北,转向拉萨,后被藏方发觉,不克前进,即由西向东抵巴塘。此次旅程,洛克黑尔“曾抵金沙江发源地,所获材料颇有价值,对藏人宗教及社会生活之记录尤可珍贵。”^①

1891年外国教会在川基本情况

1891年(光绪十七年),据中外教会资料档案统计,迄止本年度,外国教会在四川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① 徐尔源《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丛刊,第8种。

教会名称	成立时间 (年)	男女教士 人数(人)	教徒约数	医院、药房、 救济院(所)
巴塘外方 传教会	1696	100(包括 主教4名)	教徒 100000	
内地会	1877	48	教友 176 受洗者 244	医院 1、药房 2 救济院 3
圣书公会	1879	1	卖书人 6	
美以美会	1882	8	教友 35 受洗者 40	药房 1、医院 1 救济院 1
浸礼会	1889	9	受洗者 12	药房 1
伦敦会	1889	2	教友 9 信徒 6	药房 1 医院 1
公谊会	1890	7	会员 2 信徒 11	药房 1
合计 7		175	100541	13

宋育仁《时务论》初稿问世

1891年(光绪十七年),翰林院庶吉士、四川富顺县人宋育仁写成《时务论》初稿数万言,系统阐述了他的改良思想,提出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在政治上则十分推崇欧洲君主立宪政体,提出“君民共治”主张。他认为,中国专制主义制度造成“君与民隔绝不相闻”、“民皆知之而不能过问”的积弊。^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是根治这一弊病的良方,西方议会制度应是“立国的根本。”他说:“外国凡有举废,皆询之上下议院,两院议成而后谋定,国主报可而施

行。^②两院构成特点是:“上议(院)世爵为主,下议(院)民为主,两比而从其众,两持而折其中”^③,特别是,“其制下议院议士由民举,权至重”^④,这就可以达到通下情、伸民权的目的。他认为,这种政体的优点是,“民献其意,主决其计,官司专守以责其成。事有不便,不惮于更除,议有善者,未尝不举用也。合古今众人之心思材力以兴利而除患,则必有其善之善者也。乃观其善之善者,则先得自强之本矣。”^⑤

《时务论》初稿很快流传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间,受到注意和赞赏。翁同和曾评论说:“宋芸子编修……以所

① 《渝报》第5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中旬;

② 《渝报》第14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旬;

③ 《渝报》第4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上旬;

④ 《渝报》第14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旬;

⑤ 《渝报》第4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上旬;

作《时务论》数万言见示。此人亦奇迹，惟改制度，用术数，恐能言而不能行耳。”^①

1894年(光绪二十年)，宋育仁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馆二等参赞，在国外，他十分留心观察了解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写成了《采风记》一书，甲午战争结束后，宋育仁归国，将《采风记》刊印，同时又将《时务论》作了修改，再次刊印出版。两书发行后，风行一时，为以后的四川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重庆设立测候所

1891年(光绪十七年)5月，重庆海关在南岸设立测候所。这是四川最早使用水尺和气象仪器进行水文和气象观测的科研机构。

1891年(光绪十七年)3月，重庆海关成立。同年5月，海关即附设测候所开展水文、气象观测活动。测候所最初开设于南岸王家沱，不久即迁入南岸玄坛庙(今海狮路70号)海关新址。该所观测业务一直延续到1952年，以后由重庆沙坪坝气象站继续进行这一工作。这个观测所留下60年逐日记载的连续气象、水文观测资料。

全省续办捐输、津贴

1891年9月(光绪十七年八月)，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清廷，经藩臬两司查明，1884年(光绪十年)、1885年(光绪十一年)全省征收捐输、津贴银300余万两，按章已增加己丑恩科乡试文武中额各10名；1886年(光绪十二年)、1887年(光绪十三年)、1888年(光绪十四年)通省捐输、津贴银460余万两。经川省要求，增加辛卯科乡试文、武中额各15名。

因历年外省协拨、本省岁支军饷，以及拨付甘肃新饷、滇饷、黔饷、台藏各饷为数甚巨，而所收津贴、厘金等项银两早已入不敷出，财政十分困难。川省请求清廷仍按历年奏准成案，预办1892年(光绪十八年)捐输，以弥补财政赤字。捐输标准：每粮一两，仍收津贴库平银一两，并规定：“自载粮八分起，凡八分以上者，概行收缴；其零星小户，粮在八分以下者，一律免捐，以示体恤。”^②事实上，捐输从未按上述规定执行，捐输常常加征到丁粮的二、三倍以上；由于各地零星小户过多，八分以上粮户不敷摊派，也规定“酌量将八分以下粮户一律派收”，因此，小户也难以得到“免征”的恤典。

^① 《翁同龢日记》卷33。

^② 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页316、330～335。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445.4560 万海关两,出口土货总值
1891 年(光绪十七年),经由重庆	202.7367 万海关两,外贸总值
海关输入四川的洋货总值为	628.7512 万海关两。

1892 年(光绪十八年)

南江等地四川会党武装抗清

1892 年 5 月 4 日(光绪十八年四月八日),川北南江县会党陈崑山反清起事。

事件的起因是,汉中一带于 1891 年(光绪十七年)荒年欠收,川北所属广元、昭化、巴州(今巴中)、南江各州县与陕西省境相邻,因而,“陕省饥民入川求生”。本年四月初间,小麦尚未收割,陈崑山、苟管事、周蛮刀、张占鞞等聚结党人,串连饥民,以求乞为名,强食大户。5 月 15 日(四月十九日),陈崑山等聚集百余人,突然进至南江县所属之禹门场,清军把总陈仲容率兵拦截,被击毙。清军又调寿字后营管带孙绍发由南路、长胜右营管带张姚振由西路并进。陈崑山率领党人和饥民又向东乡县(今宣汉)进攻,万县清军管带刘玉田率兵赴东乡,营外候选道徐春荣亦前往顺庆(今南充)一带调度,在巴州拿获陈崑山,刘玉元、罗木耳、王尚魁等亦同时被捕。清军又在广元、通江、东乡、仪陇、阆中等地将

会党同伙一并逮捕。

川东设立洋务学堂

1892 年(光绪十八年)黎庶昌调任川东道。由于重庆开埠后,“外患日亟”,黎庶昌奏准在重庆创设川东洋务学堂,选拔优秀学生正副额各 20 名入学,专攻洋务。课程以中文、英文、数学三科为主,办学经费由黎庶昌自筹,黎去职,该校遂半途而废。这是近代重庆开办的第一所新式外语专科学校。

川西瘟疫流行

1892 年(光绪十八年)夏秋,四川大水之后,霍乱(俗称“麻脚瘟”)流行,主要疫区为崇庆、大邑、邛崃、蒲江、彭山、双流、温江、成都等 20 多个府、州、县。病势猛烈,患者发病后三、四小时即死亡。成都每日出丧最多时达五、六百具;5~9 月,全城合计死亡万余人。邛崃、蒲江、大邑死亡惨重,路断人稀。死人棺木无着,只好用蔑席、草帘裹尸埋葬。官府对此束手无策,竟以迷信方法教民。华阳县布告全县,令百姓焚烧纸船以送“瘟神”。大邑县设坛作祭,求

1892年(光绪十八年),四川由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入	毛织物	英国羽纱	4940 匹		渝平银 0.635 两 海关平银 0.592 两
		毛呢	21925 匹		
		宽面呢	8100 匹		
		西班牙条纹呢	2778 匹		
		俄国绒布	3121 匹		
		意大利绒布素面呢和起花的	8541 匹		
	棉纺织品	洋 纱	128845 担		海关平银每两值制钱 1740 文
		衫料、灰色、素面	520983 匹		
		衫料、白色	84432 匹		
		爱尔兰白布	84432 匹		
		英、美国斜纹布	8045 匹		
		英国被单料	10084 匹		
		印花布和沙发布	5047 匹		
		染色棉布、素面	57776 匹		
		土耳其红布	28956 匹		
		棉绒布素面的与印花的	24150 匹		
		意大利棉布、素面的与印花的	15637 匹		
洋货总值				5825474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出	土产	药材		352368	
		大黄	4522 担	101690	
		五倍子	8159 担	73428	
		麝香	46328 两	419648	
		白蜡	8390 担	318824	
		猪鬃	3806 担	40619	
		羊毛	10478 担	62870	
		麻	9365 担	39333	
		蚕丝	14069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2494 担		
		云南鸦片	92 担		
土产总值				2604500	
输出入 贸易总值				9245737	

1893 年(光绪十九年)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严重损害川藏贸易

1893 年 6 月(光绪十九年五月), 英国迫使清廷接受中印通商办法九款, 其中规定: 中国开放西藏亚东为通

商口岸, 准许英商自由贸易和英国派员在此驻扎, 亚东自开放之日起, 五年内藏印贸易不收税, 此约称为《中英会议藏印条款》或《藏印续约》。是年 12 月, 中英双方在大吉岭正式签约生效。从此, 四川货物在西藏境内, 受到英、

印货物的严重排挤。

首当其冲的是川藏间以茶叶和药材、动物皮毛为主要商品的省际贸易。印藏通商前,川藏每年贸易总额(主要是换货贸易)值银450余万两。印藏通商后,印茶取代了川茶,西藏药材、动物皮毛、黄金等大量流向印度,川藏贸易逐年减少,民国初年,贸易总值已减至200余万两。

官商合办筹建重庆机器纺纱厂

1893年(光绪十九年),川东道黎庶昌倡议筹办重庆机器纺纱厂,计划集资四十万两,买置地皮,备建厂房,并在上海磋商购置必要的机器。有关集资办法,1896年4月25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经总督鹿传霖批准,川东道同意先由川东道库“助银二十万两”,另外,再息借当商银两(亦可入股),外加土税一成凑足二十万两。1896年5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重庆府报告,共计借到商款十三万九千一百两,“作为纺纱局本”。

1896年5月30日(光绪二十二

年四月十八日),川督鹿传霖接奉清廷谕令,禁止官股参加重庆机器纺纱厂投资活动,该厂筹建事宜遂告终止。

道孚地震

1893年8月29日(光绪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川边道孚乾宁 $7\frac{1}{4}$ 级地震,震中烈度九度。是日卯、辰刻,道孚噶达、乾宁、角洛寺一带地震。噶达汛署衙门倒塌,惠远庙毁楼上楼下房间1400间,中谷、八美、恰坝石、角洛寺倒喇嘛寺庙7座。噶达汛一带并明正土司所属及道孚、革什咱等东西300里共倒塌汉藏民房804户,压毙喇嘛、汉藏兵民237人,伤114人,压死牲畜无数。康定城堡、兵营及官民住宅的部分墙壁、院墙倒塌。惠远庙附近及阿依列波梁子至松林口等地出现大小不等的地裂缝。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93年(光绪十九年),四川经由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入	毛织物	英国羽纱	3930 匹		
		毛呢	15711 匹		
		宽面呢	7695 匹		
		西班牙条纹呢	2714 匹		
		俄国绒布	2201 匹		
		意大利绒布素面呢和起花的	5812 匹		
	棉纺织品	洋纱	77702 担		
		衫料、灰色、素面	433732 匹		
		衫料、白色	65987 匹		
		爱尔兰白布	65987 匹		
		英、美国斜纹布	2290 匹		
		英国被单料	10030 匹		
		印花布和沙发布	3702 匹		
		染色棉布、素面	29915 匹		
		土耳其红布	14077 匹		
		棉绒布素面的与印花的	22961 匹		
		意大利棉布、素面的与印花的	16428 匹		
洋货总值				4574198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出	土产	麝香	52766 两	478192	
		白蜡	7672 担	460325	
		药材		451919	
		大黄	6284 担	94262	
		五倍子	13592 担	157665	
		猪鬃	5147 担	55347	
		羊毛	10768 担	69989	
		麻	9775 担	58646	
		蚕丝	16379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2513 担		
		云南鸦片	85 担		
土产总值				3135776	
输出入 贸易总值				8741235	

1894 年(光绪二十年)

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

1894 年 9 月 21 日(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日本陆军攻陷朝鲜平壤,海军与北洋水师接战。旅顺、威海各处防卫吃紧。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

要求切实加强防务。四川提督宋庆驻扎旅顺多年,甚得民心。北洋全军开拔后,民心惶惶,门户空虚,日舰近海游弋,如乘虚而入,后果不堪设想。宋庆前已奉命增援朝鲜,进驻九连城,与各军固守鸭绿江防线。后又奉命仍镇守

旅顺口,谕令宋庆帮办北洋军务。

总督职务。

宋育仁谋袭日本

1894年9月下旬(光绪二十年八月下旬),清军与日军在平壤交战失败,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又遭沉重打击,日本侵华气焰嚣张,清廷上下一筹莫展。宋育仁时在伦敦充任驻欧洲诸国参赞,得知国内讯息,甚为愤慨、焦急。经与使馆翻译王丰镐密商,拟购英国军舰、鱼雷、快艇,招募澳大利亚水兵,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队,由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计划确定后,他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光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该银行借款200万英镑,其中战费100万英镑,买定兵船快艇共10艘,运输船两艘,募得水兵一旅,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炮械毕集,整装待发”。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李鸿章在日本正式签订了马关条约,向日本屈辱求和,宋育仁“潜师之谋废”,只好“抚膺私泣,望洋而叹”。^①

谭钟麟调署四川总督

1894年11月19日(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谭钟麟由闽浙总督调署四川总督,未任。前任总督刘秉璋奉旨入京,四川布政使王毓藻代理四川

周元龙研制新式纺车

1894年(光绪二十年),四川三台县人周元龙游学湖北,考察湖北仿日大和纺纱机,颇受启发,决心研制。返川后,他悉心钻研,仿制出20苗头(锭)人力纺车。民国元年(1912年),周元龙去世后,其子狱生、贯亏继续研究改进,制成20~30苗头人力脚踏车,俗称“大车”。1929年,此项成果在四川省第一次国货展览会上获头等奖。

刘光第条陈变法维新四事

1894年冬(光绪二十年),刑部主事刘光第向清廷上书直言变法维新。刘光第,字德星,号裴村,四川富顺县人。生于1861年6月18日(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在军事上节节溃败,进一步暴露其腐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刘光第目睹时局阽危,于是年冬,冒着去官和被杀头的危险,毅然向光绪帝写了一道长达四千余字的《甲午条陈》,陈述变法维新四事:

一、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从而结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政出多门”的不正常状况。他认为光

^① 宋育仁:《借筹记》。

绪帝主政数年,断事决机,已为天下臣民欣服,若再以朝廷大事请示皇太后,有碍皇帝“独断之神”;其次,慈禧太后年届六旬,不应再过问朝廷军政大事。

二、请求光绪皇帝下“罪己诏”,以安抚天下民心。他说:“国家十年来,更治不修,军政大坏;枢府以下,嗜利成风;丧廉耻者超升,守公方者屏退;谄谀日进,欺蔽日深;国用太奢,民生方蹙。”他要求皇帝“引咎自责,特降罪己之诏”,使天下臣民视听一新。

三、请求皇帝严明赏罚,稳操胜算。他说:现在中日开战,奋勇作战靠将士,运筹决策靠王公大臣、军机大臣,而总揽全局、赏忠勇、罚奸怯,实操皇帝之手,对平壤之溃中欺蒙授奖的叶志超、黄海战败中负有罪责的依克唐阿、丁汝昌、丁汝贵等未给予应得的处罚。封疆大吏李鸿章“挟私遂非”,朝廷尚未予以处治。其他疆臣如李瀚章、裕宽、德馨、福润、邵友濂等,均“不满人望,悉宜罢归”。

四、请求皇帝“隆重武备以振积弱”。他认为“自今救弊所先,讲武为急”。自绿营衰败后,“各省咸恃练军,然以制土匪或有余,以制外洋则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未能很好

学习和掌握西方科技。他要求皇帝通飭各省督抚,广泛印行西方科技书籍,多聘外国教师,到各地分门传习。数年后,在乡、会试考试“时文”外,西学亦分别设科,从中选拔优异人才。同时改变练兵之法,添设武备学堂。对东三省这样的重地,应添设督抚,开办铁路,移民垦田,转饷治兵,极力经营,务成重镇。

疏成,刘光第呈刑部堂官代奏。堂官读后十分震骇,不敢代奏。刘光第非常气愤。虽然《甲午条陈》未转到光绪皇帝手中,却在清廷的衙门中喧然流传,各省亦多有传说,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刘光第死后,其疏文保存在荣县赵熙家。

外国教会扩大在川活动范围

1894年(光绪二十年),美国浸礼会在宜宾、乐山、雅安建立传教点。美国教会还在重庆开办求精小学,广益中学、启明小学,并在成都开设四圣祠医院。同年,英国圣公会在中坝、新都、绵州及安县等地建立了传教点。

有关外国教会、教派在四川设堂时间、信徒人数,以及所设学校、医院和慈善救济机构的简况,列表如下:

外国教会在川基本情况

教 派	设立时间 (年)	传教士人数(人)		信徒约数 (人)	医院、救济院、 药房、孤儿院(所)
		男	女		
巴黎国 外布道会	1753	124		信徒 93623	教堂 221 学校 425 医院 10 药房 180
中国内地会	1874	30	40	信徒 2000 皈依者 3000	医院 2 救济院 1 学校 300
圣书公会	1879	1	1	华籍卖书 人 13	
美以美会	1881	11	14	陪餐者 313 学习生 609	医院 2 药房 3
伦敦传教会	1887	5	3	陪餐者 160 皈依者 720	医院 1 药房 4
友谊会	1886	8	10	会员 27 皈依者 70	药房 2 学校 3
美国浸礼会	1890	7	6	信徒 100 皈依者 760	医院 1 学校 2
加拿大 监理会	1892	8	15	信徒 60	医院 3 药房 3 孤院 1
英国教 会联合会	1894	15	17	会员 40 愿受洗者 30	
合 计		男 209	女 106	101525	教堂 221 学校 460 其它 213
		合计 315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94 年(光绪二十年),四川经由

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出	土 产	麝香	51265 两	488299	
		白蜡	10865 担	991995	
		药材		458156	
		大黄	6279 担	91669	
		五倍子	10972 担	134957	
		猪鬃	6416 担	84132	
		羊毛	19031 担	134743	
		麻	8547 担	53501	
		蚕丝	13696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5280 担		
		云南鸦片	739 担		
土产总值			3413900		
输出入 贸易总值			10781505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

鹿传霖升任四川总督

1895 年 4 月 16 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陕西巡抚鹿传霖升任四川总督。前未赴任总督谭钟麟调署两广总督。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对四川的全面侵略

1895 年 4 月 17 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失败后,被迫在日本马关与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日本在中国取得了广泛的侵略特权,其第六款规定:

第一,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

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法,应得优例或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

(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

(二)四川省重庆府;

(三)江苏省苏州府;

(四)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

(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

(二)从上海驶进吴淞口及运河至苏州府、杭州府。

据此,日本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权利。日本轮船得“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①。

重庆开埠后,美、德以及沙皇俄国也以重庆为据点,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宗教、文化诸方面,对四川进行全面的侵略和争夺,从而开始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新时期。

骆成骧殿试中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四川资州举人骆成骧会试高中以后,参加殿试,由光绪皇帝“钦定第一”,成为有清以来四川第一名状元。

骆成骧,字公骧,四川资州(今资中县)舒家桥七里沟人,生于1865年(同治四年),九岁随父(廷焕)就读成都锦江书院,14岁应州考,成绩优异,旋以岁试第一调成都尊经书院深造,由于刻苦勤奋,学业日精,为该院主讲、著名学者王闿运所器重。1893年(光绪十九年),骆成骧中四川乡试第三名,次年赴北京会试落第,滞留京城,代馆八旗官学。

在参加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殿试中,骆成骧的长篇策论词旨切直,针砭时弊,提出了整军练兵、惩治贪污、厉行节约、兴修水利等“自强之计”,这篇策论正好投合光绪皇帝改革自强、励精图治的心思,因此受到青睐,署为殿试第一。

四川承担对日赔款

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根据中日《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要求在三年内分八次还清,否则,按年利五分行息。

清廷为偿还这一巨大赔款数额,向各省摊派收数。四川承担白银六十余万两。四川当局除饬各州县每年加契税银十万两外,盐课每斤加价二文,烟、酒厘各加价三成,肉厘每猪一只加收200文,并加抽竹篾厘金三成。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等1册,第616页。

成立蜀通官钱局,发行官银票

1895年5月(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川督鹿传霖向清廷奏呈:“请设官钱铺,出放钱票,以裕度支,而利市厘”^①。旋经允准。随即委唐次云主其事,由藩库借拨银50000两、宝川局借拨制钱50000串作股本,于次年7月(六月)在成都成立蜀通官钱局。该局发行一两银票41万余张,易钱54万余串。所筹资金或发放商务局、纺缫局等举办地方实业,或采购铜料、运购机器、以裕圜法,或发商生息,仅一年余,即盈利36000余两,全数解缴藩库。1897年10月(光绪二十三年九月),鹿传霖因故开缺调京,新督到任后未支持续办,蜀通官钱局遂于12月(十一月)公告结束。

川籍举人参加“公车上书”

1895年5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梁启超(广东新会县人)等,联合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1300余人签名上书,强烈反对中日《马关条约》,痛陈割地赔款议和的严重后果,要求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康有为等人将《上皇帝书》交都察院代奏,遭到拒绝。

四川旅京举人张联芳、杨锐等71

人积极参加了签名请愿活动。在康有为酝酿公车上书之初,共“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但最后在“公车上书”中实际署名的仅603人,而四川举人则有71人,占总人数603人的11.8%。

同年,四川举人刘奕等协恳川督代奏,驳斥中日“和议”,反对迁都;四川长宁举人张罗澄致书李鸿章,痛斥他同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成都教案发生

1895年5月28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五日),成都教案发生。当天,参加端午节庆祝活动的成都市民与传教士发生冲突,加拿大教士司蒂文森鸣枪示威,引起众怒,市民捣毁了四圣祠北街福音堂及教会医院。及至深夜,愤怒的群众又拥至一洞桥将天主堂、育婴堂和传教士住宅一并捣毁。次日,又陆续捣毁了玉沙街、正通顺街的基督教女传教士的住房、内地会福音堂、陕西街美以美会的教堂和诊所,直到30日事态才逐渐平息。

成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很快得到远近许多州县人民的响应,嘉定、叙州、保宁、重庆四府及新都、新津、大邑、眉山、彭山、灌县、崇庆、丹棱、屏山、宜宾、雅安、冕宁、邛州、仁寿、永川、大足、铜梁等州县,均发生打毁教

^① 《清实录·德宗朝》365卷3323页下。

堂之事。

美英政府就成都教案与清政府交涉,并以断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9月19日(八月初一)美国驻天津领事、海军军官和传教士组成的调查团动身入川。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镇压、捕获首犯朱瑞亭等24名,就地正法6名,军流枷杖17名。四川总督刘秉璋处理教案不利,被革职,永不叙用。所有因办理不善的州县官,邛州、大邑、冕宁、新津、灌县、乐山、成都等地行政官员共11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除惩办高级官吏、镇压首犯外,清政府还赔偿教堂损失费白银80万两。

杨锐、宋育仁在京参加“强学会”

1895年8~9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策划组织一个维新派与帝党密切结合的政治团体——“强学会”。由热心维新活动的翰林院侍读文廷式等发起,召集了筹组会议,通过了“强学会”的序文和章程,推举了提调和副提调,“强学会”正式宣告成立。该会吸收在京官僚和士大夫中的开明人士为会员,川人杨锐“起而和之甚力”,成为“强学会”的发起人和骨干之一。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当时任内阁侍读。此外,还有四川宋育仁(芸子)名列强学会的讲席,主讲“中国自强之学”。

强学会遭到封禁后,宋育仁直接上书恭亲王,力主发展本国工商实业,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他痛陈时弊,提出“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的救亡之策。主张大力扶植本国工商企业,特别是商办企业。主张各公司、企业除照章纳税缴厘外,“遇有地方一切支应差徭,无庸认派,地方书役,不得借支差名目,肆行搅扰。”在上恭亲王书中,他还要求执政者开放新闻,发展教育,开通风气,培养和选拔人才,奠定“求强致治”的深厚根基。^①

富荣盐场试办蒸汽机车采卤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由汉阳周恒顺五金厂制造的第一台蒸汽采卤机车运回富荣盐场。经安装调试后,这台机车1897(光绪二十三年)~1899年先后在“石星井”、“注洪井”试采成功,其推汲力大于畜力10倍,日推卤200筒,大大提高了井盐生产力。于是,机车经营者欧阳显荣将商号出顶所得2万余两白银投入机车经营,筹组“华兴公司”,取得专利,正式开展蒸汽机车包推卤水业务。这台井盐蒸汽机车的投产,标志着四川近代工业在盐业领域的发展。

富荣盐场蒸汽采卤机车的创办人为四川铜梁县人欧阳显荣。1884年

^① 均见宋育仁:《上恭亲王书》,《复陈四川商务折》。

(光绪十年),他在内江经营花纱生意,字号“兴发公”,在重庆设有庄号。同时,他又投资富荣盐业,与人合办畜力汲卤盐井,深感畜力汲卤产量低,事倍功半。1894年(光绪二十年),他途经汉阳,目睹长江岸边轮船上的起重机,引起他研制盐井采卤机车的兴趣,于是与重庆工程机械专家张培邨设计

出第一台蒸汽采卤机车,而由汉阳周恒顺五金厂制造。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四川经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毛织物	英国羽纱	2315 匹		
		毛呢	9811 匹		
		宽面呢	9945 匹		
		西班牙条纹呢	2742 匹		
		俄国绒布	1292 匹		
		意大利绒布素面呢 和起花的	8884 匹		
	棉纺织品	洋纱	115253 担		
		衫料、灰色、素面	511455 匹		渝平银 0.710 两
		衫料、白色	55918 匹		海关平银 0.662 两
		爱尔兰白布	55918 匹		海关平银每两值制 钱 1510 文
		英、美国斜纹布	5115 匹		
		英国被单料	14510 匹		
		印花布和沙发布	1573 匹		
		染色棉布、素面	26663 匹		
		土耳其红布	17580 匹		
		棉绒布素面的与印 花的	33761 匹		
		意大利棉布、素面 的与印花的	44112 匹		
洋货总值				5618317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出	土产	麝香	49716 两	540662	
		白蜡	11119 担	940699	
		药材		505091	
		大黄	5192 担	80470	
		五倍子	17317 担	232050	
		猪鬃	5410 担	96152	
		羊毛	15057 担	99377	
		亚铅	1000 担		
		麻	9760 担	68806	
		蚕丝	11664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10791 担		
		云南鸦片	988 担		
土产总值				3521563	
输出 入 贸易总值				13252876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

外国纷纷组团入川考察

1896 年 1 月(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由日本农务部官员、商业专科学校校长、轮船公司代表、新闻记者、商人组成的“日本商业考察团”到重庆“访问”,详细调查票号、当铺、

当铺利率、大帮信局、度量衡、运费、银钱兑换、地价和工资、火柴制造以及对日本货物的一般需要等情报。

同年,法国人鲍宁由兰州经洮州、过松潘草地、入康区,到大渡河流域探险。

同年 2 月(光绪二十二年正月),

瑞典人皮旭波夫人溯长江至万县,由陆路经梁山(今梁平县)、渠县,绕道川北,经剑阁、绵阳、灌县而至成都,再溯岷江而上,经汶川北上,改道西北,越邛崃山至大金川发源地梭磨土司(今马尔康市东梭磨乡),本拟南去打箭炉(康定),因时间过迟“地方不靖”,仍返灌县至成都。

3月(一至二月),由法国商会代表、蚕丝专家、采矿工程师以及各方人士组成的“法国里昂开发中国商业考察团”,经由成都、贵阳两处到达重庆,整个夏季在全省考察,再在打箭炉聚齐,于秋季抵重庆。

4月(二至三月),英国政府特派前往各通商口岸调查英商贸易情况的英驻广州总领事白瑞兰到重庆考察,12月(十一月),英国领事署职员波恩率领由纺织专家组成的“布拉克博恩考察团”到重庆考察,广泛搜集经济社会情报。

富顺县发生地震

1896年2月14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日),富顺县发生 $5\frac{3}{4}$ 级地震,震中烈度7度。是日申时,富顺沿滩场、黄镇铺、自流井等处地震,县城衙署、官运局照墙间有倒塌,毁民房90余间,压毙20人,伤12人。该县自2月14日至7月30日共震30余次。南溪县2月18日(正月初六日)突然

地震,人畜簸荡,县属云台寺殿宇房屋震倒,压毙、打伤僧俗6人。遂宁田水皆激起波涛,崩坏房屋甚多。合川、内江、荣县、三台、资中、潼南、安岳、简阳、中江、蓬安、蓬溪、广安、渠县、合江及贵州赤水、仁怀一带有感。余震30余次,至10月(九月)乃止。同时,川东各县也发生山崩地陷,石出滩涌,“数百年罕见之灾发于一旦”,居民为水冲去者,为地陷者,大约数千家。

石渠地震

1896年3月14日~4月12日间(光绪二十二年二月),石渠洛须7级地震,震中烈度9度。是日,洛须西原春科土司衙门倒塌,全境碉楼、寺庙倾圮殆尽,土司全家压死。曲科寺经堂、住房倒塌,佛像及僧俗人等尽陷地下。鲁码塘白度母殿毁坏。洛须西北川、青、藏交界地区的金沙江西岸大规模山崩滑坡,金沙江一时壅塞。

法、日、美、德四国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

1896年3月(光绪二十二年正月至二月),法国领事馆在重庆二仙庵设立,首任领事哈士。安迪、穆文吉、何世康等相继担任过驻重庆领事。

同年7月(五月至六月),日本领事馆在重庆设立,与此同时,中日两国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对有关领事权的规定为:“第三款,大日本国大皇帝

陛下,酌视日本国利益相关情形,可设立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及代理领事驻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通商各口岸城镇。各领事馆等官,中国官员应以相当礼貌接待,并各员应得分位职权、裁判管辖权及优例豁免利益,均照现时或日后相待最优之国相等之官一律享受。”日本首任驻重庆领事加藤义三,驻小梁子五公馆。1911年前,担任领事的先后有高桥德太郎、堺与三吉、山崎桂、富田义铨、德丸作藏、池永林一、白须直、河西信等人。

1896年12月(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美国领事馆设于重庆领事巷。首任领事史密特,1911年前,担任领事的先后有密勒、米哲尔、潘生、贝克等人。

德国领事馆设立较晚,1904年(光绪三十年)设于重庆,派卜思和米雷尔担任副领事。

宋育仁任商务局监督

1896年5月1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清廷谕令宋育仁回四川担任商务局监督,负责矿务、商务之提倡与规划。

宋育仁在任职期间(1896~1898)以“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为己任,制定了《四川商务局招股公司章程》,积极鼓励爱国商民兴办实业,保护工商权益;明确规定:“各公司均不准招集洋股”。四川兴办实业由是

形成高潮。四川的维新变法运动,也以1896年宋育仁回川为契机而兴起。宋回川后,联络了一批在渝的爱国维新志士,创办报刊,制造舆论,使维新变法运动在四川蓬勃开展起来。

四川试行银元

1896年6月(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四川总督鹿传霖令重庆府先试行银元。是年10月,即从湖北领回1元、5角、2角、1角四种银元配足10000元,发商试销,不敷行销。其后,又从湖北等省兑回大小银元40000元,继续试用,商民称便。这批银元,每大元铸明重库平7.2钱,经川东道核实,每大元定为渝平票银7.1钱,1元以下银币即按大元仿合。

官商合办麻哈金矿

1896年7月17日(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七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实施“官商合办”冕宁、紫谷壩麻哈金矿计划,拟由官商各筹股本银15万两,共成30万两,而以20万两购运机器,以10万两作工本,通力合作,计利均分,对于财政、商务均有裨益。他派矿师唐星球前往上海选购机器。同年,清政府批准官商合办冕宁麻哈等处金矿。次年10月(九月),唐星球所购机器运到,鹿传霖任命他为矿师,专管开矿,并委任候补道赖鹤年、候选知府徐麟光充当矿务总办,负责办矿事宜。官

商合办麻哈金矿自 1896 年开办,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秋使用机器生产,到 1899 年 6 月(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历时四年,由于官僚腐败,经营无方,“采取之金仅二百二十余两”。到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麻哈金矿开办五年,糜费官商资本银 30 余万两,毫无成效,每月在藩库领款四千两,以作维持经费。经四川布政使周馥报告奎俊批准,麻哈金矿停办,所有机器各件,俱饬徐麟光、唐星球点交,委员池贞铨接收。

法商亨达利洋行私签开采四川油矿合同

1896 年 8 月 7 日(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向清廷报告,渝商钟毓灵曾于 1892 年(光绪十八年)申请设厂开采石油,要求给执照出洋购买机器。钟毓灵得执照后,即赴上海,以购买机器为名,与法商亨达利洋行签订合同,由洋商出资开采油矿。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春,亨达利洋行总理雷达利及法国矿师蒲武,随同法国领事哈士先后到渝,由钟毓灵陪同,前往重庆、叙府、嘉定等府和泸州、自贡等处勘察油矿。为此,川东道照会法国领事,要求停止非法活动。法国领事以既成事实相狡辩,亨达

利总理雷达利则一味执约相抗。声称将赴京控诉。

各地旱、雹、水、火灾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春夏时节,兴文、绵阳、安岳大旱,垫江夏旱秋霖。6 月(五月),井研、雅安、犍为雨雹如注,雹大如卵,田禾损失惨重。富顺、南川久雨伤谷。

同年 8 月(七月),川北南充、武胜淫雨 50 余日,稻谷大半生芽。渠县自夏至开始,阴雨绵绵,直至中秋。8 月(七月),广安水淹天池,城内汪洋一片,人皆自北门登舟至东门,田禾委地无收。涪陵自 8 月中旬起阴雨连月,稻谷已收者霉烂,未收者生秧。

同年秋,川东夔州、绥定(今达县)、重庆、忠州等府州淫雨连绵成灾,其中以夔州府属各县受灾最重。次年春,饥荒严重,“灾民遍地,情形惨切”。大宁(今巫溪)县“深山南北境,周围约一、二百里,距城穹远,三里两家,不成村落。少壮者流亡觅食,老弱辗转沟壑,死亡枕藉,炊烟久断。……又相传有易子而食之事。”^① 米价在 1896 年冬已上涨一倍。

同年 6 月 25 日(闰五月初三日),重庆太平门失火,烧毁民房 400 余间。8 月(七月),重庆又发生大火。火灾起

^① 《渝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旬第 14 册;《重庆海关 1892~1901 年十年调查报告》,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1979 年版,页 216。

于城内东南角,共烧毁房屋 1083 间,许多最富豪的商行被焚,大量洋布和洋纱付之一炬,损失估计在百万两白银以上。灾后,重庆向英国订购十架手摇救火机,作为消防设施。

川江航道发生重大岩崩滑坡事故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秋,川江云阳大帐发生重大岩崩滑坡事故,形成一巨滩,名曰“兴隆滩”,阻断商船航运,成为川江最为汹涌的险滩。是年 9 月 30 日(八月二十四日)夜,该处山石崩陷,土石夹壅而下阻塞江心,使江面从 365 米缩减为 90 米,水势湍急,难以通航。渝万两地商帮深以为患,决定共同集资,招工千名,开凿险滩,云阳县知县汪贲之亲自督工,凿宽河面,航道稍通。次年,经四川总督电请总理衙门拨款数万,并转饬总税务司,由上海海关派遣比利时籍工程师泰勒和多那尔得来川勘修。泰勒等采用新式爆破方法,先于北岸开掘大穴数处,以杀水势,所有暗礁,尽量炸毁,沿南岸阻碍水路之大石,亦用炸药炸碎,更于滩处造一平坦纤道以作拉滩之用。这项工程共耗银八、九万两。平滩后,航运较前顺畅。

鹿传霖整顿四川机器局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四川总

督鹿传霖奏报清政府说:“现值多事之秋,武备亟当整饬,枪械尤应筹备,川省自机器局停造洋枪,历年均系备价前赴上海等处购运,不特川江险远,运费不资,并虑运解需时,缓急难恃,其从前所造后膛洋枪,前经派员演放,均能合用,间有未能如法之处,已饬酌量修整,若再认真整顿,更可日起有功。”因此,他要求“每月酌加经费银六百两”,逐渐恢复生产各式枪炮。并“咨明南北洋饬取各厂所造新式洋枪来川仿制。”^①此后,机器局的经费、司事、工匠又开始增加,生产逐步恢复。共设 7 所 9 厂:文案所、支发所、收发所、采买所、营造所、监工所、洋火药所;模样厂、机器前厂、机器后厂、修整洋枪厂、后膛洋枪厂、铜帽厂、弹壳厂、熟铁厂、生铁厂。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又增设抬枪厂、前膛洋枪厂。

本年度,四川机器局共支用经费白银 57104.4 两,其主要产品及修理项目有:修理机器 147 种、水龙 11 座,修理筹响局军装所并各营旧洋枪 5180 杆,续成机器 34 种,新造毛瑟后膛抬枪 40 杆,马梯呢枪药弹 344000 颗,前膛铜火帽 675 万颗,各种机件 258 种,各营操枪铁靶 6 架,已成洋火药 87965 觔。

^① 均见《四川机器总局档案》全宗号 3,目录号 1,案卷五。原件藏四川省档案馆。

成都创设中西学堂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廷谕令各省开设新式学堂,四川总督鹿传霖奏准创设中西学堂于成都。中西学堂按广东等省章程,由总理衙门聘请英法文教习2名、中国教习1名,每期招收学生60名,学习西方语言文学、地理、算学、中外历史等科目,培养洋务人材。四川每年拨给经费银7000两。该学堂开办六载,教学内容和方法取西方各国长处,成效显著,受到清廷嘉奖。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为推进四川新式教育,经清廷批准,将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合并,改办四川省高等学堂。

成都设官电总局,雅安、打箭炉设电报分局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鉴于川康边地多事,督署拨款修建成都至打箭炉(今康定)的电报线,并于本年6月撤销督署报房,设官电总局。8月在雅州(今雅安)设分局,12月在打箭炉设分局。

川商加入进出口贸易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四川31家商号开始经营进出口贸易,其中,成都3家,嘉定1家,重庆27家。其经营途径是:川商派遣他们的合伙人或代理人到上海采购洋货,定期进货付款。洋商用轮船将货物包运到宜昌。川商在宜昌收货后,改用民船将货物运到重庆。重庆成为四川外贸主要市场和分销中心。在每年的不同季节中,商人从偏远的城镇,如成都、保宁(今阆中)、潼川(今三台)、遂宁、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绵州(今绵阳)、合州(今合川)及其它重要地方采办土货,如鸦片、中药材、生丝、动物皮毛等,通过水路或陆路运到重庆,再将洋货运回各城镇。洋货通过这种办法分销到四川城乡,并有相当一部分浸销云南、贵州两省。到20世纪初,外国棉纺织品已深入川西成都附近及绵阳、平武、理番(今理县)、松潘等边远地带。绵阳一地,每年销售洋纱高达150万公斤。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四川经由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人 输	毛织物	英国羽纱	2326 匹		
		毛呢	3231 匹		
		宽面呢	6600 匹		
		西班牙条纹呢	3600 匹		
		俄国绒布	1735 匹		
		意大利绒布素面呢 和起花的	10096 匹		
	棉纺织品	洋纱	166676 担		
		衫料、灰色、素面	374542 匹		
		衫料、白色	37009 匹		
		爱尔兰白布	18356 匹		
		英、美国斜纹布	6105 匹		
		英国被单布	18968 匹		
		印花布和沙发布	3103 匹		
		染色棉布、素面	33632 匹		
		土耳其红布	15052 匹		
		棉绒布素面的与印 花的	33580 匹		
		意大利棉布、素面 的与印花的	58095 匹		
洋货总值				6929393	
出	土 产	麝香	53490 两	538243	
		白蜡	9595 担	796298	
		药材		507900	
		大黄	4505 担	67596	
		五倍子	4745 担	66428	
		猪鬃	5752 担	129099	
		羊毛	21977 担	145046	
		亚铅	1568 担		
		麻	12946 担	90620	
		蚕丝	12973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7025 担		
		云南鸦片	1038 担		
土产总值				3556387	
输出 贸易总值				13132308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重庆开设邮政局

1897年2月20日(光绪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根据清廷准予开办大清邮政局的谕令,川省将原重庆海关寄信局加以扩充,改称为“大清邮政官局”,由重庆海关税务司管理。这是四川第一个官办邮政局(一等局)。

1897年7月(光绪二十三年八月),重庆大清邮政官局开业,办理重庆至宜昌间陆路邮件的递送业务。重庆邮政官局最初实行定期业务,每周由重庆运出邮件一次,宜昌也定期向重庆递送邮件。1900年,重庆邮政局改为总局,辖重庆、顺庆(南充)、绥定(达县)、叙府(宜宾)、保宁(阆中)、潼川(三台)、昭通、遵义和成都(1901年成立)等局。1902年,先后开通了重庆经顺庆至保宁、重庆经叙府、乐山至成都的水上邮路。并开通了重庆经永川、简阳至成都,重庆经叙府、昭通至东川、昆明及重庆经遵义至贵阳的陆上邮路。

重庆开埠前,有16家大帮信局争相递送往来重庆的邮件,其中有3家的总局设于汉口,能够把信件、包裹和贵重物品由重庆转递沿海各埠;其余设在重庆的总局则担任递送省内、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邮件的任务。重庆开埠第二年,由重庆海关兼办邮务,称海关寄信局。大清邮政局成立后,海关邮务遂告结束,但民间信局因信誉卓著,仍有相当多的投递业务。

四川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元

1897年7月(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川督鹿传霖奏准就机器局余地,购机建厂,设立银元局。次年6月厂房落成,即从成绵道库借银115500两,藩库借银3000两,试铸银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奉令停铸,未及发行,所铸银元及剩余铸本,并交藩库收存。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川督奎俊复以川省地僻道险,求邻不易,奏准开局复铸,委任机器局总办赵鸿猷兼任银元局事务。并从藩库借铸本银35万两,拨支经费银21000两,于当年10月正式开工铸造1元、5角、2角、1角、半角银币。币面铸有“四川省造”字样,时称川板龙洋。1元龙洋重库平7.2钱,成色银9铜1,作市平7.1钱行使。角洋成色低于大元。至1911年(宣统三年),川厂共铸大小龙洋1355万余枚,折合大元998万余元。

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起,银元局还兼铸1元(3.2钱)、半元(1.6

钱)、1角(8分)3种藏币银元。1904年(光绪三十年),银元局仿印度卢比式样,铸有光绪皇帝头像的机制藏洋,时称“四川卢比”,运送川边藏区发售行使后,不仅有力的抵制了印度卢比的入侵,而且促进了汉藏商民的贸易。

李秉衡授川督

1897年9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日),山东巡抚李秉衡授四川总督,未任。原任总督鹿传霖奉召入京,由成都将军恭寿兼署四川总督。

重庆玻璃公司创立

1897年10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重庆商总杨全盛开办重庆玻璃公司。该公司包销重庆各玻璃作坊生产的各色货物,如窗玻璃、亮瓦、鸦片烟灯罩等,因公司具有垄断性质,所以销售利润甚厚。垄断阻碍玻璃产品的自由流通,以致1901年发生了“销场阻塞,折本颇巨”的困境。于是,重庆商家纷纷要求官府撤销该公司。但是,直至1905年,重庆已开办10余家玻璃工场,产品仍归该公司代销,年销金额3万余两(白银)。

《渝报》创刊

1897年11月上旬(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上旬),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在重庆创刊。宋育仁任总理,杨道南任协理,主笔潘清荫,副主

笔梅际旬。《渝报》为旬刊,每月出3期,每期60页左右,栏目有辕门抄、上谕、奏折、论文、国内外新闻和本省要闻、译文、重庆物价等。由于宋育仁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离渝赴蓉任尊经书院山长,《渝报》出版到第16期即行停刊。

《渝报》是四川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它仿效当时维新派的重要报刊上海《时务报》和湖南《湘学报》的办报方针,鼓吹救亡图存,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还刊登国内各地维新运动的消息,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从而使四川的知识界打开了眼界,从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来寻找救国的道路。随着《渝报》的创办和发行,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在四川较广泛的流传开来。

裕禄任四川总督

1897年12月(光绪二十三年冬月),清廷谕令福州将军裕禄为四川总督,原未任四川总督李秉衡因事解职。裕禄亦未来川任职。由成都将军恭寿兼署四川总督。恭寿于同年8月死于任,由四川按察使文光代理四川总督职务。

清廷再次处理瞻对事件

1897年12月2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九日),清廷驳回川督鹿传霖关于将瞻对地区收归四川,实行改土

归流的办法。谕令说：瞻对喇嘛和藏民久受国家恩典，岂能背信弃义，侵占巴、里两塘及霍尔瓦述等十余土司。可能是鹿传霖操之过急，不能使川边人民心悦诚服所致。特令鹿传霖免职，由恭寿署理四川总督，持平处理川边纠纷，所有上、中、下三瞻地方，仍然全部赏赐达赖喇嘛管辖，不必实行改土归流。

清廷这道谕旨，主要针对川督鹿传霖卸任前的两次奏疏。鹿传霖在前一奏疏中反映说：藏属瞻对寻衅构兵，连年骚扰川边，侵占明正土司地方，迫使巴、里两塘及霍尔瓦述等十余土司相率依附；并利用朱窝、章谷土司翁婿争袭之机，收服朱窝，又纠众勒令章谷投顺，不遵从委员开导，先开兵端。因此派大兵进剿，期于必克。后又上疏说：官兵已克复上、中、下三瞻全境，请准其改归内属。

恭寿对瞻对事件的调查结果，证实瞻对首领确实连年侵挠各土司地方，对川民构成威胁，同时也指控鹿传霖不加细察，以大兵进剿，处理失当等问题。鹿传霖派员前往肇事地区，除恢复川边秩序外，也同时实施开采金矿的计划，西藏上层官员得知这一消息，唯恐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因此唆使成都将军恭寿弹劾鹿传霖处理瞻对事变不当。

川东大饥荒，清廷仍催逼捐输解额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继去岁川东遭受秋霖、瘟疫，难民数万逃荒湖北之后，本年川东又遭大旱，大宁、奉节、万县、梁山（梁平）诸县“颗粒无收”，沿嘉陵江上溯到保宁（阆中）府亦因收成霉烂损失一半。夏季，通往成都的西大路上饿殍遍野。加之瘟疫流行，死者更多。饥民抛弃家园，流落沿江一带觅食。在川东忠县、夔州、绥定（达县）数府，人相食，全家饿毙者甚多。即使在灾情较轻的巴县一带，饿死、病死者即达8000人。灾荒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造成“牲畜已尽，所有耕作农事，均以人代”，“杼柚皆空，十室而九”的悲惨后果。

川省灾情虽如此严重，但清廷仍催逼捐输解额。1897年9月2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四川总督鹿传霖报告清廷，四川额征丁粮课税，向不敷年例供支。历年虽有厘金、津贴、捐输加派，“而出款日见加增，司库综计出入，每年总短银二十余万两。……近年又加拨川省认还洋债，出款日增，更属无米之炊”。而清廷仍谕令四川除本年被灾的奉节、云阳、万县、开县、东乡（宣汉）、新宁（开江）、太平（万源）、大竹、忠州、丰都、垫江、梁山（梁平）、涪州（涪陵）、彭水、黔江、秀山等州县，本年地丁、津捐均应于秋后征完清解，来年捐输待来年再征外，全川各州县，

“似可酌量照案加派”，仍循旧章，于年内先完一半，余归明年完缴。

著名医学家唐宗海逝世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著名医学家唐宗海逝世。

唐宗海字容川，彭县人，生于1847年，卒于1897年，享年51岁。光绪乙丑年(1889)，中进士。少时因其父多病，遂留心医学，尤于血证独树一帜，谓气统血，血随气行，治血必先调气。气实则泻，气虚则补，因撰《血证论》一书以阐其理。

唐生于清末，斯时随着外国传教士在内地开设医院，西洋医术已大量流入，唐氏纂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略谓中医长“气化”，西医专于“形迹”，各有短长，取长补短。并试用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印证中医理论。虽瑕瑜互见，但在当时仍属不可多得之作。

此外唐氏还著有《伤寒论浅注补正》、《金匱要略浅注补正》、《医学一见能》、《本草问答》等书行于世。

重庆等地创办新式学堂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四川维新派人士的推动下，四川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除上年省城举办的中西学堂外，各州县新办学堂如下：崇实学堂(蓬溪县)、新亚书院(荣县)、紫金

精舍(广安县)、广安官立学堂、遂宁学堂(遂宁县)、算学馆(成都)、西文学堂(江津县)、川东洋务学堂(重庆)、中西学堂(荣县)、经济学堂(遂宁县)、经济学会(彭县)、算学馆(江津)、中西学堂(重庆)。

这些学堂以启迪民智、开通风气、解放思想、培养人材为宗旨，对改革传统教育体制，推动四川近代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四川机器局生产大批枪械弹药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自上年川督鹿传霖奏准扩大四川机器局新式武器弹药的生产后，本年度四川机器局共支用经费68273.4两。其主要产品及修理项目有：修理机器172种，水龙17座，筹饷局军装所并各营旧洋枪5350杆，续成机器3种，马梯呢枪614杆，快利枪20杆，蜀利抬枪200杆，马梯呢枪弹药364080颗，蜀利抬枪弹药65880颗，前膛铜火帽8451000颗，各种机件625种，各营操枪铁靶7架，已成洋火药97017觔。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四川经由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出	土 产	麝香	52597 两	581854	
		白蜡	9756 担	799047	
		药材		600056	
		大黄	6673 担	108098	
		五倍子	13549 担	252011	
		猪鬃	6179 担	118070	
		羊毛	23696 担	174167	
		亚铅	15715 担		
		白铅	1637 担		
		麻	13559 担	97550	
		蚕丝	11466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9392 担		
		云南鸦片	1294		
土产总值				4325713	
输出入 贸易总值				17971807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

英人立德驾驶“利川”轮强行试航川江

1898 年 1 月 15 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国商人立德在上海订造双水轮机七吨小火轮一只,命名“利川”号,自任船长。该轮由上海起碇西上,行 20 余日至宜昌。向宜昌官府递交一纸强行航行川江的通知,并表示拒绝任何阻拦。定期于 2 月 15 日(正月二十五日)西航重庆,清廷无

法阻挡,只好于开航之日,派遣炮船一艘,精勇 12 名,救生船一艘,水手 6 名,护送该轮西上,“利川”号于 3 月 9 日(二月十七日)抵达重庆。英、美、日驻渝领事及中外人士 50 余人摇旗鸣炮欢迎。1899 年,立德又特制了一艘载重 310 吨的“先行号”,从宜昌驶抵重庆。立德的试航成功,为外国轮船进入川江开辟了道路。

在直航川江的上年,英国商人已直接动手整治川江险滩工程,为轮船

上航作好准备。

清廷下诏改革取士制度,开设经济特科

1898年2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清廷下诏开设经济特科,擢用通晓实学人才。经济特科与岁举交叉举行,先行特科,次行岁举。特科考试科目分为六种:一为内政,包括方輿、社会利弊、民情风俗;二为外交,包括各国政治、国际条约、公法律例、章程等;三为理财,包括税务、矿务、农、工商务;四为经武,包括行兵布阵、驾驶测量;五为格物,包括中外数、声、光、化、电各学;六为考工,包括名物、象数、制造、工程等。

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对象,无论已仕未仕学子,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推荐,即可参加考试。

四川总督推荐杨锐、宋育仁、黄英、马六尊4人为经济特科人才。同时还推荐杨锐、刘光第、宋育仁、王秉恩、李稷勋等5人为出使外洋人才。

四川开始教育改革

1898年初(光绪二十四年初),宋育仁执掌尊经书院,提出教育“无论中西,取其切于实用,如天文、地輿、兵法、医学、算学、矿学、格、化、声、光、重、汽、电各种学。”尊经书院领风气之

先,对传统教育内容、方法进行改革。接着,四川各地书院相继变通章程,兼习天文、輿地、中外交涉、商务、测算,考试改用策论。同时,四川维新派知识分子大力鼓吹兴办新式学校乃是救亡图存转弱为强的妙方,在他们的倡导下,四川出现一批新式学堂,其中有:成都的中西学堂、算学堂,重庆的中西学堂,川东洋务学堂,荣县的中西学堂、新亚学院,江津的西文学堂、算学堂,彭县的经济学舍,遂宁的经济学堂,广安的官立学院,威远的农学堂等。

重庆、泸州、江津还创办了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足。

昭信股票的颁发与夭折

1898年2月(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为偿还甲午战败后对日赔款,清政府颁布《昭信股票详细章程》十七条,由户部设立昭信局,各省设立昭信分局,选派员司经理,向全国各省发行一百两股票50万张,五百两股票6万张,一千两股票2万张,总共金额一亿两。限20年还清,年息五厘。股票系有价证券,准许辗转抵押买卖,股息准抵地丁、盐课。此项股票专用“拨还洋款,不作别用”^①。川省摊认民股银68.2万余两,官股银35万余两。总督恭寿设立昭信局,实行“按亩加派”,

^① 《清实录》光绪朝,卷415,页7。

“与正供同收”，“皆由省局预定成数。或十余万，或十万，或数万不等。各州县则仿照历年捐输办法，按粮摊派。”^① 昭信股票颁行不久，御史徐道焜、江南道监察御史张承纓先后上疏清廷，揭发股票发行流弊，对川省昭信股票扰累商民情形作了详尽报告。同年9月7日（七月二十二日），清廷不得不诏令停止发行昭信股票。

川籍维新派人士在京成立“蜀学会”、“蜀学堂”

1898年2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四川维新派人士杨锐、刘光第发起，联合在京的四川官绅傅增湘、谢绪纲、王晋涵、李植等人，在京成立“蜀学会”，会址设在北京四川会馆。经费由川籍官绅捐助。“蜀学会”以“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② 为号召，征集会员，定期集会，讨论国是。同年4月26日（三月初六日）与会的川籍京官刘光第、杨锐、高城南、胡敬敷、聂九愚、曾蜀章、乔茂萱、曾奂如等8人和旅京川籍举人数十人殷殷话别，京官等嘱咐乡里举子回川就地设法广开学校，推动维新运动。

“蜀学会”还设立“蜀学堂”，购置图书仪器，聘请中西教习“求时务之学”。“蜀学堂”只收川籍学生。学堂开

设英文、数学等课程，还请维新派京官主讲时事。1898年8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持“蜀学堂”入学通知前往注册者达70余人，其中以举人、拔贡为主，连状元出身的翰林院编修骆成驥也踊跃入堂学习。

刘光第、杨锐等参加“保国会”

1898年4月12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起组织“保国会”，参加成立大会的京官和应试举人200余人，康有为在会发表救亡演说，呼吁各界人士起而挽救民族危亡，会议通过的《保国会章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确立了活动原则，拟在京、沪成立总会，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四川维新派代表刘光第、杨锐等14人毅然参加“保国会”。保国会成立不久，杨锐等人又进一步在北京成立“保川会”，把保国与保家乡结合起来。

余栋臣再次起义

1898年4月18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由于法国天主教川东主教杜昂一再要求清廷惩办大足县反洋教斗争首领余栋臣，川东道任锡汾饬令巴县知县王炽昌收买大足痞棍，诱捕已置产务农的余栋臣。4月20

① 《渝折汇存》，光绪戊戌七月初六日，页15～17。

② 陈鸾章：《戊戌闰三月初六日日记》。

日(五月三十日)蒋赞臣、张桂山等率众赴荣昌劫狱。出狱后,余栋臣立即宣布再举义旗,招兵买马,聚众六千,占领大足龙水镇。

同年7月3日(五月十五日),余栋臣派遣张桂山、唐翠屏分兵两路,前往荣昌河包场擒获法国教士华芳济,宣布其危害人民的种种罪行。8月3日,余栋臣颁布檄文,檄文声明:“但诛洋人,非叛国家”,还提出“顺清灭洋”、“除教安民”等口号。义军队伍扩充至万余人。8、9月(七、八月)余栋臣部分别攻打安岳、荣昌、永川、铜梁各县教堂,没收教堂和教民财产,惩罚不法教民,各地群众纷起响应。

清廷电令护督文光剿抚兼用,营救法国教士华芳济。文光饬令川东道任锡汾谈判放人条件。余栋臣表示愿意就抚,但“欲得洋枪一千杆,带兵三十营,逐德人出胶州,驱日人出台湾,强欧人尽出中国境地。”^①由于清吏未接受此条件,义军内部有分歧,和议未成。

11月(十月),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奉命专办大足教案,以招降为诱饵,义军首领唐翠屏、张桂山等反对和议,蒋赞臣力主和议,余栋臣则坚持向清政府提出保存义军,发放枪械、饷银等要求。

12月(十一月中旬),清廷招降不

成,便武力镇压余栋臣义军。此时,清廷以文光不力免职,调奎俊任四川总督。奎俊提出“以剿为抚”的主张,派王之春统领泰安、安定、长胜等十余营官兵和各州县团练武装对大足龙水镇形成包围之势。

清军首先袭击转战于资州一带的唐翠屏部,翠屏战败牺牲。何希然又在内江一带兵败就义。1899年1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清军向龙水镇发起总攻,义军大败,余栋臣率部退入西山。经此大挫,余栋臣灰心绝望,于1月19日释放华芳济,数日后,蒋赞臣降清,余栋臣也携眷下山,自赴清营请降。清廷为避免后患,将余栋臣囚禁成都,“禁锢终身”,蒋赞臣遣戍西安,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对义军余部,则命令各州县严厉镇压,斩尽杀绝,并调泰安营驻防大足县龙水镇,以防群众东山再起。为弥补大足教案的损失,由清廷向法国天主教会赔偿白银1186100两。

余栋臣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甚为广泛,波及到四川的荣昌、合川、铜梁、江津、永川、南充等30余州县,还影响到云贵边境地区和湖北的施南、宜昌两府及湖南的石门县。以余栋臣起义为中心的四川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是义和团之前规模和声势最大的一次反洋教斗争,给外国侵略者以

^① 华芳济:《华司铎被掳记》。

沉重打击。正如天主教川南教区的外国传教士所描述的：“川东七个月来一直是叛乱的策源地，破坏了我们的三个传教区，烽火首先漫延到川西，毁灭了几处最美好的地区，后来没有发展了，最后一个是川南，受的损害比川东小，却比川西要大”。“下川南则有四分之三被摧毁了，且完全混乱了。六七千教徒及十三个教士逃亡在城内或躲藏在云南边境。”^①“川东的三分之一的基督教信徒一扫而光，川西的基督信徒大大地受到损害，1600人流离失所。”^②

成都“蜀学会”成立，《蜀学报》创刊

1898年5月初（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宋育仁等四川维新派人士，在成都创设“蜀学会”。该会宗旨：“以通经致用为主，以扶圣教而济时艰。”成都设总会，陆续在各府、厅、州、县设分会。学会以集会讲演为主要活动形式。著名讲演人有宋育仁、廖季平、吴之英等。讲演内容主要分：伦理、政治、格致三大类。“伦理以明伦为主；政事首重群经，参合历代制度，各省政俗利弊，外国史学、公法律例、水陆军学、政教农桑各务；格致统古今中外语言文字、天文地舆、化重光声、电气力水、火汽地质、金体动植、算医测量、畜牧、机器

制造、营建矿学。”^③总会每月在三公祠聚讲两次，讲演精彩内容，登报公诸于世。

与此同时，宋育仁等人以蜀学会的名义出版了《蜀学报》。报馆设在尊经书院，由尊经书局发行，宋育仁任总理，杨道南任协理，吴之英任主笔，廖平任总纂。

《蜀学报》是成都的第一家近代报刊，创刊之初为半月刊，到第四期改为旬刊，共出版13期。每期的栏目有谕旨、奏折、论文、蜀中近事、中国近事、海外近事等，其中以论文为多。该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提倡学习西学，介绍中外科技，深得川中人士喜爱，末期印数达二千册，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蜀学报》实际上是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的《渝报》的续刊。两报是戊戌变法时期四川地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除两报之外，四川维新派知识分子相继出版了介绍西方议会制度、工业法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的书籍，翻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四川知识界的先进分子纷纷从学习西方来寻找救国的道路。

① 《天主教川南教区神职代表格勃利昂给北京主教法维埃的信》，1899年2月4日。

② 《川南教区德来赛给法国驻北京公使的报告》，1899年3月10日。

③ 《蜀学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望日，第1期。

刘光第、杨锐参与新政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实行新政改革,百日维新开始。8月5日(六月十八日),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了刘光第和杨锐。9月1日(七月十六日),光绪帝召见杨锐,杨锐面奏数百言,“极言兴学、练兵为救亡之策”。9月4日(七月十九日),光绪帝召见刘光第,刘光第“力陈时事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光绪帝十分赞赏二人奏对,9月5日(七月二十日),赏加二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林旭共同参与新政事宜。

奎俊升任四川总督

1898年7月12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恭寿因病开缺,江苏巡抚奎俊升任四川总督。在奎俊于本年12月(冬月)到任前,由四川按察使文光代理总督职务。恭寿于本年8月(七月)病故。

清廷批准设立四川矿务总局

1898年9月10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大臣、庆亲王

奕劻、矿务铁路大臣王文韶、张荫桓等奏请设立四川矿务总局,办理四川矿务。次年4月(三月),清廷正式批准设立四川矿务总局,以云南候补道韩铎、记名道员李征庸办理。所有开办矿务章程,即由韩李等拟定奏报。

戊戌变法失败,刘光第、杨锐英勇就义

1898年9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杨秀深、康广仁等六位维新派志士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

早在9月上旬(七月下旬),戊戌变法运动进入高潮。由于言路大开,全国官民上书言事者,日以数百件计。9月11日(七月二十六日),湖南举人曾廉上疏,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并罗织罪名,指康梁为叛逆。光绪帝阅后交谭嗣同逐条批驳,谭嗣同痛加批驳后表示:“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也毅然提笔联署:“臣光第亦请先坐罪”^①。后来,康有为在《六哀诗》中写道:“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署奏拒鹰鹫,心感报无所。”^② 这诗表达了他对刘光第等大义凛然行为的深切怀念。

9月13日(七月二十八日),光绪执意改革政体,前往颐和园请求慈禧

① 《戊戌政变记》第105页。

② 《康有为诗文选》第257页。

太后允许开懋勤殿议论新政,慈禧严厉拒绝。

9月14日(七月二十九日)晨,光绪帝召杨锐进宫,密商保全之策,并授密诏一封,要求维新派速定变计。密诏说:“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进用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虽由朕岂随时几谏,而慈意甚坚。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圣母谓已太过,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能及,若必强以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进此英勇通达之人,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封奏以闻,候朕审择施行,不胜焦虑之至!”^①杨锐读密诏后,为保全维新大局,提出他的策略主张,当即复奏,言皇太后专权皇帝应遇事将顺,不宜固执己见,申说新政应分阶段逐步推行,并劝皇上进退大臣不宜太骤。

9月下旬(八月上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除新政,捕杀维新派人士,9月28日(八月十三日)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杨秀深、康广仁英勇就义。

四川制订百货土药厘金定章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

月),四川制订通省百货土税厘各局抽厘定章。川省被课厘金货物,共分15类,各类分项共计894项。其中川药材分项最详,计242项。绸缎等次之。牙角羽毛等类又次之。

厘金抽收机关,省城设总局,总理全省厘务,并经营四门厘金及簇桥丝厘,全省共设厘局16处。

据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所报告的各省岁入表记载,光绪年间,四川每年厘金收入为514,946两,据《四川财政说明书》载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川省各局厘金收数为657,000余两。

川省改铸八分铜钱

1898年12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川省护督文光,遵照清廷谕令,将制钱每枚重一钱改为重八分,于甲申全卯额开始改铸。由于铜斤虽减而钱数实增,因而实际铜料、工本并未减少,未能达到清廷要求节省开销的目的。从前川省铸钱,每年卯额共用铜铅160万斤,除折耗外,实净用铜铅145万余斤,以原铸每文一钱二分计,共应铸钱194133串333文。癸未全卯改铸一钱,共铸得钱232960串,较之原额实多钱38826串667文。除例支工料外,实加增工料钱5243串434文。又甲申全卯改铸八分,共铸钱291200串,较原额实多铸97066串

^①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9页。

667文,除例支工料外,实加增工料钱13108串586文。川省年来米贵钱荒,工费大涨,与多铸轻质铜钱,增加工料开销有直接关系。

四川试办武备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廷谕令各省开设武备学堂,培养新军人才。署四川总督恭寿,派员赴湖北采取武备学堂章程,回川试办。当年四川即延聘中外教习,招选正额、备额学生,设立讲堂、操场,开始试办。学生专习测绘、舆地、数学、枪炮、营垒等科目,还教练洋操。学生经短期培养后,挑选技艺精熟者,随时分拨各营。每年经费银约24000~25000两。

外国探险家、地理、矿产学者来川考察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瑞典人凡尔赛至川滇接壤之金沙江区域考察。

同年11月(十月),外国人赖特由印度政府派遣,随戴维斯入滇,在探察滇缅铁路路线工作中,赖特主持测量方面的工作。1899年11月(光绪二十五年十月),赖特再次入滇,原计划再向西探测伊洛瓦底江源地,因藏人阻挠,乃向北经巴塘、里塘至打箭炉(康定),再经雅安至成都,取道水路经重庆东下,于1900年7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抵上海。赖特调查行程先后共

计8000里,由德钦经巴塘、打箭炉以迄雅安,沿途亦均经细心测量,获得极其宝贵的地理资料。

1898年12月13日(十一月初一日),外国人亚孟特荪由打箭炉出发,穿过木里土司区域,经永宁中甸,渡金沙江,经丽江至大理,折而向东,由永仁以东再渡金沙江,溯安宁河而上,经西昌,过彝族区,于1899年4月18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九日)仍返抵打箭炉。亚孟特荪沿途均作有路线图,尤注重西昌彝族人民生活状况。

1898~1899年(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五年),法国采矿工程师勒克莱,奉法国殖民部之命,由越南进入中国,在那拉菁(现名宝鼎煤矿)煤田考察矿产资源。1909年(光绪二十七年)出版了《东京湾附近的地质和矿的研究》一书。

四川机器局加紧生产枪械弹药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根据清廷攘外安内的战略计划,川督继续加强四川机器局生产能力。1898~1899两年间,四川机器局支用经费17.99万两,其主要产品及修理项目有:修理机器395种,水龙42座,筹饷局军装所并各营旧洋枪9790杆,续成机器141种,马梯呢枪1500杆,快利枪5杆,蜀利抬枪1720杆,前膛枪550杆,马梯呢药弹51040000颗,蜀利抬枪药弹760120颗,前膛铜火帽923000颗,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四川经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毛织物	英国羽纱	1090 匹		
		毛呢	4928 匹		
		宽面呢	5144 匹		
		西班牙条纹呢	2463 匹		
		俄国绒布	646 匹		
		意大利绒布素面呢和起花的	8986 匹		
入	棉纺织品	洋纱	170034 担		
		衫料、灰色、素面	399346 匹		
		衫料、白色	43331 匹		
		爱尔兰白布	7500 匹		
		英、美国斜纹布	12721 匹		
		英国被单料	19593 匹		
		印花布和沙发布	3120 匹		
		染色棉布、素面	6800 匹		
		土耳其红布	8730 匹		
		棉绒布素面的与印花的	36324 匹		
		意大利棉布、素面的与印花的	4203 匹		
洋货总值				7967012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出	土 产	麝香	46677 两	584629	
		白蜡	9979 担	848243	
		药材		582467	
		大黄	9839 担	166775	
		五倍子	7806 担	128799	
		猪鬃	5174 担	100586	
		羊毛	19108 担	15095	
		亚铅	3808 担		
		白铅	5890 担		
		麻	9967 担	70765	
		蚕丝	12824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6075 担		
		云南鸦片	1455 担		
土产总值				3693510	
输出 贸易总值				17428200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

外商在川办矿未果

1899 年 2 月(光绪二十五年正月),法商俞德乐与中国保富公司总办(该公司为四川矿务总局所设)徐麟光在成都签订《中法矿务章程》,组成福安公司,合办四川煤铁各矿,开采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川、重庆等地的矿产,资金为 1000 万两,华、洋商民各占五成。但福安公司未进行开采即告解散,法商投资协议自行结束。

1899 年 4 月 14 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五日)英国开东公司代表摩根与四川矿务总局设立的华益公司(成立于 1898 年)代表李征庸签订《四川矿务华洋合办公司》,设立华洋合办“会同公司”,开采四川全省矿藏。该公司因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而中止。1907 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取消摩根所立章程。

1899 年 11 月 29 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保富公司召集洋商

合办金矿。法国领事哈士向四川总督奎俊提出,由法商和华商筹集股金1000万两(华洋各半),合办天全、懋功(小金)两处五金矿产,名曰“福成公司”。后因义和团运动发生,该计划中止。

英国舰船直航重庆

1899年5月7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英国炮艇“山鸡”号及“山莺”号抵达重庆,受到重庆军政官员的欢迎。上行途中,“山莺”号遇险,

经抢修始获重航。

6月20日(五月十三日)英商浦安公司第一艘商轮“先行”号(载重310吨,马力1000匹)自宜昌启航,经7天时间抵达重庆。在航行途中,在叶滩浪翻了二只中国民船,淹死船员1名。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四川经由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毛织物	英国羽纱	2530 匹		
		毛呢	2730 匹		
		宽面呢	8412 匹		
		西班牙条纹呢	3485 匹		
		俄国绒布	550 匹		
		意大利绒布素面呢和起花的	11543 匹		
入	棉纺织品	洋纱	325192 担		渝平银 0.810 两 海关平银 0.755 两 海关平银每两值制钱 1326 文
		衫料、灰色、素面	525012 匹		
		衫料、白色	158874 匹		
		爱尔兰白布	20428 匹		
		英、美国斜纹布	8714 匹		
		英国被单料	49094 匹		
		印花布和沙发布	4279 匹		
		染色棉布、素面	14737 匹		
		土耳其红布	14919 匹		
		棉绒布素面的与印花的	59451 匹		
		意大利棉布、素面的与印花的	79414 匹		
洋货总值			13075176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出	土 产	麝香	42127 两	711683	
		白蜡	17193 担	825277	
		药材		668453	
		大黄	8090 担	155324	
		五倍子	12700 担	212091	
		猪鬃	6289	120663	
		羊毛	7018	50531	
		亚铅	8502 担		
		白铅	7473 担		
		麻	9824 担	66800	
		蚕丝	12651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12827 担		
		云南鸦片	2832 担		
土产总值				4610822	
输出入 贸易总值				25792677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

英地质学者雅克赴川西调查矿产

1900 年 1 月 4 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英国地质学者雅克应英商之请,赴川西调查矿产。从上海出发,溯江至重庆,陆路赴成都,考察东陵子铜矿,北游松潘草地,再由绵阳、

平武、松潘、灌县返回成都,后由此去雅安考察矿区,再南行至丽江入滇。

傅樵村创办图书局和《启蒙通俗报》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春,简阳县人傅樵村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创办图

书局,出版书籍,代办京沪各报,还设立两处阅报公所,陈列图书、报刊,供人浏览,是为成都最早的通俗图书馆。同年,傅樵村同算学馆总教习苏星舫创办《算学报》,用木刻印刷,因销路不好,出版两期后停办。

鉴于当时民众文化水平不高,报纸又是新事物,人们尚无看报习惯,傅樵村乃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创办《启蒙通俗报》,该报初用木板印刷,1903年傅氏从日本购置设备,开始用铅字排版,机器印刷,这是成都第一家用机器排印的报刊。

四川旱、雹灾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入春以来,四川旱灾、雹灾频仍。广安州春耕时无雨,秋播时大旱,水井枯竭,渠江断流可涉。剑州连年大旱,越西大旱。4月5日(三月初六日),半夜,涪江西北部南北两岸毗连80~90里,雷雨交作,风雹骤至,大者如砖,小者如卵,摧折树木,打毁房屋十分之八九;胡豆、小麦颗粒无收,轻者仅收一二成。

本年全省大小麦因灾歉收共达五府、三州、一县。宁远府(西昌)仅三分有余,汶川县仅四分,重庆、保宁(阆中)、顺庆(南充)、绥定(达县)和资州、西阳二州仅四分有余,忠州与叙永厅只有五分收成。

李征庸为四川矿务商务大臣

1900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四川总督奎俊奏请以三品卿衔李征庸为四川矿务商务大臣,以候选道陈光弼会办四川矿务商务,清廷下谕允准。

英肇通商轮再航川江

1900年5月16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英商立德订制的肇通商轮自宜昌西上,于5月24日(六月二十日)抵达重庆,为时九日,实际行轮仅73小时,途中经波涛汹涌的泄滩,绞断钢绳两根,挣扎三日半之久并浪翻小船二只,始得通过。

肇通商轮系立德以英商杨子贸易商会名义,付款8万元,在沪克来得厂订造。轮长180英尺,宽30英尺,高6英尺,装置明车车轮,直径14.6英尺,马力1000匹,时速14里,吨数331吨,载货150吨。

英商立德自固陵轮西上被阻,利川轮试航成功,这是第三次航行川江,也是通过川江,抵达重庆的第一只外国商轮。

四川参加东南互保联盟

1900年6月26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当京津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上海道余联源等,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谈,明确提出防止义和团运动

扩大到长江流域和外国军队进入长江内地,避免中外发生冲突的《东南保护约款》九条^①。在刘坤一、张之洞的倡议下,山东、广东、广西、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的督抚,先后参加了这一“互保”。

1900年7月19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成都将军绰哈布、四川总督奎俊接受刘坤一、张之洞的建议,正式参加“东南互保”,并布告全川说:“川省系长江上游,自当一律办理。……各国官商教堂及游寓洋人之在中国者,自应按照无论何国,一体保护。”^②

川省调兵五营接济京师防务

1900年7月17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奎俊遵旨抽调练军五营,兼程北上,接济京师防务。早在6月17日(五月二十一日),清廷即谕令各省督抚酌派营队来京,听候调遣。奎俊奏报清廷,四川留防各军,迭经裁撤,仅余防军15营。他到任后,陆续增募改练添设威远练军15营,共计30营。全省“地段绵长,途险杂、界连数省、地控夷巢、处处分防,兵力实在单薄。……盖以人心浮动,

伏莽滋多。本年各属复苦旱荒,谣米价腾贵,饥民载道,实在堪虞。北信遥传,讹言四起。诚恐奸徒煽惑,酿为乱阶。……区区三十营之兵,已属不敷分布。”^③他虑及到京师为根本之地,势处危难。因此抽调各队五营,派委提督丁鸿臣统带,于7月25日(六月二十九日)起程,取道荆襄。星夜兼程,北上赴防。

四川义和团活动初起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夏,四川受北方义和团运动影响,一度平息的反洋教斗争重新高涨,秘密会党的活动趋于公开化。四川总督奎俊奏报清廷说:“近则贫民愈众,教民日多,人心亦觉浮动,咽匪、枭匪、散练游勇之外,又有平会、成会、江湖会、孝义会等名目,成群结党,劫夺为生,无业游民遍地皆是,掳抢之案,层见迭出。”^④当北方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时,四川地区“北信谣传,讹言四起”^⑤,开始酝酿驱逐外国教士的巨大风暴。

1900年7月初(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大邑县县民罗文榜举起“顺清灭洋”旗帜,操拳练武,远近来聚者数千人。7月9日(六月十三日),罗文榜率

① 《愚斋存稿》卷36,页11—12。

② 《巴县档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29~330。

④ 《清档·赤批奏折》农民运动类100分号,光绪二十五年川督奎俊折。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30,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众捣毁教堂,惩罚教民,“屯聚寨栅”,以拒官兵。12日(十六日),奎俊派遣官兵镇压,罗文榜被害。

7月10日(六月十四日),蒲江县人民响应大邑人民反抗斗争,捣毁该县教堂。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雅州名山县武举庞世琪聚众数千人扎营天王寺,声称假道嘉定(乐山),北上“勤王”,焚劫教堂,驱逐教士,惩治教民,造成“合邑惶骇”。奎俊命雅州府出兵镇压,知府李念兹采用剿抚兼用策略,瓦解了大部分反教群众,少数群众坚持斗争10余昼夜,最后被血腥镇压。事后,赔偿教堂白银25000两,名山知县受到革职处分。

7月(六月),丹棱县任春、古老五等率众焚毁英、法两国教堂,驱逐教士,县令肖寿琪镇压了这次活动,任春、古老五被杀。

7月31日(七月六日),自流井反教群众首领陈敬斋、王黑棒率众捣毁豆芽湾、两口塘二处教堂,并砸烂部分教民的房舍,家具。教堂杨司铎逃往富顺县衙避难,并要求知县镇压自流井反教群众。富顺县知县王润田派兵捕获了陈敬斋和王黑棒,将他们游街示众,站笼处死,并向教会赔款5000钏。王润田将镇压反教事由和严禁打教告谕立碑于教堂,以示警戒。

8~9月(七至八月),成都附近群众成群结队,自称“保国团”,到处打击外国教会势力。

从大邑县唐场人民反洋教以后,邛州、崇庆、温江、郫县、灌县、双流、崇宁、天全、南部、汶川、彭县、梁山(今梁平)、大足、永川、名山、蒲江、丹棱、犍为、荣县、宜宾、富顺、眉山等23个州县均发生反洋教事件,仅双流等八州县被毁教民房屋即达500余家之多,邛州尚不在内。各处法国教堂、经堂、医馆、书馆以及教民房屋多被焚毁。

为了尽快消灭全省义和团武装起义,同年8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川东道向四川总督献策说:“此等匪徒,夜集晓散”,应当严密辑拿。规定凡发生教案的地方,不仅州县官要“听候查办”,而且要分摊赔款,“其坐视不救之团保,将来亦由该道府查明,分成赔偿”;士兵若能擒斩其“肇事首犯”,每名“赏银五十两”^①。

四川增兵五营,驰赴山西保驾

1900年9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四川总督奎俊接上海探电,八国联军攻陷津京后,慈禧太后仓惶逃往西安,奎俊与成都将军绰哈布商议,在四川防军中再抽调五营(其中旗兵一营),由署贵州提督夏毓秀统带,星夜北上,驰赴山西保驾布防。

^① 《巴县档案》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重庆府呈四川总督奎俊”。

奎俊暂署成都将军

1900年10月28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清廷谕令成都将军绰哈布调任黑龙江将军,四川总督奎俊暂署成都将军。

立德遂火柴厂开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渝商周坤培借英商名义,在重庆开设立德遂火柴厂,自称华洋合办,雇工数百人,“所出之货,较聚昌、森昌两厂尤佳。”后因聚昌、森昌两厂根据它们有火柴制造专利权具控官府,四川总督奎俊“飭川东道严加惩处”,巴县知县下令将立德遂厂取缔(1901年并入森昌)。但是,这一处置并未能保护聚昌、森昌两厂的火柴制造专利权,新的投资者将继续采取租赁洋商牌号或迳与洋商合资经营的手法,来对付森昌两厂的火柴专利。如1903年巴县秀才杨海珊租赁德商牌号在重庆设立火柴厂。1904年,日本人竹川与江津卞小吾在重庆设立东华火柴公司。1905年,重庆商人租用德国商牌,设立惠利公司,制造火柴。与此同时,华商以“森昌只能专利于川东”为理由,向官方申请在泸州、叙府、成都等地设厂,从而使火柴企业在四川各地兴办起来。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日商有邻公司在重庆王家沱开设自来火厂,资本额为4万两,年产火柴4000箱。

为与森昌等华资企业竞争,有邻公司大力改良制造技术,由东洋运到印刷机印制火柴盒牌号,其装潢较森昌火柴更为美观。

德瑞生商轮触礁沉没

1900年12月27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德商瑞记洋行定造于里克马公司的商轮瑞祥号(长210尺,吃水6.6呎),早晨7点由宜昌起航西行,搭客数十人,除华人外,尚有外国人34人,中午11点航至崆岭险滩,触礁沉没,船主溺毙,华人死者甚众。这是长江上游沉没的第一艘外国商轮。

四川出现兴开办实业热潮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自重庆开关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四川开办商矿各业开始形成热潮。

四川商务,自白蜡公司开办以来,杜绝行户抑价,奸贩搀假等弊,商民称便。洋烛公司所制洋烛,颇能合用。成都车务公司,开始制造东洋快轮手车(人力车)。

四川矿业方面,1894年(光绪二十年),重庆巨商“凑集七百股,约30万元,准备开采川西各矿”,但是“此款尚不足举办,拟派员至申,另招商股”,采矿所需“抽水机器及冶炼大炉拟自日本购买,并拟延聘日本矿师指导采

冶各工”^①。1899年9月(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巴县举人文国恩等筹集股金11400两,设立四合公司(全称“南岸矿务四合公司”),从1900年起,专办煤矿,兼淘沙金。1900年,渝商傅裕章呈禀商局,请将广安、涪州、南川等处煤炭制造焦炭,转运出口。经商局批准开办,因机器未到实际上未开办。1899—1900年(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重庆巨商李耀庭在蓬溪县试办石油矿,“有天顺祥商人自备本银,设立顺昌公司,在该处开挖油井,数年之间,颇有成效,惟于矿学有限,致所开之井,或数日而枯竭,或逐日而减少”。因此,“该公司业已派人前赴日本考察煤油矿学,俟考查归来再行督饬推广。”^②

在制造业方面,亦有若干重要企业开办。1897年10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重庆总商会杨全盛开办重庆玻璃公司,该公司“发卖各色货物,价值极高,各铺因该公司有垄断之权,势不能不买”。1901年(光绪

二十七年),出现“消(销)场阻滞,折本颇巨”的局面^③,于是各商纷纷要求政府撤销该公司。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重庆教渝郭祖桓、禀生彭雨潭、职业傅毓璋、潘鸿清等呈禀四川商务总局,要求在重庆试办电灯。由于商局和巴县政府相互推诿,此事遂寝。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渝商印用卿独资创办吉厚祥布厂,拥有木机24台,所织布“用五福商标”^④。1900年,富顺县举人泸州学正孙荣、职员傅英芝、文生何光祖、监生张柱臣、抱禀徐贵等,为“维工商而挽利权”,在重庆成立纺织公社,制造新式木机,次年又在重庆设立裕原织巾厂,“仿造洋葛巾经纬匀净,毛绉齐整,货高价廉,各商争购”。^⑤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四川经由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65页。

② 《东方杂志》一卷八号,实业,页127。

③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页1154。

④ 《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4页。

⑤ 《孙荣等创制新式木质纺织机呈请给以专利设立公司禀文》,《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页70~72。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入	毛织物	英国羽纱	2176 匹		
		毛呢	2391 匹		
		宽面呢	7864 匹		
		西班牙条纹呢	1776 匹		
		意大利绒布 素面与起花的	10655 匹		
	棉纺织品	洋纱	285902 匹		渝平银 0.815 两 海关平银 0.760 两 海关平银每两值制 钱 1316 文
		衫料、灰色、素面	498060 匹		
		衫料、白色	40445 匹		
		爱尔兰白布	12392 匹		
		美、英斜纹布	3497 匹		
		英国被单料	44015 匹		
		印花布和纱发布	1776 匹		
		染色棉布、素面	13515 匹		
		土耳其红布	17786 匹		
		棉绒布素面的与印 花的	93771 匹		
		意大利棉布、素面 与印花的	91900 匹		
洋货 总值				12918073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出	土产	麝香	31866 两	537732	
		白蜡	9296 担	483388	
		药材		477078	
		大黄	6514 担	117247	
		五倍子	9381 担	160408	
		猪鬃	9264 担	158213	
		羊毛	13401 担	93804	
		亚铅	5144 担		
		白铅	1569 担		
		麻	3038 担	19444	
		蚕丝	13832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7710 担		
		云南鸦片	4827 担		
土货 总值				3398008	
输出入 贸易总值				24453058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

四川镇压义和团运动

1901 年 8 月(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四川布政使颁布了一道严厉镇压命令,飭各属遇“匪徒打教而又聚众抗

官拒捕,不能不以兵加之,照例格杀勿论”。并一再颁布严禁习拳告示,告诫所属州县“妥为办理”。

同年 9 月 2 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江津县李市场民周益三在

场操习神拳，观者如堵，官吏以向民众传授“神拳”罪，将周益三“送案收禁”。

同年9月30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夜，四川綦江与贵州桐梓接壤的青羊场发生神拳打教事件。先是，该地杨瀛峰、封百川等人向群众传习神拳，由陈泽普、杨连章、庄奠模、封百川、万银安五人分任训练，每人各教数棚，每棚11人，共有18棚，未成丁者居多。神拳首领杨瀛峰、封百川等决定惩罚教士和新场保正肖际云，遂会同老场保正陈秀俊等数百人，焚毁肖际云屋宇、耶稣教士王济安闻信早逸，肖际云越墙逃走。神拳复聚万二坡，以抗官兵。一时“风声鹤唳惊扰数邑”，正安、仁怀、南川、巴县，谣传喧嚷，摇动邻封。川东道密饬所属，“一体严防”，并约集川黔两省大兵围剿，陈秀俊自首入狱，奎俊以“传习邪教，诱胁团众”罪，杀陈秀俊于巴县，封百川等人亦被捕，永远监禁。

清廷惩罚对义和团镇压不力官员

1901年8月19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清廷诏令惩罚上年义和团运动中对外国教士、教民、教堂保护不力地方官，四川地区获咎官员如下：

名山县知县卢鼎智：革职。邛州（邛崃）知州李常需：革职，永不叙用。

建昌（西昌）道王季寅：革职留任。雅州府知府李念兹：同上。署雅州府知府王之同：同上。叙州（宜宾）府知府文焕：撤任。宜宾县知县王殿甲：同上。灌县知县王瑚：同上。双流县知县龚宝琅：同上。崇庆州知州陈兆棠：开缺离省。崇宁县知县陈鼎勋：同上。南部县知县袁用斌：同上。大足县知县赵绥之：同上。郫县知县黄树勋：停委二年。温江县知县周庆壬：同上。

清廷废书院，兴学校

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清廷谕令将全国书院停废，改办新式学堂。谕旨说：“人才为庶政之本，作育人才，首在修明学术。…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鲜实，今欲痛除此病；自非敬教勤学，无由感发振兴。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场改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使心术端正，文行交修，深通时务，讲求实济^①，使其成为新政可用之才。”

同年10月21日（九月十日），四川泸州率先由泸州知府沈案堃和周善培商同在籍内阁中书高楷废川南经纬堂书院，改办经纬学堂。

^① 《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第一册，页1；并参阅《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乙未。

日本在四川新设立租界

1901年9月2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根据中日《马关条约》中日本在中国境内享有租界特权的规定,日本驻渝领事畸桂和川东道宝棻在重庆订立《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其主要内容有:

(一)在重庆府城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设立日本专管租界;

(二)租界内警察之权、管辖道路之权及其余界内一切施政事宜,悉归日本领事馆管理;

(三)租界内所有地基,由中国地方官向地主收买,照章交与日本商民永远承租;

(四)租界内修码头后,凡在码头停泊,揽载界内货物船只,由日本领事馆随时酌定章程,每次应捐若干,以充租界公费;

(五)租界内的土地,只准日本商民承租执业;华人在租界内,只准居住营业,不能在界内租地;

(六)中国人民在界内违犯章程,中国地方官所派官员与日本领事馆所派官员,会同审判。倘中国审判官定讞或有不符,应由日本领事官照会重庆关监督复审。

据此条约,日本在重庆南岸王家沱设立了租界,占地面积达143080坪。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起,日本商民陆续承租了土地,先后有有邻

公司、大阪洋行、又新丝厂、武林洋行、日本军舰集会所、日清公司等租界内设立。

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在重庆城内强索租借地,在重庆领事巷后面,有一片高地名打枪坝,系全城制高点。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由川东道贺元彬与重庆关英籍税务司华特森订立了《永租打枪坝约》,将此地永远租给重庆海关,作为历任税务司公所,允其自行建造,中国不得干涉。

辛丑条约赔款,四川摊派220万两

1901年9月28日(光绪二十七年己酉),户部奏报清廷《辛丑条约》(即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丧权辱国条约)议定赔款总数为45000万两,分39年还本付息,总共本利银98223.815万两。前数年,每年付本利银1882.95万两,嗣后,按年递加,每年2000余万两至3000余万两不等。四川摊派第一期(庚子)培款每年220万两,分12次解交海关转付,每月应解银18.333万两,又补关平银3012两。

四川总督奎俊为筹措庚子赔款,决定增收契税10余万两,加征肉厘20余万两(每肉一斤,加抽二文),并再度削减各局、各防营支款,每年可节省银数万两,共可筹集60~70万两。不敷之数,加派亩捐,烟酒糖厘。四川

当局奏准在原派捐输之外,按年加派亩捐银100万两,名新捐输。再加抽川省烟酒糖厘各三成,春茶亦加三成,均按向章加入累计。

四川派遣首批官费留学生出国

1901年10月(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四川派遣首批官费留学生抵达日本,进入成城学校普通科学习。

上年,川督奎俊与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商定,由四川选派省城书院和中西学堂中聪颖谨厚,年龄在20以内学生22名赴日本国立公学分习武备、政治等专业,每名每年由川省供给学费和零用银200两,学习时间限为3年。当年8月(七月),奎俊将此事奏报清廷,拟于9月(八月)派遣留学生东渡,由候补知府李立元送往日本学堂。在日本期间,由中国驻日公使派员照料,学成期满回国,应回川省供职。其中,客籍生必须在川省服务5年以上,方得它去。清廷批准这一计划后,四川按预定日程派遣了这批留日学生。

首批留日学生22名,后补充2名,共24名,在成城学校预习半年后,分配各专门学堂深造。这批学生中,本省学生只占11名,其中有巴县胡景伊、陈崇功、双流周道刚、华阳徐孝刚、

成都张天培、简州毛席丰等;客籍学生占13名。以后,这一情况稍有改变。

同年,四川机器局派遣赴美留学生23人,其中有尚不具启蒙程度的机器局的工匠。在留学生路经湖北时,这一情况被湖北巡抚端方察觉,下令将不识字的数名人员暂留湖北,使其识字,再定去向。端方希望四川当道者及早另派聪颖子弟出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英人柯尔斯入川测绘地形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历任英国驻华领事馆译员及领事等职的柯尔斯来川旅行,沿途测绘路线和经纬度。此后,他曾多次来川进行地形测绘活动。

英法军舰进入川江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英炮舰乌德科号航行宜宾、嘉定,英兵舰金沙号开赴宜宾,法国炮舰奥立号自宜昌到达重庆,法兵舰阿纳利号和大江号亦进入川江。

外国在川传教会

1901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据中外教会档案资料统计,外国教会在川情况如下表:

教 派	设立 时期	传教士 人数		信徒约数	医院药房救济院等数目
		男	女		
巴黎外方 布道会	1753	124		信徒 93623	教堂 221 所, 学校 425 所 医院 10 所, 药房 180 所
美以美会	1881	11	14	陪餐生 313 学生 609	医院 2 所 药房 3 所
伦敦传教会	1887	5	3	陪餐生 160 皈依者 720	医院 1 所, 药房 4 所
加拿大监理会	1892	8	15	信徒 60	医院 3 所, 药房 3 所 孤儿院 1 所
友谊会	1886	8	10	会员 27 皈依者 70	药房 2 所 学校 3 所
英国教会联合会	1894	15	17	会员 40 愿受洗 者 30	
美国浸礼会	1890	7	6	信徒 100 皈依者 760	医院 1 所, 学校 2 所
中国内地会	1874	30	40	信徒 2000 皈依者 3000	医院 2 所, 学校 30 所, 救济 院 1 所
圣书公会	1879	1	1	华籍卖书人 13	

成都开设邮政局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 大清邮政总局开设成都邮政局于小什字路口(今暑袜北一街), 由英国人钮满氏、中国人杨少荃、傅樵邨经办。成都邮政局为副总局, 管辖川西北区邮政业务, 递送省内外和国际邮件。最初, 图书局代办分局, 报章、地图、新书赖以输入。

重庆开设镪水公司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 川商尹尊三在重庆集资创办镪水(硝酸、硫酸、盐酸合计, 又称“王水”)公司, 仿照外国制造技术生产镪水, 申请专利 29 年。

四川冬春大旱

1901 年冬~1902 年春(光绪二十七年冬至二十八年春), 四川久旱无雨, 以川东北广安州、巴县最严重, 冬春连续大旱, 胡麦菜蔬, 枯槁委地, 清明时节, 田土龟裂; 到栽秧时因缺水栽插不到十分之三。春荒加剧, “米价陡贵, 石米涨至十金以外”。到 6~7 月, “省城穷民食大户者, 每处聚集二、三千人。拉人勒赎之事, 省内亦复时有所见。川西、川南移家入城者, 纷纷在道。”^① 在“米价奇昂、饥民载道”的情况下, 川省“上下官吏不议赈恤, 而盗贼之患日甚一日”。

^①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高枬奏四川乱象已成特简重臣补救折》, 《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

同年4月(三月),南充、西充、岳池三县又遭风暴、冰雹袭击,死伤达300余人,树木、房屋倒拔,禾麦、牲畜的损失难以数计。

郑寿全逝世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著名中医学大家郑寿全逝世。

郑寿全,字安钦,邛崃县人。生于1804年,卒于1901年,终年97岁。行

医成都。崇尚仲景六经方药,擅长温扶阳气,善用姜、桂、附等热性药,被誉为“火神派”首领。晚年授徒,代有传人。著有《伤寒恒解》、《医法圆通》、《医理真传》等书,刊行于世。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四川经由重庆海关输入洋货、输出土货分类数量、价值统计如下表: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毛织物	英国羽纱	360 匹		
		毛呢	2835 匹		
		宽面呢	7630 匹		
		俄国绒布	524 匹		
		西班牙条纹呢	4171 匹		
		意大利绒布	10655 匹		
		素面的和起花的			
	棉纺制品	洋纱	243467 担		
		衫料、灰色、素面	322519 匹		
		衫料、白色	52109 匹		
		爱尔兰白布	14891 匹		
		美、英国斜纹布	18987 匹		
		英国被单料	30159 匹		
		印花布、沙发布	2115 匹		
		染色棉布、素面	12163 匹		
		土耳其红布	11348 匹		
		棉绒布素面的与印花的	64735 匹		
		意大利棉布、素面与印花的	105340 匹		
洋货 总值				12598741	

项目	货 物 名 称		数 量	价 值 (海关两)	制钱(千文)与海关 平银(两)比价
	总 类	分 类			
输 出	土货	麝香	46342 两	842845	
		白蜡	10356 担	498344	
		药材		662538	
		大黄	5760 担	132469	
		五倍子	9287 担	167170	
		猪鬃	8070 担	159812	
		羊毛	16824 担	242542	
		亚铅	8124 担		
		白铅	784 担		
		麻	12594 担	74303	
		蚕丝	18369 担		
	土产鸦片	四川鸦片	12266 担		
		云南鸦片	3761 担		
土货 总值				4837178	
输出 贸易总值				24269050	

本年度,常年进出重庆港各种船只 20000 艘,载货 50 万吨。重庆现有棉花、棉纱、食盐、纸张、酒类、食糖、丝

绸、书籍、纽扣、杂货等行帮公所 12 所,在进出口贸易中有重要作用。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

张森楷创办四川蚕桑公社

1902 年 3 月(光绪二十八年二

月),四川合州著名学者张森楷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激于爱国热情,在家乡创办四川蚕桑公社。张森楷亲自拟定

了作为新式企业的12条章程,包括招股、筹款、购器、种桑、养蚕等经营管理和科学养殖技艺的具体办法。为了在全川范围推广种桑养蚕技艺,他开办了四川民立蚕桑中学堂,并亲往日本考察蚕桑事业。张森楷在四川各地推广的“鲁桑”,一名“湖桑”,是由浙江海宁、石门等处购回培植成功的。

四川蚕桑公社初招股银15000两,续招股银10000两,迄止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所招股银仅及原定金额六分之一,不敷开支。张森楷稟请地方当局,改归官办,川督拒不接办,并严饬张森楷限期归还所欠公款。张森楷受到公私债务逼迫,又受知州杨体仁追逼,“以侵蚀罪,请暂革刑讯”,蚕桑公社因此走入绝境。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张森楷仿照日本丝厂方式,开办经纬丝厂,招收男女工和学生共数百人,从事生产和教学活动。

四川发生特大旱灾

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春夏,四川发生特大旱灾,史称“壬寅大旱”。全川大部分地区从4月(三月)到7月(六月)未下过雨。受灾范围遍及全川,主要灾区集中于川中、川西人口稠密的产粮地区。南充等处24州县,简州等37州县春雨愆期,夏收无着,雅安

先旱后涝,严重歉收;龙安(平武),马边等府遭受水灾、雹灾,大小春告歉。各地灾区米价暴涨三倍,或斗米1500文、2000文不等。全川遭受旱灾地区达七八十个州县,每处饥民离乡乞讨者至少以5000计之,共有数十万之多。饥民载道,死者枕籍。

清廷谕令度支部拨银30万两,予以赈济。稍后,川督岑春煊又奏请广开捐纳封典荣衔,按二成四上兑,得银30余万两,从省外购进小麦办理平糶,灾情稍有缓解。

春旱以后,水灾、夏旱、雹灾交相侵袭,受灾面积达到90余个州县,饥民数千万人,难以存活。少数量的赈款和远道购运的赈粮,又受到地方官吏局绅多方侵吞,杯水车薪,无法缓解饥民的困境。因此,各地人口死亡数量剧增。据《蓬溪县志》记载:“辛(丑)壬(寅)冬春之交,县民无所得食,扶老携幼,迁徙他乡,转死道途者,已难胜计。其不能去者,或男女相守,僵于牖下,或骨肉并命,惨填沟壑;或将尽之喘,卖及妻儿,以图一饱;或一家之长先杀其属,后乃自裁。市廛寥落,闾巷无烟,徒死之余,子遗无几。”^①

裁撤尊经书院,开办高等学堂

1902年6月(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川省遵照清廷1901年9月14日

^① 《蓬溪近志》卷11,“匪灾篇、前篇”。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有关整顿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开办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的上谕,将尊经书院裁撤,于成都创办四川省高等学堂(初称通省大学堂)。这是在八国联军侵略之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川省高等学堂经费,原经川督等筹定46000余两,因东洋留学生经费亦在此项内开支,实归学堂支用者,约计不足四万两。该校由川督岑春煊奏准任命翰林院编修胡峻为总理(即校长)。不久,由“该编修带领教习前往东洋考察学校”。胡在日数月,将日本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学科程级“无不洞悉本原,毕贯条理”。回川后,便将日本教育经验参酌办理,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春正式开学。学堂开办于尊经书院旧舍,可招学生500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改任按察使冯煦为总理,邛州知州方旭为提调,“以华洋教员讲授现代科学——化学、物理、外文等。”该校历年的外籍教员有:日本人池永太六、进来重松、三木清二、小里伊人、田和喜八郎、过信一、吉田义静、野口信、新觉田二、平野、犬岛居弃二、秩父固太郎、野村茂、志贺、山水早水、平野,英国人史弥德、华林泰,美国人霍夫曼、卜伦,丹麦人蓝尔生。为扩充规模,又新修部分校舍。因川省各府县刚设中学尚无毕业生,因此高等学堂最初招收秀才、廪生等入学,开办普通甲、

乙、丙班和优级师范若干班,课程设置方面,考虑到这些学生已具备文史根底,主要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科目,同时开设外语、外国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等科目。此外,课程中开始有体育内容,当时称“体操”。稍后,各州县中学有了毕业班,就开始招收正科,按日本大学预科设文史政法专业一班,理工专业一班,以后不断增加招生数额。

席卷全川的义和团武装斗争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秋,北方义和拳运动失败后,“邪拳匪党,潜窜各处,渐次入蜀,乘便煽惑”,四川义和团反清反教斗争进入高潮,全川各属均有神拳红灯教等活动,数十州县发生了义和团武装反抗活动,资阳、金堂、安岳、嘉定、重庆等地是义和团主要活动区域。金堂县廖九妹领导的神拳反抗斗争,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

当时,金堂县民女廖九妹(人称廖观音)、曾阿义(人称曾罗汉)联络成都各郊县团民起事,毁耶稣教堂一所,杀教士一名,教民4名。华阳县知县率官兵拿办,屡为团民所败。廖九妹、曾阿义乘胜联络简阳、彭山、温江、郫县、崇庆、灌县各路义和团,对成都形成包围之势。廖九妹等于7月(五月底)在石板滩大败官兵后,联络各路团民万余人进攻城郊龙潭寺。省城官绅闻讯,一片惊惶,按察使陈璘亲率官兵迎战,

使用新式武器杀伤团兵,加之新都、雅安官兵声援,义和团未能获胜。廖观音率部退走金堂,拆毁金堂县属教堂,杀教民数名。唐顺之与之配合,率金堂义和团向广汉方向移动,扎营清江镇火盆山,奎俊调记名总兵孙烈全专门“剿办”金堂团众。

8月初(六月底),汉州(广汉)知州高维寅率练勇百余人进取清江镇,为义和团所败。义和团乘机捣毁苏家山、土堆瓦两处教堂,杀黄神父和教民千余人。但清江镇火盆山终于被陈璠督师攻陷,义和团大败,廖九妹等退守淮口。

资阳李刚中以反洋教为号召起义,率800人进攻县城。为响应李刚中起义,8月中(七月初),资阳义团首领凌天顺、曾洪春等率各路团众抗击官军,杀参将陈比龙。9月初(八月初),义和团猛攻资阳县城受挫,转移县东金瓶庵、枕头寺活动。知州王明德调兵歼击,凌天顺和团众数百人被害,余众突围失败。

9月初(八月初),射洪县义和团首领税玉堂与三台县义和团首领徐机匠联合攻占射洪县太和镇,焚毁教堂,搜杀教民,广招流亡,编立营棚,势力扩张至二、三千人。

9月中旬,川西各县义和团风起云涌。9月14日(八月十三日),义和团小股由成都西郊到达青羊宫,由南门入城,战败靖川营清兵,直扑走马

街,全城官坤惊惶失措,川督奎俊急欲逃跑,护卫闭辕门不敢出署。按察使陈璠出督署,突遇义和团,弃轿夺马奔命。由于城守清军闻讯齐集走马街,枪炮轰击,义和团自南门败走。省城自9月16日(八月十五日)至20日(十九日)昼夜关闭。法国军官胡尔君率洋兵一队驻扎汉口(今彭山县双江镇),得到成都洋人遇难警报,立即开赴成都。直至21日(二十日)洋兵入城后,始许行人出入。省城内外戒严,日捕数人至数十人,不论真伪,一律处决。

9月中旬(八月中旬),新任川督岑春煊发布对义和团的剿抚报告,宣布了整顿军纪,严查内奸,惩办首恶,宽大胁从的各项措施,对蔓延全川的义和团武装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廖观音、曾阿义、唐顺之先后在简阳被捕,在成都遇难。

奎俊获咎解职,岑春煊继任川督

1902年8月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四川总督奎俊受到掌山东道监察御史高枬、福建道监察御史王乃征严章弹劾,被解除总督职务;同时,岑春煊由山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改署四川总督。

同年7月5日(六月二十三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高枬、福建道监察御史奏章称:四川乱象已成,局势危如累卵。四川盗贼、饥民、会党、义和拳,分之为四,合之为—,其势力蔓延全

川。奎俊无法控制局势,却谎报军情,粉饰太平。最初,当川南长宁、兴文、永宁(叙永)、纳溪、江安等县“盗贼”纵横、大案迭起时,奎俊隐瞒不报。当资阳、安岳打教事起,杀教士、毁教堂戕教民,劫署围城,奎俊已不能补救,造成全局骚然,省城一带,“邪拳”、“盗贼”公行,城门为之昼闭。

奏折称:四川上年冬、今年春皆干旱无雨,栽插不到十分之二。四、五月虽有小雨,不能补栽,米价陡贵,石米十金以上。奎俊却谎报“雨水调匀,粮价平稳”。五、六月间,省城贫民吃大户成风,每处聚集二、三千人;拉人绑票也时有发生;川西、川南乡绅纷纷移居城内。奎俊却谎报“人心大定”。

奏折说,川省吏治极端腐败,是局势糜烂的根本原因。奎俊昏聩无能,又偏信成都知府、贪得无厌的阿麟和昏庸无能的藩司(布政使)吴凤林,互相利用,狼狈为奸,造成全川大乱。

清廷为补救川省危局,作出了上述撤换川督的决定。

法商和成公司在川开办

1902年9月29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商雷达利投资200万两白银,创办和成公司,与四川保富公司在成都签订开采巴县、万县油矿章程。规定中法股本各占一半。

该章程使用四川矿务总局关防,分呈统辖铁路矿务总局、外务部衙门、

户部衙门及四川总督部堂、布政使各衙备案,但因四川社会动荡,保路运动发生,和成公司未进行开采即解散。

四川选派举贡生员出洋游学

1902年10月(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四川学政吴郁生奏请清廷,由四川各属就地筹款,选派举贡生员出洋游学。

全省每年游学举贡生员名额,初定为10名,学以3年为期,前者毕业,后者继往,专取举贡生员,志趣纯正,中学已优者,由学政选定,再由游学公会绅董出具切结,方予批准。按年给费。在外洋期间,由中国使臣照料。如出洋后不知自爱,行止乖谬,由学臣查确撤回,分别革惩。其学成取得凭照回籍者,经学部统一考验奖励,但应先在本省充教习3年,由学政考验合格者,再行发送外务部候选。

四川新设学务处,兴办各类学堂

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川督岑春煊设立四川学务处。他说:“人才者国家之元气,学校者教育之根源。……若不建设总汇之所,则是非无定,责成不一”,因此成立学务处,以督办全川学堂事宜。

岑春煊委任道员张鸣岐为学务处督办,其主要职责是:分立职司,揀用妥员,筹款经费,编定章程,购运学堂用品和派员巡查各属学堂等。学务处

暂设督署内,由布政使司每月拨给白银 200 两,以资办公。

1903 年,锡良接任川督后,委任邛州知州方旭提调学务,后又派按察使冯煦任学务处总理,主持全省学务。学务处建立后,便严饬各道、府、厅、州、县赶办学堂,届期上报,随时调查检验,记功司过。若有阻挠延宕的绅士,“必加惩办”。如 1905 年,锡良给办学有功的知州、知县记功的,计有简

州、什邡等 15 个州县,对办学延宕的知州、知县记过的,计有郫县、绵州等 11 个州县。

由于川省当局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兴办新式学堂,于是,在 20 世纪头 10 年间,川省出现了一个兴学热潮,到 1910 年达到高峰,该年全省学堂 11387 所,学生 441738 人。兹将历年设立学堂数、学生数、教员数列表如下:

年 代	学校数	在校学生数	教员数	备 注
1902	2	140		其中师范 1,中学 1
1903	28	1550		其中师范 1,中学 4,高等小学 13,两等小学 5,初等小学 5
1904	150	6308		其中中学 8
1905	4361	73219		其中师范 2,师范传习所 110,中学 8,高等小学 152,初等小学 4017,两等小学 38,半日学堂 34
1906	4897	145876		
1907	7775	242782	12824	其中优级师范 1,初级师范 28,中学 48,小学 7629,女学堂 69
1908	8700 余	277700 余	11724	仅是初小数,其它不详
1909	8762	268382	13072	其中高等小学 221,两等小学 360,初等小学 8022,半日学堂 1590
1910	11387	441738	15291	其中男学堂 11224,女学堂 163

四川兴办新式印刷企业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泸州绅

商集资 5000 两,创办开智书局,购置日本大阪生产的 3 号铅印机 1 部,3 号、5 号铸字铜模各 1 付。开智书局经营 3 年,营业亏损,机器设备盘售于劝学所中学校、川南师范学校。

同年,开县人李某创办文伦书局,始立于开县,印有李本方编写的《蒙学十种》。次年春迁成都三道会馆(金玉街),7 月 14 日(闰五月二十日)曾代印《蜀报》旬刊创刊号,并印行《新政应试必读》6 卷。文伦书局使用新式手摇铅印机器设备,是成都早期铅印企业之一。

丰裕、溥利火柴企业开业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由尹焕庭筹办,投资 1 万元,于重庆开设丰裕火柴厂,生产硫磺响火火柴,商标“佛挑”、“鹰钟”,每月最高产量 150 箱,销售重庆、江北、遂宁、涪陵、长寿、忠州、江津、丰都、万县,雇工 440 人,其中男工 240 人,女工 200 人。

同年,泸州创设溥利火柴公司,城厢妇孺以此为生者达数百人。

重庆开办昌华(振兴)毛葛巾公司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重庆世合商号掌柜白汉周仿效欧美各国开办制造业,随带工匠 2 人至日本专攻织造毛巾工艺,工匠于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学成归国,并携带织毛巾机抵渝,照样制造 20 余架,开设昌华公司。

精工织造,货色同东西洋无异,畅销获利,外洋毛巾受到抵制,一时无人贩运到重庆。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昌华公司改为振华公司,为控制毛葛巾市场,振华厂于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拟订《渝北毛葛巾帮会议章程帮规》,报巴县政府批准立案。

伤寒流行遂宁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遂宁城乡伤寒流行,死亡逾千人。

彭县开办铜矿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商人魏子书经四川总督获准,出资自办彭县大宝山铜矿。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锡良以魏子书“办理不善”为由,将铜矿收归官办,划归商矿局管辖。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又改隶造币厂。仍沿土法冶炼,未收效果。1909 年(宣统元年)设彭县铜矿局,四川总督赵尔巽任命日本矿业专科学校毕业回国的孙海寰为局长,主办铜矿。1910 年(宣统二年),铜矿隶劝业道。孙海寰会同劝业道改良采炼技术,借拨官款银四万两,用新法采冶,添设冶炼设备厂房,延聘日本技工、管理人员共五人,招募矿工千余人,每月出矿百余万斤。并在县属白水河设“冶炼厂”,先后置备“鼓风反射真吹冶炼炉,每月可出精铜三万斤”。产铜主要供造币和军工之用。

三台县裨农丝厂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陈开沚创建裨农丝厂于三台县。先是,陈开沚“佃富家之业,种桑饲蚕。……即获大利,遂于万安寺建设裨农丝厂”。建厂之初,有直缫意大利式木机丝车12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新修厂房,增添60部(丝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新建蚕室4间,并添新车40部。1909年(宣统元年),添修茧库及缫丝工厂,添车140部,雇工数百人。

陈开沚,字宛溪,号愚溪,1855年(咸丰五年)生,晚清秀才。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潜心蚕桑研究和新式缫丝技艺,曾著《裨农最要》、《蚕桑浅说》、《劝桑说》等,后在三台、乐山县分别建立丝厂,所创蚕桑实业,对四川近代工业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改计岸商运盐为官运盐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为筹措新军经费,在丁宝桢办理边岸(滇黔销区)、楚岸(两湖销区)和边、楚计岸(川省靠近云、贵的销区和湖北例食川盐的销区)的基础上,又将一直是商运商销的成都、华阳、温江、新繁、彭县、崇宁(今郫县境)、郫县、灌县、金堂、新都、崇庆、新津、双流、汶川、理番(今理县)、广安、邻水、岳池、达县、东乡(今宣汉县)、渠县、大

竹、太平(今万源县)、垫江、眉州(今眉山)、彭山、青神、邛州(今邛崃县)、大邑、蒲江、仁寿、雅安、荣经、营山、天全、清溪(今汉源县)、峨眉、夹江等38州县计岸水陆盐引32922张,照滇黔官运办法改为官运。官方垄断川盐运销范围进一步扩大后,税课利润猛增,岁入正杂各款高达银630余万两,比清中叶高5倍左右,超过田赋,跃居清末财政收入首位。

英商立德创办普济公司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由英商立德与四川保富公司总办严岚昌订立合约,由英商投资1000万两,创办普济公司,在乐山等8州县开采煤、铁、石油等,经营期限50年,后又与四川全省煤矿煤油公司合办,资本定为300万两,中英各半。

因四川红灯教武装暴动不断发生,四川社会动荡,英商无法如期履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以后,四川商民收回利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导致1911年(宣统三年)保路运动的发生,普济公司开办四川矿业的协议终于废弃。

四川成立“天脚会”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谕令全国妇女解放小脚,今后亦不得再缠小脚。四川总督岑春煊、锡良先后刊颁白话图册,遍谕民间,要求妇女“一

律全放不缠”,脱离苦海,永免残废。

省城内女学生及开明家庭女眷均已放脚。而成都缠脚之风,虽经官绅提倡劝导,尚未见实行。成都各界于1904年成立天脚会,英人立德之妻及启尔德之妻在玉龙街龚氏蓬园举行大型讲演会,号召妇女放脚。

重庆各界亦广泛宣传放脚,四品卿衔、直隶州同知、举人梅际郇等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发起设立天脚渝会,制定会章,上下联络,推广天脚。梅际郇认为:“强国莫先于强种,欲种之强,必使传种之女子形完神定,……我国缠脚之风,久成锢害,始于五季之末世,而后遂遍于寰区,驯至民族不竞,以为女界之玷。”

较早成立天脚会的州县还有:大足、威远、涪州等。

1909年10月(宣统元年九月),四川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上,议员提出并通过了“劝戒缠脚办法”的提案,使妇女免除缠脚的要求获得了法律保证。

黄吉安创作川剧历史剧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时任警察传习所总办的周善培,在川推行新政,改良戏曲,特聘川剧剧作家黄吉安到“戏曲改良公所”专门创作和整理剧本。从此黄吉安的创作活动进入高潮,他的一些剧作开始陆续刊行。

黄吉安,成都人,著名川剧剧作

家,生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卒于1924年。他一生创作的川剧剧本有80余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被川剧界尊称为“黄本”。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反对愚昧迷信的《邛水投巫》,有感于清末禁止鸦片而写的《断双枪》,为讴歌妇女权力而作的《女探母》、《木兰从军》、《缙蓉救父》、梁红玉击鼓《战金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宣传妇女放脚而写的《凌云步》,讽刺统治者卖国投降昏庸腐朽而写的《春陵台》、《闹齐宫》、《闹齐庭》、《江油关》。黄吉安的剧作特别重视歌颂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和英雄人物,借以启示、教育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挽祖国厄运而奋斗。其中有写伍子胥的《渡芦》,写屈原的《忠烈国》,写项羽的《九里山》,写荆轲的《大闹秦庭》,写岳飞的《朱仙镇》,写诸葛瞻的《绵竹关》,写张飞的《怒鞭督邮》,写虎门焚烟的《林则徐》,写文天祥、陆秀夫、张士杰的《柴市节》、《三尽忠》等。在这些脍炙人口的剧本中,黄吉安以其如椽之笔为观众塑造了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众多英雄形象,对弘扬民族文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经由重庆海关输入洋货价值16042212海关两,出口货值8639092海关两,外贸总值24681304海关两。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四川设劝工总局

1903年2月4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川督岑春煊奏准设立四川劝工总局,作为全省推行实业的总机构。劝工总局有新建房屋120余间,共分为四厂所:一曰工艺厂,专门加工精制四川工艺品,扩充四川工艺品生产;二曰副厂,专门收容穷民、游民,教以寻常存活工艺。其宗旨为教养穷游民;三曰迁善所,专门拘留轻罪人犯,督促其从事粗浅工艺,使其弃莠从良;四曰养病院,专门疗养本局病者。

劝工总局拥有储货、发货、售货、陈列货品房舍,此外还有工棚、食堂、盥洗之所,共可容纳800人,每年开支经费银6900余两,每年轮番教养学徒及改造罪犯约2400人。

劝工总局总办为沈秉堃,订有章程七章。劝工总局拟先开办迁善所、副厂,同时由沈秉堃选派灵巧工匠赴日本、欧美学习工艺及购办机器数种,回川即开办工艺厂。

此后,全省各州县先后设立劝工局、习艺所、工艺局、化学实验所等机构70余处,专门收容教养无业游民、

孤独童叟、残疾人等。内设纺、织、染有关科目50余处,生产品种繁多的棉织、丝织、刺绣、漆器、皮革、肥皂、火柴、印刷等工艺、文化日用品。

郑孝胥办理四川商矿事宜

1903年2月(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川督岑春煊上奏清廷,请派大员来川办理四川商务、矿务(原商务矿务总办李征庸卒于任)。清廷诏令江苏候补道郑孝胥发往四川,随同川督办理四川商务、矿务。

各地义和团重起,锡良督兵剿办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初,大足、安岳义和团“重兴”,屡与官兵交锋,不分胜负。金堂义和团首领李石匠、李洪兴拥众2000余人,约定阴历三月初在老关山聚集起事。后被岑春煊察觉,立即派出重兵驻扎该处,事未成。5月(四月),岑春煊调赴两广总督任;9月(8月),锡良接任四川总督,义和团和各地“仇教”群众不断起事,或设棚传授“神拳”,或群起“吃大户”。清廷严谕川督:“川省盗匪复炽,……著锡良体察情形,妥筹办理。”^①

^①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

锡良接任后,整饬军纪,撤换官吏,并重新整顿各地团练,重建保甲联环组织控制全省居民;然后督率各路官军进攻义和团重要据点,采取“歼厥渠魁,胁从罔治”^①的分化瓦解策略,前后攻破营寨10余处,击毙首领300~400名,俘获70~80名。义和团的大规模活动至此基本结束。

锡良为表彰镇压义和团有功人员,还向清廷专折保奏了一批官绅,由清廷论功奖恤。

川省平定瞻对阿坝里寺叛乱

1903年4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瞻对首领品初朗吉带领僧众,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支持下,驻扎阿坝里寺等处,号召数百名喇嘛制造分裂活动,凭借险要地势,反对土司、官府。驻打箭炉委员刘廷恕驰电密告川督锡良,锡良饬令刘廷恕带领官兵于5月27日(五月一日)由炉出关,星夜抵达里塘,准备平叛。

阿坝里寺周长3里,寺垒重叠,殿高5层,围墙安设棚门垛口,枪眼凌空排列,围攻甚难,刘廷恕等分兵5处,占据麻里堆等重要地势后,以招降书射入寺内,劝其投诚悔悟。招抚无效,官兵轮流攻击,昼夜不停。6月10日(五月十五日),攻破大招寺,品初朗吉及其兄洛桑朗吉率叛乱势力突围逃

跑,被官兵捕杀。

锡良署四川总督

1903年4月18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锡良由福建总督(未任)调署四川总督。前任总督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由四川布政使陈璠护督。9月(八月),锡良到任。12月(冬月),实授四川总督。

开办警察总局

1903年4月(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省城开办警察总局。这是清末新政的一项措施。先是1902年,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遵照清廷筹办地方警察的谕令,在省城成都创办通省警务学堂,聘任曾赴日本考察过警政的周善培为教习,训练首批警官,为川省警政之始。1903年4月,直辖于四川总督的警察总局在成都帘官公所街原保甲局旧址正式成立,委候补道李光觐为总办,但凡章程、布署等皆出自周善培之手。总办之下设会办、参谋、总巡、提调、稽核等官。总局管辖范围仅限于省城内及城外附近街道,在东、西、南、北、中和外东六路各设正局1所;正局之下设分局,共设40个分局。全局官佐、长警及夫役800余人,后增至1200余人。1905年清廷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政,警察总局遂改称通省警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页752—754,中华书局1985年版。

察总局,掌管全省警政,兼管省城警务。时值锡良任四川总督,对警政极为重视,乃委周善培为通省警察总局总办。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遵照清廷诏令,裁撤成绵龙茂兵备道,改设四川通省巡警道,综理全省警政,改通省警察总局为警务公所,专管省城警务。警察总局期间(1903~1907年),四川144个厅州县中,有108个相继开办警察,设立巡警局,共配置巡警5060人。

《广益丛报》创刊

1903年4月(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广益丛报》在重庆创刊。该报刊是由朱蕴章、杨庶堪等人创办的,属于文摘性质,在荟萃全国新书报的基础上,选择精辟论述和重要新闻汇编成册,定期出版,由广益丛报馆编辑发行,每旬出一册,刊登文章范围广泛,论著、新闻报导、诗词、小品等,只要能“树新风,振民气”的作品,无不刊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进步报刊。此刊自创刊后,一直持续到1912年(民国元年),每年出30册,最后一期是289号。在100号以前,省内外设代派处有40处,出到186号时,省内外代派处多达74处,一般发行量为2000册,成为全国性报刊而为中外瞩目。它发表了不少文章激烈抨击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直接或

间接地鼓吹反清革命,对封建的宗教迷信、虚伪礼教等进行揭露,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

《广益丛报》的发行,对推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在四川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四川新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

邹容《革命军》出版

1903年5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四川巴县人邹容撰写的革命宣言——《革命军》在上海大同书局印行。

《革命军》全文凡二万余字,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革命之原因,第三章革命之教育,第四章革命必清人种,第五章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结论。章太炎先生见而重之,为之作序。

《革命军》深刻揭露和批判了2000余年来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统治,深刻揭露了以满州贵族为代表的清王朝,将专制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紧密结合,变本加厉奴役和压榨中国人民的黑暗现实。明确提出,以西方启蒙思想为武器,以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楷模,进行一场以推翻清王朝,恢复自由、平等、人权为中心的社会大革命,建立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

《革命军》受历史局限,有大汉族主义倾向。在宣传反对满清专制统治

的同时,没有将满州贵族和广大满族人民相区别。

四川开铸铜元

1903年7月(光绪二十九年六月),遵照清廷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有关沿江沿海各省仿广东、湖北铸行铜元的上谕,四川在成都机器局内,就宝川局原铸制钱机具和铸料存铜,试铸当五、当十、当二十铜元,设柜兑换,行销甚利。次年,川督锡良奏准立案,并由藩盐两库及各署局、银号等,借银100万两,委员在湖北采购洋铜、印花机等,增加铸数。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日铸铜元达30万枚,铜元厂事繁任重,遂于机器局划分,另立帐目正式设立铜元局。至清朝结束,川厂共铸各类铜元77559万余枚,折合制钱885万余钊,省内各地铜元已取代制钱流通。

锡良奏准自办川汉铁路

1903年7月11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七日),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川汉铁路由商民自办,以抵制外国蓄谋争夺川汉铁路主权的图谋。锡良提出,商办川汉铁路采取股份公司办法,先设公司,妥订章程,招集华股,为国家开辟利源,同时也维护铁路主权。清廷批准了锡良的奏折,谕令设立川汉铁路公司。

卞薰回川鼓动民主革命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夏,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卞薰由上海回到重庆。他向杨庶堪、朱之洪、朱蕴章等革命党人介绍了北京、上海等地的革命形势和邹容、章太炎等人对四川同志的殷切期望。为了推动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卞薰还将他变卖部分家产在上海购得的《革命军》、《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革命书籍数百册秘密运回重庆,广为散发,对鼓动群众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卞薰,字小吾,四川江津人,生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其家为江津大姓,书香门第。卞薰自幼聪明好学,县学考试屡获优等,但不喜八股试帖,遍求经世致用之学;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感染,力主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在上海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立志反清。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受革命同志嘱托,回川联络同志,鼓动革命。

西昌阿什支彝族起事

1903年7、8月(光绪二十九年五、六月),西昌县阿什支彝族起事,“焚掠府州城外西昌县属黄连坡、马家村等处。”后又“纠大股千余人”,袭击小麻柳、合龙场等处。清军出动镇压,

“阵亡六十余人”。^①

川省水灾、火灾、时疫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夏秋暴雨,嘉陵江、岷江、沱江猛涨,成都、绥定(达县)、重庆、嘉定(乐山)等5府、18州县先后发生水灾。成都平原大水,城内水深1米,庄稼全毁;嘉陵江泛滥,合州(合川)城被淹,城内水深2米多,顺庆(南充)城墙部分倒塌;重庆大江上涨30余米,许多地方被淹,溺死千人以上。

同年,泸州城内大火成灾,延烧竟夜,焚毁逾千户。

同年秋初,遂宁地区时疫大作,道路死尸横陈,有全家染疾不治者,死者数以百计,城乡谈疫色变,纷纷外迁。

四川创办新军

1903年9月(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锡良督川后,为加强镇压四川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奏准开办新军。先后从川军中挑选精锐1072名,组成中、前、左、右四营。1904年2月又募一营,作为后营,共五营。7月(六月),编成工程兵一队,后陆续扩充成营。新军称常备军,采用新式操练方法,并增加饷银,委任拔贡生陈宦统带。1905年7月(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川省共有常备军六营,工程兵一营,合计官兵

2583名。

1903年10月(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川督锡良将四川尚有的绿营37营并为30营,作为续备中、前、左、右、后、副6军,每军各5营,补充新式枪炮,改用新式操练方法,布防于省内要害腹心地带,称为巡防军,计:中军驻成都府属为中路;前军驻金堂、汉州(广汉)及保宁(阆中)、顺庆(南充)、潼川(三台)3府为北路;左军驻重庆府、酉阳州各属为东路;右军驻邛、眉两州及雅州府属、打箭炉为西路;后军驻泸、叙、资各府厅州属为南路;副五营专防越西、马边、雷波、峨边、屏山5厅县少数民族地区。

1903年冬(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川督锡良命建昌道赵尔丰督饬续备后军,在叙南六属血腥屠杀各族人民,破家被杀者数以千计。清廷以赵督剿有功,赏带头品顶戴。

1904年(光绪三十年)底,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统率续右军右营出打箭炉,办理屯防。次年春,巴塘教案发生,凤全被杀。清廷续派前军各营出关镇压,又派赵尔丰统带常备两营,新募四营,名曰续备新军前往协助,并留办善后。赵尔丰将凤全原统率右军右营改为续备新军后营。陆续出关的续备新军共约2500人,留关外屯扎未返。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史料》下册,页756。

四川银元获利

1903年12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川省银元局自1901年1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开铸,迄至本年12月(十一月)铸造龙元5种,共合龙大元2289434元,藏元(1903年开铸,每枚重3.2钱,含银75%)1037093元,除去银本、铜本,共得余利银124181两余,除去三局工薪开支,实得净利九七平漂铜65041两余。

由于银元质真价明,可与银锭兑换,银元局所铸银元,省会畅销,各地也逐渐通行。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各府州县纷纷来省购办银元。呈现畅旺之势。川督明令全省,自1904年(甲辰)起,丁粮、税厘、捐输一律完纳银元。

打箭炉升直隶厅

1903年12月,川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将打箭炉升为直隶厅。打箭炉为联系川藏之枢纽,而川边土司又不易控制,故锡良决定将打箭炉同知升为直隶厅,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理,除管理原辖关外土司外,还管辖巴、里塘粮官,沈边、冷边等土司及泸定桥巡检。同年清廷批准,敕部复议施行。

重庆新办毛巾、火柴厂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重庆杂

货帮集资创办重庆毛巾厂。该厂所制毛巾,与洋货无异,因此甚为畅销。

同年,巴县秀才杨海珊租用德国商牌在重庆南纪门外晒坎开办杨海珊火柴厂。

四川机器局改建为成都兵工厂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四川总督锡良将四川机器局扩大改为成都兵工厂,“以精制造”。在东门外数里,购地四百余亩筹建兵工厂,聘用德国工程师设计厂房,从德国蜀赫厂订购大批机器,还进口日产50支步枪的全套设备。全厂拥有一千多名生产工人;又选派学生40名赴德研究机械,以养成专门技术人材。还调精通制造的官员总其事,并于江南汉阳等地制造厂,遴选技师,及娴习工匠百数十人来厂从事武器制造。兵工厂不仅自造洋枪,同时兼造机关枪及当时各种新式大炮,并开始试制日本新式速射山炮。

川省举办师范教育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川督锡良通飭各州县设立师范传习所,规定“凡授徒者,皆须到所讲习”。为摆脱旧式书院陈习,适应近代学堂需要,锡良又令各州县集资选士,赴日本攻读师范速成科,“以明教授之法”^①。次年5月,全省一次就送160余人去日本学

^① 《锡良遗稿》第1册,页371。

习师范教育。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全省共开办师范传习所110所,当年7月,仅成都师范传习所就培育师资313名。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开办通省师范学堂,各州县保送学生360名,分简易、初级、公共、优级等班,培养中小学教员。同年9月,开办“四川优级师范选科学堂”,本科先后设理化、史地、数学和博物等班,为中学输送大批师资。

据清季学部统计: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四川共有优级师范学堂1所,教员28人,学生632人;共有初级师范学堂28所,教员109人,学生1722人。师范教育的蓬勃发展,为全省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川官报》创刊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不久,即将四川原有官书局改名“四川官报书局”,委派调往河南候补道陆钟岱创办《四川官报》,按旬出版,每月3本,分发各州县,散给四乡绅民购阅。

根据《四川官报书局详定章程》规定,《四川官报》内容包括:一、上谕,二、宫门抄,三、论说,四、紧要时事,五、省内新闻,六、奏折,七、公牍,八、辕门抄(牌示、告示附之),九、告白(来

函附之)。该报用上等大白纸印成,每张四篇,可以裁订成册。

锡良在给清廷奏请创办《四川官报》的疏言中说明了开办官报的意图:“四川地邻蛮徼,僻处西陲,水陆道途无不艰阻,各省报章书籍购寄为难,民情尤为隔绝。……人情风俗,内政外交均有关碍,尤非亟办官报不足以正视听而息浮言。”^①

《四川官报》是四川最早出现的反映全国全省情况的官办新闻旬报。

美国教会势力深入川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美国教会势力开始进入川边巴塘地区。不久,在川康地区建立了教堂,开办了学校、医院等文化事业。学校招收民族子弟,开设数、理、化、英文课程,并向学生灌输基督教教义。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并对贫困学生给以物质帮助。医院实行免费诊治,但在就诊前,要接受神甫布道。

德国人菲尔希纳率队到松潘考察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德国陆军中尉菲尔希纳率队来中国考察,考察目标主要是黄河的上游区。此考察队由汉口溯江而上逾秦岭到西安,再由西安经兰州至西宁,后由青海至松潘。沿途除作路线图外,还用三角测量

^① 《四川官报》甲辰冬月上旬第二十九册,“奏议”;九月中旬第二十四册,“广告”。

制图 46 幅,大部分为 1/75000,此外另有总图一幅。各图均极准确。黄河上游区之有详细准确的地图,应自菲氏之行开始。

法商代码德筹组华利公司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由法商代码德投资 30 万法朗与川省管解白蜡委员刘鹏私立合同,成立华利公司。在巫山、大宁(巫溪)、云阳、开县、万县等地开采金、铜、煤各矿。指地多处,由英、法领事为该商照转或请准办,或请立案。川督锡良以“不合定章,碍难准行”为由,未予批准。

“四川武备学堂”正式开办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川督岑春煊在成都正式建立“四川武备学堂”。本科分为步、马、炮、工、辎五种,学制 3 年。训练及管理,均仿日本,教习大多是日本人和留日士官生。到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共招生 270 余人。

同年,创设“官弁学堂”,选拔川省军队中 30 岁以内,略通文学者入学,学制一年,以“讲求战术,训练将才”为目的,对在职军人进行培训。

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成立“测绘学堂”,主要研习地形,制作军用地图,为军队培训参谋人员。首批招学生 50 名,1 年半毕业。学生分东、西、南、北四路测绘全省地形。同年,设“兵

备处研究所”,以专门研究军政形势为宗旨。

锡良奏设川省课吏馆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锡良奏准设立川省课吏馆。锡良奏称:川省仕途拥挤,吏治废颓,加以停捐之际,各班人员,纷至沓来,聚处省垣,一无所事相率习为游惰,志气日即萎靡。故设课吏馆,著将军、总督、两司等勤见僚属,访问公事,以覘其才识,并察其品行。其贤者量加委任,不必尽拘资格,其不堪造就者,即据实参劾咨回籍。其余候补同、道、州、县,年力富强,可资启迪者,挑选入馆肄业,按照章程,认真考课,以经世之学为宗主,以内政外交为分端。严行甄别,以期考核人才。

四川选派赴日本、欧美留学生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川督锡良选派各州县优秀生员 20 人,留学日本宏文师范学堂,学习师范专科。同时,不少自费生也东渡日本,学习师范、实业等专业,著名革命家吴玉章就是这一年与兄长到达日本的。

同年,川督锡良为扩充四川机器局,委候补道章世恩为总办,并令与候补通判祁祖彝选带委员、学生、工人等 20 名赴欧洲、美国学习机械制造和选购机器。

沈秉堃督办四川商务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绵龙茂道沈秉堃赴日本考察工商事宜,具知兴商要领。同年9月,四川总督锡良委令沈督办四川商矿总局及劝工局、会同原办员绅切实讲求,以期逐渐扩充,用收实效。

重庆成立“女学会”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重庆开风气之先,提倡“女学”,成立“女学会”。“女学会”决定在重庆城内设立“女学堂”,待“规模周备,经费充足”,再行推广。《重庆女学会章程》规定:“凡有关于女学之责任,如整齐学务,建立学堂,编书购器等事责,本会皆尽力肩担之。无论会内外诸友,有以女学事来询或托办有关女学之事,本会皆可代办。总期化无学之女为有学,无用之女为有用。”在未立女学堂时,先立女师范学堂,“以广师资而便学者”。^①

全川推行普通教育

1903年底(光绪二十九年冬月),川督锡良遵照清廷改书院为学校、“兴学育才”的上谕,按照张之洞等人制定的《学务纲要》,发文通飭全川府、厅、州、县立即着手兴办各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将办学情况列为官吏考核

的重要条件,若有“玩世固执之辈”,“无论官绅,定于严处,断不宽贷”。^②同时,川省采取切实措施,建立学务机构,造就师资,考察西学,延聘教习,广筹学款,严定奖惩,为推行普通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据统计,自1903年以来,四川普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普及率很高。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全省共有小学堂7629所,小学生233000余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有小学堂8700余所,小学生277000余人;1909年(宣统元年),有小学堂9700所,小学生328000余名。因受办学条件限制,中学比小学发展慢。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普通中学共计8所;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有中学48所,中学生5074人;1909年(宣统元年),有中学51所,中学生5828人。

从1909年(宣统元年)开始,对全川私塾进行改造,广泛设立“简易识字学塾”,据1911年统计,全川共有16300余塾,学生245000余人。

此外,川省还大力推行对贫苦家庭子弟的教育,全省遍设半日学堂,免费招收无力、无暇贫困家庭幼童入学,使他们获得从事农工商业的必备知识。

兹将光宣新政时期四川各府、厅、

^① 《广益丛报》第一年第九册,教育附录。

^② 《四川学报》乙巳第3册,公牍。

州、县,办学情况统计如下表^①:

地名	学校数	备 考	地名	学校数	备 考	地名	学校数	备 考
彭水	60		乐山	83	学生 2905 人	成都	31	1910 年统计
新都	53		大邑	49		潼南	35	
西昌	58	学生 2201 人	江津	279	学生 11244 人	金堂	80	
冕宁	33	学生 1740 人	长寿	100	学生 2822 人	仁寿	261	学生 6063 人
盐源	41	学生 1262 人	华阳	65		达县	103	学生 4158 人
会理	44	学生 1691 人	德阳	13		东乡	102	学生 2786 人
万源	12		蒲江	27	1909 年统计	秀山	56	1910 年统计
峨边	12	学生 284 人	永川	183	学生 4609 人	北川	43	
峨眉	91	学生 4256 人	荣昌	87	学生 3802 人	名山	46	
洪雅	40	1912 年统计	綦江	52	学生 1275 人	汶川	18	1910 年统计
夹江	87	学生 3219 人	南川	72	学生 2317 人	高县	26	学生 700 人
犍为	74	学生 3049 人	合州	193	学生 777 人	珙县	40	学生 900 余人
荣县	208	学生 3827 人	广安	52		新宁	106	学生 4834 人
威远	71	学生 3064 人	简州	80 90	1905 年统计	渠县	149	学生 3350 人
崇宁	24		苍溪	44		太平	34	学生 1055 人
越嶲	16	1909 年统计	阆中	107		巴县	200	1906 年统计
雅安	44	1909 年统计	涪州	567	学生 10022 人	广元	78	
新繁	21		铜梁	81	学生 3290 人	温江	52	1909 年统计
清溪	43	1909 年统计	大足	85		灌县	58	1909 年统计
芦山	21	1909 年统计	泸县	151	学生 4856 人	昭化	12	1909 年统计
天全	31	1909 年统计	纳溪	17	学生 598 人	巴州	100	1909 年统计

^① 参看阮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页 398—400。

地名	学校数	备 考	地名	学校数	备 考	地名	学校数	备 考
眉州	69	学生 2483 人	合江	280	学生 4695 人	剑州	61	1909 年统计
丹棱	23	学生 742 人	江安	80	学生 1560 人	南充	103	1909 年统计
彭山	41	学生 1485 人	安县	40		西充	127	1909 年统计
邛崃	69	学生 2267 人	什邡	60		蓬州	78	1909 年统计
荣经	53		崇庆	30	1905 年统计	营山	63	1909 年统计
汉源	80		郫县	50		仪陇	35	1909 年统计
里塘	16		富顺	161	学生 4086 人	邻水	61	1909 年统计
茂州	12	1909 年统计	彭县	87	学生 3097 人	岳池	62	1909 年统计
绵竹	134		资中	66	学生 2856 人	三台	50	1909 年统计
绵阳	90		资阳	118	学生 4662 人	射洪	86	1909 年统计
石泉	29	1910 年统计	井研	52	学生 1642 人	盐亭	160	1909 年统计
璧山	67	学生 3167 人	内江	101	学生 3190 人	中江	71	1909 年统计
定远	73	学生 2976 人	双流	35		遂宁	140	1909 年统计
巫山	36	学生 763 人	南江	16	1908 年统计	蓬溪	57	1909 年统计
万县	98	学生 2480 人	青神	33	1909 年统计	乐至	107	1909 年统计
大宁	128	学生 1962 人	江北	60	1909 年统计	安叙	157	1909 年统计
新津	48	1909 年统计	打箭炉	10		马边	15	1909 年统计
汉州	100	1909 年统计	奉节	52	1909 年统计	宜宾	118	1909 年统计
梓潼	87	1909 年统计	云阳	144	1909 年统计	庆符	17	1909 年统计
罗江	31	1909 年统计	开县	51	1909 年统计	南溪	26	1909 年统计
平武	34	1909 年统计	大竹	92	1909 年统计	筠连	21	1909 年统计
江油	69	1909 年统计	城口	22	1909 年统计	兴文	28	1909 年统计
彰明	53	1909 年统计	垫江	69	1909 年统计	隆昌	57	1909 年统计
松潘	12	1909 年统计	梁山	202	1909 年统计	雷波	8	1909 年统计
懋功	23	1909 年统计	黔江	45	1909 年统计	永宁	7	1909 年统计
古宋	40	学生 1061 人	南部	125	1909 年统计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经由重庆海关进口的洋货总值 20947902 海

关两,出口土货总值 8276796 海关两,四川对外贸易总值为 29224698 海关两。

1904年(光绪三十年)

重庆海关永租“打枪坝”

1904年1月15日(光绪二十九年冬月二十八日),经川督锡良札委川东道贺元彬与重庆海关英籍税务司华特森商谈,双方签订了《永租打枪坝约》。这个合约规定:“打枪坝”以每年 200 两白银的价格,租给重庆海关,作为将来重庆海关税务司公所,由税务司自行建造房屋,中国官府不得干涉。

“打枪坝”位于重庆旧城通远门内南侧的一块高地,原本重庆镇驻军的操场,间或在此举行实弹射击,故名。因此地雄踞市区,俯瞰长江,地位十分重要。由于紧邻领事巷,外国使节垂涎已久。1903年12月,在各国领事怂恿下,重庆海关英籍税务司华特森向中国政府提出永租“打枪坝”的正式要求,因此,有上述合约的订立。海关“永租打枪坝”,是外国势力利用手中特权,侵夺中国领土主权的又一证明。

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

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

成立。先是四川总督锡良于1903年7月向清政府报告,因外国蓄谋争夺川汉铁路主权,请求批准自办川汉铁路,设立公司,妥订章程,招集华股,“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清政府批准了锡良的报告。1904年初成立川汉铁路公司。初由川省委署藩台冯煦为督办,成绵龙茂道沈秉堃为会办,不久改任赵尔丰为督办。筹集资金数额很大,川汉铁路由汉口至成都全长 1980 公里,建筑费用需银 54 万两以上,四川工商业不发达,招集如此巨额股本实乃一大难事。为此,四川留日学生 300 余人在东京集会商讨办法,并于 1904 年 10 月上书锡良,提出“因粮摊认”和实行官商合办以保证股东权利的建议。锡良没有采纳官商合办的主张,但接受了“因粮摊认”的建议。

重庆川东商务局成立

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重庆成立川东商务局,以川东道为督办,委本地熟悉商务绅士为会办,专门整顿重庆商务,通达商情,兼理华洋交涉事务。

重庆绅商抵制英人立德获得江北厅属煤矿开采权

1904年4月(光绪三十五年五月),英人立德组织华英合办江北厅煤铁矿务有限公司,拟集股银50万两,与四川矿务总局签订《江北厅煤铁矿务合同》,取得江北厅属煤铁矿务开采权、土地租用权,在龙王洞建立5窑6厂,并取得轻便铁路修筑权,以50年为期限,这是英帝国主义掠夺四川矿产的一次重大事件。1907年,英方又要求将矿区扩展至石牛沟,铁路延伸四十余里,江北人民对英人肆意掠夺矿权行为极为愤慨。清政府迫于人民压力,同意收回自办。江北、巴县绅商杨朝杰等在官方支持下,为了收回矿权,于1908年初成立江合矿务公司,利用合同中所规定的:如有华商开办,华英公司不得再请开采的条款,抢先买下了石牛沟的矿山,以阻止英商扩张矿界。经过反复斗争,并通过中英两公司谈判协商,立德被迫同意将华英公司所有开矿权利及公司全部设施出售给江合公司,共作价银22万两。江合煤矿公司收买了华英公司矿区和设备后,又集资7万元,正式开采煤矿。该公司拥有大荒洞、乾龙洞、连湾、石牛沟等四厂,技术方面比较先进,又重金购买华英公司的各种机器、材料、窑厂房屋等,使江合公司生产条件得到了大大的补充,劳动生产条件远远高

于湖北、安徽等省矿区。收回江北厅煤矿的斗争,反映了川省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

改设炉霍屯务

1904年4月(光绪三十年八月)川督锡良为加强对打箭炉(康定)所属霍耳5土司(章谷、朱窝、麻书、孔撒、白利)的管理,仿照懋功(小金)分设五屯成案,在章谷特设屯员,派委候补州县接管,更名炉霍屯务,兼管朱窝、麻书、孔撒、白利及东谷等土司,仍隶打箭炉厅统辖。同时,升打箭炉厅为直隶厅。

整修都江堰

1904年(光绪三十年)夏,岷江发生洪水,都江堰外江水漫溢内江,九州县田亩几遭淹没。旋因水力迅猛,由人字堤冲裂数十丈,湃入外江,崇庆、温江、双流等县,全罹水灾,冲刷田庐无算。川督锡良查都江堰年久失修、坏损处较多,恐来年江水骤发,滋生大患,遂飭藩司许函度妥筹办法,并札成绵道沈秉堃督同署成都知府事增爵等,驰往各处,逐段勘查。查明内中外三江堰口堤埂,损坏淤塞约三四十处。锡良即飭各州县劝集捐款,分段承修。

四川发生“甲辰大旱”

1904年(光绪三十年)夏,四川全省遭受严重大旱,史称“甲辰大旱”。保宁(今阆中)、潼川(今三台)、顺庆(今

南充)、绥定(今达县)、重庆、夔州(今奉节)6府、资州(今资中)、泸州3州共60余州县持续大旱。

川督锡良奏报清廷说:本年春季,各地雨水不均,豆麦收成不好。不料从四月(5月)开始,正值播种水稻、红苕之际,上述川东北60余州县亢旱连月,田土拆裂、草木焦卷,已种的谷物萎败不结实,红苕连藤蔓也不长。大片田畴荒芜、干涸,出现赤地千里的惨象。乡民奔走10多里寻找饮水,农家往往连蔬菜、瓜果也吃不上,全家老小到了饿死的边沿。

与此同时,川西岷江、沱江洪水泛滥,崇庆、温江、双流等9州县“田亩几遭淹没,……冲刷田庐无算”。

“壬寅大旱”(1902年)后,川省元气尚未恢复,又遭上述旱洪大灾,全川性饥荒随之而来,“殍殣相望,闾市萧条,……老稚呼号,流亡渐起。”^①

道孚地震

1904年8月30日9时42分(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日酉时),道孚7级地震,震中烈度9度。道孚角洛汛一带,上至将军梁子,下至松林口约200里地带,居民房屋多被震倒。道孚街场倾圮80余家,死30余人;灵雀寺大殿倒塌,中殿偏斜,僧屋600余间倾圮500余间,压毙喇嘛100余人。孔色土

司官寨倾倒,压死头人、差民14人。麻孜土司居寨倒焚,死1人。角洛汛署倒塌,所管四乡压毙200余人。炉霍土司朽旧寨址侧裂。康定、丹巴、甘孜等地同时受震。

成都开办劝工外局

1904年9月(光绪三十年八月),省城劝工总局开办年余,大著成效,如官纱一项,历来行销四川者为江浙制品。现在局中所制质料轻细,色调鲜明,且较南来者价廉,合计织造各种纺织品:正厂制成47品,付厂19品,迁善所12品。最为畅销者为布匹、绢扇、毛巾。川督锡良奏准另设劝工外局(在钱法府署仪门左侧相祠内),共收学徒百余人,到年底已有学徒700余人。是年,川督锡良令劝工局延聘日本工匠8人入川教习,每人领学徒30名,“各传其艺,期年卒業”。1905年,锡良令选学徒20名,分送到日本各实业学堂学习。

重庆市民罢市、成都机器局工人罢工

1904年9月(光绪三十年),重庆全城罢市,反对捐税厘金等苛索。

同年,成都机器局兵工厂工人600余人,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举行罢工。工人上街游行示威,到总督衙门

^① 《锡良遗稿》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414、449。

请愿,总督锡良派员接受工人控诉。由于官方有意拖延,对工头不予处理,罢工持续16天之久。

《重庆日报》创刊发行

1904年10月(光绪三十年九月),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在重庆方家什字麦家院创刊发行。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卞薰是《重庆日报》的创办者。

《重庆日报》由江津人卞薰效法陈范出资接办《苏报》之举,将祖遗田产尽数变卖,得银6000余两,全部作为办报活动经费。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卞薰利用当时官府畏惧洋人的心理,聘请了日本进步人士竹川藤太郎为社长。担任编辑、采访工作的有肖九垓、燕梓材、周拱极等人。卞薰经常为该报写社论。

《重庆日报》创刊之初,发行量仅500份,到1905年5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已增加到3000份。该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抨击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行径,成为一个鼓吹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

《成都日报》创刊

1904年(光绪三十年)《四川官报》创刊以后,各地乐于购阅,销数颇多,但因刊期较长,不利于传播新闻和刊登广告,官报书局稟请创设《成都日报》,与《四川官报》(旬报)相辅并行,

经川督批准发行。

《成都日报》于1904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正式出刊,每日一出,篇幅不求过大,价值不求过昂,每纸收制钱五文,按月按年预定者量予减让。

《成都日报》开办宗旨是:“开辟商民风气,灵通中外新闻,但不议论官事、臧否人物”。

《成都日报》体例为:1、上谕,2、关门抄,3、论说(包括专揭代论、专件代论),4、紧要时事,5、省内新闻(附物价),6、省外新闻(藏事附之),7、外国新闻,8、辕抄(牌示、告示、批示附之),9、告白(来函附之)。

全省实业兴办情况

1904年(光绪三十年)四川全省兴办重要实业有:绵竹织布公司,由张小山兴办,为取得先进技术,他曾派其子前往日本学习织染专科,其子回籍后,即开办织布公司,并附设实业学堂,专织芝麻呢、槟榔布等,出货10余种,均能畅销。

重庆渝济公司,由重庆绅商开办,自出心裁,创造木机织造宽布,不用人力,梭机往来,纯用滑车。

资州罗泉井油矿,由王某、杨某合资开井取油,井深八、九十丈、所出之油,初只销售本地,近已开至10余井销行畅往。惟澄清不及洋油,尚须设法提炼。

富川、复原布厂分别于 1904 年(光绪三十年)和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由曾应之集股创办于重庆南岸呼归石和江北簸箕石。富川布厂开办时,有东洋机 30 台,辛亥后即停办,复原布厂开办时,有湖北机 50 台;1909 年(宣统元年),改为复新布厂,增机至 105 台,1913 年全厂停办。

1904 年(光绪三十年),由高少农投资兴建幼稚染织厂,厂址设于重庆南岸林觉寺,系由该寺庙充公而设,当时着急于教养平民。内设织布、缝纫、靴鞋等 18 种。织布方面始用木机,1928 年改用铁轮机。

1904 年(光绪三十年),卞聶创办了东华火柴厂,厂址设在重庆兜子背,资本 28000 元,专制硫磺火柴。

四川开征统捐

1904 年(光绪三十年),四川对烟、油、糖等土产品和百货实行捐厘合并征收办法,将上述商品厘捐免去,改征出产统税,统捐之名,即始于此。征收办法,以主要产品为对象,确定榷额。以糖为例,对川糖的征收税,以糖清为标准,每斤征税 4 文。凡桔糖、冰糖、片糖,未征糖清者,及外省输入之糖,一律折合糖清标准征收。以糖清转制白糖、桔糖者,计斤分摊、糖房、漏棚,各任其半。

清廷向四川摊派练饷、工程铁路经费

1904 年(光绪三十年),清廷向四川摊派白银 30 万两解往北京,充北洋练饷,又搜括白银 6 万两,充上海黄浦江工程经费,再拨云南铜本、铁路经费 5 万两。

劝学所和省学务调查所成立

1904 年(光绪三十年),为推进全省教育改革,各州县陆续成立劝学所,或就原学务局改建。全省共有 140 余州县成立了劝学所,各州县又划分若干学区,每区设劝学员。各地劝学所切实履行管理学务、普及教育的职责。如渠县劝学所下设编辑部,编译教科书,撰写乡土志;下设文报所,处理学务文牍报告;下设调查所,考察本县各乡区学务。达县劝学所将全县划分为 5 个学区,设劝学员 5 人,分区劝导各乡均设学董,谋求教育普及。

1904 年底,省学务调查所在成都设立。调查所负责考选各种教职人员入所讲习,以备派往各地调查学务。其任务是:复核、督办各地学务。所内设 5 科:预修科、审定科、收发科、录事科、庶务科。除督促办学外,调查所还负责印行教科书、审定各州县申报的学堂章程和登记出洋留学人员等。

重庆总商会成立

同年 10 月 18 日(九月十日),重

庆总商会宣布成立。先是清政府于1903年设置商部,商部设立后,为振兴商政,奏准在各地设立商会,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宜设立商务总会。”并特别要求重庆、天津、烟台、上海、汉口、广州、厦门等七个全国性商埠“均作为应设总商会之处”。川东道和川东商务局奉商部之令,会同重庆府、巴县知县传集各帮商人开会,经过酝酿,于1904年10月18日成立重庆总商会。总商会董事由匹头帮5人、药材帮2人、八个外省的客籍商帮首事8人组成。设总理、协理各1人。总理由重庆商界首富、票号天顺祥老板、分省补用知县李耀庭担任,协理由陕商杨怡担任。重庆总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微弱的四川资产阶级开始有了维护本阶级利益的近代化组织。如重庆总商会出版的机关报《重庆商会公报》,竭力鼓吹改良,支持清王朝的新政和立宪,反对洋商,保护民族工商业,均充分表达了四川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宝川局关闭

1904年(光绪三十年),布政使司冯煦奏请将宝川局正式裁撤,附入机器局,改铸铜元,局址改作劝工局。次年,川督锡良又奏请在宝川局旧址设立农政局。至此,历时172年的宝川局宣告结束。

四川宝川局创建于1733年(雍正十年),负担户部铸造制钱任务。初设

炉8座,后陆续增至40座,按照户部配额铸钱。四川配额在正常情况下,每年正配12卯,加铸4卯,带铸1~2卯,总计17~18卯,年用铜铅160余万斤。同治、光绪时,铜料短缺,制钱时铸时停。

四川推行实业教育

1904年(光绪三十年),为在川省推行新政、举办各类实业、振兴商务,全省出现开办实业学校热潮。本年度成都设立“工务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创办“艺徒学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农政总局在成都开办“中等农业学校”,以“课蚕桑实业为先务”。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四川学务处设立“中等工业学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川商务局创办“实业学堂”,作为“四川救贫起弱之基础”,根据川省资源状况设窑业、染织、采冶、理化等4科。1909年(宣统元年),创办“财政学堂”,以便培养财政通才,分设中等、高等和别科。同年,通省劝业道建立“劝业员养成所”,培训劝导实业人才。1910年(宣统二年),四川学务公所设立“实业教员讲习所”,教授农工商三项实业,培养各府、厅、州、县实业教员。同年,成立“四川商业讲习所”,造就商业专门人才。

此外,成都还开办了“商工实业学堂”、“机器局机器工业学堂”、“铁路学堂”,重庆开办了“联合县立中等商业

学校”，永川开办了“县立中等农业学校”，江油、遂宁、渠县、长寿、合川、荣县、宜宾、会理、南部、梁山、涪州、广汉也分别开办了县立实业学堂。

《崇实报》在重庆创刊

1904年(光绪三十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在重庆创办了《崇实报》。古洛东时任沙坪坝大修院院长，在兼办天主教会的圣家书局之后，发起创办了这分教会的报纸。

该报为周刊，每年出刊50号，由教会承担经费，通过教会系统发行，各地天主教堂代为零售。该报自1904年(光绪三十年)创刊到1933年(民国22年)停刊，延续29年，一直未中断，并能按时出刊，其印制质量居当时报刊上乘。

《崇实报》内容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政论(主要是对中国政治的评论)；二、新闻(国内外、省内外新闻)；三、宗教(宗教教义和教务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广告、渝旨恭录、社说、小言、时评、京师要闻、国外消息摘要、本埠新闻、渝埠见闻录、省抄、省内短简、西学、来函、重庆银元牌示等。辛亥革命以后，该报逐渐增加了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比例。该报在开通内地人民智识，传递新闻信息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设立英法文官办学堂

1904年(光绪三十年)，川督锡良鉴于川省缺乏谙悉英、法语言文字人才，遂于是年3月挪拨款项，在成都修建英文、法文官办学堂，归洋务局司道管理考选身家清白子弟入学，不分旗汉、本籍客籍及有无功名。初分英文、法文两个班，每班定额40名，遴选出洋历练之员两人，分任英、法文教习。

设立军医学堂

1904年(光绪三十年)，川督锡良在成都创办军医学堂，聘法国医士罗尚德充当教习，学生定额30名，各营选拔1人，毕业回归营。

四川出现留学热潮

1904年(光绪三十年)，随着清廷推行新政，教育改革和实业建设的迫切需要，全国留学日本、欧美学生数量激增，四川也出现留学热潮。据《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统计：迄至光绪三十年底，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80名。

由于四川预备留学日本学生人数众多，成都出现了官办和私立的留日预备学堂，为留学生补习日文和基础课程。

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四川奏报清廷，设立东文学堂，使留学生在出国前“肄习洋文，学期以

内,可徐察其性行,以为选派之地。”^①东文学堂设原中西学堂旧舍,延聘教习,考选举贡生员 60 名,于 11 月(十月)开学。

同年,成都教育家徐炯,热心新式教育,担任东文学堂监督后,又在中新街设立东游预备所,为打算留学日本的青年补习日文,免收学费。

同年,成都开办东游预备学堂于江南馆,为预备留学日本的学生服务。在堂学习的学生中,已有 14 人东渡日本。次年陆续出国者数十人,专攻农工实业。

同年 3 月(四月),鉴于川省筹办学堂,教习难得其人,管理学校也罕知其法,故川督锡良飭各州县选派优秀生 200 名赴日本学习师范、文理、博物等科,由周凤翔带队,其中 160 名专攻师范速成科。更多数量的自费生也先后出国。这次留学计划,是为了适应各地开办中小学堂,急需师资而制订的。日本方面专为中国开设宏文书院、速成师范科,专攻学校管理之法,八个月至一年毕业。官费生所需培训经费

4000 元(开办费及监督薪水各项公费),由学务处支付,另给每人 300 银元(按日币折合银 270 两)作为往来旅费和学杂食住之用。

同年 4 月(五月),川汉铁路总公司自行筹办铁路。川督锡良认为:勘路估工及一切修造管理之法,中国缺少专家,借用它国人才,终非长局,比利时擅长路矿工程,不如派遣留学生,专攻路矿工程,将来轨政不兴,不致有令材之虞。飭由总公司选送聪颖端谨官员士子 13 名,前往比利时学习,并派同知刘钟琳充任监督,带同学生出国。为发展四川机械制造业,另派道员章世恩率官员 20 名,赴欧美专习机器制造,后委直隶州知州杨兆龙充当监督,亦渡洋赴欧。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4 年(光绪三十年),经由重庆海关进口的洋货总值为 18454399 海关两,出口土货总值为 10952028 海关两,四川对外贸易总值为 29406427 海关两。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

犍为红灯教武装反抗

1905 年元月(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由于犍为县红灯教蔓延全境,犍

^① 《四川官报》1905 年 3 月第一册。

为县令李端概率兵丁前往县西南,对红灯教徒发起进攻,红灯教首领张老三率领信徒据屋抗拒,受伤被捕就义,其兄张潮淞被收监。

3月(二月),犍为红灯教准备数路发起对县城的进攻,李端概又派兵勇前往镇压,红灯教首领景海山等,于县西北部聚众一、二万人,进行反抗。李端概向省城告急,锡良增调兵力约10营驰援。

犍为红灯教起事,将各处洋学堂捣毁,击毙罗城场、舞云场等处学董、保正,全县官绅一片惊惶,城门为之关闭20余日。

4月13日(三月九日),红灯教在石板溪击毙靖川营炮艇管带史久豫等人,复败李端概,获练丁10余人,杀以祭旗。

4月14日(三月十日),又败朱登五营,朱率残部退守县城。

4月15日(三月十一日),红灯教数千人由石板溪、唐坝口两路进攻县城,与朱登五部战于舞凤山(城北3里),清军败退,县城危在旦夕。此时各路清军均入县境,红灯教军由舞凤山转移到铁山龟头寨据守。各路清军于4月17日(三月十三日)将龟头寨团团围困,红灯教扼险死守,清军不能取胜。4月23日(三月十九日),龟头寨被攻破,教军数百人牺牲。首领王子田

等20余人被捕遇害。锡良又令清军在荣县、五通、屏山、井研等地设防,以杜教军“越境窜扰”。清军团练在犍为县大事搜捕,贫民被株连者甚多。外国主教以教堂受损为由,强索赔款银8500两。

卞薰创办“东文学堂”和“女工讲习所”,旋被捕牺牲

1905年2月4日(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卞薰创办的“东文学堂”在重庆黄桶街正式开学,由卞薰亲自主持授课,“其特色在注重精神教育,一洗奴隶腐败之风”。^①该校还聘请担任《重庆日报》社长的日本进步人士竹川藤太郎,讲授日语,为留学日本作准备。该校的优秀学生淡泽昉、吴礼苍二人(后均成同盟会员),就是由卞薰资助留学日本的。“东文学堂”被誉为“渝中独一无二之学堂”,以至“入学者纷纷不一其人”。

1905年5月31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卞薰在培德堂创办了“女工讲习所”。该所半工半读,既学文化,又学技术,所收学生均已带头放足,一洗数千年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习。

由于卞薰从1903年夏回川以来,办《重庆日报》,开学堂,大力宣传革命,在四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清政

^① ②《广益丛报》光绪三十一年第二期记事十三。

府当局深为忌恨,必欲除之。1905年6月2日(四月三十日),卞聶被官府役吏逮捕,《重庆日报》社也遭查封。卞聶在狱中写了《救危血》、《呻吟语》等宣传革命的文章,传诵一时。

卞聶在成都关押3年,清官府始终未得一合适罪名来公开处死卞聶,于是便威逼利诱同狱犯人王佑生,在1908年6月13日(五月十五日)夜,用匕首将卞聶杀死。

锡良奏报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

1905年2月11日(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锡良奏报所订《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6章55条,确定了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付息的具体办法。

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办法,约有四端:一、认购之股(即以已资入股者);二、抽程之股(即按租抽谷入股者);三、官本之股(即由国家库款作股本者);四、公利之股(即系本公司筹款开办别项利源、收取利息作为股本者)。其股票,无论官款、民款,均按四厘行年息。四种股本中,“抽租之股”是主要来源。租股的抽收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无论祖遗、自买、当受、大写、自耕、招佃,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

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①在《川汉铁路按租抽谷详细章程》中说:“此项租谷,均抽自收租之家,其有佃户押重租轻及债户以租抵利者,但有租谷可收,数在十石以上者,均一律照抽,不专抽自业主。”“各乡租谷,由各乡董、保长、牌甲人等奉到州县榜示定期开收后,催令各户上紧赴城完纳。收成较早之处,以十一月底为限;收成较晚之处,以十二月底为限,一律清完。若有延欠之户,即由城局绅董开单,送请州县官催追究追。”^②

租股自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开始征收。从此,全川150余府、厅、州、县,除峨边、懋功(小金)、打箭炉(康定)、理番(理县)等少数穷僻苦家地区外,都循令缴纳铁路租股。迄至1910年底止,六年时间内川汉铁路共筹租股款9288128两,占总筹股款11983005两的77.5%以上。既然租股占川汉铁路股金的大宗,四川的大小地主便都成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卷入资本主义漩涡,加之广大的自耕农和佃农也属租股征收对象,“因此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③这就为辛亥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动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① 《轨政纪要初编》,轨三,第1~12页。

② 《四川官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上旬,第14册,专件类,页1~3;

③ 吴玉章:《辛亥革命》。

特别是因川路租股的征收而由地主阶级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入的一部分人,他们的代表大都受过新式教育,留过学,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的号召和活动能力都远远超过资本家和商人。他们作为四川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构成了四川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主体,如蒲殿俊、罗纶就是这样的人物。

巴塘教案再起,赵尔丰进兵川边

1905年3月底(光绪三十年、二月下旬),巴塘藏民3000余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驱逐清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所部官兵,并焚毁法国教堂,与前来保护的清兵发生战斗。凤全躲入土司寨内,被藏民包围。4月5日,凤全率随从突围,藏民设伏兵于红亭子山后,凤全及随行部众50余人遭伏击,悉数被杀,无一生还。藏民又先后焚毁巴塘地区法国教堂3处,杀死法国司铎牧守仁、苏烈2人。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巴塘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自从1903年英国武装入侵西藏以来,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分裂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川边藏族地区的形势顿行紧张。针对这种形势,清政府于1904年10月令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经营川边,巩固川边。凤全到达川边后,以屯垦和练兵为急务,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但凤全却不顾藏民的风俗信仰,采取强硬办法限制

藏民宗教活动,力图抑制当地大农奴主上层喇嘛和土司的权势,固而遭到其激烈反对。1905年2~3月,凤全在巴塘准备移民开垦。当时七树沟藏民受丁宁寺喇嘛唆使,声称神山不可犯,要求凤全不要开垦。凤全自恃朝廷命官,作风专横,竟笞责其代表。这就导致了形势恶化,远近骚然。于是,当地上层喇嘛和土司利用广大藏民对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传教士的不满,发动了暴乱。

事件发生后,川督锡良急命四川提督马维骥率大军“进剿”,并委建昌道赵尔丰“办理炉边军务”,以为声援。1905年7月底清军攻入巴塘,杀起事喇嘛及藏民多人,焚毁丁宁寺,处死巴塘正副土司。事毕,马维骥部撤回成都,留赵尔丰任川边善后督办。赵尔丰首先“剿办”七树沟,“骈杀数百人”。翌年春,又亲率5营直抵乡城,将桑坡寺围困,百日方才攻下。随后军指贡噶岭,攻克向的寺,里塘全境平定。

清廷以赵尔丰平叛有功,于1906年加侍郎衔,充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并逐步在川边藏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至于巴塘教案,经赵尔丰与驻打箭炉法国主教议定,以赔偿银121,500两了结。

邹容狱中牺牲

1905年4月3日(光绪三十一年

二月二十九日),伟大的民主革命战士邹容病逝于上海租界监狱。

邹容,字威丹,四川巴县人,生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在日期间,邹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3月(光绪二十九年二月),邹容因参予痛打清政府密探姚甲,被通缉在案。他隐匿身份,于4月(三月)潜回上海,参加爱国学社活动,投身抗议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反帝运动,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5月,所著《革命军》一书于上海刊行。1903年6月,因《苏报》推荐《革命军》,发表章太炎鼓吹革命的文章,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将章太炎逮捕,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并在会审公廨上继续宣传革命。次年5月,邹容被判刑2年。1905年4月3日,邹被迫害病死狱中。1912年2月由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

省内雹灾、水灾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春夏,四川部分地区发生雹灾、水灾。4月19日(三月十五日),广安州发生雹灾,冰雹大如鹅卵,击伤人畜,井溪和戴市尤甚,秋收大歉。8月(七月),南溪县发生水灾,大水几乎淹没市区二分之一,田禾庐舍漂没无数。长江上游连日大

雨,江水猛涨,重庆水位上升36米,沿江许多地方被淹,居民淹死千人以上。洪水以后,物价暴涨,商界出现倒闭之风。

当年全省夏熟歉收共92厅州县,最严重的歉收地区:城口厅仅2分有余,越西等8厅州县仅3分,广元等3县仅3分有余。稍轻的歉收地区:华阳等30厅州县仅4分,大足等13厅州县仅4分有余,郫县等37厅州县仅5分收成。

全省秋禾有长寿、荣昌、綦江、新津等51厅州县歉收。

川汉铁路总公司改为官商合办

1905年5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长寿举人张罗澄等公呈都察院代奏,请简派督办川汉铁路大臣,以融合川鄂两省意见,通达下情;并提出川汉铁路宜正名为商办,以摆脱官吏对公司的直接控制。京官王荃善等,亦相附和。张、王等人的主张和四川留日学生提出的把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的要求,遥相呼应,内外同声。锡良为调和官绅意见,于督办之下,由官绅各派总协办一人,共主路事。官方总办以沈秉堃代理,绅方总办由在籍绅董公推京官乔树枬担任。至此,川汉铁路公司正正由“官办”转化为“官商合办”。^①

^① 《锡良遗稿》第一册,第497~498页。

浚川源银行开业

1905年6月7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川督锡良奏请设官银行。30日奉朱批允准,遂令重庆商务局总办周克昌筹办。取开通川省利源之义,定牌名浚川源银行,颁发官防1颗,定名“四川官银行”,于是年10月19日(九月二十一日)成立开业。开业股本50万两,其中30万两由藩库筹拨,20万两由商股募集。总行先设重庆,成都设分行。1910年(宣统二年),总行迁成都,相继在上海、汉口、北京、天津、宜昌、沙市、万县、涪陵、自流井、五通桥、保宁(今阆中县)等地设分行或办事处。浚川源银行总行主事人称总办、总理,分行称管事。先后在总行任总办、总理者有周克昌、邹宪章、乔世杰、黄云鹏等人。该行在清末发行钞票。1915年(民国四年),奉命发行银元兑换券300万元,回收军用银票。民国初年,银行库款被军方多次提用,正常业务无法经营,于1920年(民国九年)由财政厅接管办理清理结束事宜,浚川源名存实亡。

同盟会成立及其在川活动

1905年8月20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总部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各省设立分会。在7月30日(六月二十八日)举行

的干部选举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执行部总理,黄兴为庶务部长。川籍留日学生担任同盟会总部职务的有:董修武、熊克武、但懋辛、吴永珊、黄复生、吴鼎昌(以上为评议部评议员)、李肇甫(执行部书记科)。先后担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主盟人的有:谈春暘、张治祥、黄复生、董修武等。据统计,在同盟会成立初期(1905、1906年),四川留学生共127人参加,仅次于广东和湖南两省。

1905年底~1906年,同盟会总部分别派遣了几批川籍会员回川,发展党员,建立组织。1905年底,童宪章、陈崇功等人来到重庆,当地原有的革命团体公强会(1903年成立)公推杨庶堪、朱之洪“首应盟约”,加入同盟会,于是同盟会重庆支部在公强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1906年,同盟会总部又先后派黄复生、熊克武从日本回川,由黄任成都分会会长。他们到成都后,先后联络了秦炳、张培爵、卢师谛等人,成立了同盟会成都支部。

同年,孙中山委任川南会党首领、同盟会会员余英为西南大都督,命其回川发动武装起义。余英回川后,与熊克武、谢奉琦等人在泸州设立了同盟会的秘密机关。随即谢持又在富顺建立了同盟会分部。

同盟会在四川发展组织,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一是学界,以学校为基

地,以教职员和学生为发展对象。二是会党,即哥老会,通过吸收哥老会的首领加入同盟会,而把遍及四川各个乡镇的哥老会这个强大的社会力量,引导到反清的革命斗争中来。三是军队,尤其是在新军中发展同盟会员。此外,四川同盟会也注意在工商界中发展党员,但四川资产阶级毕竟十分微弱,因此,四川同盟会还得自己创办企业,借以联络党人,筹集经费。

四川奉旨停止科举,大兴学校

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清廷批准袁世凯、张之洞等督抚停止科举的奏折,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学校,以后朝廷用人皆由学堂出身。

当时四川总督对“兴学育才”,开办近代学堂十分重视。锡良鉴于川省办学师资缺乏,决定首先从师范入手,令各州县设师范传习所,迄1905年,全省共办师范传习所110所。是年锡良令各府和直隶州、厅各设师范学堂一所。锡良认为聘用外人讲学,比派人留学省费见效快,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入川的外国教习有8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日本人。此外,锡良将兴办学堂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1905年就各地办学情况,分别予以奖惩。在锡良的推行下,川省近代学堂发展很快。

1904年,川省仅有学堂105所,学生6000余人。1905年,即有学堂4361所,学生73219人。到1907年锡良卸任时,已达7700余所,学生24.2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四川留日学生创办《鹃声》杂志

1905年9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川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雷铁崖、邓契、董修武、李肇甫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白话文杂志《鹃声》。《鹃声》创刊号封面大书“发明公理、拥护人权”,扉页上刊登了民主革命战士邹容遗像。

创刊号《说鹃声》一文,表达了该刊开办宗旨,要效杜鹃啼血精神,把四川在清王朝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的侵略下所遭受的沉重苦难以及“如何造成新国家,救我们四百兆同胞的法子,一期一期的说了出来,哀鸣于我七千万伯叔兄弟之前。日日啼哭,今日劝不转来,明日依然啼哭,明日劝不转来,后日还是要哭诉的。”^①

《鹃声》为近人所见者为第一、二期和再兴第一期。内容有社说、论说、宗教、教育、政法、经济、史地、时评、小说诸目。再兴第一期有《中国已亡之铁案说》、《檄告蜀人当先天下兴光复军》等文章。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563~567;同书,下册,页1074页。

成都总商会成立

1905年9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在省城官绅支持下,成都商界举行集会,宣告成都总商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成都总商会章程17条。按照章程规定,由各行帮共推会董20名,再由会董公推总理、协理。由于风气初开,商情涣散,首任总理、协理由商务总局委任。商务总局札委盐商、成都举人、候选知府舒钜祥为总理,宝龙银号老板、山西帮商人、补用知府齐世杰为协理。1年期满,按章另选周祖佑为总理。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周善培推荐樊孔周为协理。

在成都总商会成立大会上,川督锡良致训辞,保证使官商“同心协力,加意讲求,将昔年腐败情形,一一重新整顿。”

自贡地震

1905年11月9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自贡5级地震,震中烈度6度。自流井周围约300里猛烈震动,11月8日13时15分已震动3次,至同月27日共震动19次。贡井地区大多数房瓦震翻,许多墙壁倾倒,少数人受伤。自流井地区受轻微损坏。在距自流井110华里的陈家口(译音)高500尺的小山有一部分受震倒下,掩覆了山麓的3间房屋,压毙13人。

四川省第一次运动大会

1905年11月19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省城四十所学堂参加了成都武备学堂(北较场)举行的“省城各学堂运动大会”,参赛运动员3281人,大会职员140人,设有34个竞赛项目。这次运动大会,为川省第一次运动大会。

彭县发生反清武装起义

1905年12月初(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底),四川革命知识分子在彭县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彭县位于成都西北90里,1903年以来,即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影响。激进的知识分子杨钧、萧光前、刘子成等与四川同盟会骨干,内江县余切密切联系,共谋大举。1905年10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余切与杨钧、汪泽、简化南、萧光前等在双流县簇桥密议决定,在彭县起事。12月初,余切、杨钧、萧光前等人率部分群众在彭县石堰洞后山宣布起义,提出“驱逐鞑虏,创立民国”的口号,组织大同军,余切任元帅、杨钧为军师,“歃血结盟,号召群众举事”^①。1905年12月13日,大同军与彭县团练、堂勇及什邡、新繁、崇庆各地团练激战,义军获胜,县属大同军一时蜂起。彭县知县采取分化瓦解策略,使萧

^①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页50。

光前退出起义,余切、汪泽被迫放弃起义,隐匿省城,起义失败。

重庆铜元局开办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经川督锡良批准,先后从川汉铁路公司借拨款银200余万两,派人赴欧洲考察并购置英德两国造币机器,在重庆南岸苏家坝建筑厂房,设立重庆铜元局。经年,厂房建成。局分两厂,分别安装英制、德制机器设备各1套,仅德制机器,日铸铜元可达40万枚。开工前夕,忽接部令,中止铸币,改设炼钢厂,未果。

四川新办工矿企业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梁山人李济川筹资十万元,创办梁山造纸公司。梁山“向产黄表纸”。行销省内外。李济川有志新式制造业,联合10余人,集资创办公司,从事黄表纸的“改良制造”。

同年,重庆开办富川造纸厂,开办人陈崇功,有资金10万元。富川造纸厂适应重庆火柴生产需要,专门生产“火柴盒用纸”。

同年由张某集资数万元,购机器80台,开办璧山织造厂。所出之货,与江浙匹敌。

同年,泸州迁善所派人前往重庆

裕济厂,购织布新机5部,任命技工1人为所长,提高产品质量。

同年,重庆布商曾应元开办重庆复元织布厂,有织机50台,宣统元年改为“复新”厂,有织机105台,1913年停办。

同年,重庆开办东华玻璃厂,资本2万元。

同年,成都某君制造抽水机器,专门用于清除五金矿、煤矿洞内积水,所出样品,经商矿局试验,获得嘉奖。

同年,邻水县某绅,在日本学得熬炼樟脑法,当年秋回国,筹立工厂,制造樟脑。该县商民“仿办此业者,已达二十家。”^①

同年,万县开办紫金山铜矿。地主戴姓约同邑绅发起开办,经矿勘验,铜质优良,矿藏丰富。

同年,万县开办金子坪红铜矿。本地乡绅已拟集资开采。该矿质地颇佳,每斤可炼净铜五六两之谱。天全铜矿,由天全县赵秀芾筹集资本开办,月费白银160余两。

成都开办劝工局制革厂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由商务总局在东门外建设专厂,借用当商生息银48000两以充资本,生产分制革、皮包、靴鞋、马鞍、铜器、毛毯六种,雇用日本技师6人,分工种教授。开设之

^① 《四川官报》丙午(1906年)四月中旬,九册“新闻”第一页。

初学徒仅 120 余人,后扩大至 300 人,厂内设总、襄理各 1 人,司事 7 人。厂务管理分为 4 所:会计所、物料所、货物所、工务所。并于城内总府街设售货所,发售成品。

四川造币机构的合并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四川银元局与铜元局合并为银铜元总局。次年(1906 年),清廷决定各省造币厂统归户部管辖,四川银铜元总局改名四川户部造币分厂,后又改名度支部造币蜀厂。1910 年(宣统二年),度支部造币蜀厂划归天津造币总厂管理,改名成都造币分厂。

清廷在四川编练新军,裁减绿营,加强团练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即按西法训练的近代化陆军)36 镇,四川分配 3 镇。川督锡良为准备建镇,继续扩军,就巡防营续备军选拔,并重新招募。拟编新军 10 营(步兵 6 营、过山炮 2 营、马队 1 营、工程兵 1 营),暂作两协,以程文葆任第一协协统,陈宦任第二协协统,并积极整顿各地原有巡防营。1906 年 7 月,清廷练兵处将四川常备军编为第三十三混成协,锡良任陈宦为混成协统领。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川督锡良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奏准继续按年裁减边腹屯务各绿营兵,将所剩绿营兵每年裁减一成,10 年裁尽,截留此饷,以为拓办省城内外各府、州巡警之用,松、建两镇边防夷屯各营裁二留八。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再向四川派练饷 80 万两,通过川盐每斤加价 2 文等办法筹集,以作省内练饷。

同年,川督又令地方加强团练组织,层层落实,其所需枪炮,准予省城机器局购买,以充实地方武装的实力。

四川大批官费、自费留学生东渡日本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中国留日学生突破 1 万名,四川官费和自费留学生数量也急剧增加。迄至年底,四川留日学生已达 800 余人。仅 1905 年就有 393 人。

自费生是留学生的主要部分,选修科目比官费生多,除文理、师范外,还有工业、农业、商业、铁道等专门学科。当时,川督锡良奏报四川留学生情况说:“自风气盛开,东游相继,官费而外,自费游学者,不下四、五百人。”^①

省矿务调查局成立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谕

^① 《督宪陈川省学务情况并推广办法折》,《四川官报》乙第 28 册,奏议,页 3。

令各省清理、整顿全国矿产,令各省督抚选派干练廉正官员,会同工程师,“将已开未开各矿,逐一详细注明,随时咨报”,准备集股试办,禁止私售,从而达到“权自我操,利不外溢”的目的^①。为防止外国人掠夺矿产,有利于川省“占先开办”,四川于同年成立“矿务调查局”。其主要任务是:1、调查矿产种类,开采价值、矿源数量、储量多寡;2、开办方式、运道难易、扩充办法。

省矿务调查局成立后,进行了大量矿产调查、集资办矿的业务活动。现存《巴县档案》中,有当时巴县各区矿产调查报告17份。当时报刊报道了矿务调查局派员前往川东各县考察矿务的活动:“据言南川煤矿甚富,矿苗亦佳,即川东各处煤铁两宗可开之处亦复不少云云。现已具呈矿务局,禀请妥订章程,集资开办矣。”^②“巫山县煤矿向已著称,近经该县李大令将境内各矿详细调查。凡矿山所在,是否开掘,有无成效,以及生产若干,销往何地,煤质高下,均一一绘图列说。”^③。

《重庆商会公报》创刊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重庆总商会创办了《重庆商会公报》(以后改为《商会公报》,这是四川最早的一家

商业报刊。

《商会公报》直接由商会领导,向社会广聘记者,印刷和发行由广益书局代办,以订阅为主。创刊之初为旬报,每月出3册,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改为周报,每逢星期日出1册。1909年(宣统元年)停刊,原因不详。

《商会公报》反映的内容不局限于商业,具有较大的社会涵盖面,其设置栏目由少到多,大致有阅抄、奏牍、公牍、厘税、论说、商情、商史、物价、采报、案件、录要、拾遗、余谈、小说、科学、要件、调查、纪实、杂俎等。在新闻采写、编辑制作方面开始注重版面的视觉美感和读者效应;设计新颖,栏目加了花边,标题多呈直行,鲜明醒目。这都反映了重庆总商会明确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立场。

西昌马家支彝族起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继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西昌阿什支彝族起事之后,马家支彝族又称兵起事,“焚劫西昌县属大兴场”。川督锡良派遣高培焜率领常备前后两营前往镇压,但该军出省城即纷纷逃散,“哨官畏罪潜亡数人,失去快枪八十支并子药甚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7,实业十,考11352。

② 《成都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总180号)。

③ 《四川官报》丙午第17册,新闻。

多”^①，吉耳等支彝民踞碗厂河、四块坝等地抗击清军，后又踞勺勺梁天险抵抗。清军向彝民“开炮破垒”，“纵火焚林”，杀死彝民百余名。事息后，清军又费时半年，搜索余众，清查首从，才将这次反抗事件镇压下去。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经由重庆进口的货物总值为1656.6万海关两，出口货物总值为1116.9万海关两，四川对外贸易总额价值2773.5万海关两。其中，洋货进口总值为1155.8万海关两。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省城举办第一次商业劝工会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初，经四川商务局批准，将历史悠久一年一度的青羊宫花会加以扩充，改名为成都商业劝工会，并制订“四川商业劝工会章程”，凡各府州县出产及其制成品或货物，均可参加展销，陈列比赛，这是四川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它标志着四川的商业向近代化的展销迈进一步。

四川各地纷纷举办商业劝工会

1906～1907年（光绪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四川各州县受到省城商业劝工会鼓舞，纷纷要求并筹办本地区商业劝工会，得到批准和举办商业劝工会的地区有：

1、新繁县：1906年西城外大佛寺以当地孟兰会为基础，改办商业劝工

会，交易额折合白银万两有奇。1907年，该县开办第二次商业劝工会，会期仍为10日，并选举商董。共有34行众多商家参加交易，交易总额2.9万两，比上年提高40%，拟办第三次，力开风气。

2、嘉定（乐山）府：1906年以乡会为基础，改办商业劝工会。1907年经商董提议开办第二次商业劝工会，并将妥善布置，大加改良。

3、崇宁县：1907年官绅协同筹款开办商业劝工会，分区筹备，略仿花市规则，招集远近各商依期赴赛。

4、雅州：1907年该处绅商倡议，就旧日城隍会筹款开办商业劝工会，拟定章程，并派人赴省详加调查。

四川开办彩票

1906年3月（光绪三十二年二

^① 《东方杂志》第2年第5号，军事。

月),川督锡良奏报清廷,拟在重庆、成都开办彩票,听民自购,如获盈余,准备拨归练兵制钱之用。清廷予以驳回,云“练兵筹有专款,所请应毋庸议”。^①当年冬,锡良为扩军之费无着,各项筹款“仍属缓不济急”,再次奏请开办彩票。清廷查照湖北、江南等省成案,准其暂行试办。“所获赢余,足敷制械购机之用,令将每月收数报部查核”。^②

1907年5月(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四川正式发行彩票。由劝工局经营彩票,每张售银5角,票额、彩数均照彩票公司规则,其中无彩、空彩票据亦酬以值银2角的商品。

红灯教的反抗活动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开县、万县、新宁(开江)、彭县、威远、仁寿、荣县、眉山、渠县、大竹、平武、温江、中江等地广大农村乡场均有红灯教传授神拳,打毁教堂,武装反抗官府的活动。红灯教首领聚众人数,从数百、数千到数万,给清廷构成严重威胁。其中以开县、万县红灯教反抗规模最大。

7月22日(六月六日),开县红灯教首领韩洪顺等率众数百人将县属学堂及教士、教民住房捣毁,知县率练勇“剿办”,亦被击溃,退守县城。教军数千人兵分两路,一路攻占万县新场,一

路攻打开县城。川东道陈瀚声急调重庆官兵驰援,川督锡良又派巡防军中军统领刘毓湘率部水陆兼程开赴川东,官军总数多达5000余人。

8月初(六月中旬),重庆援军抵达开县岳溪场普里河南岸,炮轰北岸教军,死伤甚多,清军追击教军,教军首领韩万顺等15人和数百群众遇难。红灯教主力数千人转战新宁(开江)县境。8月上旬(六月下旬),清军向新宁(开江)县境发动攻势,教军突围失败,惨遭血腥屠杀,被捕首领全部遇难。

成都开设戏园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华阳县人吴澄波在成都会府北街开设戏园——可园(又名咏霓茶社)。过去演戏,主要在庙会 and 堂会,可园开设后,官绅多往观看。戏曲改良会提倡演出健康的新戏,淫秽、凶杀剧目不得演出。成都戏局,气象一新。冯家吉《锦城竹枝词》说:“梨园全部隶茶园,戏目天天列市垣。买座价钱分几等,女宾到处最销魂。”^③可见当时戏剧演出已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茶园每日张贴演出剧目广告,以招徕观众,座位分等定价,女宾也打破习俗,入园看戏。

① 《锡良遗稿》第一册,页556、621。

② 《四川官报》丁未四月下旬,第十册,新闻,页1。

③ 冯家吉《锦城竹枝词》,民国十三年成都研精馆刊本。

同盟会组织大竹书报社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肖德明、陈凤五、张简廷、江三乘、邹畏之、曾葆森等联合发起,在大竹县南门圣庙对面开办大竹书报社,经营各种新式书报杂志,如《广益丛报》、《云南杂志》、《民报》等。该书报社以商店作掩护,实际上是同盟会联合会党、运动军队、采买枪枝弹药、准备武装起义的重要机构。

大竹书报社肖德明、陈凤五等,积极发展会党首领加入同盟会,他们将实力雄厚的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争取过来,与同盟会密谋起义,使孝义会基地大竹大寨坪成为同盟会员、革命志士集聚和避难场所。孝义会在保路运动期间,积极筹备经费,购办军火,聚众数千,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成为四川独立和反清的一支劲旅。

除大竹书报社而外,同盟会还在大竹县城开设三生石苏裱店、春华棧、祥生号茶旅店等,熊克武、但懋辛、喻培棣、吕汉群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均曾在大竹聚会,为组织川东北革命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川烟土泛滥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报告四川烟土销售情况说:全国烟土产量凡33万担(每担合133.4磅),川土产额已占全国产额2/3,约为23.8万担。运往国外者

4730担,本省销售18.2万担。

四川鸦片产量居全国之冠的原因主要是:

1、四川土税较全国为轻:自1906年7月全国征收土药统税,无论出口或内销,每担均征库平银150两,川土实居例外,每担抽库平银27两零,并加铁路捐5.28两,共为32.56两,远远低于全国榷额。

2、种罂粟利厚,种小麦利薄,种罂粟比种小麦利润高80%。

3、市场辽阔,吸食者众多:吸烟者占四川成年人总数的17%,四川人口总数的9%,约计315万人。

4、清廷虽有戒烟严谕,但川省官吏奉行不力。省城烟馆500家,1907年6月查禁后,很快又设官烟店300余家。同时私烟改头换面,仍在暗中出售。

四川烟土种植始于鸦片战争,1850年鸦片交易已盛行于市,1859年已设局抽收洋药厘金。1876年以后,川江沿岸遍种罂粟,已是普通的农作物了。到1890年,四川罂粟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产量最大的有川东的涪陵、忠州、梁山、垫江、邻水、大竹、新宁(开江)、东乡(宣汉)和绥定(达县)府、重庆以西的巴县、上川东的永川、荣昌、隆昌、大足、川北的遂宁、川南的富顺、永宁(叙永)和叙府(宜宾)、川西北的松潘厅等。鸦片的生产和运销大都集中在这些地区。

川边各地设立电报分局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四川电报业务逐渐扩展,川边里塘、巴塘、河口(即今分雅江,距康定190公里)、喇嘛了(距里塘75公里)、昌都均设立报房,开办电报分局(三等局),有机器1~2部,开展电报业务。

次年,川东涪陵设立电报分局,“已于五月开办,凡通电至重庆者,每字照章收洋五分。”

成都改良娼妓管理办法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巡警道周善培实行改良娼妓管理办法。成都娼家主要集中于东门柿子园,北门武担山,流娼则与民户杂处,良莠难分。周善培将柿子园改名新化街,将武担山略加修整,规定所有娼妓集中在上述两处。为便于管理,特仿日本“游学区新吉园”处理妓女办法,规定宿费标准,定其家为监视户。并钉“监视户”木牌于各娼家门首。妓女若要从良,周善培特设“妓良所”听其择嫁。

川省连年遭灾,奏准展办常赈两捐二年

1906年9月21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四日)四川总督锡良报告清

廷,四川连年遭受天灾,弥旧支新,全赖筹捐应付,壬寅(1902年)、甲辰(1904年)两年赈济,报销后还超支银1万余两。各省垫解未扣者尚有24万有奇,综计不敷银25万余两。本年全川30余州县被雹、被水成灾,此次所收赈捐50余万两,不敷赈需,因此,奏准清廷将川省展办常、赈两捐“再予展限二年”,^①以济要需。

同盟会江油起义

1906年9月(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四川同盟会发动江油起义。江油起义的组织者为同盟会员、绵州人李实。李实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加入同盟会,以排满革命之说奔走传播于川北各地,并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首领何如道等人建立了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经过短期筹备,李实决定于1906年9月发动革命于江油。因消息泄露,川督锡良闻警,急调兵勇、团练会剿。李实等毫无防备,仓卒应战,被强敌击溃。李实率领余部退入南部小燕山,招兵买马,准备再图反清大业。四方豪杰闻讯,趋之若鹜,旬日之间,聚众至千余人。李实“立官职、制备旗帜、枪械、药弹”^②,刊刻文告,宣传革命。锡良再调巡防军围剿。激战数日,起义军伤亡严重,李实壮烈牺牲,余众

^① 《锡良遗稿》第1册,卷5,页601~602。

^② 《蜀中先烈备遗忘》卷1,“李实传”。

溃散。江油起义遂告失败。

天主教会在四川各地进行气象观测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1月开始,法国天主教会先后在成都、安岳、西昌、宜宾、康定、巴塘、达县、忠县等地天主教堂内进行气象观测。

1873年(同治十二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徐家汇观象台”(初称徐家汇天文台)。该台受海关税务司委托,并得到外商“太古”、“怡和”两公司的津贴,在沿江、沿海设立气象站。该台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1月在成都平安砦街、1910年(宣统二年)3月在安岳、1916年(民国五年)11月在宁远府(今西昌)先后进行气象观测。

1924年(民国十三年),法国天主教会又在叙州府(今宜宾)、打箭炉(今康定)、巴安(今巴塘)、绥定府(今达县)、忠州(今忠县)等地的天主教堂内设观测记录,并将观测结果每天以电报发往徐家汇观象台,每月还将观测记录报送该台。

上述各观测点的原始气象记录,均查无下落,现仅存有1928年(民国十七年)徐家汇观象台用法文编印出版的《中国雨量》。资料年代为1873年~1926年。

外国人费格生到川康边境考察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外国人费格生到川边考察。东起成都,西至打箭炉,北起里塘,南至汉源,沿途作平板测量,自灌县开始,最后仍返灌县,计程625里。费格生对这一地区的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民族史的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对康区民族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川增派官费留学生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由于新政人材奇缺,四川增派官费留学生出国进修各类专业,派遣情况如下:

1、省农政局、矿政调查局、提学司、劝工局、洋务局各派学生赴法国留学。派遣梁祖贻学习矿物、刘照青学习法政、杨芳学习蚕桑、全咸澍学习理化。

2、省洋务局、机器局派遣官学堂法文头班学生游汉章、濮良钰、濮良封及候补州判胡继垣前往法国、英国学堂深造,回川备用。

3、川督锡良派遣高材生多人去日本留学,专攻速成师范。次年毕业,还采购讲义,由日本返川发售。

是年,四川派遣留学生达到800人。

留日川籍学生上书清政府要求铁路纯归商办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蒲殿俊

约集胡骏、肖湘等数百留日川籍学生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蒲殿俊被举为正干事（会长），与该会主要成员共同署名上书清政府，要求川路公司实行“商办”。他们还出版期刊《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揭露官僚把持川路公司造成的弊端，诸如股票滞销、路款被挪、帐目混乱、冗员牵掣、股东无权等等。指出这些弊端均是绅商无权所致。因此，他们以川路租股为大宗的事实论证商办的合理性。

重庆开办鹿嵩玻璃厂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留日专攻玻璃制造的江津人何鹿嵩，在日本购置机器设备、药物材料，投资8万两，并聘请日本技师3人，在重庆江北刘家台开办鹿嵩玻璃厂，计划自造各色玻璃及各种样式的杯、瓶、盘、碟、碗、盂、鱼缸、洋式茶壶、窗心和理化实验器具等新式产品。该厂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正式投入生产。从1909年至1918年，鹿嵩玻璃厂制品畅销川省城乡，还远销云南、贵州、湖北诸省。1911年（宣统三年），该厂产品出口参加巴拿马博展会，获一等奖。

官办惠昌火柴厂开业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成都设立官办惠昌火柴厂，劝工局拨银1万两，加上商矿局拨借部分，共有资本3万2千两。厂设成都东门外白塔寺，

“雇工匠多人，日夜赶造，每日所出火柴约数百箱”。由于经营有方，销场畅旺，每年获利尚厚，1912年“纯利达一万两”。1913年以后，工厂扩大，有工人800余名，其中女工650余名，年产火柴3150箱，值银63000两。

三台县开办永靖祥丝厂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重庆花纱布商人王静海在三台县投资开办改良缫丝工厂，取名永靖祥丝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该厂购置机器，扩充经营规模，拥有丝车240架，每年能成丝240箱。该厂所产之丝，得到国内外市场好评，法国里昂商会检验样丝后认为：“实丝均匀光泽，且质强韧，尤合机器之用。”1909年，因王静海在重庆经营的棉纱亏空，无力兼营丝厂，决意将该厂全部转让，由重庆商会协理曹瀚珊、赵资生、李和阳等筹集资金，并借得官银7万两，接办了永靖祥丝厂，更名为锦和丝厂。

成都、忠州开办造纸企业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成都商人朱秉堃集资10万元承办乐利造纸公司。乐利公司吸收官股，并且也为四川官府生产公文纸。该厂由于缺乏制浆生产设备，其生产仅维持一年，即告停产。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东京专攻化学专科的温江人吴铸九

筹集资本,于忠州开办化学造纸厂,收取残废帐簿及各种字纸,用药水融化,让墨迹沉下,纸料浮上,再造成纸,其质量不比外洋差,所造纸张很合实用,纸价也很低廉,极受用户欢迎,嘉、叙、泸、渝各纸号“均寄资订购”。

四川开办矿业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四川新办石油、煤矿、铜矿企业如下:

彭县石油矿公司。由县绅马某等纠纷集股,在该县创设公司。

什邡炭厂。什邡县绅邓华丰拟采取新办法,开采邓家山一带岚炭,特赴重庆购置新机数部,就地广泛开采,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荣经县煤矿。由县石某等合众集股购置机器,从事采掘,已得多人赞助。

四川机器总局试办嘉定煤矿。嘉定府属石铃山等地煤矿,由机器局派员试办,该员等报告,开办新槽,功费甚巨,先就废槽蕴藏宏富者采办,待有成效,再行扩充。并拟有章程六条,禀报到局。

灌县各矿。由该县某君筹集资本开采,已在商务局禀请试办。

天全前阳村铜矿。由赵季乡开办,月费工本银160~170两,可得铜500余斤,色质俱佳,洵称上品。

叙州等地水灾,涪州等地雹灾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叙州、忠州、夔州、重庆府所属厅州、县及蒲江、屏山等县,洪水成灾。

同年,涪州、剑州、简州、西充等5州1厅11县大雹灾。云阳、綦江、南川、里塘等县发生大水灾。

本年全省小麦共有12府厅州歉收。资州仅收二成,顺庆、绥定2府与酉阳州仅收三分,重庆、保宁、潼川3府与眉州、石砭厅收四成,忠州、叙永厅和理番厅收五成。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经由重庆进口货物总值1810.3万海关两,出口货物总值1089.2万海关两,进出口货物总值2900.1万海关两。其中,洋货进口值为1481.9万海关两,比上年增长300万海关两;土货进口值为328.4万海关两,比上年增长170万海关两;本地出口其它口岸的土货价值为1.089万海关两。

重庆关进口洋货的主要品种是棉纱、人参、海参、豆蔻和布匹。出口土货中,羊皮增长2成,猪鬃和鸡鸭毛略有下降,木耳和苧麻增长,五倍子增长了134%,生丝、黄丝和废蚕茧需求增加很快,白蜡、昆虫、中药材质量和价格均上升,销量激增。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川省禁烟

1907年2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督署直辖政务处札飭各属限定本年2~7月(一至六月底)限期内禁绝烟馆。

不久,政务处奏准颁发禁烟章程,章程第一条说:“四川为土产最盛之区,现定以十年禁绝吸食,自当先限栽种,庶吸食可期禁绝,应由各督抚分飭州县,确查境内向种罂粟之地若干亩,造册详报”。

同年4月(三月),川督锡良奏准设立戒烟总局并拟定戒绝办法。

同年8月(七月),护督赵尔丰藉禁烟为名,设立省城官膏店,独家经营鸦片,谋取暴利,官膏店由官制膏,凡吸烟者提前赴警局登记领牌,按牌售膏,禁止一切熬户私自制膏,所有烟馆限期停歇,另谋生业(省城共有烟馆500家)。

对重庆和川东等鸦片产销区实行限制生产和销售的办法。对瘾民进行登记,重庆登记瘾民2.2万人。将1600家零售熟土的烟铺和烟窟加以查封,在市区和郊区开设83家为获准吸食者提供熟土的官烟场,吸食者须接受监督和额外课税。对烟土实行专

卖,设置总部和若干分支机构管理购销,官方烟场和瘾民要取得专卖机构许可证,才能零售和吸食,每天平均销售烟土1000两左右。

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未任

1907年3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四川总督锡良调云贵总督,云贵总督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未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代理总督职务。

川汉铁路总公司改归商办并续订章程

1907年3月4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由于四川绅商的一再要求,锡良不得不奏报清政府,将川路公司遵照商律改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制定公司续订章程59条,举乔树枏(历任刑部郎中、学部左丞)为总理,胡峻为副总理,“所有重大事件,由该公司禀承督臣办理,原设官总办一员,即予裁撤。”

《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续订章程》第3条规定:“本公司专集华股自办,无论整股零股,均惟华人自购,不附洋股。”第5条规定:“所需股本,约计银五千万两以上,拟先集一千

五百万两为基础”。其余之数,分期续招。第7条规定:“本公司募股之法,分为二种:一、股分之股。二、抽租之股。股份征收之法,由本公司自行照章经理;租股征收之法,由本公司呈请总督札饬地方官会同本公司绅董,遵照租股专章办理。”第32条规定了董事、查帐人的当选条件:“董事限有本公司股分一百整股以上,查帐人亦限于五十整股以上之股东之到会者选举之。……至各租股局举出之绅董,亦得作董事及查帐人。”第41条规定,“本公司呈请四川总督奏派总理、副总理二人,即为《商律》中之总办,总司理人。”^①

同年,川汉铁路总公司聘请詹天佑为总工程师,负责整个川汉铁路的设计和施工。

《续订章程》虽体现了四川绅商争取铁路商办的斗争,有了一个结果,但租股仍须凭借官府的力量摊派征收,公司的总理、副总理仍由川督奏派,公司的重大事件仍须禀承督臣办理,这一切均表现了铁路商办并未能真正摆脱清政府的控制。

省城开办第二次商业劝工会

1907年4月23~30日(光绪三十三年),省城青羊宫和二仙庵举办第二次商业劝工会。提供展出产品者有

千余家,并有学界、工界、商界发展之应用机器及模型标本,售货价值达40万元。该会筹办章程规定,第二次商业劝工会应在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基础上扩大规模,丰富内容,提高质量。各州县赴会参赛物品“有苟且敷衍情形,应订变通办法,加以限制。并请各属切实办好工艺,以体现国家振兴工艺的政策。”参赛的商品主要有:棉纺织品、地毯和毛巾、丝织品、刺绣、瓷器、瓷绘、各式中西家具、木器、漆器雕刻、卷烟、竹席、竹制品、草帽、草鞋、竹篮、工艺花、羊毛毯、蜡烛、皮革等等。

第二次商业劝工会在会场附设一精品展览。凡古今书画,碑版玉磁各精品,均搜集陈列,纵人观览。

商业劝工会又决定添设一动物园,由商务局函致各州县,就本地所产珍禽异兽、水族鳞介之属尽量购致,以丰富会场内容,提高游客兴趣。

赵尔巽授四川总督,未任

1907年5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赵尔巽由盛京将军授四川总督,未任;前任总督岑春煊授邮传部尚书,继续由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代理四川总督职务。

川边大兴学务

1907年6月(光绪三十三年五

^① 《轨政纪要初编》轨三,页38;轨三,页13~20。

月),川滇边务大臣、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奏准清廷,在打箭炉设立学务局,以作为统筹全局的兴学机构。从普及汉语官话及中国浅近文字教育入手,推进边地经济文化建设。赵尔丰提名在籍度支部主事吴嘉谟充任总办,从边务经费中拨出白银2万两作为学务公费。以后常年经费增加到6万两。

入学制度带有强制性,凡是学龄儿童都必须入学,否则罚及家长。学生入学不缴学费,还免费供给饭食、文具、书籍,发给汉式男女服装,凡学生皆免其徭役。由于上学不增加负担,还能得到许多好处,藏区人民踊跃送子女上学。1907年开始办学时,川边仅有两所学校,到1911年川边地区的学堂几乎遍及整个川边,仅巴塘、理塘、定乡、盐井、中渡、稻城六处,学堂增加到200余所,学生9000余人。

省内旱灾、水灾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春夏,四川旱灾、水灾相继。5~6月(四至五月),广安州两月无雨,收成减半。夏秋之际,川西地区霖雨连旬,成都一带发生水灾,各州县地势低 城垣、庐舍、田地均被淹没,成都城内街道水深1米,秋禾荡然。绵竹河水暴涨,冲毁田庐无数,大量人畜淹毙。当地人称,实百年未有的奇灾。

四川开办电灯、自来水等企业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夏,重庆绅商尹德钧、曾光栋、熊嘉翼、刘沛膏、曾光枏等,筹集资本两万两,从上海向德国采购电灯机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一台100千瓦直流发电机运抵重庆,租定白象街客房,作为厂址,并架设电缆,立案开办烛川电灯公司。当年6月8号(五月初十)发电,报名用电者预定数千盏,后又续招华股30万元,向上海购办可照3万盏电灯的发电机器。大机开始发电后,市民中愿照者颇形踊跃。

1907年10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由成都总商会董事马正泰发起,集资创办自来水,修筑水池,安接竹制水管,由人力挑运供水,较之过去方便、实用,但用户距水池远近不一,人力挑运,水量有限,无法畅行。马正泰等于本年底会同各股东会商决定,另集股本银5万两,仿上海方法,用机器汲水,铺设铁管,安装龙头,分注各家门首,方便民用。

1907年11月10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五日),重庆成立纸烟公司,公司将叶烟打叠成折,备制各种烟品,叶烟产自郫邑、新繁等处销场极广,烟价不断上涨,本年新庄市价每斤七分二厘,因渝城设立纸烟公司,购运甚多,每斤价值已涨至八分二厘。

同年,乐山商人徐荣丰开办荣记丝厂。

香港督署助理秘书克利孟梯入川探险

1907年7月12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三日),香港督署助理秘书克利孟梯由俄属中亚延集出发,翻越帕米尔至疏附,东经阿克苏、库车、吐鲁番至迪化(乌鲁木齐),再经哈密、甘肃酒泉、张掖至兰州,折而向西南,经天水、略阳、广元、绵阳至成都,沿江而下经嘉定、宜宾至重庆,南行经綦江、松坎纵贯贵州东部,于1908年3月31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抵香港。疏附至香港计程3990里,分198站,测定纬度141处,经度139处,高度185处。

赵尔丰提出经略川边计划

1907年7月20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正式向清廷提出经略川边的计划,其主要内容六项是:

一、屯垦:招致内地中户农民前往巴塘、里塘土地肥沃处垦荒,由官给资费、种籽,自办农具、庐舍。

二、兴学:川边藏区文化落后,必须开办学校以造就人材,逐步提高当地文化水平。

三、通商:发展川边商业目的,一方面可使川边物产输往内地,不至弃财于地;另一方面可使内地货物,如菜蔬、棉布之类畅销边地,有利于川边的

繁荣。

四、开矿:川边矿产丰富,宜由官首办矿业,自筹利益,臻于富庶,此举既利于边地摆脱“岁岁仰给他省”的贫困状态;又利于朝廷增加收入。

五、练兵:因川边僻远,“西连藏卫,北接青海,南尽蛮夷,纵横约各二、三千里,山川险要,驿路綦长,处处皆须派兵驻防,”建议增加驻防军队,以巩固川边,稳定局势。

六、设官:川边巴塘、里塘、乡城等处,应设管理民事流官,以改变土司世袭奴役制度。

清廷对他经略川边的计划十分赞赏,批准实施,赵尔丰在川边数年,积极开办学堂,修建旅舍,招募汉民屯垦,修筑道路桥梁,并着手开办矿务、医院等,同时招募新军,巩固边防,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陈夔龙授四川总督

1907年9月5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陈夔龙升任四川总督。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未任)于同年7月28日(六月十九日)调任湖广总督。陈夔龙也未来川上任,次年调任湖广总督。川督职务仍由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代理。

重庆、成都成立大清银行分行

1907年9月17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日),清政府度支部委派刘宇

泰赴四川开办大清银行四川分行,由部拨资本 120 万两。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大清银行重庆分行成立,7 月,成都分号成立。在四川发行 1 两、5 两、10 两、50 两、100 两银两票 98000 余两;1 元、5 元、10 元、50 元、100 元银元票 76700 余元,均随时兑现。1910 年(宣统二年),设自流井、五通桥分号。1911 年 12 月 8 日(宣统三年十月十八日),成都分号遭哗变士兵抢劫,随即停止。重庆分行由蜀军政府接管,曾改名为大汉银行。1915 年(民国四年),北京政府成立大清银行成渝清理处,并于 5 月 24 日《西蜀新闻》刊登公告:限 5 月 1 日~8 月 1 日,收兑大清银行银两票、银元票、本票等各种票券,过期无效。

成都开办信立钱业有限公司

1907 年 9 月(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成都信立钱业有限公司开业。该公司由成都商人李念祖筹组,仿外国储蓄银行规则,参考劝业银行宗旨,变通实施,拟订章程。公司额定资本 20000 股,每股银 10 两,总额股本 20 万两,公举总副理 1 名。5 月,先设立庶务所,招集股本。收足股本 4 成后,即于当年 9 月先行开业。次年 8 月 27 日正式注册。

这是四川最早由民间集资创办的首家商业银行。

成都自治局成立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秋,代理川督赵尔丰奉清廷上谕设立成都自治局,筹备成都自治事宜。自治局内设法制、调查、文牒、庶务四科。成都自治局直辖于成都府。

成都、华阳二县也遵旨设立议事会、董事会,以推进县地方自治事宜。其余各府、厅、州、县均以省城为楷模,相继筹备地方自治事宜。县以下繁庶乡镇,也遵令陆续设立镇会、乡会。

四川留日学生创办《四川》杂志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下半年,四川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决定以被迫停刊的《鹃声》为基础,创办《四川》杂志,公推吴玉章为主持人,雷铁崖、邓 等为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于翌年元月在东京创刊。为了加强同国内外特别是四川省内的联系,《四川》杂志除在东京设立事务所外,又在成都、重庆设分社,并在四川省内的嘉定、荣县、大竹、冕宁、会理、云阳、奉节、泸州等 22 州县,省外上海、北京、昆明,以及国外河内、新加坡、巴黎等设立代派所。

《四川》杂志以揭露外国列强侵略中国以及清政府投降卖国活动为主要内容。由于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清的特色,一出版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第一、二号出版后十五天,又再版发行,各销售四千份,第三号销售五千

份。因此,《四川》杂志很快就遭到清政府和日本当局的扼杀。1908年秋,在《四川》第四、五号印好即将发行之际,日本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将《四川》杂志查禁。

督轅设立宪政研究所

1907年12月(光绪三十三年冬月),在清廷不断颁布立宪政令、朝野一片立宪呼声中,代理川督赵尔丰开始着手筹划四川宪政,特在督轅开设宪政研究所。凡司、道、府,以及候补道、府官员,均定期参加讲习。同时饬令法政学堂在堂内附设讲习宪政速成班,凡在省城当差的大小官员,以及佐杂吏目都必须报名讲习,分班入学。本月初已全部开办。

四川设通省劝业道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为振兴实业、改革工艺制造,四川设立通省劝业道。劝业道由劝工局总办周善培调任。

劝业道设立后,统筹农工商矿各业,通饬各属开办劝工局、蚕桑学校、工艺传习所,以传授家具、皮革、陶瓷、土布、毛巾、卷烟、化妆品、漆器、丝织品、刺绣等工艺。开办通省劝业员养成所,令各府、厅、州、县选送合格士绅到省学习。第1期学员188人,结业后回

各属充当劝业员。还开办通省商业讲习所,为各属培训工商业经营管理人材。另外,劝业道署内又设立通省度量衡局,谋求度量衡整齐划一。

周善培积极支持新兴工商业,以劝业道资金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潼川(三台)锦和丝厂、三台裨农丝厂面临倒闭危机时,劝业道给予贷款,使他们重获生机。1909年(宣统元年),成都出现金融危机,银根奇紧,他会同布政使拨钱20万元维持市面。还设法帮助解决一些公司和工厂的亏累,劝业场建筑部亏损1.3万两,悦来公司亏欠1万两,电镀公司亏空1500两,都由劝业道出面通过布政使“代向商号承担押借”^①。重庆鹿蒿玻璃厂创办之初,亏折严重,几遭失业,幸得劝业道向川汉铁路公司借款万元,才得以生存。

此外,劝业道还倡导兴办成都劝业场,以及全省和各地商业劝工会、“工商赛会”,使数以千计的工商企业的名优特产得到展销,促进了全省工商实业的快速发展。在改变社会风气、革除陈规陋习方面,劝业道亦有贡献。如建立悦来茶园,为川剧演出的大众化、商业化提供了条件。加强娼妓的管理,严禁僧道借消灾念经哄骗妇女钱财和严禁虐待婢女等禁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社会不良风气的蔓

^① 《督宪批藩司劝业道会详筹办殖业银行并请先行拨款备用文》,《四川官报》已酉第22册,公牍。

延。

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春柳剧社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立我国第一个话剧(新剧)社团春柳剧社,川人曾孝谷是该社的创办者之一。

曾孝谷(1873~1937)名延年,号存吾,四川成都人。他是我国早期话剧活动家之一。1903年赴日留学,1907年2月,留日学生李淑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唐廉江(四川重庆人)等,在东京组织“春柳社”,相继公演了《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呼天录》、《热血》等剧。曾孝谷根据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译本(林琴南和魏易的译本),改编成七幕话剧《黑奴呼天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多幕话剧本,于1907年6月1日、2日在东京本乡座首场演出。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激发了留日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东京当地反映也很强烈,报纸上连发评论,获得盛誉。

四川留日学生人数居全国第六位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四川留日本学生人数为373名。据《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三年第一册《留学日本各省学生人数表》统计,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六省区分别是:湖北1366名,湖南589名,江苏558名,直隶454名,浙江448名,四川373名。

同盟会发动江安、泸州、成都、叙府武装起义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根据孙中山和同盟会总部关于在四川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和四川同盟会成都草堂会议关于在四川各地同时起义的决定,同盟会会员余英、张培爵、谢奉琦等分别在江安、泸州、成都、叙府举行了武装起义。

泸州为川南重镇、水陆要冲,战略地位重要;加之余英的哥老会势力雄厚,因此将泸州作为革命重心,同盟会的基地。余英联络巡防军哨官刘安邦和川滇黔边区会党首领刘天成及其部属刘子成、刘希成等,预定由同盟会员刘安邦、鲍九成首先在江安起义,然后顺流而下,攻打泸州。但在准备过程中,黄复生、熊克武、杨雄等人在永宁(叙永)兴隆场黄方家制造炸药不慎爆炸,黄复生受重伤,引起官府注意,特别是各路会党3000余人云集泸州城内外,旅店为满,为清吏警觉,泸州知州杨兆龙在诱捕余英不遂后,下令搜捕党人。同盟会员决定提前于1907年11月5日(九月三十日)发动江安起义,并通知成都革命党人同时行动。但是,由于江安知县预作准备,先发制人,紧闭城门,大搜革命党人,同时令巡防军阻击刘安邦部,江安起义遂告失败,泸州起义也因此未能发动。

成都起义计划由张培爵、谢持、余

切、黄方等人负责,预定在11月14日(十月九日)西太后寿辰之际,乘清吏集于会府,举行祝寿典礼时,聚而歼之。并以泸州、叙府两地响应,3处同时并举,造成全川革命声势。江安、泸州起义失败后,党人陆续潜入成都,多达100余人。11月6日(十月一日),各路会党约4000人集中成都,分住小天竺、安顺桥、茶店子,由余切指挥,闻警则发。新军和学生中党人也作好了一切准备。但是,起义的密谋被一个名叫吕定芳的学生(夹江知县之弟)泄露,省中大吏急调大军入城,实行戒严,成都革命党人起义计划流产,只好遣散党人作罢。在官兵严密搜捕中,革命党人杨雄、黎靖瀛、江永成、黄方、王树槐、张治祥6人被捕下狱。新军中同盟会员伍安全被害。

成都起义失败后,部分部门党人转图叙府,同盟会员谢奉琦筹备了叙府起义,他与曾省斋联络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县幕詹树堂发动堂勇于1908年1月14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发难,因地方团首惧祸自首,叙府知府宋联奎捕杀刘、詹二人,叙府起义亦半途而废。叙府起义总指挥谢奉琦回到家乡自流井,伺机再举,但遭到同盟会叛徒江慰然出卖,被清巡防军诱捕,解往叙府杀害。

周善培创办劝业场(商业场)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署理四

川通省劝业道周善培,与成都总商会协理樊孔周(成都图书业帮董)合作推行新政,发起创办劝业场。樊孔周以总商会名义约集各帮商董及热心成都实业的知名绅士召开筹备会,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成都劝工场。

樊孔周受命后,拟集股章程16条,规定了集股宗旨、办法、权利义务,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劝业场筹得股金银40000两,全数收足,樊孔周等选购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老盐店一带地皮作为劝业场地址,总商会具禀详请商务局并转护督赵尔丰批准,同时聘请公司董事重庆鹿嵩玻璃厂总理何鹿嵩为庶务员,总商会科长谢霖为会计员,全部工程由成都著名建筑营造商江建廷设计修建,当年7月(六月)开工,数月后竣工,开工后不久,周善培即将商业劝工会(花会)改为劝业会,又将劝工场改为“劝业场”。

劝业场全长近30余公尺,分前场、后场,中有东西支路,前场口南向总府街,后场口北向华兴街。场内建筑为仿埃及古代建筑,一楼一底,楼呈通廊式,前后贯通,楼上楼下全为商店,共有150余间店铺,准备集中成都富有特色的商号商家汇集于此,使之家家有特色,户户有专长。

全省学务概况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四川全省学务发展情况见下表:

学务项目 学堂类别	学堂数	教员数	学生数	毕业生数	备 注
高等学堂	1	22	229	235	本年度统计：全省各类学堂共有职员6407名；共拨教育经费银1421242两，共支出1444157两，不敷经费银22915两。
法政学堂	1	5	258		
通省师范学堂	1	5	334	108	
优级师范学堂	1	28	632	107	
游学预备学堂	1	20	220		
铁道学堂	1	12	183	36	
客籍学堂	1	12	103	50	
江南学堂	1	6	80		
模范小学堂	1	5	56		
模范女子小学堂	1	8	101		
淑行女子中学堂	1	5	75		
中学堂	48	366	5074	205	
师范学堂	27	106	1712	1116	
高等小学堂	244	882	11560	328	
两等小学堂	368	1011	15970		
初等小学堂	6857	9194	200863	13	
女子初等小学堂	67	141	2060		
半日学堂	160	210	4725		
蚕桑传习所	1	3	47		
英文学堂	1	1	15		
农业学堂	4	16	107		
民族学堂	1	3	24		
女子师范学堂	1	3	10		
初等医学堂	1	2	18		
艺徒学堂	1	5	42		
体育学堂	1	6	40		
共计	7793	12077	244538	2198	

法国探险家考察大凉山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曾经主持过建昌教会的法国传教士盖布里昂为法国探险家多龙作向导,由宁远(西昌)出发,自西向东横穿大凉山。在记述此次旅行的书中,多龙称盖布里昂“走遍了宁远府的所有水路,掌握了亚洲探险活动的全部情况。他的足迹遍布保保山——长江间的每个角落……我们所到之处沿途都有天主教徒放着鞭炮列队欢迎我们,听我们使唤,给我们通风报信,充当我们与保保人(彝族)的中间人。”^①

省商务总局统一省平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省商务总局鉴于各地称量银两的平码种类繁多,商贸交易中银钱收付折算极为繁难,根据清廷谕令,规定以正九七平为全省通用制平。并于次年札饬各府、厅、州,城乡市镇所用砵码,都改用正九七平。除藩库出入仍用库平外,其它官私银钱收交,一律以正九七平砵为准。省商务局颁发各地砵码,成都、重庆及各府、厅、州设公码局。

四川开办矿业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四川全省新开矿业如下:

梁山县陆家桥铅矿,由某绅集资开办。

汶川县矿厂,某君游学归里,拟集资开采该县西路矿苗,已具禀批准。

马边屏山铁矿,马屏二县交界处铁矿旺盛,质量甚高,该处某绅粮集股开采。

天全铜矿,由徐某集资合众开办,所炼之铜,色质俱佳。

彭县朱家山铜矿,由李某集资开办,设炉化铜,成效显著,该矿旋被划归造币分厂。

万县铜矿,由某绅邀请各商家集股试办,以禀告当局。

新宁县(开江)铜矿,由某君请准开采,一切均参照西法,开办至今,成效显著。

四川开办各式印刷出版企业

1907~1909年(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四川开办各类主要印刷企业如下:

重庆分设商务印书馆(1907年)。

重庆开办聚义和印刷厂(1908年9月)。

成都开办国书局石印公所(1907年),主办者傅樵村,拥有股本5000余元,订购外洋石印机器各一付,承印铁路公司股票220万张。

成都开办照像楼印刷所(1908

^① 张良春《解放前西方人在凉山彝族地区的活动》。

年)。

成都开办正宜出版有限公司(1908年9月),专营出版业务和药品销售。

上述印刷出版企业,除印行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外,还印刷出版新式书刊数以千计,包括大、中、小学教科书、西洋科技、人文书籍、中外小说、艺术、体育等等,对于近代四川思想、文化、社会变革均起了重要作用。

省城开办“淑行女学堂”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华阳举人陈慎言创办“四川淑行女学堂”,招收能识字书写的女子入学,分别讲授初、高中课程,成效显著。不久,清廷学部令各省在省城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一所,于是该校改名为“成都淑行女子师

范”。在校长陈慎言的苦心经营下,女师扩充校址,增加班次,提高教学质量,成为川省女学的榜样。1914年(民国3年)春,改名为“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经由重庆关进口货物总值为1597.6万海关两,出口货物总值为1108万海关两,外贸总值为2705.6万海关两。其中,洋货进口总值为1332.3万海关两,土货直接出口总值为2.56万海关两。外贸总值比上年减少200万海关两。主要原因是:白银对黄金比价下跌影响了外贸进口;部分商人进口棉纱和原棉改用厘金船,便于他们在途中销售。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加任驻藏大臣

1908年3月6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湖广总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前任四川总督陈夔龙调湖广总督;同日,谕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11日(九日)清廷谕令

同时任命赵氏兄弟分掌川藏重权的理由是:“以免杆格而便联络”,“西藏为川蜀藩篱,……举凡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利便交通,以及添置官吏,整顿庶政诸大端,均应及时规划,期于治理日益修明。”四川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藏“无分畛域,随时接济。”^①

^①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170~171。

6月9日(五月十一日),赵尔巽抵达成都,16日(十八日)接川督印视事。赵尔丰同日卸任护督。次年10月(九月),赵尔巽兼署成都将军。

川江轮船有限公司成立

1908年3月16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川江轮船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后,资本主义各国加紧掠夺川江航运权。法商捷足先登,组织东方轮船公司率先注册开航。川省官绅深为忧虑,护督赵尔丰密令劝业道周善培赴渝鼓动绅商组织轮船航运公司。经与重庆绅商反复筹议,并经清廷批准,创办官商合办川江轮船有限公司。

公司股本定为白银20万两,官认40%;其余60%由绅商分认。实际筹款情况是:官本40000两;重庆绅商集资45000两,后又由川东道陈蓉曙分派36属绅商,集资24700两,加上利息1500两,合计收足金额111600两。由于股本不敷,旋又拉重庆商会曹漱珊、赵资生、李裴知共办,由重庆票号天顺祥号垫付30000两,后由绅商陆续归还。

公司开办之初,股东会议公推曹漱珊为总理,赵资生为协理,并聘英国工程师蒲蓝田为造船顾问。公司以92000两船价向英国所尼厂订购江轮机器、部件,并运往上海江南造船厂装

配。1909年(宣统元年)8月,全船告竣,并附带拖驳,命名“蜀通”。该轮全部开支,包括装配、修缮及各种杂费在内,共耗资120500两。“蜀通”轮为双暗轮式锅炉、水管式引擎、600匹马力,时速13.5海里。如带拖驳,时速11海里,拖驳载重量159吨,客舱12位,统舱68位。“蜀通”轮自1909年9月开航,往来重庆、宜昌间,每月2次。行驶数年,略有赢利。这是四川第一家民族资本开办的轮船公司,也是本国商轮首航川江。

外国人勃洛克到川探险遇害

1908年3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外国人勃洛克由成都出发,在大金川区从事探查测量工作。

11月(十月),再次由成都出发,经雅安至西昌,拟由此去印度,因未等候到同行者,勃洛克只身先进大凉山调查,在当地遇害。勃洛克除测量工作外,“对川康山地之动植物颇注意,曾采获若干稀见之植物标本。”

同年,外国人摩尔到川边考察。

各地会党起事

1908年5月(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安县草鞋街红灯教举事,毁教堂,并与清军团练发生激战。

6月(五月),绵竹通口场教堂被红灯教捣毁,与此同时,红灯教首领谭德全率众占据达县东檀木场顺水寨,

知县调集兵力前往镇压,“相持数日”,始散去。

无生教门首领苏子林、孙膏如等在省城内及附近州县传徒结众数百人,自称梧花王、元帅,他们以“外国教堂势大,民穷财尽”为号召,刊印起事票单,每人一张,以票为符,以“天德”二字为见面口号,以天地人和四字为起事口号。并拟定于12月1日(十一月八日)夜,在省城内外同时放火为信号,聚众入城,先打军械所,并抢劫藩署银两,再烧抢各衙署、教堂,谋举大事,并约定在金堂、彭县“同时并举”,事为清军侦破,苏、孙等10余人被捕牺牲。

省内旱灾、雹灾、水灾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夏,雨水稀少,旱情严重;7月(六月)以后雨水过多,秋禾糜烂;间有大风、冰雹摧毁田禾房屋。成都府、绵州(绵阳)、建昌(西昌)、永宁(叙永),以及川北和川东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

自流井盐业工人大罢工

1908年6月1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三日),富顺和荣县及所属自流井、贡井发生盐业工人大罢工,全城商店和盐井均停止营业和生产,抗议官

府对商店和井灶户增收20两白银的警察捐,并勒令降低盐价。工人组织抗议集会,反对清政府的搜括。官盐局竟令营兵杀伤罢工群众,导致“民情愈为愤激,蜂拥入局,毁坏窗棂垣墙,其势汹汹”,罢工人数达到20000人^①。川督飭令富顺知县出面,采取剿抚结合办法,平息了盐场抗议活动。

成都悦来公司开办新式戏园、旅馆

1908年8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成都总商会协理樊孔周等集商股银2万两(后增至3.5万两)成立悦来公司,由公司开设戏园和旅馆各一。

戏园名悦来茶园,在华兴街购地修建,仿照可园,接纳各戏班轮流演唱。1909年(宣统元年)告竣,先后接纳“复兴班”、“宝顺和班”(京戏)、“翠华班”、“长乐班”、“荣泰班”(川戏)、“文明班”、“文化班”(改良川戏)等轮流上演。其间曾举办过两次赈灾演出,邀请成都八大班名角串演,盛况空前。悦来茶园的开办,这是川戏由堂会、庙会向近代舞台演出发展的重要开端。

悦来旅馆于1909年6月(宣统元年五月)开张,规模甚大,可接待旅客近百人。旅馆有浴室、电灯、冷热自来水等新式设施;并雇请名厨操作,供应中西餐。旅馆服务周到,使客人有“宾

^① 《广益丛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至如归”之感。悦来旅馆是四川第一家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大旅馆。

德格土司全境改土归流,川边行政变化

1908年9月(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驻藏大臣赵尔丰入藏行抵打箭炉,因德格土司兄弟争袭,互相屠杀,赵尔丰乘机消灭了受西藏三大领主支持的昂翁降白仁青一派,迫使德格土司多吉僧格接受清廷改土归流政策,赵尔丰乃奏请将德格以及春科、高日、灵葱土司的郎吉岭一村改设流官,设置登科府(石渠南洛须)、德化州(今德格)、白玉州(白玉)、石渠县、同普县(今西艾江达),并设边北道以统辖各府州县。

同年,改叙永厅为永宁直隶州,升打箭炉厅为康定府,升巴安县为巴安府。

悦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开业

1908年10月2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由成都总商会周均德等发起,招集股银25000两,在劝业场附近创设悦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获准立案。该公司于上海购买40千瓦电机一部,建厂发电,供劝业场照明。劝业场首创电灯照明后,场口高悬园形大电球,每日黄昏发电时,人群拥挤,灯光骤明,群情欢呼,热闹非凡,川西

各县农民也纷纷进场观看电灯。

四川矿务总公司成立

1908年12月18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准清廷,设立四川矿务总公司,除现在官办各矿,及华洋商人禀准已开之矿外,凡川省未开矿产,概归总公司承办经理。此后无论本省外省外埠绅商,有愿开办四川之矿者,只准指定矿区作为总公司之分公司,用人理财,总公司并不干涉,一切章程悉遵矿章及总公司定章,用归划一。总公司先集华股银300万两,如有不足,或由官量筹补助,或再续招股本,一面遍查矿地,议价收买,一面择要先采。所有提成纳税,均照矿章办理。拟将全省矿产区分为五路:成绵道属为中路,建昌道属为上南路,永宁道属为下南路,川东道属为东路,川北道属为北路。每路派总、协理各一人,分任其事,共同办理总公司一切事务,以专责成,并互相监督,将来公司成绩渐著,还须附设矿业银行,以融通资金。总公司成立后,议定资本400万两,官商合办,其招股之法,以50元为整股,5元为零股,分两期缴齐,月息8厘。惟不收洋股,以杜利权外溢。

1908年四川学务概况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川全省学务发展情况见下表:

学务项目 学堂类别		学堂及学务 机构	职员数	教员数	学生数	拨入经费 (两)	支付经费 (两)	资产数 (两)
专门学堂		8	30	77	1391	151168	141537	465016
实业学堂		8	22	48	733	48218	48538	250316
师范	优级	3	6	24	678	45173	46102	37086
	初级	6	12	36	285	13023	5333	36950
	传习所	9	20	34	336	4236	4457	55
中学堂		51	126	424	5323	345202	317962	1139374
小学	高等	221	255	811	10694	338722	309709	1569498
	两等	360	378	933	16108	124479	127271	497277
	初等	8014	3978	9019	233770	635949	635589	1378234
蒙养院		3	4	10	226	2942	2757	2750
半日学堂		159	69	170	4738	8665	9052	12324
女子学堂		84	55	138	2838	11170	8519	22796
学务公所		1	21	2		269612	78343	59333
劝学所		143	1189			459376	334296	2154302
教育会		42	88			7080	4818	2567
宣讲所		234	281			1856	2385	905
共计		9346	6534	11726	277120	2466871	2076668	7628783

川南瓷业公司创办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川省商务局在荣昌、隆昌两县创设川瓷公

司。计划在实业学堂特设实业科造就技师,同时派官费生偕同荣隆地方自费生赴湘省醴陵学习。商务局即派员

赴日本“延聘技师,购买机械药品,以图开办工厂”,因实业学校划归提学使,办厂计划遂中辍。但从日本订购的三万余元机料已抵川,废置可惜,即由劝业道招商承顶。时值荣隆两县绅士黄光藻、郭文襄、余星奎等集资开办瓷业,以5万元承顶川瓷公司机械药品,厂址改设泸州,价银自公司成立的第四年起,分为七年摊还,并给予15年专利。该公司共耗资8万,才于1910年(宣统二年)建成投产,开始生产成品。

本年四川财政收支情况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川省岁入之款,分田赋、盐课税厘、茶课税厘、土税、关税、杂税、厘金、杂捐、官业杂款,为10类,岁出之款,分解款、协款、行政总费、交涉费、民政费、财政费、典礼费、教育费、司法费、军政费、实业费、交通费、工程费、边藏费,为11类,总计岁入共银15520640两,岁出共银15167836两,出入相抵,有盈余350000余两。但内有补收、预收、借收者,有应解、应发还未支者,如逐项厘剔,所短尚数倍所存。

留日四川学生组织工商学生协会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留日四川学生在日本组织工商学生协会。主要目的是发表工商业改良意见,介绍国内外精良机器,报告工商情况,帮助

采购机器等。

四川地方自治局、通省自治研究所成立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根据清廷宪政编查馆编订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有关规定,川督赵尔巽将成都自治局加以扩充,改名为四川全省地方自治局;并将成都自治局开办的自治研究所改为通省自治研究所,作为全省推行和研究地方自治的专门机构,赵尔巽饬令各州县保送学生或绅士二人赴所学习自治。

四川地方自治局仍设法制、调查、文牒、庶务4科,由布政使、提学使、按察使为总办,巡警、劝业、盐茶三道为会办。自治所研讨的科目有:1. 奏定宪法纲要;2. 法学通论;3. 现行法制大略;4. 咨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5. 城乡自治章程学。

四川设咨议局筹办处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川督赵尔巽在成都设立咨议局筹办处,会集官绅公议筹办事宜。按照会议决定,由布政使王人文充任总办,提学使方旭、巡警道高增爵、在籍翰林院编修胡峻、在籍即用知县邵从恩充任会办。设立文牒、法制、选举、庶务4科,制定了《筹办处章程》。

此项宪政的实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早在1905年,袁世凯、周馥、张之

洞已联衔上疏,请定宪政。1906年9月1日,清廷颁谕仿行宪政。1907年9月,清廷宣布设立咨政院。10月,下诏各省设立咨议局。1908年11月,光绪帝病歿,宣统溥仪继位,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决心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为挽救腐朽衰落的清王朝,摄政王载丰急令各省成立咨议局。同年底,川督赵尔巽遂在成都设立咨议局筹办处。

川省成立“经征局”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川各府、州、厅、县、卫成立“经征局”。经征局负责征收从前由知县征收的房地契税、执照税、屠宰捐、酒捐、油捐等。为了支应这些新局的经费,各局收数的1/10拨为保留款项,其余9/10缴交藩库。

四川开办各类企业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川全省新办棉织、矿产、肥皂企业如下:

荣县织染公司,由王某开办,1906年他自费赴日本研究织染专科。1907年回籍,创设公司,已织出成品10余种,其中以芝麻呢、槟榔布等最为畅销。并附设初级实验学堂,招学生数十名,专攻织染专业。

重庆协利织布厂,创办人苏炳章,拥有铁轮机105台。

重庆江北福泰公(蜀华)布厂,资本额8000元。

成都因利织布厂,开办人樊孔周,资金15000元,织机40余台。

合州保存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保存矿权、抵制洋煤,仿云南保地会办法设立,集办公司资本共1000股,每股100两平漂银。

泸州铅矿,由泸州陶某集资开采。

夔万煤矿,由巴县某绅集众筹商,为供应川汉铁路需煤,拟集资赴夔万各处产煤丰富之区,择地禀官,先行试办。

西充县煤矿,由县绅周某集资试办,经延请矿师考察,始知煤苗旺茂,拟集资开办,已约定多人。

成都开办的第1家肥皂企业——官办裕德肥皂厂,资本额为13000元,年产肥皂18000打。

川省缩短禁种罂粟的期限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下令将禁种罂粟的期限缩短为两年,具体实施办法为:本年春播季节,凡过去种植罂粟的农田削减一半种植面积。凡是从未种过罂粟的农田和虽曾种过,但因受自然灾害影响或歉收的农田,今后一律不得再改种罂粟。不久又发布补充文告规定:地主和实际耕种者均须执行上述命令,否则将受严厉制裁。

据英国驻华公使统计:四川全省吸毒人数为315万人,全省每万人中瘾民比率为17%,全国平均每万人中

瘾民比率为9%，四川瘾民比例数量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比率。

这一禁种命令的发布，立即引起四川鸦片价格的扶摇直上。四川生土每担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的220海关两上涨为300海关两，云南生土从1907年的380海关两上涨为480两。四川熟土的价格为每担450海关两，云南熟土为710海关两。1909年（宣统元年），川生土的价格上涨到每担350海关两。同年11月，当人们知道1910年（宣统二年）将完全禁种罂粟后，市场价达到每担500~550海关两。

与此同时，出现了土烟出口中川土数量下降的迹象。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经重庆海关出口的烟土为10378担。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为烟土出口高峰，达到16429担，其中川土数量为13045担，南土为3380担。1909年（宣统元年），烟土出口数量为13106担，其中川土仅8449担，南土4657担。虽然有将川土与南土混合，冒充南土，以谋取高利的情形，但并不是川土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川土假冒南土，不是禁毒令开始后发生的）。川土出口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川督禁种罂粟命令生效后，罂粟播种面积

减少，鸦片产量下降造成的。

1909年秋，川省禁烟活动到了关键时刻，川督下令不得再播种任何罂粟。这一禁令的成效如何，重庆海关作了专门考察。考察报告说，这“对很多地区都是直接的考验，但最大程度地清除罂粟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毫无疑问的事实。可以说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罂粟已不存在，从40多个中心市场收来的可信报告说，罂粟的种植已经停止。1908年底时，许多公路的两旁是数千亩的罂粟地，现在连一株罂粟也见不到了。”^①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经由重庆关进口货物总值为1819.1万海关两，出口货物总值为1299万海关两，外贸总值为3118.1万海关两，其中，洋货进口总值为1387.2万海关两（直接进口洋货总值21.9万海关两），直接出口土货总值为1.69万海关两。

重庆海关进出口货物的特点是：棉布进口量大幅度增加，棉纱供不应求，煤油的进口量激增，牛皮销量下降，山羊皮销量激增，生丝、废蚕茧销势看好，土药的进口值加翻，出口值也有很大的发展。

^①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页316~317，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1909年(宣统元年)

省城举办第三次商业劝工会

1909年(宣统元年)春,经川督批准举办省城第三次商业劝工会。劝工局在给全省工商业的飭文中说:在第三次商业劝工会上评选优质获奖产品,确定四等奖赏。凡能制备某种机器,无论仿造,或是购买现成机器,生产日用必需品,授与头等赤金牡丹奖牌;如能以高超的手艺创制四川前所未有而又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精美产品,授与二等镀金荷花银奖牌;如能革新四川原有各种日用必需品和工艺品生产技艺,卓有成效者,授与三等海棠银奖牌。其它较有质量的产品,授与四等梅花铜奖牌。

劝工局飭文强调说:“只要真正制备出好机器、好东西,本局不但给予头等奖牌,并且可以申请一定年限的专利,还可以代为招股,增加资本”。^①

当年4月(三月),成都、重庆和省内外府厅州县送往青羊宫参展的新式工业品、农业陈列品多达数千种,如劝工局的各种绣品,乐利公司的各式洋纸,电镀工厂的电镀五金器,内江的蜜饯糖食,绵州的各色花素大绸,荣昌、江

津的各式提花麻布、加宽夏布、弓箭,泸州花酒、织布机,各地研制的打谷机、破碎机、吸水机、解剖镜、显微镜和数量繁多的农副产品等,使青羊宫商业劝工会展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有力的促进了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

同盟会发动广安起义

1909年3月1日(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晚,四川同盟会在广安县发动武装起义。

四川同盟会在川西南发难的计划失败后,准备寻找机会在同盟会势力较强、官府控制较弱的偏僻山区再次发动起义。1909年初,余英、熊克武约集川东北革命党人和部分会党首领在大竹县女子学堂开会,决定于当年3月1日晚在广安县发动起义,同时发动大竹、邻水、长寿等县群众响应。然后集中各地起义力量,攻打顺庆(南充)府,占据川北为革命根据地。

3月1日晚,由于大部分会党未能准时赶到广安,而风声已泄漏,州县官为之惊惶失措。余英决定提前到晚上九点发动起义。晚九点正,熊克武率数人假扮斗殴呼冤的群众,出其不意

^① 《四川官报》戊申(1908年)第一册,新闻,页2。

地攻入州县衙大堂,守卫衙门的把总弃众逃跑,剩余营兵、堂勇人心涣散,纷纷逃窜。知县吴懋下令紧闭城门,增派兵勇把守;同时截断交通。余英、廖从云等人被官兵拦阻,幸得熊克武部支援,才击退官兵,攻入巡防营,缴获枪械数十支。义军与官兵激战通宵,但敌众我寡,天色将明,熊、余考虑无获胜希望,才在晓色掩护下,分头杀出城去,随即将队伍解散。

事后,官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何忠恕、雷大和、蓝绍先被捕斩首。王晓澄、陈云九、萧俊等被捕后遭严酷刑讯。川北一带革命由此转入低潮。

成都劝业场开张

1909年4月3日(宣统元年三月初三日),成都劝业场(今商业场所在地)正式开张营业。四川劝业道周善培主持开场仪式并发表简短演说,省城司道官员、各界绅商、名人耆旧应邀出席仪式。

劝业场内本省名优商品争奇斗艳,计有:鹿嵩玻璃厂出品的五彩描金玻璃器皿、大小水银玻镜,因利织布厂(樊孔周开办)生产的各色新式机织花布,长发美制造的通景摹本、时花摹本,马正泰、马天裕生产的水丝浣花巴缎、百子图被面,裕国春制造的宫粉香胰,松竹轩织造的刺绣绢扇,荣生久剪裁的新衣皮袍,鼎荣生制造的各种官帽,熙德隆生产的各式靴鞋,醉墨山房

特制的精美刻磁,三都重出售的书画雅品,谦益祥雕琢的各种玉器,等等。

场内南北商家云集,有京广货铺、苏广货铺、绸缎铺、大绸局、古玩玉器铺、福烟铺、书铺,还有风行一时的扇帮。商品陈设五光十色,有巴黎香水、外国自行车、台湾番席、西洋裁绒、八音钟表、金丝眼镜、广东糖食、福建丝烟、京戏戏厘、北京丸药、纸烟、洋酒、留声机器等。

四川审判机关的创设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按照清廷宪政建设计划,四川省成立四川审判厅筹办处,统管全川审判机构的筹建事宜。经四川审判厅筹办处报请中央批准,四川第一批成立的审判厅有:1、四川高等审判厅,2、成都府、重庆府地方审判厅,3、成都县、华阳县、巴县初级审判厅。

1910年12月2日(宣统二年十一月一日),四川高等审判厅(厅址在成都市正府街,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在地)、成都府地方审判厅、成都县、华阳县初级审判厅同时成立。

1911年1月1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一日),重庆府地方审判厅、巴县初级审判厅同时成立。

在上述审判机构成立以前,四川无独立审判机构,民刑案件由各级行政长官审理。四川第一批审判厅的建立,标志着四川司法审判与行政机关

开始分离,四川近代司法体制开始形成。

此外,各级检察厅附设于各级审判厅内,与审判厅同时成立。

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1909年(宣统元年)春夏,四川全省各地相继遭受严重风、雹、水、火灾。4、5月(三、四月),资州、绵州、茂州、梓潼、德阳、井研、广元、巴州、开县、江油、罗江和洪雅等州县久旱无雨,栽种失时;忠州、屏山、西昌、丰都和昭化等州县风雹成灾,春粮被毁。6月(五月)以后,酉阳、秀山、彭水、营山、广安、岳池、蓬州、南部、隆昌、乐山、犍为、夹江、大邑、巴县、长寿、涪州、南川、大足、江津、永川和璧山等州县,阴雨连绵,河水暴涨,田庐禾稼多被冲毁,人畜淹毙,生计断绝。涪州水灾之后,又继之以大火,城内街房烧掉数间。广安州6月(五月)连旬大雨,渠江水陡涨5米,冲毁人畜、房屋、船只无数,大水灌城。境内山洪齐发,田禾被淹,木石桥梁均遭冲毁。巴县梁滩坝中下之区,霖雨连旬,沿岸稻禾悉遭淹没,几无收成。7月31日至8月1日(六月十五、十六日),境内接龙场、彭家场和界石场突发狂风暴雨,夹杂鸡蛋状冰雹,摧毁房屋庄稼,损失惨重。

全省大小春收成仅四成有余。

长寿县创办机制面粉厂

1909年(宣统元年),长寿县人孙建中、舒绍芳和陈廷璋集资在县城外东街创办机器面粉厂,命名为“禁烟改种纪念公司”,此名是根据当年认真禁种罂粟、原有烟田改种小麦的史事命名的。该厂资本额为23.80万银元,日产面粉600袋。每斤售价70文,比平常面粉约贵20文。这是全省面粉工业之始。

劝业道招集绅民倡办“森林公司”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劝业道招集绅民组织森林公司,基本股金100万两,以百两为一整股,10两为一小股,官商各半,限日成立。

清廷与英、法、德三国银行拟订借款合同

1909年6月(宣统元年四月),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草拟湘鄂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共借款550万英镑,利息常年五厘,九五扣交付,25年为期。规定用英国人为粤汉铁路总工程师,德国人为鄂境川汉铁路总工程师,英、法、德有优先供应铁路材料、机器、什物的特权和铁路建设的监督权,为此川湘鄂粤人民因此纷起反对。

成都创办启明电灯公司

1909年7月6日(宣统元年五月

十九日),由绅商陈嘉爵等 16 人发起,集资创办启明电灯公司,经立案注册,划定城厢内外为营业区,择定中新街为厂址,实收股本 34850 元,购置锅炉、电机两部,可供电灯 1500 盏。因“供不应求”,复购 40 千瓦直流发电机一部,旋又购 75 千瓦交流发电机及 100 匹马力发动机一部,扩大营业范围。因川路事起,营业未臻发达,公司债台高筑。

四川省咨议局成立

1909 年 10 月 14 日(宣统元年九月初一日),四川省咨议局在成都成立。由各州县选出的议员 105 人出席成立大会。

四川总督赵尔巽向会议致训词,内容分为六方面:一为“融畛域”,说明官绅融洽、共图自强之义。二为“明权限”,说明官权、民权界限,咨议局议政之权不可漫无边际,必须局限在咨议局章程 21 条范围;除此而外,“皆非咨议局所应过问”。三为“图公益”,阐述兴利除弊,造福国民意义。四为谋远大,即要顾及本省本地眼前利益,也要考虑国家长远利益。五为“务实际”,劝谕议员对欧美民主政治有所取舍,要符合本国惯例习俗。六为“循次序”,告诫议员不可求治太急,要循序渐进。

议长蒲殿俊代表全体议员致答词,赞同赵尔巽所言六事。与会官员尚有:成都将军马亮、布政使王人文、提

学使赵启霖、按察使江毓昌、巡警道高增爵、劝业道周善培、盐茶道尹良、成都府于宗潼等。

会议选举蒲殿俊为议长,肖湘、罗纶为副议长。

省咨议局议员根据清廷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第三条规定的条件,通过复选法选出。章程第三条内容是:

凡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 20 岁以上,具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为咨议局议员之权:

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 3 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到文凭者;

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

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

五、在本省地方有 5000 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同时规定:“不识文义者”、“娼优隶卒等贱业之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按照上述规定确定的选举人均为有学历、有宦历、有钱财的绅士和商人。全省选举人总数 191530 名,议员定额为 105 名,即每 1824 位选举人中产生一位议员,按这一比例在各府州产生的选举人和议员人数如下:

选 区	选 举 人	应选议员	选 区	选 举 人	应选议员
成都府	24608	14	绥定府	7277	4
绵 州	7120	4	忠 州	5342	3
龙安府	2690	1	酉阳州	5519	3
茂 州	992	1	保宁府	11212	6
雅州府	3506	2	顺庆府	10582	6
宁远府	5921	3	潼川府	12620	7
眉 州	2847	2	叙州府	9803	5
邛 州	3712	2	泸 州	2133	1
重庆府	28781	16	资 州	11613	6
夔州府	14169	8	嘉定府	15244	8
共 计				185691	102

川汉铁路公司选举董事

1909年12月14日(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二日),川汉铁路公司选举董事如下:川东余农苑、肖湘、邓孝然、江树;川西刘昌庭、杨藻;川南汪世荣、张文焯、刘振圻;川北沈敏政、陈宗瀚、王余淮、查帐人陈一夔、郭成书、范子安、客籍李箕孙。

川汉铁路宜万段开工

1909年12月28日(宣统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川汉铁路宜万段举行开工典礼,宜昌至归州三百余里间同时动工,聚集修路工人成千上万,本日成为川路开工建筑的开始。这以前,四川护督赵尔丰电请邮传部任命詹天佑为

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又任命颜德庆为副总工程师。詹天佑、颜德庆先后赴宜昌,亲划工段,勘测路线,制定工程计划,在宜昌建立了工程局。

四川开办棉织企业

1909年(宣统元年)四川全省举办的棉织企业有:

中江利华布厂,1913年由中江迁成都。

简州织布厂,魏用予留学日本归里,发明新式织布机器,约集同志,集股2000元,设厂制造。该厂利用简州所产棉花,制造棉布。

万县文锦公司,由奉节王光德等、万县余雅轩等、云阳敬聚五等筹资组

建。其织花染色,均仿北京织布厂办法。

四川开办机械电镀企业

1909年(宣统元年),吴友成于成都南门开办四川实业机械厂,专门制造民间小工业所需机械,颇著成效。

同年,成都开办华昌电镀厂,锅炉设备齐全,邀宁波技师三人负责生产,专门对金属制品进行电镀加工。

四川财政收支情况

1909年(宣统元年),四川岁入总数为1730余万两。各项财政收入如下(藩库平银,以两计):

1. 地丁、火耗、津贴、新旧捐输:430万两;2. 盐款:630万两;3. 契税:310万两;4. 厘金:70万两;5. 肉厘:110万两;6. 酒烟税厘:100万两;7. 糖、油、税捐:60万两;8. 关税、杂征:10万两;

同年,四川岁出总数为1700万两。各项财政支出如下:

1. 本省文武各官正俸、养廉:13万两;2. 京饷:48万两;3. 东北固本军饷:12万两;4. 甲午战争赔款:60万两;5. 庚子赔款:220万两;6. 甘肃、新疆协饷:200万两;7. 贵州协饷:50万两;8. 代贵州拨解庚子赔款:20万两;9. 云南协饷:30万两;10. 本省制营、满营兵饷:100万两;11. 防剿经费:140万两;12. 新军十七镇饷银:

150万两;13. 各州县公费:110万两;14. 将军、总督、以致各府公费:40万两;15. 成渝两地警费:40万两;16. 弥补摊捐款项:70万两;17. 全省各局所经费:250万两;18. 学校经费:60~70万两;19. 其它京、协、洋各款汇费及各项杂用:70~80万两。

民间晋丰银行在江津成立

1909年(宣统元年),江津盐商陈鼎臣、陈兴成兄弟,在亲友中集资银10万两(其中陈氏家庭族股本占70%),报请农工商部批准,成立晋丰银行。总行设江津县城,重庆设有分行。因经营亏损,于1924年(民国十三年)关闭。这是四川早期开办的民间商业银行。

各地纷纷成立商会

1909~1910年(宣统元年至宣统二年),川省成立商会蔚然成风,各地商人纷纷出面筹立商会,两年间,全省各州县共设商会81处(其中1909年48处,1910年33处),其数量超过全国其它省份。连同1909年以前成立的5处和1911年成立的12处,清末全省商会合计98处,在全国各省商会合计793处中占12.36%,名列各省区之冠。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09年(宣统元年),经由重庆关

进口货物总值为 1828.7 万海关两,出口货物总值为 1417.7 万海关两,进出口贸易总值为 3246.5 万海关两。其中,进口洋货总值为 1404.9 万海关两(直接进口洋货总值为 24.6 万海关两),直接出口土货总值 1.3 万海关两。

重庆进出口贸易的变化情况是:原色布销量激增,白布从 83822 匹增加到 109712 匹;染色布和花布销量下降 30%。毛巾、袜子销量激增,棉纱受银钱兑换率的变化进口量下降。废蚕茧和山羊皮的出口量猛增,绵羊毛、鸡鸭毛出口稳定上升。

1910 年(宣统二年)

同盟会发动嘉定起义

1910 年 1 月(宣统元年十二月),四川同盟会继广安起义后,发动了嘉定(今乐山市)起义。

1909 年 6 月(宣统元年五月),余英、熊克武等同盟会领导人在荣县方家冲但懋辛家中开会,决定在嘉定、屏山再度发动起义,以重整革命党人土气,掀起武装斗争高潮。

1910 年 1 月 23 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秦炳、程德藩等率百余名义勇,伪装募兵官兵,突然来到嘉定童山场团练局,乘团丁不备,夺械而去,宣布武装起义。接着,余英、税钟麟等也袭击白马埂、杨家场、板桥溪等处团练局,夺获大量枪支弹药。“并劫嘉河炮船 8 只,获快枪百余支,断电线以

阻清官兵消息。”^①起义军“遍张文告,晓谕居民,公然以汉军政府著称”。义军拟“乘夜潜攻嘉定郡城”^②,但因消息泄漏,加之余英突然发病,义军未能及时行动,使清军得到从容布署岷江河防的时间。起义军无法渡河,只好退往屏山。次日,嘉定追兵和马边,屏山官兵在宋家村夹击义军,激战从早到晚,义军伤亡甚重,弹尽粮绝,趁夜突围。税钟麟、邹德高等十余人因伤重被俘,在犍为、嘉定等地遇害。

嘉定一役,义军死伤 200 余人,同盟会许多优秀人才也过早牺牲。1910 年 3 月(宣统二年二月),余英率部分同志赴川滇边境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因被叛徒出卖,在豆沙关断蛇坡被捕,解往叙府被害。

^① 《蜀中先烈备征录》卷一,“烈士王九皋事略”。

^② 《蜀中先烈备征录》卷一,“邹国宾税联三合传”。

成都再办“商业劝工会”

1910年3月2日(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成都青羊宫再次举办“商业劝工会”。全省各府、厅、州、县工艺品和手工业产品在会上展销,南北各省商贾也踊跃赴会,形成万商云集,千品斗艳的商品竞销热潮。

省城开办女子学堂

1910年3月上旬(宣统二年正月下旬),四川劝业道主办的公立女子蚕桑讲习所如期开学。分设正科、别科两班,正科60名,招收14至17岁女生,正科两年毕业后派充丝厂教习及管理。别科一百名,收15至20岁女生,半年毕业后,派充各丝厂生产骨干。

省城北门外私立福贞女子学堂开学,收学生60名,以上均免收学、杂费。

英美各教会联合创办华西协合大学

1910年3月11日(宣统二年二月初一日),由美以美会、英美会、公谊会、浸礼会四个英美基督教会联合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今华西医科大学前身)在成都锦江南岸该校理科临时教室正式开学,当时入校新生共11人,教师8人(中籍2人,西籍6人);开设文(分为普通文科和政治、历史二组)、理、教育三科。1914年增设医科,1917年增设牙科,学校课程亦用英

文,学生除专业课外,还必须修宗教课程和参加宗教活动。

华西协合大学酝酿于1904年,美以美会负责人毕启、甘莱德,英美会负责人启尔德、杜焕然,公谊会负责人陶维新等,在成都商之后,草拟了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提交华西教会顾问部通过。1907年,华西协合大学理事在成都选定校址,购地300余亩,兴修校舍,划定教学区,以中央为公共场所,四周为“宿舍”区。每舍占地约60亩。1909年,首先在新校舍开办一个附属中学(华西协合中学),1910年3月11日正式开设大学。

甘孜改土归流

1910年3月27日(宣统二年二月十七日),赵尔丰对甘孜各土司实行改土归流,收回孔撒、麻书、向利、朱窝、东科五土司及林葱土百户土地,归并设治,并收回土司印信号纸,委任候补知县寇卓为甘孜委员。甘孜全境划为五区,公举村长。并札场各寺庙遵章纳税,不得强迫百姓当喇嘛。

喻培伦等谋炸摄政王事败

1910年4月(宣统二年三月),同盟会员喻培伦(四川内江人)、黄复生(四川隆昌人)、汪精卫等在北京什刹海摄政王府前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败,黄复生、汪精卫被捕,喻培伦因当夜被推赴日本东京购炸药,得以幸免。

8669238人。

成都劝业场改名商业场

1910年4月(宣统二年三月),成都劝业场改名商业场。该场开业一年多,本地产品仅占十分之二三,其余为洋广货所占有。成都总商会认为需改变场名,名符其实。经具文稟请川督并报农工商部批准,正式易名。

据有关资料统计,1910年,商业场全年交易总额激增至白银46万余两,其中洋广货代销商谦益祥、田宝记、章洪源三家营业额合计为银5万余两。

1910年四川户口总数

1910年6月(宣统二年五月),四川总督赵尔巽向清廷奏报四川人口普查结果。报告说:根据民政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年度普查汇报人户总数的章程,四川于1909—1910年分次普查并先后汇报了全川140余厅州县人户数,并加上滨江、绵州等35属、崇庆州19属、华阳县等20属船户口数,共得:

一、户数:正户6503801;副户2682719户;船户18704户。共计9205224户。

二、口数:男31175522人;女19041508人,共计50217030人。

三、附查:学童4288689人,壮丁

四川设立“存古学堂”

1910年6~7月(宣统二年五月),四川提学使署司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说:“川省向为文学渊薮,署司所见考试优拔诸生文艺及各学堂国文试卷,明通瑰玮者固亦有之,而俚俗窳陋,触目皆是”。现奉学部明令,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堂”,以维国学。

“遵即派员就省城南门外,规定校舍,量加修葺,现已一律就绪,拟通飭各属,选求文理素优之生徒,备文申送,严加甄考,暂定一百名为额,即于本年下学期开办,以致力于理学、经学、史学、词章为主”。^①

有古学堂于1910年8月6日(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式开学。

《蜀报》创刊

1910年8月(宣统二年七月),四川咨议局的机关报—《蜀报》创刊。该报社长为咨议局议长蒲殿俊,总编辑为朱山,同时聘请蜀中名士肖湘、邓孝可、叶治钩、吴虞等为报纸特约撰稿人,阵容整齐。《蜀报》以“监督行政,促进立宪”为宗旨,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蜀报为何而作也?盖发生于九年预备立宪之明诏,而欲使政治思想普及于吾蜀,造成健全之舆论,直接为本

^① 《四川教育官报》1910年5月,第4册。

省咨议局之补助,间接而裨益政府之实力进行,以促国会之成立者也。”

《蜀报》共出 22 期,其内容多为批判君主专制主义,颂扬君主立宪,提倡民权,争取召开国会等类政治性文章,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年 3 月 11 日(宣统二年二月初一日),成都总商会所办《成都商报》改为日报,易名为《四川商会公报》,由《蜀报》编辑发行代表朱山、吴虞兼任主笔。1911 年(宣统三年)改由邓孝可主笔。该报充分表达了广大商民的反帝爱国的思想,反对铁路国有政策,坚守破约保路立场。路权斗争中,还出版争路副刊,影响颇大。不久改名《四川公报》继续发行。

四川民选资政院议员

1910 年 9 月(宣统二年八月),清廷为推进立宪进程,在京设立资政院,由全国民选议员赴京就职。四川民选资政院议员为李文熙、高凌霄、张政、刘伟、刘策勋、万慎等六人,其中五人是举人、增生、附生,一人是留日学生。

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成立

1910 年 9 月(宣统二年八月)全国立宪派领袖、江苏省咨议局议局长张謇在北京发动各省咨议局联合代

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四川咨议长蒲殿俊出任这次代表大会副主席,邓孝可担任书记。在省内,立宪派发动成都上层各界组织“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配合各省代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缩短立宪期限。同年 10 月(九月),立宪派在成都聚集 3000 余人到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早日召开国会。清廷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不得不诏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宣布将于 1913 年(宣统五年)召开国会。

省城开办电话

1910 年 10 月(宣统二年九月),四川总督赵尔巽批准四川巡警、劝业道报告,准予开办省城电话。批示说:“电话为交通机关,传达信息,颇资便利;而于商务、警务尤多裨益,筹办自不宜缓。”批示同意周善培关于设立电话公司的意见,由于电话效益未显,招集商股困难,先由巡警、劝业两道共同筹设省城电话公司,由公司息借官款银 35000 两试办,待一年以后,设法将官款按年抽还。

1910 年 11 月(宣统二年十月),省城电话公司动工兴建电话线路,电话机械已陆续运到,并将安装在电话局内,电话局设于华兴街,预定安设电话用户已有百余处。^①

^① 《四川官报》已酉十月中旬,第三十册,公牍;《四川官报》庚戌十月下旬,新闻,十一月中旬,新闻 3。

黔江起义

1910年12月(宣统二年十一月),同盟会发动了黔江起义。为发动武装起义,同盟会员温朝钟、王克明、谭茂林等于黔江县八面山小南海发起组织“铁血英雄会”。他们印制邹容的《革命军》万余册散发给群众,在湖北咸丰、利川,四川黔江、酉阳、彭水等地发展会员,参加群众多达万余人。1911年1月,温朝钟、王克明在彭水凤凰山率200人割辫起义,聚众千余人,分三路进攻黔江县城。知县王炽昌派把总曾吉芝据守要隘大垭口,革命军猛攻大垭口,斩曾吉芝,直逼黔江县城,知县弃城逃走。

1911年1月7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七日)革命军占领县城,召集全县群众大会,宣传革命大义。酉阳知州杨非霖闻讯领兵进攻黔江,革命军作战失利,进入咸丰县八角庙,川督赵尔巽闻讯,电飭酉阳及川东各属巡防军驰援,清廷急调川、鄂、湘、黔四省军队围剿,温朝钟、王克明相继遇难,起义失败。

武昌起义爆发后,王克明烈士之妻王杨氏率温朝钟余部再举义旗,光复县城,成立黔江军政府。民国初年,四川军政府将“铁血英雄”的金字匾额授予黔江,以表彰先烈;省议会亦通过议案,高度评价黔江起义,称这次起义“实为民国之先声。”

四川各类专门学堂概况

1910年(宣统二年),根据诸多资料综合统计,四川业已创办各类专门学校80余所,这些学校主要集中于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兹按地区分年分列于后:

一、成都

武备学堂(1903年)、川省高等学堂优级师范班(1903年)、淑行女子学堂(1904年)、成都府师范学堂(1905年)、四川机器局附设机器学堂(1905年)、蚕桑学堂(1905年)、客籍学堂(1905年)、矿务学堂(1906年)、铁道学堂(1906年)、藏文学堂(1906年)、农政学堂(1906年)、官班法政学堂(1906年)、通省师范学堂(1906年)、通省游学预备学堂(1906年)、省城劝学所(1906年)、毓秀女学(1906年)、警务学堂(1906年)、陆军弁目队(1906年)、陆军小学堂(1906年)、实业学堂(1907年)、自治研究所(1908年)、通省法政学堂(1908年)、农业学堂(1908年)、医学校(1908年)、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中等工业学堂(1908年由通省游学预备学堂改办)、中等商业学堂(1909年)、高等巡警学堂(1909年由警务学堂改办)、女子美术专门学堂(1909年)、官电学堂(1909年)、川中师范学堂(1910年)、实业教员讲习所(1910年)、存古学堂(1910年)。

二、重庆:

实验工学团(1904年)、四字讲社(1905年)、半日学堂(1905年)、东文学堂(1905年)、女工讲习所(1905年)、科学预备学堂(1905年)、医学堂(1905年)、重庆实业学堂(1906年)、巴县师范传习所(1906年)、川东师范学校(1906年)、重庆公立法政专门学堂(1906年)、私立游艺树坤学堂(1906年)、开智学堂(1907年)、重庆商业学堂(1907年)、省立重庆高级商业职业学校(1910年)。

此外,还有东亚女学、体育学校、懿行女学堂,共计45所各类学校。

三、泸州:

川南师范学堂(1905年)、私立女子师范传习所(1906年)、官办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

四、其他地区:

宁远府化夷学堂(1906年)、荣县女学堂(1906年)、打箭炉夷汉大同学堂(1906年)、蓬溪县女子师范学堂

(1907年)、宜宾县工科学堂(1908年)、乐至县医科专门学校(1907年)、川北师范学堂(1910年)、夹江县初等农业学堂(1910年)、蓬溪县初等实业学堂(1910年)、三台县实业学堂(1910年)、邻水县初等实业学堂、雅州府中等实业学堂(1910年)、保宁府农业中等学堂(1910年)、合江县女子师范学堂(1909年)、大宁县初等农业学堂(1910年)、开县初等实业学堂(1910年)、夔州府中等实业学堂(1910年)。

四川学务概况

1910年(宣统二年),四川官方统计四川学务情况:全省共有男学堂11224校,共有学生336078名;全省共有女学堂163校,共有学生5660名。全省共有男女教员15291名,共有教学管理人员7599名。兹将1909~1910年普通教育分年统计如下:

1909年(宣统元年)全省教育情况

学堂类别	学堂数	学生总数	平均每所学生数
普通中学堂	50所	5323名	160名
高等小学堂	221所	16094名	48名
两等小学堂	360所	16108名	45名
初等小学堂	8022所	233770名	30名
半日学堂	159所	4738名	30名
蒙养院	5所	226名	75名

1910年(宣统二年)全省教育情况

学堂类别	学堂数	学生总数	共有班级
普通中学	47 所		95 班
文科			21 班
实业科			17 班
高等小学	241 所		
两等小学	404 所		
初等小学	6946 所		
半日学堂	444 所		
简易识字学塾	2626 所		
改良私塾	9681 所(尚有 36900 所未改)		
女子两等小学	190 所		
女子初等小学	199 所		

竞存公司开业

1910年(宣统二年),夔州王毅达与兄王禹襄及黄启文、刘辅晨、王懋功诸人筹商,“共出资本银5000元,设立织布工厂,名曰竞存公司。”^①该公司用自己研制的木机生产,“专织洋纱”,每日每人可织布5丈,每丈约值市价八百四、五十文。

四川戒烟初见成效

1910年(宣统二年),四川戒烟数

年,成效显著。成都至重庆沿线,罂粟种植面积大为减少,重庆罂粟面积已减少7/10。除偏远各属推行禁政不力,尚有少量地区罂粟种植面积略有保留外,全省基本上得到控制。本年春,川督任命四位道台和48名委员前往各指定地区负责禁种事宜。

由于禁种罂粟后,四川每年将减少鸦片收益3000余万两白银,为填补因烟土损失带来的巨大亏折,川省开始实施由官商联合起来改良工农业和

^① 《四川官报》1910年第10册,《本省近事》。

发展新兴产业的计划,由官方提供贷款,兴办农工商企业。在禁种罂粟的大片土地上,建立农产品试验基地,种植豌豆、花生、小麦;在成渝地区,罂粟地改种甘蔗,发展制糖工业,同时着手试种优质棉花,准备以后大面积种植。

在烟土的禁销方面,川督规定了最后期限,在销区建立“存土公司”,为剩余烟土提供出口方便,货主在期限前可自由运出。对本省注册烟店、烟铺实行限量供应,重庆官膏局每月向每个城区老资格店铺供应 600~800 两烟土,老店铺再向注册店铺分配这批烟土。重庆在一年前有烟馆 860 家,本年只剩 81 家,过去零售烟价每两售制钱 270 文,现在上涨到 500 文,货品只能向四家官膏局购进。成都设戒烟局 6 所,凡已注册吸户,均可入局戒烟,不收费。重庆设戒烟所三处,免费戒烟。1911 年还对女瘾民进行登记,限期戒烟。

赵尔巽奏报四川筹备宪政情况

1910 年(宣统二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护督王人文向清廷报告四川筹备宪政情况,共分以下几端:

1、续办全省城乡自治:根据清廷要求,全省繁盛城会 40 处、乡会 10 处,本年夏间已设立议事会、董事会。巴州、叙永厅、郫县等 58 个中等城会也设立了议事会、董事会。岳池、叙永、泸州等厅州县乡也已成立 133 处。盐

亭、雷波等偏僻城会,简州(简阳)、绵州(绵阳)、成都、新宁(开江)、梁山、资阳、绵竹、仪陇、宜宾、仁寿、荣县、大竹等州县 67 处偏僻乡镇先后成立乡会。总计全省已成立城会 100 处,镇会 143 处,乡会 67 处。

2、筹办州县地方自治:清廷要求各省会地方首县筹设议事、参事等会,四川除成都、华阳(成都市区)两首县遵照筹设外,重庆府江北厅、巴县、泸州三厅州县同时成立。绵竹县也呈请批准成立。

赵尔巽奏报四川新政成效

1910 年(宣统二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护督王人文向清廷奏报四川新政成效说:

1、造报全省人户总数:清廷要求本年 10 月以前,应将各省人户总数一律报齐。四川全省人户总数及成都等 125 属人口总数、绵州等 35 属船户口数,已于上年上届具报,现将崇庆州等 19 属人口总数、华阳县等 20 属船户口数备总报齐。

2、复查各省岁出入总数:1909 年(宣统元年)四川出入款项,已经财政局清理编纂送部。

3、确定地方税章程:四川以上年为调查年限,将国家税、地方税同时厘定,分类列表送部。

4、试办预算、决算:四川本年试办预算表册,查照部定册式,编成总分各

册,并比较各表,先行遵限送部,复场司局共同协商,切实核减开支,另编册表,亦于8月(七月)咨部。

5、成立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四川已设立省城、重庆两处审判、检查厅,人员、经费表册已拟定报部,并已动工新建厅署及看守所,拟于本年开庭。同时还将在省城设立模范监狱。

6、推广简易识字学塾:四川遵照部章,由提学使转行各属,责成地方劝学所实力筹设,将部颁课本刊行各属,督令开学教课。全省就原有小学附设识字学塾2020处,就祠庙公所创设者606处,预备筹设者9017处,将来注重养成师资,认真改良私学,期于发展完善。

7、设立厅州县巡警,清廷限于年内完成。四川各厅州县巡警,初具规模者137属,加上即将设立的古宋、盐源、西昌三县,合计140属。

成都、华阳等县还设置乡镇巡警25处。

四川改良农业初见成效

1910年(宣统二年),四川改良农林牧副业已有成效,四川以务农会为基本推行单位,设置新式试验场,派遣留学生出国攻读农学,订立详尽的农业改进计划,开展各类讲习班普及农学。据四川劝业道周善培奏报:全省各厅、州、县共设农务分会99个,县以下乡场共设分会21个;各厅、州、县共设

农业试验场74处,并已分类引进外国良种;全省共植桑树2600余万株,共设缫丝厂18家,共设蚕桑传习所130余处,学生2400余名,并特开外洋技艺传习班,创立女子制丝传习所,共收蚕茧11140斤以上;为普及经济林木椿、桐、樟、杉、漆、蜡等,川省已在汶川县白龙池开办试验场,附设垦牧艺徒养成所,还设南川县金佛山乐屏垦务社,以便推广;全省兴修水利也有进展,如蓬州、峨边各属兴办塘堰多达3000余所,灌田40000余亩;对蔗糖生产,也相当重视,川省已成立糖务总局,下设蔗苗试验场、甘蔗品评会、糖业见习生养成所、粗糖改良模范工场,并正招股开办机器制糖公司。

同年,经劝业道批准,四川农务总会决定由各属选派赴日攻读农学学生,每府、厅、州、县派遣1~2人至4~5名。留学经费由各属摊派,学成回来,专任改良农业职务。留学公费将在薪金中扣还。

川军扩协为镇

1910年(宣统二年),川督赵尔巽加紧扩建新军,编足步兵两协,炮兵三营、骑兵、工兵、辎重各四队,共计兵丁8194名,由清廷编列为陆军第十一镇,朱庆澜为统制,驻防省城附近。同时决定在建昌道及雅州、打箭炉等地驻扎一镇,因保路运动起,这一镇并未建成。

民国初,改镇为师,改协为旅,改标为团,所谓四川陆军第一师,即清末陆军第17镇易名演变。

外国人费格生到川南彝族区探险
1910年(宣统二年),外国人费格生再次来川考察。此次前往川南彝族区探险,北起雅安,南至西昌,利用沿途所作平板测量,及一部分由土著居民采集而得的材料,制成本区百万分之一的地图。彝族区域向属土司管辖,未能设官治理,内地很难了解其详情。费格生所绘地图极有价值。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10年(宣统二年),经由重庆关进口的货物总值为1681.8万海关两,出口货物总值为1549.1万海关两,进出口贸易总值为3230.9万海关两。其中,洋货进口总值为1255.9万海关两(直接进口洋货总值为41.7万海关两),直接出口土货总值为1.92万海关两。

重庆进出口贸易变化情况是:棉纱和棉布进口量大幅度下降,生丝出口有所增加,废蚕茧的出口下降,猪鬃贸易仍在发展,羊毛需求增加,皮货贸易趋于停滞。

1911年(宣统三年)

王人文护理四川总督

1911年1月12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日),前督赵尔巽奉诏入京,调任东三省总督,四川布政使王人文护理四川总督。

四川通省商会联合会成立

1911年3月(宣统三年四月),四川成立通省商会联合会。是年,四川的商会数已达98处,占全国商会数的12.3%。该联合会是由成都商务总会

发起,联合重庆商务总会和全省各属商务分会、分所组成。该会以“涤除公共弊害,扩张公共利益,敦促会务之进行为宗旨”^①。会议要求全省绅商“高瞻远瞩,审世界之趋势,拓社会心理,将使全蜀商团人人皆有弧矢四方,经营八表之志,则民业日殖,国富日增”。联合会号召川省绅商奋起“商战”,力挽利权,以固国基。联合会以重庆商务总会为会所,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会议代表有提案选举表决权。

^① 《成都商报》1911年3月31日。

瞻对改土归流

1911年3月6日(宣统三年二月初六日),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札委米宗襄接收瞻对,7月(六月)正式收回瞻对后,尚未接获设置怀柔县的谕旨,札委试用典史米宗襄为瞻对委员。

川省戒烟再见成效

1911年(宣统三年)初,护理总督王人文继续推行严禁种植罂粟的措施,全川基本上没有农田种植罂粟。市场上出售的烟土都是商人按政府指令贮存在“存土公司”的,任何通过其它途径保存烟土都是违法行为,作为毒品没收。

从3月3日(二月三日)开始,全省关闭了所有向注册瘾民出售烟土的店铺,戒毒局、所对烟瘾很深的吸食者实行免费戒毒。

6月13日(五月十七日),海关明令禁止出口烟土。上半年,经由海关出口的烟土总数只有398担。

川省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以来推行的戒毒行动取得了基本成功。

赵尔丰署四川总督

1911年4月21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四川总督,护理总督布政使王人文赏侍郎衔,充任川滇边务大臣。周儒臣补授四川布政使。

川籍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广州起义,川籍革命党人喻培伦、秦炳、饶国梁、熊克武、但懋辛等参与是役,血战一夜,喻、秦、饶三人英勇牺牲。民国成立后与其他殉难者同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七十二烈士。

在此以前,孙中山等同盟会领袖认为,从乙未至庚戌(1905—1910年)起义不断失败,乃各地党人互不相谋,力量单薄,遭清廷各个击破所致,乃欲集中精英,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一举颠覆清朝统治。1910年春夏间,中山先生召集各地代表开会,决定在广州起义,由黄兴领导军事行动。吴玉章(荣县人)、喻培伦(内江人)、秦炳(广安人)、饶国梁(大足人)、熊克武(井研人)、但懋辛(荣县人)、张百祥(广安人)、蔡体平(广安人)等与各地同志先后至香港,参与密议和起义的准备工作。

年初,吴玉章奉派去东京,向同盟会总部汇报情况并组织起义的后勤事宜。王子骞(仁寿人)自日本沿海路,冲破重重封锁,运输枪械弹药至香港。喻培伦则积极研制于起义中使用的轻便炸弹。二月初,黄兴派喻培伦、熊克武、但懋辛等人潜赴广州城内调查敌情。黄旋率党人人城待举。4月27日清廷

两广总督张鸣岐得到党人中的叛徒密报,加强戒备。黄兴待援不至,于夜间匆促发动。喻培伦、饶国梁等百余人随黄直攻督署,熊克武率同志 17 人猛攻督署后门,秦炳则偕数人进袭水师行台,欲断敌后臂。喻培伦在东京时,因试验炸弹不幸炸废右臂,战前仍坚决请战。战斗中喻全身挂满炸弹,冲锋在前,痛歼顽敌。既而清兵三面合围,黄兴负伤,饶国梁率 20 余人英勇阻击驰援之清军主力——巡防军。义军与顽敌血战竟夜,终以弹尽援绝失败。秦炳于阵前壮烈牺牲。喻、饶受伤被俘。喻就义前,向清军慷慨演说云:“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饶则凛然谓清吏云:“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有何荣?求仁得仁,死有何憾!”并索纸笔,洋洋千言,概述革命大义,然后从容就义,清吏皆感动、慑服。熊克武、但懋辛幸而脱险,转赴香港。

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1911 年 5 月 9 日(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清廷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铁路,延误之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同时任命候补侍郎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迅速前往接管路事。

自《辛丑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主要通过向中国提供铁路投资的方

式控制中国铁路干线。截止 1911 年 5 月,清廷已接受列强铁路借款 16 次,总金额达 33957 万元,除已偿还 5895 万元外,负债 28062 万元之巨。借债修路的条件就是出卖路权,让帝国主义列强全面控制中国铁路的建筑权、经营管理权,实际上就是把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这是使中国彻底殖民地化的重要步骤。

粤汉、川汉铁路均为中国交通大动脉,帝国主义列强窥视已久。经过数年激烈争夺,1910 年 5 月 23 日(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中英公司、华中铁路公司代表英国银行团,德华银行代表德国银行团,东方汇理银行代表法国银行团,摩根、格林斐公司代表法国银行团在巴黎订立协定:1、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借款 600 万英镑给清廷建筑粤汉和鄂境川汉铁路;2、此项借款由四国银行团均分;3、一切建筑材料购置由四国银行团均分;4、粤汉铁路由英国派总工程师,川汉铁路由德、美、英、法四国分段指派总工程师。在列强的强大压力下,清廷被迫接受借款,宣布铁路国有已是势在必行了。

川汉铁路公司要求维持商办原案

1911 年 5 月 12~23 日(宣统三年四月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后,湖南、湖北、广东三省掀起争路风潮。四川绅商也通过各种形式要求清廷收回铁路国有成

命。

5月12日(四月十四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召集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兰村、副主席董事都永和等商议收路办法,不得要领。彭兰村立即与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讨对策、蒲、罗均感难办,主张召集临时股东会决定。

5月15日(四月十七日),川汉铁路总公司董事局致电邮传部,要求维持川汉铁路商办原案。邮传部置之不理。

5月23日(四月二十三日),川汉铁路董事局上海分局向成都报告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争路热潮高涨情况,川路股东大受鼓舞。

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签字

1911年5月20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代表清政府与英、德、美、法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金额600万英镑,利息五厘,40年还清,以两湖厘捐作抵押。清政府必须选用英国人担任粤汉铁路总工程师,德国人担任湖北境内川汉铁路总工程师,由“中英公司”和“德华公司”分别作为购买外洋各材料机器杂物的经理人。如上述铁路需要延展,上述银行有借款优先权。

四川绅商要求收路退款,王人文代奏暂缓收回路权

1911年5月下旬(宣统三年四月下旬),四川省咨议局呈请护督王人文代奏。呈文严厉批驳了清廷强加给商办铁路公司的种种罪名,从法制的角度提出,取消商办系剥夺人民权利,应由资政院议决。稍后又历数川路自办的艰辛,人民数年以来,万众一心的感人情形,要求清廷收回成命,以免激成民变。

5月28日(五月初一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商讨应付“非常变局”的对策。到会股东722人,集中讨论了如何对付清廷接收川路问题。与会代表情绪沉痛,意见分歧。邓孝可提出,只有清廷答应退还路款,才能承认路权国有。代表们反对清廷派员接收川汉铁路。会后,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翰林院侍讲学士衔编修伍肇龄等都上书护督王人文,陈述形势危迫,要求清廷取消铁路国有政策。四川咨议局、省城各法团绅商以及川籍京官均纷纷出面呈请清廷收回成命。

护督王人文在法团、绅商一再恳求下,再次电请内阁暂缓接收川汉铁路,此案应由资政院交咨议局议决。清廷对王人文严旨申斥,诬蔑川路公司“朘削脂膏,徒归中饱,殃民误国,人所

共知”。王人文“竟率行代奏，殊属不合。”^①

四川代表参加北京“宪政会”活动

1911年6月4日(宣统三年五月八日)，全国十六省国会请愿代表40余人，在立宪派领袖谭延闿、汤化龙等倡导下，成立“宪政会”，在北京设总部，各省设支部。四川支部由蒲殿俊、肖湘、罗纶、何耀先、胡庸章、李新展负责。宪政会以完成宪政为目的，主张实行“尊重君主立宪政体”，“督促责任内阁”，“厘理行省政务”，“开展社会经济”，要求清政府收回设立“皇族内阁”成命。四川咨议局副议长肖湘和各省议长联合上书，提出皇族内阁不合立宪政体，请另组责任内阁以安定民心。但是，清廷却顽固坚持“黜陟百司，系上君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②。宪政会各省代表闻讯极其愤怒，秘密相邀到国民公报报馆商议对策，决定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清廷绝无政治改革诚意，应当准备发动革命。蒲殿俊在归川途中联络湖南咨议局议员左学谦、周广洵共图义举时认为，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昭著不要人民了。我们要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们四川人民已有相当准备，希望联络各省，共策进

行。

清廷收路借款，绅商誓死保路

1911年6月11日(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四川绅商获悉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会街发出歌电，电称清廷准备将现存路款，一律发给股票。如川省坚持归还路款，清廷必须再借外债，而以川省财政作抵押。并令上海、武昌、长沙、宜昌、成都各电报局不得收发争路电报。绅商们通过川路公司痛斥盛宣怀取消租股，破坏公司。

6月14日(五月十八日)，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合同寄达成都，清廷借债卖路面目真相大白。四川绅商争路情绪高昂。邓孝可在《蜀报》第十期撰文，直呼盛宣怀为卖国贼，揭露此举夺路夺款，黑暗野蛮。号召川人坚持商办，反对国有，死里求生。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

1911年6月17日(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5月9日(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收回川汉铁路商办成命后，川汉铁路公司于6月16日召开在省股东及各团体开会筹商，到会者数千人，皆以收

^① 《宣统政纪》第54卷。

^②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页578。

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与会者决定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破约保路”^①。会后,蒲殿俊、罗纶等20余人连夜聚议,筹建保路同志会。

1911年6月17日上午,四川铁路公司召开大会,宣布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会址设在岳府街铁路公司内,公司特拨银四万两作同志会活动经费。大会由罗纶致开幕词,邓孝可、刘声元、程莹度等相继发言,言者历数清政府举债列国,出卖路权的亡国行径,听者无不声泪俱下。大会宣布同志会设总务、文牍、讲演、交涉四部,分别由江三乘、邓孝可、程莹度、罗纶任部长。

会后,保路同志会发动了到总督衙门的请愿游行。由80岁老人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头,罗纶、刘声元、池汝谦、彭兰村、叶秉诚、林山腴、邓孝可、蒙裁成随后。再后面是声势浩大的群众。这种由绅士们带头,群众参加的游行请愿,在清朝专制统治下的四川还是破天荒的事。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向全川各界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书》、《讲演部启示》、《致各府厅州县有司启》等文告。这些文告以外争国权、内争民主为宗旨,号召全川士农工商联合起来,“破约保路”。

《保路同志会宣言书》揭露满清皇

族内阁铁路国有政策的专横、野蛮,痛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是葬送人民于死地,将三省3600里路权彻底拱手送给外国的合同。四川保路同志会对这一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危亡的借款合同必须坚决反对,以表救亡之苦心。保路同志会要求省内外各府厅州县的自治会、城会、县会、教育会、农会、商会、股东会等团体团结一致,积极参加保路斗争。

重庆、成都各界保路同志会成立

6月28日(六月初三)重庆举行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到会者逾四千人。同日,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亦在成都新玉沙街举行成立大会,川东、川南、川北均有妇女代表莅会。大会发表“四川女子保路会告川中妇女书”,呼吁:“以我四千年无用之妇女,化为保国、保种之柱石”。该会发起人之一,江安籍的朱季(《蜀报》主笔朱山之妻)被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并往湘、鄂、粤三省联络各界同志。同日,省垣回民亦于东鹅市巷清真高等小学堂内,举行“清真保路同志协会”成立大会,到会回民四百余人,发起人为苏元泰、马德等,该会成为全省回族民众参加保路运动之倡。

7月(六月),由同盟会员梅树南、朱之洪等主持,重庆保路同志协会连

^① 三余会书社主人编《四川血》。

续召开万人大会,激励了群众的反清情绪。7月26日,重庆各界保路同志协会亦宣告成立,在会长王季兰的领导下,一致通过了“拒款、破约、保路、保国”的活动宗旨。

截至7月底,省内各州县已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同盟会成、渝两地机关部鉴于三月广州之役,因无人响应致挫败,乃掌握川人群情激昂、纷起争路之机,派员四出,策动武装起义。

据统计,6月28日(六月初三)至8月(七月),四川各地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共计67个,分布于全省64个府厅州县。参加保路同志会的群众基础十分广泛,包括爱国绅商、工农群众、青年学生、各界妇女,甚至优伶皂隶,均踊跃参加集会,捐款捐物,形成全民性的强大抗议运动。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及各类报刊竞相发行

1911年6月(宣统三年五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为加强破约保路的宣传活动,立宪派人士邓孝可向川汉铁路公司负责人建议,举办通俗报刊,使全川人民充分了解保路斗争的重要意义。于是,铁路公司拨银2400两,由邓孝可、朱山创办《蜀风杂志》,池汝谦等创办《西顾报》,江三乘等筹办《白话报》、《启智画报》等。保路同志会文牍部从6月26日(六月初一)开始编印《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辟有“报告”、“纪事”、“著录”各栏,专载有关保路运动的通讯、消息和评论。该刊物为日刊,后因发行量太大,纸张不敷改为双日刊。这些报刊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意义,揭露清廷铁路国有的卖国性质,号召全川人民奋起破约保路,拒绝借款修路,并声讨卖国贼盛宣怀。同时还宣传法制、人权和民主平等进步观点。

同年(宣统三年)秋,成都还出现过一种油印报纸《游艺报》,是黄方、张辑五诸人在监狱里印行的,在总府街出售,倾向保路运动,击中时弊,购者踊跃。

同年冬,武昌革命发生后,四川同志军势力大盛,又有《蜀醒报》出版问世(杨叔尧题写报名),每日曾销售7000~8000份。当时,成都巡防军不守军记,即将哗变,该报撰文议论军人,军人于12月6日(十月十六日)将报社捣毁,该报从此绝版。

四川保路同志会代表赴京请愿

1911年7月2日(宣统三年六月七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南较场隆重召开欢送大会,欢送刘声元等三人赴京,与四川在京咨议局副议长肖湘等和四川同乡会人士联合行动,竭尽全力向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劻请愿,揭露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夺路夺款,出卖主权的罪行。

8月(七月),刘声元等在京多方活动,与旅京绅商屡次集会,向载沣、奕劻等皇族当道上书,要求破约保路,收回成命,毫无成效。

9月10日(七月十八日),刘声元约集四川旅京代表,前往庆亲王府哭跪请愿,泣诉四川危迫局势,请求改变铁路国有政策,平息大祸,围观者逾数千人。奕劻使用计谋,诱捕请愿代表。9月11日(七月十九日),清廷下令将刘声元捉获,递解回川。

与此同时,四川保路同志会还分别派出代表前往湖北、湖南、广东各省联络同志,组织破约保路一致行动。川省代表除与湖北咨议局签订了联合保路协议外,在湖南、广东均遭到地方当局阻挠破坏,未获成功。

护督王人文被谴

1911年7月(宣统三年六月至闰六月),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因受四川人民保路爱国热情感染,一再上疏要求清廷破约保路,惩办卖国罪魁盛宣怀,以安定民心,维护国家主权,被清廷下旨严斥。

王人文,云南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本年1月(宣统二年十二月)由四川布政使护理川督。王人文不满清廷无视民瘼,实行祸国殃民的卖路政策。4月21日(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谕令

王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理川督,王坚不受命。王为政较开明,同情川省绅民的保路运动,曾一再为绅民代奏,要求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他上奏说:“收路国有之命,川人尚可从,收路而为外人所有,川人决不能从,借债主办内政,川人尚可从,借债而令外人夺我财政,川人决不能从。……即邮传部横施压力,强制川人,川人有死而已,不能从也。”^①

赵尔丰接任川督

1911年8月3日(宣统三年闰六月九日),新任川督赵尔丰在清廷一再催促下,到成都接印上任。

清廷虽于4月21日(三月二十三日)已下谕由赵尔丰署川督,护督王人文调任川滇边务大臣,王不肯受命。王同情和支持保路运动,多次上疏代奏为民请命,要求废约保路,严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清廷下谕申斥王人文,一再催促赵尔丰立即接任,端方、盛宣怀也联名致电赵尔丰,要他速赴川督任,因此,赵尔丰兼程赴成都上任。

川路股东特别大会

1911年8月4日(宣统三年闰六月十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全省各厅州县股东分会均派代表赴省开会,商讨保路新对

^① 王人文《辛亥四川路事罪言》。

策。

8月5日(闰六月十一日),股东特别大会在铁路公司正式开幕,罗纶任大会主席,到会代表500余人投票选举颜楷、张澜任股东大会正副会长。新任川督赵尔丰到会致“训词”,告诫会议代表:“惟当维持秩序,恪守范围,无事浮夸之议论,力求适当之解决。”

同日,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转来端方8月3日(闰六月九日)中伤股东大会电文:“蜀中近状嚣张,初十日开股东会,闻颇有地方喜事之人,参预鼓煽,其实公正绅董,颇不谓然。”李稷勋同时转来北京电文:清廷已有旨交川督“即将倡首之人,严拿惩办。”

8月7日(闰六月十三日),股东特别会议代表得知端方电文,“顿时会场声如沸鼎”。重庆代表朱之洪登台逐条驳斥端方诬蔑中伤,代表们齐声附和响应。会议当即通过抗议端方电文一通,利用赵尔丰与端方之矛盾,由赵代转。

8月9日(闰六月十五日),股东特别会议讨论了盛宣怀收买李稷勋吞没路款,没收路权问题,决议将李辞退,请赵尔丰责令李稷勋在十日内办理交卸手续,并反对邮传部任命李主持宜归段路工。

保路同志会在股东特别会议期间也召开职员评议会议,聚集六、七千群众为股东大会呐喊助威。

同盟会策划全川武装起义

1911年8月4日(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十日),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秦载赓等秘密召集各地哥老会首领在资州罗泉井举行“攒堂大会”,实际上是布署全川武装起义大事。出席会议的各地哥老会首领有:秦载赓、罗子舟、胡潭、胡朗和、孙泽沛、张达三、侯国治等人。有的首领未到,派出代表参加。

这次会议决定,改同志会为同志军,将保路运动转变为武装起义,于8月下旬(七月)在各地相机发动。会议推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起义工作,张达三、侯治国负责川西北起义工作。会议还决定向各地团练局及富绅借用枪支,向各县借用积谷及其它物资作为军火饷需。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哥老会占有很大比重,据统计,哥老会在全省16属,外16属,均组织了同志会,声势浩大,全国罕见。侯宝斋是川西南地区著名哥老会首领,1904年他召集各路哥老会集成数千人,组织“九成团体”(全川九府哥老会首领),并嘱人撰写《大同改良》一书,刊布四方,以申盟约。在罗泉井会议前,1911年7月,由侯宝斋借六十寿筵之名,出面秘召“九成团体”百余人在新津王爷庙举行重要会议。同盟会员秦载赓以哥老会首领身份提出武装起义主张。与会者决

议各回本属,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举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再图进取。

经过罗泉井会议,同盟会与哥老会进一步联合起来,为武力推翻清廷在四川的统治打下了基础。通过这次会议,同盟会以成立同志军的形式,把群众自发斗争纳入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统一了起义的指挥和步调,标志着四川保路运动开始向武装反清革命发展。

傅嵩炆奏请设立西康省

1911年8月10日(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六日),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炆奏请设立西康省。

奏折说:康地介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卫,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非特与川滇辅车相依而已。”其地为土司世守,“以数千里之地,分二、三十部落,皆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征服之实。”自赵尔丰经略川边以来,大部分地区已改土归流,设置府厅州县。目前“已成建省规模”,亟应及时规划,改设行省,俾便扩充政治,底定边陲。”^①

奏折建议新建之省名“西康”,取以康地建省之义。全省疆域东自打箭炉,西至丹达山顶,计3000余里;南抵

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4000余里。西康省经费,由四川解款项下支給每年以100万两银为定额,分春、夏、秋、冬四次拨给,每次拨银25万两。

傅嵩炆奏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西康建省之议遂被搁置。民国期间,经刘文辉一再向国民政府提出西康建省,终于在1939年元月,西康省正式成立。

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浪潮

1911年8月24日~9月7日(宣统三年七月初一至七月十五日),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全川人民参加罢市、罢课斗争。

8月24日(七月初一日)上午,在川汉铁路股东审查会上,重庆代表朱之洪要求股东会长公布清廷8月19日来电。会长颜楷报告电文内容说:清廷违背四川人民罢斥李稷勋的正当要求,仍派李稷勋总理川路路工。顿时会场群情激愤,哭泣声、喊叫声、咒骂声、捶胸顿足声、演说声交织,会议一致通过罢市、罢课决议。

同日下午,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与会群众得知清廷一意孤行消息,失声痛哭喊叫,一致要求前往督署请愿。罗纶、邓孝可等担心失去控制,说服群众,由他们向赵尔丰陈诉衷情。但是,成都全城已不约而同地关门罢市,百

^①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503~504。

业停闭;各学堂也一律停课。为解决罢市期间小商贩和苦力生计问题,各同志协会还设立慈善会,组织救济工作。

9月2日(七月初十日),保路同志会开会商讨罢市罢课问题,学界代表庄严宣布:“仍守前定宗旨,不达圆满之目的不开课。”^① 商界代表赞同学界代表决定,商界罢市与学界罢课相始终。学界保路同志会决定:各校学生离校回乡协助各地罢市、罢课,并组织抗捐斗争。

在抗议活动期间,保路同志会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超出“文明争路”范围,一方面通过川路股东会继续揭露盛宣怀、端方违法证据,请赵尔丰代奏;另一方面则散发《四川保路同志会公启》,为保路运动订立戒律:(一)勿在街头聚群;(二)勿暴动;(三)勿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② 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为表示他们争路不是反清,还连夜印发先皇牌位,正中大书“德宗景皇帝之神位”,两边联语为:“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③,神位分发全城居民,在每家大门供奉牌位。又在各街道中心区高搭“皇位台”,上设香案,供光绪帝牌位,下悬

“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幅。这种方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也使清廷无从挑剔,陷入被动。

由于省城学生回籍组织罢市、罢课,四川省城16属:成都、华阳、双流、金堂、新繁、崇庆、简州、新津、汉州等县,外属潼川府、嘉定、叙州府、资州、重庆府、五通桥等地相继开展罢市、罢课斗争。

全川展开抗粮抗捐斗争

1911年9月1日(宣统三年七月九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一致通过全省不纳粮税决议:

一、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

二、将本日议案提前交公司、咨议局,照例呈院,并启咨各厅、州、县地方官;

三、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

四、恳告全川人民,实行不买卖田地、房产;

五、广告全国人民,俟前四条实行后,自开市、开课。^④

川督赵尔丰电告清廷:“川人已定

① 《西顾报》第40号、41号,宣统三年七月十三、十四日。

② 《李劫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366。

③ 《蜀辛》卷上,页10。

④ 《蜀辛》卷上,页6~7。

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它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待毙。”川省司道以上官员联衔奏称:川民“不纳丁粮、厘税、杂捐,二千数百万之岁入顿归无着。四川一切行政固惟束手,而京部、洋偿、解协等款,全无所出,贻误实大。且滇、黔、新、甘、边藏向皆仰给于川者,亦将坐困。川一动摇,中央根本,西南半壁,无不受其影响。”^①他们要求清廷罢斥盛宣怀,重新考虑川路问题。

清廷坚持其顽固立场,拒绝接受川省地方当局的建议,严令端方入川查办。

成都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

1911年9月5日(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同盟会员朱国琛写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在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会场大门被大量散发给入场的股东代表。

《川人自保商榷书》旨在鼓动四川人民反清独立,它指出:“今因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翻然悔悟。两月以来,其团结力、坚忍力、秩序力中外鲜见,殊觉人心未死,尚有可为。及是时期,急就天然之利,辅以人事,一心一力,共图自保。”^②

商榷书明确倡议“现在自促条件”四条、“将本自保条件”15条,“筹备自保经费”办法5条,其核内容是筹措经费,“练国民军”,制造军械,武装群众,实现“川人自保”。

商榷书的问世,使清廷大为震惊。赵尔丰奏称:“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风靡全省,气焰嚣张,遂图独立。竟敢明目张胆,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③他们把商榷书看作是四川反清独立的信号,决心镇压日益高涨的保路运动。

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

1911年9月7日(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成都发生血案。

9月初,全省各县积极响应川路公司不纳粮税、不认外债的号召,抗粮抗捐斗争迅猛展开。9月4日(七月十二日),清廷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一协(师)入川协助赵尔丰镇压保路运动。

9月7日(七月十五日)赵尔丰借口《川人自保商榷书》隐含独立,开始镇压保路运动。首先查封立宪派和保路同志会的喉舌《蜀报》、《西顾报》、《四川商会公报》、《启智画报》以及《保

① 《赵季和电稿》第四卷,《致内阁》。

② 《川人自保商榷书》,《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页352~356。

③ 《愚斋存稿》卷81,《川督赵致内阁请代奏电》。

路同志会报告》等报刊,同时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

9月7日(七月十五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运动领袖人物——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铁路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和主事邓孝可、江三乘、胡蝶、王铭新、叶秉诚、彭兰村等九人,指为反逆,严加监禁。成都人民得知蒲、罗等被捕,十分震动,群众扶老携幼,沿街呼号,不约而同地蜂拥至督署请愿。赵尔丰令营务处统领田征葵率军开枪,屠杀平民,一时督署内外,伏尸累累,鲜血成溪,平民、学生、小儿无辜伤毙者甚众。赵又“驰放马队,分巡各街;冲截践踏,伤毙尤众”,此即在清王朝支持下赵尔丰制造的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它迅速激化了矛盾,成为同志军大起义的导火线。

同志军起兵反清

1911年9月8日(宣统三年七月十六日),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即下令全城戒严。正在城中的同盟会员龙鸣剑缒城而出,直奔城南农事试验场,偕同朱国琛、曹笃等人,削制木片数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全川,各地同志,迅速自保自救”21字,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时值秋潮水涨,音讯迅即传遍全川,成都附近的华阳、新津、双流各县同志军率先举起义旗,其它各地也纷纷揭竿而起。

9月9日(七月十七日),同盟会员华阳县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率义军千余人攻成都东门,与清军激战,并派人四出鼓动,征招同志。10日(十八日),同志军扩大至万余人,大张旗帜军械,围攻省城。11日(十九日)攻城失利,退至仁寿县籍田铺,设立东路民团总机关,数日内,队伍发展到20余万人。秦载赓所率东路军,旋与王天杰、龙鸣剑所统荣县民军,陈孔白所统井研民军会师于仁寿籍田铺,复与清军转战于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等蓉城近郊。然同志军卒以武器陋劣,遂放弃进攻成都,分兵收复州县。

同时,新津县哥老会首领侯宝斋率所部同志军,与双流县同盟会员向迪璋所领双流、温江、华阳、崇庆、郫县各场镇同志军6000余人会合,集中于双流县城和簇桥。9月9日(七月十七日)与清军激战于红牌楼,乘胜进迫成都城下。

同盟会员、灌县哥老会首领张捷先,郫县哥老会首领张达三统率西路军分五路向成都城郊进军,打死打伤清巡防军200余人。同时又击败清军第六十七标军,迫使清军退守城垣。同志军团团包围成都,砍断电线杆,阻截官方邮递文件,同清军英勇战斗。

温江同志军统领吴庆熙率军参加红牌楼战斗。9月16日(七月二十四日)与巡防军在辜家碾大战六小时,越日,又会同崇庆县同志军首领孙泽沛

在温江三渡水伏击新军,擒斩队官陈锦江,毙敌八九十人,缴械百余支,威名大振。

同盟会员蒋淳风曾组织西路同志军学生大队,由成都府属中、小学生500余人组成,与清军激战郫县、犀浦间,大队长蒋淳风阵亡,学生多英勇牺牲。原《西顾报》总编辑池梁矩(汝谦,立宪派人),编辑陈宽均投笔从戎,同时参加同志军武装起义。池为稍后綦江独立的领导人;陈为著名的东路同志军反清檄文的执笔者。省城学生(同盟会员)王西平亦于血案后,返西昌原籍组织同志军,策动各族人民反清起义。

崇庆同志军声势浩大,各区树帜开会声讨赵尔丰,攻占州衙,炸毁狱署,各乡镇响应者二千数百人,分东西南北中五军,其中以西军战斗力最强,与温江、大邑互相配合,断敌通讯联络,与清军大战数次。

数日间,华阳、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灌县、大邑、崇庆、邛崃、蒲江、广汉、金堂等成都郊县,富顺、荣县、威远、峨边等川西南州县群众纷揭义旗,每县大者万人,小者数千人,一时同志军大盛。到处砍断电线,截阻邮路交通,截留粮税作为义军饷需,使赵尔丰龟缩成都,坐以待毙。

9月11日(七月十九日),清巡防军第八营书记周鸿勋率部起义于邛州,旋进军双流,与南路同志军首领侯

宝斋会师于新津,聚众至10万,侯、周分任川南全军正副首领,掌管县政,军威大振。周鸿勋又乘胜攻占邛州,枪毙知州、劣绅,造成震撼全蜀之势。赵尔丰急令新军统制朱庆澜、提督田振邦亲率重兵会剿。侯、周协力保卫新津,激战达半月。由于同志军凭借岷江据守,又派人到灌县挖堤放水,使新津河水猛涨,东岸清军无法渡江进击。同志军采取偷袭侧击战术,牵制敌人。加之各地义军大力声援,使清军腹背受敌。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清军凭借优势火力,猛攻抢渡,同志军退守县城。12日(二十一日),清军破城,13日(二十二日),同志军向外州县转移。

10月(九月初)下旬,周鸿勋率南路同志军一部攻打嘉定(今乐山市)。在名山县城稍事休整后,由夹江、洪雅至牛华溪、五通桥,歼盐务巡防营,得快枪数百支。攻犍为失利。应荣县、威远同志军邀请,率部众千余驻荣县,被秦载赓、王天杰推为川东南同志军统领,合兵攻克自流井,旋为盐商借用川滇军之手所杀。周已加入同盟会,是策动四川清军倒戈反清的第一人。周率部趋驰川西南各县,发动各地起义战绩卓著,牺牲时年仅28岁。

大相岭阻击战

1911年9月10日(宣统三年七月十八日),荣经县同志军起义,推举李永忠集民兵编成荣字营五大哨口。

同时,同盟会员、哥老会首领罗子舟在雅州起义,建立同志军五营。李永忠派人约请罗子舟率军前往荥经共同抵御川边傅嵩炆部边军。当时同志军围攻成都,赵尔丰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炆部边军第十七镇六十六标标统叶筌部陆军,以及驻越西等地巡防军1万人,由傅嵩炆节制,从打箭炉、泸定、宁远等地兼程东进,集结于清溪(汉源)县,企图翻越大相岭,经荥经、雅州直扑成都。能否阻遏傅军东进,关系四川辛亥革命的生死存亡大局。9月18日(七月二十六日),罗子舟派刘殿臣率兵百余,与荥经县同志军200余人会合,与傅嵩炆边军激战于白马庙。当日中午,罗子舟领援军至荥经,在当地同志军配合下,歼击驻荥经巡防军200余人,获快枪200支。军威大振。罗子舟以“川南同志军水陆都督”名义,全力布署大相岭防务,调集各乡团勇分扎大关、鹅岭、晒垫坪等要隘,阻击清军,连日激战打退清军多次冲锋,清军统领马守城率队2000余人屡次突击,均不得越大关一步。

边军虽在大相岭被阻,但驻守雅州的2000余清军仍然严重威胁成都周围地区同志军。为此,罗子舟回师攻打雅州,但遭到重大挫败,伤亡惨重,罗子舟之弟罗老十率领的少数民族同志军全部壮烈牺牲。罗子舟被迫退走

洪雅、嘉定等地。

罗子舟等领导的大相岭阻击战阻挡清军精锐东进成都,使赵尔丰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状态,为四川辛亥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廷采取应变措施

1911年9月15日(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川西南遍燃起义烽火,清廷于本日急电湘、陕、滇、黔等省,令速派军“援川”。除前已派端方率鄂军入川外,又令前川督岑春煊赴川“办理剿抚”。岑于18日(二十六日)一面电奏清廷速调滇军来川备用,一面致电四川“父老兄弟”各安本业,等他到任后共筹维持挽救之策。20日(二十八日),岑又向川人发布“告蜀中父老书”重申前意,欲以镇压及欺骗两手扑灭保路运动。已率鄂军取道施南入川的端方,亦于9月15日发布“晓谕川人迅速解散告示”,诬川民为“乱匪”,扬言“本大臣自当督兵镇抚,除暴安民”^①。

赵尔丰配合岑、端的行动,表面上下令省城解严,迫商民开市。又设立筹防处,招募兵勇,分区分段严守省城。为欺骗人民,他除利用《成都日报》作欺骗宣传外,又开办《正俗白话报》作舆论工具,大肆兜售反革命说教。此外,还接连发布告示威吓各地团保绅

^① 《宣统政纪》卷60。

商,不得参予反清活动,并以重金悬赏捉拿“倡乱”首要人物。

10月2日(八月十一日),岑春煊见大局不可为,意存观望乃托病请求辞职,清廷不允,仍于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日)补授岑为四川总督。15日(二十四日),清廷谕令王人文开去川滇边务大臣,仍令赵尔丰为边务大臣,在岑未到任前,赵尔丰仍督理川省剿抚事宜。时武昌起义已成功,各省相继响应,行抵武汉的岑春煊终不敢赴任。11月6日(九月十六日),苟延残喘的清廷命端方在岑春煊未到任前,暂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不再担任四川总督职务。

各族人民竞相举行反清起义

1911年9月18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同盟会员罗子舟率原围攻雅州(今雅安)的汉、彝、羌各族同志军阻击由川边回援省城的清军傅嵩林部万余人于大相岭,为保持省城革命势力,夺取四川辛亥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月中旬前后,汶川藏族土司索代兴、索代赓率藏、羌族同志军协同灌县同志军占领威州,阻击从松潘回援省城之清军,并进而控制松、理、茂、汶地区,有力地支援了川西地区同志军的战斗。西昌的汉、回、彝、藏族人民亦在王西平、张耀堂等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斩西昌县令张庆,围攻西昌城。德昌各族人民亦“攻城杀官”,

重创清军,并杀德国教士二人。会理各族人民亦打死法国天主堂司铎贾元贞,进攻县城,再揭“反清灭洋”旗帜。打箭炉以西的川边藏区,道孚县数千群众一举焚毁法国天主教堂,攻占县衙,活捉清朝地方官杨宗汉。巴塘藏、汉人民亦集结万人,两度围困县城,藏、汉群众组成的武装起义军控制了川边广大藏区。

荣县宣告独立

1911年9月29日(宣统三年八月初八日),同盟会员吴玉章、东路同志军首领王天杰在荣县召集反正大会,宣布荣县独立,推同盟会员、广安县人蒲洵主持县政,驱逐清朝官吏,任命革命同志管理全县要务。同时,废除旧制度,发布新政命。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是辛亥革命中,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

荣县同盟会员王天杰长期在家乡从事反清活动。保路运动发生后,王天杰于8月27日(七月四日)鼓动县民罢市罢课,抗缴赋税,接管经征局,率民军训练所学生百余人,拘留县局委员。继而以民团训练所督办名义,组织民团武装千余人,在荣县五保镇起义。9月初(七月中旬),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后,荣县留日学生、四川省咨议局议员龙鸣剑星夜赶回荣县,与王天杰一道在荣县起兵,参加围攻成都的战斗。

正当荣县同志军出发围攻成都时,同盟会总部派来四川主持工作的吴玉章由东京回到了家乡荣县。龙鸣剑临行将荣县“一切大计”托付吴玉章筹划。王天杰、龙鸣剑离开荣县后,吴玉章承担起荣县反清革命斗争重任。他声张革命大义,驳斥封建势力对同志军的恶毒诽谤。为支援同志军的饷需,他采取按租捐款办法,筹粮筹款,输送前线。他加紧培训各乡民团,开办军事训练班,积极扩大革命武装力量,使荣县成为牢固的后方基地。

王天杰、龙鸣剑率领的五千同志军攻占仁寿县城后,与秦载赓部组成东路同志军。东路同志军在成都外郊与清军累战不利,王天杰、龙鸣剑遂与秦载赓分兵转攻各州县。在进兵叙府的途中,龙鸣剑不幸病逝。王天杰回师荣县,清知县和封建劣绅郭慎之等仓惶逃走,荣县独立条件业已成熟,吴玉章不失时机地提出立即推翻旧政府,夺取县政权的建议。王天杰等完全赞同吴玉章的建议,从而造成荣县独立新局面的实现。

川东北起义

1911年9月(宣统三年八月),同盟会员、洪门“孝义会”首领李绍伊聚众数千人起义,攻占大竹县城,称“同志军川东北都督”,发布反清檄文,分兵四出,屡破清军,进克垫江、广安、岳池、邻水,兵锋及于达县、东乡(今宣

汉)、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各州县纷起响应,均自行推举官吏,宣布脱离清廷独立,从而使渠江流域诸州县尽归革命势力范围,清政府在川东北的政权,遂被一举摧毁。后胡景伊主川政,忌恨革命党人,李绍伊被其诬杀。

四川政局面临崩溃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九月),新军思变,政局解体,赵尔丰坐以待毙。

为清政府培训新军干部的成都陆军小学堂第四、五期学生李家钰、余中英等,激于爱国热忱,聚众演说,支持保路斗争,并酝酿罢课。学堂总办姜登选率兵恫吓,被学生鼓噪驱逐,川督改任尹昌衡为总办,力图缩小事态。不少学生返原籍鼓动风潮,或迳加入同志军。

本月,清成都将军玉昆、川籍京官赵熙、乔树枬等不满赵尔丰屠杀川民,纷纷上奏弹劾。先后奉诏查办川事的端方、岑春煊与赵尔丰相互攻讦。充当端方代表的朱山、刘师培又至省城运动脱离清廷“自治”。赵尔丰亲信要员、布政使尹良以及田征葵、路广钟、王挾等辈又竭力怂恿“剿办”,而赵檄调的省内各处援军,却遭同志军阻击,自保不暇。新军虽奉命镇压同志军,但其中多数同盟会员及同情者,均不取积极行动,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就公然非议赵的高压政策,又不便公开支持

同盟会,思想极度矛盾。清廷所调援川之陕、滇、黔、鄂、湘军,除鄂军随端方入川外,余皆观望迟疑,进展缓慢,不起作用。赵尔丰尚能指挥的巡防军十营,被同志军痛歼后,龟缩城内,不愿出击。赵既捕蒲、罗而士绅离心,倚靠武力则军心涣散。城垣之外八方告警,四面楚歌!于是赵尔丰惶惶然,如同置身于沸鼎。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本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举行武昌起义。次日,成立湖北军政府。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桂、皖、粤、闽、川等省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迅速解体。

12月,孙中山回国,经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

英驻渝领事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

1911年10月31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十日),各国驻渝领事和炮舰司令官召开联席会议,磋商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后四川的局势和各国的对策。会议决定,在川省政局恶化的情况下,通知各国在渝侨民、传教士和外交官在11月6日(九月十六日)以前必须

撤离,由炮舰护送到宜昌。会后不久,英国驻渝领事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式的文告,声称:如果中国不能很快平息四川的“反叛”,英国就要进行干涉。

威远独立

1911年11月1日(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由吴玉章、王天杰派遣的同盟会员胡御阶带领2000多同志军一举攻下威远城,宣布威远独立。但胡御阶听任士绅们选举豪绅董伯和为正军政长,自己仅任副军政长。不久,端方派湖北新军和清巡防军进攻威远,董伯和企图拥原威远县官徐昭益复辟。胡御阶果断地处死了徐昭益。董伯和等豪绅遂四处扬言,胡御阶杀了父母官,全城人民要遭殃,并于11月11日深夜派人将胡御阶绑架杀害,向端方报功。

夏之时率新军于龙泉驿起义

1911年11月3日(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同盟会员夏之时率新军一部于简州龙泉驿起义,进军重庆。

夏之时,合江人,曾留日学习军事,返川任新军十七镇排长。保路事起,曾化名参加筹组《西顾报》,著文鼓吹兴汉。后随军戍龙泉驿,以革命大义感动士卒。至是率新军步兵一队,骑兵辎重兵各一排宣誓起义,被推为中华革命军总指挥,率队兼程赴渝,途中又收编原归附的新军某协步、炮兵各一

排,沿途经乐至、安岳、潼南、合州均传檄而定,重庆革命党人派朱之洪迎义军人渝,促成了重庆的光复。

蒲殿俊等被释放

1911年11月14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赵尔丰被迫释放蒲殿俊、罗纶、江三乘、张澜、胡嵘等9人,设宴款待,请彼等每日到督署会商川事。蒲等被其软化,发布“哀告全川叔伯兄弟”文告,要求起义民众“罢兵息争,各归乡里”。“然各道民军扶义反正,与同志会画然两事,非蒲、罗等所能动矣。”^①而此时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岌岌可危,因此蒲、罗等人亦同南方各省立宪派一样,在此革命大动乱中,利用革命党人的经验不足,捷足先登,抢夺政权。

涪州光复

1911年11月18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同盟会重庆机关部代表谢持、高亚衡协助下,长寿同盟会员廖于亚、左先臣等起兵驱逐清吏,于县城宣布独立,建立政权,为川东之倡。

20日,高亚衡以长寿兵至涪州(今涪陵市)助李郁生等宣布独立,成立涪陵军政府,由高亚衡任司令。旋分兵下丰都、忠州、彭水、石柱,所至皆逐清官,树汉帜,建立政权。民国成立后,

高亚衡被袁世凯在四川的代理人川督胡文澜逮捕下狱,险遭枪决。

大汉蜀北军政府建立

1911年11月21日(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大汉蜀北军政府于广安成立。

1911年9月,四川同志军起义爆发,川北革命党人立即响应。同盟会员曾省斋、张观风等人在垫江起义,11月21日进入广安城,当即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曾省斋为都督,张观风为副都督。旋分兵连克岳池、营山、射洪、蓬溪诸县。垫江、大竹、渠县、邻水等县已先期光复。四川反清革命建号称都督者,以曾省斋为最先。蜀北军政府于1912年8月撤销。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

1911年11月22日(宣统三年十月初二),张培爵、杨庶堪等人领导同盟会重庆支部,会合夏之时所部新军,在重庆举义,宣布独立。清地方官吏或降或逃,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蜀军政府成立,设军政府于巡警总署。

蜀军政府根据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建立政府机构。11月23日通过政府机构人选名单。都督府为最高机关,由张培爵、夏之时分任正副都督,杨庶堪、朱之洪任顾问。下设总司令处(总

^① 《辛亥四川革命纪事》、《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

司令林绍泉)、参谋部(部长但懋辛)、总务处(处长谢持)、军政部(部长方朝珍)、行政部(部长梅树南)、财政部(部长李湛阳)、军需部(部长江经源)、司法部(部长邓絮)、外交部(部长江潘)、交通部(部长杨霖)、秘书院(院长向楚)、审计院(院长李时俊)、监察院(院长熊兆飞)等机构。

蜀军政府成立次日,发表《对内宣言》和《对外宣言》,宣布政府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详细阐述了军政府的内外政策。同时制定《减厘办法》,明令裁减厘捐、杂税,并成立大汉银行,以朱之洪为正办,接管大清、浚川源银行。

11月25日创刊《皇汉大事记》,由朱国琛主编,宣布军政府政策法令。以后改为《国民报》,由燕翼任总编辑,作为蜀军政府的机关报。

蜀军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和“廓清全蜀”,组建步兵七标和炮兵一营,积极准备西征、北伐。川东南57州县相继独立,宣布接受蜀军政府节制。

泸州、万县、自贡光复

1911年11月25日(宣统三年十月初五日)同盟会员杨兆蓉等策动泸州官绅学民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建川南军政府,举原川南道尹刘朝望任都督、酒业巨商温翰桢任副都督。川南军政府建立后,重庆蜀军政府认为该军政府的都督及部长人选,没有同盟会

同志,尽是清朝旧官僚,是假独立,欲派兵进攻。刘朝望惶恐不安,即请同盟会员杨兆蓉等协助改组川南军政府。12月初,泸州召开川南15州县代表会议,将川南军政府改组成以同盟会员为主,完全听命于蜀军政府。

11月25日,万县原清巡防军管带刘汉卿率部反正,被推为下川东蜀军副都督,夔府、巫山、云阳相继光复。

11月下旬,自贡亦宣布独立,成立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议长陈湘涛(进士、盐商,曾任清知府)。

革命党人诛杀端方

1911年11月27日(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随“查办”川路事件的“钦差大臣”端方入川的鄂军中的革命党人,杀端方于资州,传首重庆。此前,入川鄂军中的革命党人田智亮等得武昌起义消息,即与同盟会重庆机关部密约,共同举义。及至蜀军政府成立,田等即发动鄂军官兵易帜反正,杀端方及其弟端锦。然后拔队东下,过内江,援助地方独立,全队路经重庆时,谢绝了重庆军政府挽留,携械乘船返回湖北。

内江光复

1911年11月28日(宣统三年十月初八日),内江成立革命军政府。荣县独立后,同盟会员吴玉章、吴庶咸来到内江,与过境的鄂军中党人取得联

系,经过策划,决定在内江起义。消息传出,清吏纷纷逃走。11月28日,吴玉章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内江军政府。公举吴玉章为行政部长,吴庶咸为军政部长。但此时重庆已宣告独立,蜀军政府电催吴玉章赴渝。12月2日,吴玉章离内江,内江军政府改组,由同盟会员谢绍廉任军政长。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1911年11月27日(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慑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长江以南省份已纷纷宣布独立,乃与省垣士绅邵从恩、蒲殿俊等集议,达成转让政权的“四川独立条约”30条,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由原省谘议局局长蒲殿俊出任都督,原清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除旧立宪派人分任都督府要职外,另以原陆军小学总办、彭县人尹昌衡为军事主任。尹为都督府内唯一的较接近同盟会的军人。赵尔丰仍居督署,窥测方向。赵尔丰虽然让权退位,但仍居督署,由他的亲信朱庆澜任副都督,掌握兵权,并对蒲殿俊进行监视,伺机反扑,卷土重来。加之蒲殿俊软弱无能,军政府内部不团结,这个政权仅仅存在了12天就发生了民变,军政府解体。

成都兵变,藩库银遭洗劫

1911年12月8日(宣统三年十

月十八日)成都发生兵变。

事变起因是:成都独立前后,附省同志军中哥老会势力强大,其中有不少流氓无产者,寻衅闹事,为所欲为,形成一股破坏力量。清朝的巡防军,要求发欠饷,也群起哄闹,加之赵尔丰党羽又暗中煽动叛乱,遂酿成兵变。

12月8日上午,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在成都东较场阅兵。巡防军十三营和部分陆军乘机索饷哗变,执枪射击将台。蒲、朱等惊惶脱逃。军政府“各职员……尽墙而走,军政府为之一尽”。叛军蜂拥入市,首抢大清银行、浚川源银行、藩库,次及商业场、私家银号、票号和东大街各商号,“省垣公私财货、军需利器,抢掠一空”。时人估计,“公私损失财产不下千万金,全省精华尽于此劫”。据稍后统计,仅清代藩库银,实际损失为白银356万余两。藩库被洗劫后,无银支付军饷,四川军政府财政部以四川银行名义制发军用银票,强行流通。此项军用银票于12月下旬开始发行,初定发行总额为300万元,至1912年12月底,已达1500万元。

四川军政府成立,赵尔丰被诛

1911年12月10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日),四川军政府成立。

成都兵变后,军政部长尹昌衡由东较场脱逃后,驰赴陆军小学,带领陆小学生军占领成都北门并布防于北门

至北较场一带。尹昌衡又赴凤凰山军营招来由周骏、宋学皋等统带的新军63标入城平叛,乱事稍定。同志军吴庆熙、孙泽沛、侯国治等部也在城内维持治安。12月9日(十月十九日),新军将领周骏、彭光烈等约集成都绅士徐炯、邵从恩、张澜和同盟会人士在北较场集会,推举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12月10日(十月二十日),四川军政府取代了已经崩溃的大汉四川军政府。

四川军政府在都督府正副都督下设总政务处和军务、巡警、民政、财政、学务、司法、实业、交通、盐政、外交等十部。同盟会负责人董修武任总政务处总理并兼任财政部长,同盟会员杨维任军事巡警总部总监,同盟会员杨庶堪任外交部长,政府成员中,同盟会会员显著增多,据当时统计:“十分之六是同盟会员”,其次是立宪派和少量会党人士,军务部长则为参加平息兵变的原清军标统周骏。

12月11日(十月二十一日),四川军政府发表告全蜀父老子弟书,严禁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坚决镇压烧杀抢掠的破坏分子。尹昌衡每夜亲自带兵巡街,杨维负责平乱安民,带领军警四出巡察,严厉惩治破坏治安秩序者,使省城很快安定下来。当时,聚集成都新、旧各军多达20万,四川军政府及时对他们进行了改编,即将入城平叛的第十七镇新军改编为四川陆军第一

师,各县驻省同志军改编为第二师,巡防军残部整编为第三师。

12月22日(十一月三日),四川军政府以赵尔丰暗通北庭,教唆兵变,乱中乘机使用总督名义发出文告,图谋颠覆军政府,派遣都督护卫团团长陶泽琨率兵赴督署将其逮捕。经军法处审问后,处以极刑,斩首示众。辛亥中各省封疆大吏为革命军所杀者,仅赵一人。

旗兵和平缴械

1911年12月23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清成都将军玉昆命令驻防旗营的全体满、蒙旗官兵向军政府缴械,并在汉民协助下自谋生计。为争取旗民问题和平解决,通省师范学堂监督徐炯、四川高等学堂监督周凤翔前往满城晓谕,军政府副都督罗纶独自一人迁住满城(原名“少城”,今之人民公园一带),使担心受到种族报复的满蒙人民消释顾虑。军政府拨款20万元由董修武等协助创办“同仁工厂”,主要安置满、蒙人民劳动就业(今西城的同仁路即因而得名)。辛亥革命进一步打破了成都满城二百余年间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四川满、蒙、汉人民的文化、技术交流和兄弟民族间的友好交往。

成渝对峙和四川统一

1911年12月24日(宣统三年十

一月初五日),蜀军政府认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川南、川北大部地区虽已独立,全川尚待平定,乃用张培爵、夏之时名义,电请黔军援川,要求“与滇军分头并进,期以早日平定全蜀”。而四川军政府的尹昌衡则欲以武力统一全川,成渝两个军政府一时形成对峙局面。

但四川的革命党人很快认识到这种对峙的危害,急谋早日实现统一。尤其是援川滇军乘机在四川扩张势力,抢夺地盘,有意在四川制造分裂,只承认蜀军政府,对四川军政府则攻击中伤,还借机遣散和镇压同志军,杀害川南总司令、同盟会员黄方及部下百余人,使四川各界均感严重威胁,从而认识到了合并统一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成渝两地政府合并,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11年12月29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日),四川军政府致电蜀军政府提出统一的初步条件,其要点有:

1、以成都为四川政治中枢,四川军政府设于成都;

2、重庆应设重镇,置镇抚使一人,领兵一镇;

3、拟以成都正都督为四川正都督,重庆正都督为四川副都督;

4、两处副都督,拟担任重庆镇抚使或枢密院长及军事参议院长;

5、各部长官,由两地人才组织之。

此后,双方电函相商,专使往来,

终于达成协议。1912年1月27日,成渝代表以四川军政府提出的合并条件为蓝本,拟就成渝两军政府协议合并草约十一条,双方签字盖印,后经成渝两军政府批准生效。新成立的四川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为正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罗纶任军事参议院长,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杨维任军事巡警总监,董修武任总政务处总理兼财政部长,谢持任总政务处副总理,周骏任军务部长,邵从恩任政务部长,杨庶堪任外交部长,其中,同盟会员居多数。

1912年2月17日,四川军政府致电孙中山、黎元洪、黄兴,报告四川统一经过。四川统一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

成渝分别派代表赴南京参加选举会议

1911年12月29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南京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议,17省代表出席,公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重庆军政府代表为张懋隆、黄复生、李肇甫、熊成章(均同盟会员)。四川军政府代表为肖湘(立宪派人)、周代本(同盟会员)。

雅属反正

1911年12月下旬(宣统三年十一月中旬),原清廷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林前奉赵尔丰命,率军万余进犯

省城,遭雅属同志军阻击,相持于天全、荥经间,滞留于雅安。而今,尹昌衡命川军第二师师长彭光烈率部会同民军合击傅军,边军投降,傅被解省,雅属得反正。

大汉银行建立

1911年12月(宣统三年十一月),四川军政府派员接管原大清银行在蓉的全部资产,改组为“大汉银行”。不久,军政府令铸“汉”字壹元银币和当五十文铜币。

蜀军政府平内患

1911年(宣统三年)冬,蜀军政府平息林绍泉、吴克勤叛乱。林绍泉为旧军官,曾充夏之时上级。9月(十月),随义军入渝,被夏荐为蜀军总司令,旋改任征西军先遣司令,心怀不满,煽动部属图谋颠覆。吴克勤为前川江巡警提调,伪装投诚,私招外兵,图谋不轨,事败,蜀军政府宣布吴的罪行处以极刑。对林则撤去职务,遣送回湖北原籍,因林认罪态度较好,又有夏之时求情,故免死。

破除盐茶引岸征税办法

1911年12月(宣统三年冬月),四川军政府宣布破除盐岸(各地专销口岸),将各岸引盐税款一律改为就盐

场征收。破除腹茶(内销细茶)引岸和边茶(边区粗茶)引岸,边岸行票,边茶税另定征收办法,腹茶税免征。原征关税和厘金也予撤销。破除盐、茶各专销口岸后,历代盐茶专卖制度实际上被废除,盐、茶产品在产区完税后,即可自由行销,即所谓“一税之后,不问所之。”

内江制糖业臻于鼎盛

1911年(宣统三年),内江制糖手工业达到极盛时期。沱江流域是著名甘蔗产区,制糖工业有悠久历史。本年仅内江地区即有糖房1200家以上,漏棚1000家以上,年产糖清达100万担,白糖24万担,桔糖36万担,水糖25万担,冰糖4万担。清末内江糖商曾一度组织“精糖公司”,筹集资本达50万元,拟用新式机器制造,“旋因办理不善,即告倒闭。”^①

四川对外贸易概况

1911年(宣统三年),经由重庆关进口货物总值1907.1万海关两,出口货物总值1007万海关两,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14万海关两。其中,洋货进口总值1256万海关两(直接进口洋货总值27.8万海关两),直接出口土货17.1万海关两。

由于席卷全川的保路风潮和同志

^① 重庆中国银行:《四川省之糖》等93页,1934年出版。

军反清起义的影响,洋货的进口,因进港船只数量和吨位比上年下降30%,正常的交货延迟,遇到了严重障碍。各种洋纱的进口量都继续下降,各类布匹进口量维持在中等水平,煤油却从上年的20.7万加仑一跃而为85.8万加仑。土货的出口虽因土药的禁止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在前3个季度,出口

货物有了全面增加。9月(八月)初开始,出口因政治危机而日见下降。武昌起义发生,重庆货物停止外运。

全省人口总数

1911年(宣统三年),四川全省居民总户数为905.0215万户,人口总数为4344.2815万人。

编 后 记

本书的编纂工作是1983年5月开始的。十年间,编纂工作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年5月~1985年8月),为收集资料阶段。编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到图书馆、档案馆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包括巴县档案、丛书方志、报刊资料等,抄录和复印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重大事件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排比整理,对大事编写范围、收录标准、纪述方法作了认真探索。

第二阶段(1985年9月~1988年8月),为制定和修订大事条目提纲,试写重点大事、编写资料长编阶段。1986年9月完成初稿50余万字(油印本),1988年7月完成第二稿40余万字(油印本)。初稿和第二稿均先后呈送省志编委领导审阅,第二稿还邀请有关部门专家学者评议,得到不少宝贵的批评建议。

第三阶段(1988年9月~1991年1月),在一、二稿的基础上,删去枝蔓,突出大要,增补阙佚,修订史实,加

工锤炼,统一体例,开始编写送审稿。1991年1月完成送审稿打印工作。

第四阶段(1991年2月~1994年3月),对送审稿进行进一步加工锤炼、增补删改工作。送审稿于1991年2月报送省志编委领导、省志总编室和省志总编班子审阅。1991年6月以后,编者根据省志编委领导和各位总编意见和建议,再次进行修订。与此同时,又将打印稿按分志和专志分类剪贴,分送省志各分志、专志编委征求意见,请求他们修订和增补有关分志大事条目。陆续返回的意见和增补内容大都为本书的修订工作采纳或部分采纳。

最后需要说明本书编纂工作分工和撰稿情况:本书主编工作由张学君和任一民分担,张学君担负具体编务工作和主要条目的撰稿任务;任一民指导编纂工作并审定已完成的稿本(在审稿时,补写过少量条目)。参加编纂和撰稿工作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系李祖桓先生和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历史室张莉红同志。李先生参加了本

书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初稿中川军抗英、李蓝起义、咽噜反清等条目;张莉红完成了教案和反洋教斗争、太平天国在四川的战斗、四川机器局和丁宝桢治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等条目,并承担了数易其稿时繁重的编辑和抄稿工作。

此外,本书有关外贸概况引述了周勇、刘景修译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

发展》中有关统计资料,分年人口概况引用了李世平、程贤敏教授主编、成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近代四川人口》第65~68页用内插法修正过的1840~1911年四川人口统计表中数据,特此申明,并向二书编者致谢。

编 者

94.7.20

